



ISSN 3080-3039
eISSN 3080-3047

维普数据库全文收录

国际中文学术期刊数据库ICAJD 收录期刊
中国国际中文期刊卓越行动计划 建设期刊

Modern
Education



香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
HONG KO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WISVORA

主办：广东国图出版管理有限公司



2025

第1卷第3期

3

Journal of Modern Educational Studies in China

中
国
现
代
教
育
学
报

中国现代教育学报

Journal of Modern Educational
Studies in China

主管 香港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院

主办 广东国图出版管理有限公司

编辑出版 《中国现代教育学报》编辑部

编辑部邮箱 jyx@wisvora.com

投稿地址 www.wisvora.com



中国国际中文期刊卓越行动计划 建设期刊
国际中文学术期刊数据库ICAJD 收录期刊

总编辑 梅见华

编辑委员会

陈科存	孙文杰	苏天	穆艾伟	熊森浩
刘伟伟	吕憬岩	黄少安	刘宇	叶明裕
陈曦	景瑞宾	崔健	王正威	李泽宇
姚金芳	李明蔚	吴钰双	穆尚海	曹一君
陈立立	舒波	袁臣辉	郝澳茹	

版权声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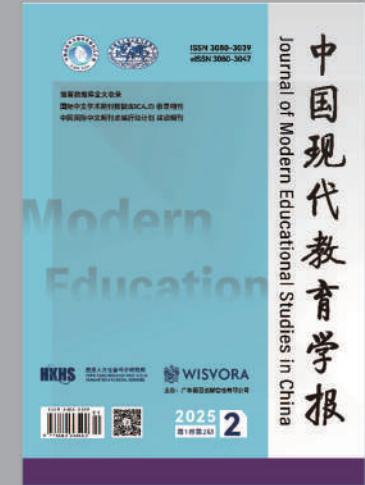
文章版权由文章作者与维思沃尔出版社(WISVORA Publishing)所有。单篇文章由 WISVORA Publishing 正式出版, 所刊载文章均依照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进行许可。根据该许可协议, 任何第三方在明确署名原作者与出处的前提下, 均可对本刊内容进行复制、传播、演绎使用, 无需作者及出版社另行个别授权。



香港人文社会科学院
HONG KO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香港人文社会科学院专注于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与交流, 旨在为学者提供研究支持, 并促进知识的共享与应用。研究院通过出版学术期刊、举办学术会议及提供政策建议, 推动学术界与社会各界的对话与合作。

网址: www.hks.ac.cn 邮箱: info@hks.ac.cn



维普数据库
全文收录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印刷出版 ISSN 3080-3039
电子出版 ISSN 3080-3047

出版社 WISVORA Publishing
维思沃尔出版社

地址 香港新蒲岗景福街99号启德
工业大厦8楼D07

wisvora-publishing@wisvora.com
www.wisvora.com

中国大陆引进
北京中科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大陆运营
广东国图出版管理有限公司



WISVORA
Publishing



微信扫一扫

维思沃尔出版

学术无界，普惠可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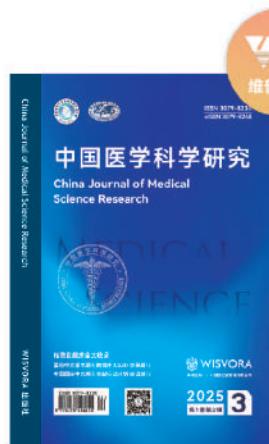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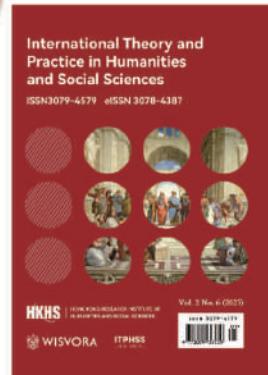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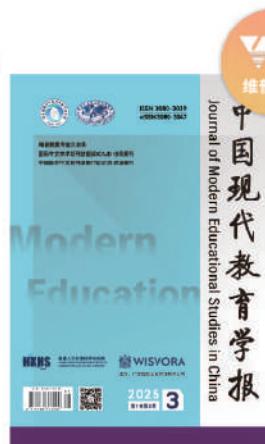
Scholarship Without Borders, Access Within Reach



WISVORA

Gotu Track

国图出版



WISVORA是一家致力于促进创新和社会进步的国际学术出版商。我们相信，跨学科前沿研究对于理解世界和解决现实挑战至关重要。WISVORA出版社汇集了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和实践者，致力于打破学科界限，将研究见解与实践经验相结合，为应对全球挑战提供深入的分析和有效的策略。

WISVORA还致力于推动中文学术成果的全球传播，设立多个覆盖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管理、艺术等领域的中文学术期刊，为中文作者提供更便利、更高效、更专业的发表选择。我们重视学术原创性与表达自由，采用快速审稿、开放获取、普惠版面费机制，努力构建一个包容、多元、国际视野下的中文学术传播平台，助力更多优质中文研究走向世界、服务社会。

学术无界，普惠可及

Scholarship Without Borders, Access Within Reach

10+

我们目前已成功运营10余本学术期刊，涵盖人文社科、管理、艺术、教育等多个领域

我们运营的期刊数量

400+

已有来自全球的300多位学者参与我们期刊的编辑、审稿与学术合作

我们的合作学者数量

10000+

我们的作者社群已超过3000人，汇聚青年学者、博士生与研究机构专家

我们的作者社群规模

www.wisvora.com

目 录 TABLE OF CONTENTS

人工智能背景下高等教育的思考与实践 - 张凯, 宁君, 宋法质, 董岳, 刘杨	1-3
中日韩三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律框架体系比较研究 - 张炜琼, 朱国闻	4-15
教育强国背景下高素质专业化体育教师队伍建设的困境与路径研究 - 秦淼	16-20
高校啦啦操运动员不同性别赛前心理状态的对比趋势分析 - 李怀哲, 徐文峰, 韩君翊	21-26
小学高年级学生性教育认知现状研究: 以 W 市为例 - 吴慧玲, 陆一丹, 宋方港, 吴奕冉, 郑屹焰, 侯利兵, 薛彬鹏	27-31
从废墟中振兴: 威廉三世在柏林大学创立中的角色探析 - 田叶景	32-36
针对“双非”院校文科硕士生就业难的网络舆情分析 - 叶新雨	37-42
新课标视角下: 中美体育教育课程对比分析 - 姜亦宣	43-47
供应链可持续尽职调查的框架与实施——基于供应商 ESG 审核的视角 - 马杰	48-57
科学微电影创作: 中学科学教育与影视艺术融合的实践路径探究 - 周剑霜	58-61
高校学前教育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协同路径研究 - 俞雪琴, 杨晓岚, 谢小华, 顾蓓蕊	62-66
“何以为能”: 大语言模型时代翻译专业学生核心能力的解构与重塑 - 陈巧云	67-69
民国时期文艺作品中的嘉兴方言词汇研究 - 司琦琳, 邓彦, 孙婧宜	70-74
思想政治教育课程议题式教学实践研究思考 - 王艺璇	75-78
数智赋能高校足球个性化教学模式的实践路径研究 - 乔伟, 项和平, 王逸	79-82
唐山故事融入“大思政课”的一体化机制研究 - 张健, 周颖芳, 王璐璐, 王海红	83-87
“影视画面造型”课程教学设计与实践探析 ——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 - 邢璐	88-92
虚拟世界中的自我认同: 时空模糊性的教育哲学探讨 - 侯睿辰	93-97

中小学课间延长的网络舆情分析 - 胡卓妮	98-103
幼儿自我调节的干预研究—以深圳市 x 幼儿园为例 - 黄绮婷, 李丽婷	104-107
“双轮驱动”背景下现代产业学院专业建设质量提升路径研究 ——以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与产业需求协同为视角 - 邹鸣民, 郑懋云	108-120
中国特色政治话语翻译中的人机协作模式研究——基于《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白皮书官方译本与 DeepSeek 译本的对比分析 - 陈巧云	121-125
基于 GIS 的 3D 建模与分析技术在房地产质量评价中的应用 - 林詹滨, 张蒙莉, 虞小燕, 李昆松	126-132
从解构到重现: 清宫宝座造形风格的形态建构 - 蔡志军	133-140
问题、现象、超越: 质性研究视域下的书法理论寻绎 - 余阔洋, 张祐铭	141-148
敏捷治理视角下“矛盾化解在基层”数字化转型路径的实证考察——以成都市郫都区“一站式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为例 - 杨沛璇	149-157
“螺旋递进、多元协同”: 现代产业学院产教融合课程体系的构建路径研究 - 邹鸣民	158-166
中外对比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以广东东软学院为例 - 赵晓沁, 钟海权, 徐文聪	167-171

人工智能背景下高等教育的思考与实践

张凯¹ 宁君^{2, #} 宋法质^{1, #} 董岳¹ 刘杨¹

(1.哈尔滨工业大学,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2.大连海事大学, 辽宁 大连 116026)

摘要: 人工智能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动人类社会的变革, 其影响已深刻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乃至教育的各个领域。作为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 高等教育在人工智能背景下面临着全新的机遇与挑战。人工智能技术不仅推动了教学理念和课程体系的重构, 还为课堂教学、学习评价和人才培养提供了新路径。本文以人工智能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为研究对象, 系统分析人工智能与教育理论的契合点, 提出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思路, 旨在增强高校教师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能力, 促进教育工作目标的顺利实现。

关键词: 人工智能; 课程实践; 高校教学; 教学模式

DOI: doi.org/10.70693/jyxb.v1i3.72

1 研究背景

当前, 人工智能技术正以空前的速度加速演进, 持续地影响着全球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格局。从医疗领域的智能诊断, 到交通领域的自动驾驶, 从金融领域的风险预测, 到制造业的智能生产, 人工智能已广泛渗透到各个行业, 成为推动产业升级和创新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人工智能作为一门新兴的技术科学, 源于计算机科学、心理学、哲学等多学科的交叉与融合, 其核心任务在于研究和构建能够模拟、延展乃至拓展人类智能的理论、方法与应用系统^[1]。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 人工智能技术已经产生并将不断催生各领域的新产品、新技术、新业态, 是一个引领未来的新兴交叉学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对我国人工智能的发展进行了总体部署, 大力推进跨学科的探索研究, 着眼于提升人工智能创新的源头供给, 从基础理论前沿、共性关键技术、支撑平台建设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完善体系布局, 促进学科间的交叉渗透与资源共享, 着力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应用型人才^[2]。

2 人工智能对高等教育的影响

近年来, 各大高校纷纷探索“人工智能+X”的研究生培养模式, 并深入研究如何能够将传统的学科专业壁垒打破, 从而将相关学科之间进行有效衔接, 加强复合型人工智能交叉人才培养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为了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并实现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有必要在教学过程中加强学科交叉与产教融合。这不仅是面向新经济背景下深化新工科建设的核心议题, 也是专业发展亟待解决的关键任务^[3]。接下来将从多维度全面分析人工智能对高等教育的影响。

表1 传统教学与AI教学的区别

维度	传统教学	AI时代
教学理念	以教师为中心	以学习者为中心
课程体系	学科交叉有限	注重跨学科
教学方式	讲授为主、互动有限	多元化、高互动性

作者简介: 张凯(1993—), 男, 博士, 副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网络化智能控制以及健康监测;

宁君(1988—), 男, 博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船舶运动控制;

宋法质(1987—), 男, 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超精密运动控制;

董岳(1988—), 男, 助理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超精密运动控制;

刘杨(1982—), 男, 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高精度智能控制。

通讯作者: 宁君, 宋法质

评价体系	结果导向、标准化	过程导向、多元化
------	----------	----------

2.1 教学理念的转型

人工智能推动高等教育从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转向“以学习者为中心”。借助大数据分析与智能推荐, AI 能够为学生提供个性化学习路径, 使教育从“标准化灌输”走向“因材施教”。这一转型不仅提升了学习效率, 也更加符合教育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4-5]。

2.2 课程体系的重构

在人工智能背景下, 课程内容和专业设置面临深刻调整。一方面, AI 技术自身成为高校新兴学科和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方向; 另一方面, 传统学科也需要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 形成“AI+X”的复合型课程体系, 从而满足社会对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迫切需求。

2.3 教学方式的革新

人工智能改变了高校课堂的运行方式。智慧课堂、虚拟实验室、智能助教系统等应用, 不仅提升了课堂的互动性与趣味性, 还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 推动线上线下深度融合。学生的学习不再局限于课堂内, 而是可以在智能平台的支持下实现随时随地学习, 增强了学习的自主性与灵活性^[6]。

2.4 教育治理与评价的智能化

人工智能能够实现对学生学习过程的动态监测与精准分析, 为教学质量评价和教育决策提供数据支持。通过学习分析系统, 教师可以及时发现学生的学习瓶颈, 制定针对性教学方案; 学校管理层也能基于大数据优化资源配置, 提升教育治理的科学性与效率。然而, 智能化治理也带来隐私保护、学术伦理等新挑战, 需要制度与技术的同步保障^[7]。

3 高校教师在人工智能背景下的应对策略

面对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高校教师既是改革的推动者, 也是适应者。教师的转型与应对能力, 将直接决定教育改革的深度与效果。具体而言, 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表 2 人工智能背景下的应对策略

应对策略	关键要素	内容描述
形成教学新理念	更新知识结构	主动学习 AI 相关的基本理念
适应教学新角色	以学生为中心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跨学科整合能力
探索教学新模式	采用混合式教学	结合人工智能技术, 探索新型教学模型
树立教学新规范	强化责任意识	引导学生正确使用人工智能工具

3.1 强化人工智能素养, 更新知识结构

面对人工智能快速发展, 高校教师首先需要主动学习和掌握 AI 相关的基本理念、工具和应用方法。例如, 熟悉学习分析平台、智能辅助教学软件以及虚拟实验环境等, 使自己能够在课堂中科学使用新技术。同时, 教师应持续更新自身的知识结构, 将人工智能与学科前沿结合, 避免知识老化^[5]。

3.2 转变教学角色, 增强指导与引领能力

在智能化学习环境中, 教师的角色正由“知识传授者”转向“学习引导者”和“价值塑造者”。教师应更多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与思维方式,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批判性思维与跨学科整合能力, 发挥人工智能无法替代的人文关怀和价值引领作用。

3.3 探索创新教学模式, 推动课堂变革

教师应结合人工智能技术, 积极探索混合式教学、翻转课堂、项目驱动学习等新型教学模式。例如, 利用智能推荐系统为学生设计个性化学习路径, 通过虚拟实验室弥补硬件条件不足, 通过智能助教减轻重复性事务, 从而把更多精力投入到教学设计与学术研究中^[8]。

3.4 重视教育伦理与学术规范, 强化责任意识

人工智能的应用同时带来数据安全、隐私保护和学术诚信等挑战。高校教师在教学和科研中必须树立良好的伦理意识和责任感, 引导学生正确使用人工智能工具, 避免学术不端行为。同时, 应在课程中渗透数据伦理与技术治理的相关教育, 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与价值判断能力。

4 结论

人工智能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是深远而多维的, 它不仅推动了教育理念、课程体系、教学方式和人才培养目标的转型, 也对高校教师的角色与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一背景下, 高校教师需要不断更新知识结构、转变角

色定位、探索创新模式，并高度重视教育伦理与学术规范。唯有如此，才能在人工智能时代实现教育的高质量发展，真正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复合型人才。

参考文献：

- [1] 赵明, 刘磊, 马钦, 等. 依托产学合作育人的人工智能课程建设和实践[J]. 计算机教育, 2021, (10): 24-27.
- [2] 李冬, 张志佳, 王珺琦, 等. 多元融合视域下“人工智能+控制”创新人才培养探索与实践[J]. 智能制造, 2025, (02): 128-131.
- [3] 薛红, 倪健, 孙胜娟. “学科交叉、产教融合”实践教学机制探索[J]. 计算机教育, 2024, (03): 223-227.
- [4] 李海宝. 人工智能对应用型高校基础课程教学的影响及应对策略[J]. 大学教育, 2025, (16): 17-23.
- [5] 宋海涛, 吴文瑞, 张春越. 智能教育生态下的高校教师角色转变: 人工智能能否成为“教学合伙人”? [J]. 大学教育, 2025, (14): 6-9+17.
- [6] 薛敏, 许莉. 人工智能对高校教师教学工作的影响及应对策略[J].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4, (02): 85-88.
- [7] 陈健, 曹可欣.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政课个性化教学的策略选择[J/OL]. 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1-8[2025-09-08]. <https://doi.org/10.16124/j.cnki.cn13-1390/c.20250903.002>.
- [8] 王鹏涛, 陈建, 左卫广, 等. 人机协同教学理念下高校教师人工智能素养提升对策[J]. 高教学刊, 2025, 11(25): 164-167.

Thoughts and Practices on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Kai Zhang¹, Jun Ning^{2, #}, Fazhi Song^{1, #}, Yue Dong¹, Yang Liu¹

¹ School of Instrument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rbin, China

² College of Navigation, 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 Dalian, China

Abstra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reshaping human society at an unprecedented speed, with its influence profoundly extending into the realms of economy, politics, culture, and education. As a key arena for knowledge creation and talent cultivation, higher education now encounters both fresh opportunities and pressing challenges in the age of AI. The advancement of AI not only drives the rethinking of teaching philosophies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curricula but also opens up innovative pathways for classroom practices, learning evaluation, and talent training. Focusing on the impact of AI on higher education,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its alignment with educational theory and proposes strategies for teaching reform, aiming to strengthen educators' ability to integrate AI technologies and to better achieve educational goals.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urriculum Practice; Higher Education Teaching; Teaching Model

中日韩三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律框架体系比较研究

张炜琼¹ 朱国闻¹

(1.韩国岭南大学, 韩国 大邱 38541)

摘要: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交织的背景下,国家认同面临多维挑战,东亚地区中日韩三国通过法律框架规范爱国主义教育,以维护文化主权与应对外部冲击。本研究基于比较法学视角,系统分析三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律体系的制度逻辑与实践特征。研究发现:中国以《爱国主义教育法》为核心,构建了层级分明的法律框架体系,强化总体国家安全观与人类共同体意识;日本在和平宪法框架下形成“宪法约束—政治实践”动态博弈,通过隐性渗透平衡和平主义与国家主义;韩国依托“传统符号—安全叙事”双轨体系,突出反殖民记忆与文化主体性。三国宪法基础差异显著:中国强调多民族统一与历史延续性,日本受和平主义与教育中立性制约,韩国融合儒家传统与民主理念。核心法律层面,中国采用专门立法模式,日韩则依赖分散立法隐性渗透。配套法规政策中,中国注重原则性条款,缺乏系统性量化标准和结构化实施细则,日韩两国操作性和连贯性更强。研究揭示三国共同面临历史责任平衡、全球化应对与代际认同转型等挑战,提出中国需借鉴日韩地方差异化实践与隐性教育经验,构建“传统内核—现代表达”的本土特色体系,在意识形态整合与开放包容间寻求动态平衡,为全球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东方智慧。

关键词: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教育;日韩爱国心教育;思想政治教育;道德教育;国家认同

DOI: doi.org/10.70693/jyxb.v1i3.73

作为民族精神的核心要素,爱国主义是维系国家认同的情感纽带和凝聚社会共识的价值基础。在现代法治国家,爱国主义教育既是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更是宪法赋予的国家责任。

从国际局势来看,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浪潮的交织使国家认同面临多维挑战。东亚地区作为全球经济与地缘政治的核心地带,中日韩三国在历史记忆、文化传统与现实利益上的复杂互动,对区域安全与合作构成持续影响。在此背景下,爱国主义教育作为塑造国民身份认同的核心机制,成为各国维护文化主权、应对外部冲击的重要战略工具。中日韩三国都面临着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共同挑战,迫切需要通过完善法律体系保障爱国主义教育的规范化实施。

从内部环境来看,中国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2023年10月24日通过,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的颁布是中国爱国主义教育制度化建设中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大事件。然而,全球化带来的价值多元、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渗透,青年群体价值观的多元化趋势,以及东亚区域内历史认知分歧等问题,对中日韩三国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效性提出了新挑战。这种内外交织的复杂环境,为比较研究三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律框架提供了重要的现实依据。

当前,我国爱国主义教育在法治化进程中仍存在制度结构性矛盾、区域发展失衡等问题。与日韩两国相比,我国在教育内容衔接、实施主体权责划分、公民参与机制建设等方面尚需完善。开展跨国比较研究,既能借鉴东亚邻国在法律体系构建中的经验教训,又能立足本土实践探索符合国情的法治路径。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深化实施的背景下,系统研究三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律框架的异同,对于推动区域文化认同、促进东亚命运共同体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对当前学术界现有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性整理研究发现,国内学界对爱国主义教育的研究多集中于德育理论建构与实践路径探索,对法律保障机制的系统性研究相对不足。近年来,部分学者开始关注日韩教育立法经验,但大多停留在制度表层描述,缺乏基于法律文本的结构性深层比较分析。国外研究则主要聚焦于东亚民族主义形成

作者简介:张炜琼(1995—),女,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教育政策;

朱国闻(1997—),男,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视觉传达。

通讯作者:张炜琼

机制,对教育法律体系的跨国比较较少涉及。^{[1][2][3][4]}现有成果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但尚未形成基于法律规范分析的完整研究框架,亟需从规范法学视角开展创新性研究。日韩学者的研究多集中于本土教育模式的自我阐释,基于跨国比较视角的文献成果有限。^{[5][6]}

本研究基于比较法学的视角,系统考察中日韩三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律体系的制度逻辑与实践特征。通过剖析三国宪法原则、教育基本法及专门法规的内在关联,揭示法律框架在价值导向、实施机制、保障措施等方面的不同。重点探究三国如何通过立法平衡国家认同建构与公民权利保障的关系,以及法律规范在应对历史争议、塑造现代国民意识中的作用机理,为完善我国相关法律体系提供理论参考。理论层面,本研究突破传统德育研究的单一视角,构建“法律规范—文化传统—社会治理”三维分析框架,拓展爱国主义教育研究的法学维度。实践层面,通过解析东亚邻国的制度经验,为我国爱国主义教育立法提供可资借鉴的域外样本,助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教育体系。同时,研究成果对深化中日韩人文交流、增进区域政治互信具有积极推动作用,为东亚地区文化治理提供新思路。

一、中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律框架体系

中国爱国主义教育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制度化、体系化建设,体现了国家对公民精神塑造的战略布局。根据现行法律框架与最新立法动态,相关规范可划分为5个层级,1部宪法、22部核心法律、5项配套法规、557件地方性法规及部门规章、10余件政策性文件,形成覆盖教育内容、实施机制、保障措施的立体化法律体系。按照法律效力位阶从高到低的顺序,将当前中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律体系以金字塔图形式绘制,如下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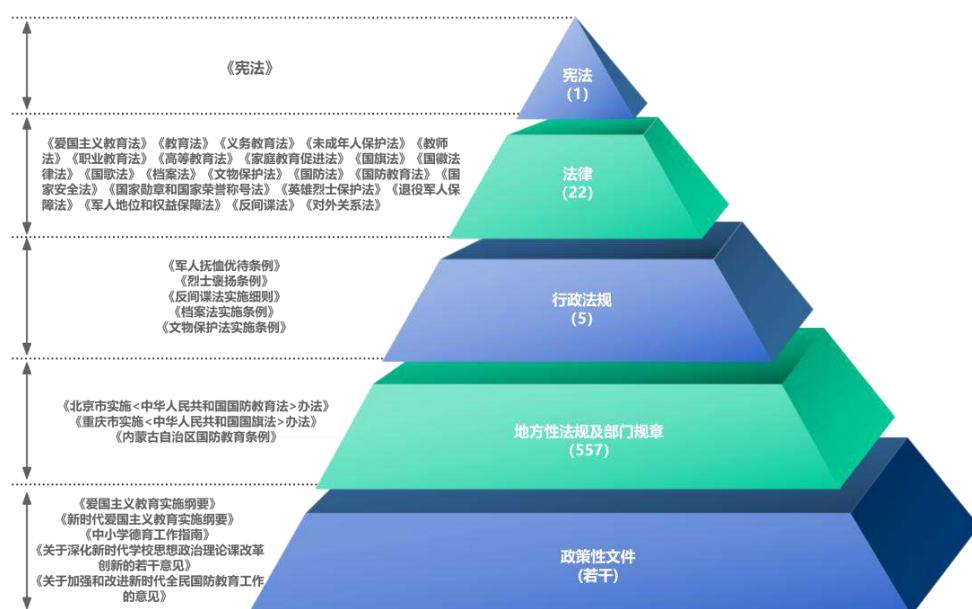


图1 中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律体系图

下面,本研究将基于宪法基础、核心法律、配套法规(包括行政法规与地方性法规及部门规章)、政策文件4个维度,并列举相关法律条文来展开具体分析。

(一) 宪法基础: 国家根本法决定爱国主义教育的价值导向

“爱国主义精神与宪法制度在维护国家利益、拥护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反对外来侵略、保障民主权利以及增进民族团结方面表现出来的一致性,说明宪法与爱国主义精神之间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7]《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年)作为国家根本法,通过序言、总纲、公民基本义务及国家象征等条款,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爱国主义教育宪法框架体系。该体系以国家认同为核心,通过历史叙事与现实责任的双重维度,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宪法依据,表现出鲜明的民族性、突出的政治性、丰富的时代性与内涵的广泛性。

宪法序言以“中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历史叙事,确立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法理基础,将爱国主义定位为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特别通过“台湾属权”条款,将领土完整与国家统一纳入宪法义务体系,既强调历史延续性又突出现实责任感。这种宪法表述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历史合法性与现实紧迫性的双重支撑,将国家认同教育与完成统一大业的历史使命紧密结合。总纲第24条首次以根本法形式确立“五爱”公德体系,将爱国

主义教育融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整体布局。第 52~55 条通过公民基本义务条款，构建起包括维护国家统一、安全荣誉利益、抵抗外国侵略等在内的责任体系。第 22 条和 28 条关于历史文物与国家安全的规定，为《文物保护法》《反分裂国家法》等下位法提供宪法依据，形成从价值倡导到行为规范的完整教育链条。这种“权利—义务”对等的宪法设计，将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有机统一。

国家象征条款（第 141~143 条）通过国旗、国歌、国徽等符号系统，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具象化载体。特别是将《义勇军进行曲》确立为国歌，既传承革命历史记忆，又赋予新时代精神内涵。这种符号化表达形成“视觉一听觉一情感”的多维度教育场域，通过仪式化实践强化国民身份认同。该宪法体系呈现三个显著特征：在价值维度上实现历史传统与现代文明的辩证统一，在规范维度上形成原则宣示与具体义务的逻辑衔接，在实践维度上构建制度保障与情感认同的双重机制，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理智慧。

（二）核心法律：爱国主义教育制度化的四梁八柱

以宪法为基础，我国构建了包含 22 部核心法律的爱国主义教育法律体系，形成四大支柱性规范群。

专门立法（1 部）：2024 年施行的《爱国主义教育法》作为首部专项法律，“克服了以往爱国主义教育制度缺乏纲领性法律总领的困境”^[8]，明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涵盖思想政治、历史文化、国家象征等九大领域。该法突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统一领导、齐抓共管”的实施机制，建立从学校到家庭的全方位教育体系，对破坏教育秩序、损害国家象征尊严等行为设定法律责任，填补长期制度空白。

教育领域法律（7 部）：《教育法》确立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目标^[9]，《义务教育法》强调德育首位^[10]，《未成年人保护法》规范教育内容^[11]，《教师法》明确教师育人职责^[12]，《职业教育法》突出职业道德教育“德技并修”^[13]，《高等教育法》强化社会责任培养^[14]，《家庭教育促进法》推动家校社协同^[15]。这些法律构建起贯穿全学段的爱国主义教育链条。

“国家象征与历史保护类”法（5 部）：《国旗法》《国徽法》《国歌法》规范国家标志使用^[16]，《档案法》加强文化教育服务^[17]，《文物保护法》推动文化遗产传承^[18]。例如《国旗法》要求学校每周升旗，《文物保护法》规定重点文物单位配套建设教育展示中心，形成具象化的爱国主义教育载体。

“国家安全与英烈表彰类”法（9 部）：《国家安全法》《对外关系法》《反间谍法》维护国家主权、构建总体安全观^[19]，《国防法》《国防教育法》强化国防意识^[20]，《反分裂国家法》开宗明义遏制“台独”^[21]，《英雄烈士保护法》弘扬英烈文化、筑牢民族精神之基^[22]，《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退役军人保障法》发挥军人在爱国主义教育中的作用^[23]。这些法律从安全保障与精神传承角度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内涵。

（三）配套法规：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细则与领域延伸

宪法确立的教育原则通过行政法规与地方性法规实现体系化延伸：

行政法规层面：国务院颁布的《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烈士褒扬条例》构建英烈褒扬机制，修订增设“荣誉金增发比例与功勋等级挂钩”条款^[24]。《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建立分级保护制度，要求全国重点文物单位配套建设教育展示中心^[25]。《反间谍法实施细则》明确公民举报奖励机制，将抽象爱国情怀转化为具体法治实践^[26]。

地方性法规层面：北京建立“市级统筹—区级联动—社会参与”的国防教育基地网络^[27]，重庆市首创“重大场合仪式化教育”模式^[28]，内蒙古构建“国防教育+民族团结”的融合机制^[29]。这些探索既落实国家立法要求，又融入地域特色，形成“一省一策”的创新格局。

两类法规呈现鲜明的协同特征：行政法规侧重原则性规范与资源保障，地方性法规侧重操作性细化与情境化实施。当前配套法规体系呈现三大演进趋势：在价值导向上强化“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如《档案法实施条例》新增“数据安全”“网络安全”条款^[30]；在实施路径上推动“线上线下融合”，如北京开发红色文化数字资源库；在保障机制上构建“法律责任闭环”，如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推动建立“国防教育问责制”。这种动态调整使爱国主义教育始终保持时代适应性与实践穿透力。

（四）政策文件：爱国主义教育实践的行动指南

政策文件形成“顶层设计—学段衔接—课程融合”的实施体系，以下举例说明。

《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2017 年）：按学段设置递进式德育目标，形成“历史传统—现实成就—未来使命”叙事逻辑。如上海卢湾中学基于“众教育”理念开发“中国系列”校本课程^[31]，实现爱国主义从宪法原则向教育活动的转化。

《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2019 年）：继承 1994 年纲要基础上实现三大突破，构建十大教育模块、创新八大实践载体、强化法治保障，推动教育形式转型。例如“同升国旗、同唱国歌”等仪式礼仪通过《国旗法》修订转化为学校常规制度。^[32]

《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2019年）：通过“内容重构—教学创新—评价改革”三位一体改革，将爱国主义教育深度融入思政课教学体系。构建“四史教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课程群，推广“大思政课”实践教学模式。^[33]上海商学院与中共一大纪念馆共建中共一大纪念馆新媒体与元宇宙实验室，使爱国主义教育从知识传授转向价值创造，形成“理论认知—情感共鸣—行动自觉”的育人闭环。

《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全民国防教育工作的意见》（2022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聚焦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党委领导、军地协同、社会参与”的立体化教育体系，通过强化领导干部国防培训、将国防教育纳入学校课程考核、建设数字化教育平台等举措，推动全民国防意识与国家安全教育深度融合，形成覆盖全域、贯穿全程的国防教育新格局。^[34]

这些政策文件呈现从宏观战略到微观实施、从单向灌输到多维互动、从知识本位到素养导向的演进特征，构建起“宪法原则—政策指引—实践创新”的立体化教育生态，为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国际视野的新时代公民提供制度保障。

二、日本爱国主义教育法律框架体系

日本爱国主义教育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体系化建设，体现了国家在历史认知与国民精神塑造上的战略平衡。根据现行法律框架与立法动态，其规范体系可划分为6个层级，1部宪法、12部核心法律、8项配套政令、2件省令、若干件地方条例、4种政策文件，形成以宪法为基础、政策文件为指导、法律为核心、配套法令为补充的复合型规范体系。按照法律效力位阶从高到低的顺序，将当前日本爱国主义教育法律体系以金字塔图形式绘制，如下图2所示。（政策文件本身不具备法律效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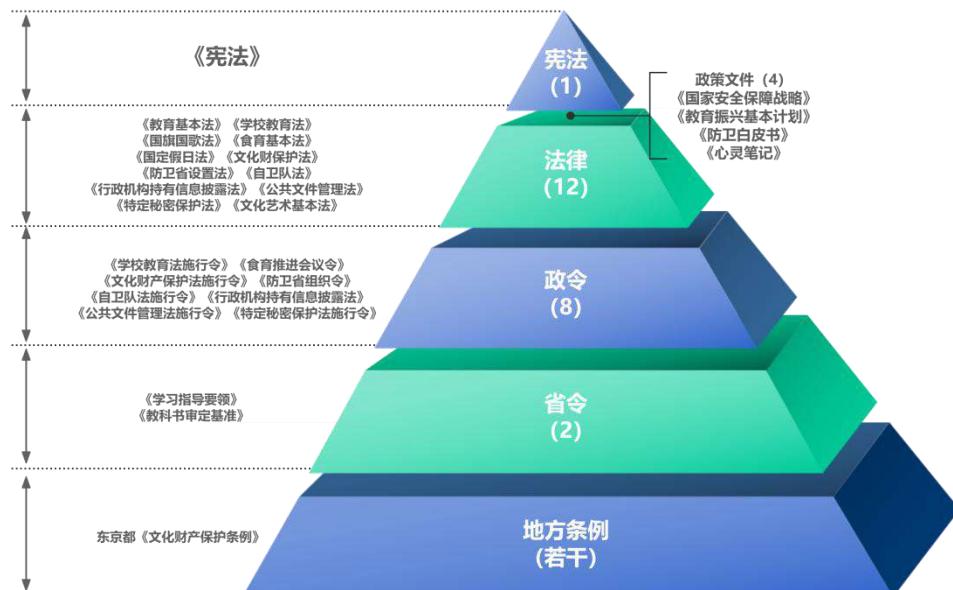


图2 日本爱国主义教育法律体系图

下面，本研究将基于宪法基础、核心法律、配套法令（包括政令、省令与地方条例）、政策文件4个维度，并列举相关法律条文来展开具体分析。

（一）宪法基础：基于和平主义原则下的爱国心价值平衡^[35]

日本宪法通过第9条和第26条构成了教育活动的重要规范依据。

第9条确立的和平主义原则对教育内容具有方向性约束。司法实践中，如1959年“砂川事件”判决，最高法院将该条款理解为对教育政策具有一定适用性，强调教育内容需与宪法原则相一致^[36]。

第26条则通过“受教育权保障”“机会均等”“教育内容的中立性”等原则，为国民认同教育与价值教育提供制度框架。在2010年东京都国旗国歌相关诉讼案件中，最高法院对学校仪式教育的实施方式进行了规范化解释，强调应在制度原则内执行。围绕历史教育内容的呈现，如2014年教科书表述调整事件，反映了宪法原则与教育行政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总体来看，日本宪法呈现“原则性规范—行政解释运作”并存的特征：第9条提供总体方向，而《教育基本法》等后续法律及行政审定制度则形成进一步的实践层级。

(二) 核心法律：爱国心教育制度化与争议并存的四梁八柱

日本通过 12 部核心法律构建起爱国主义教育的制度框架，形成教育领域（3 部）、文化保护（4 部）、国家安全（5 部）三大板块的联动体系。

《教育基本法》^[37]是教育制度的基础性法律，2006 年修订时明确提出培养“热爱国家与地域”的教育目标，同时保留了教育中立性相关条款。《学校教育法》^[38]第 21 条将历史地理教育纳入学校课程体系。部分修订内容（如 2014 年的表述调整）引发学界关于历史叙述方式的讨论。《食育基本法》^[39]则通过饮食文化教育推动传统文化认知，其课程设计（例如传统料理体验）体现文化教育与生活教育的结合。

《国定假日法》^[40]通过设定具有历史文化意义的纪念日，构建公共仪式教育的规范依据。《文化财保护法》^[41]对文化遗产进行分类保护，并在教育活动中予以引导。2023 年的《文化艺术基本法》^[42]增加了文化传播相关内容。《国旗国歌法》^[43]规范国旗国歌的法律地位，为学校仪式教育提供制度基础。这些法律共同构成“文化传承—象征教育”体系，在实践中伴随对法律适用范围与具体实施方式的持续讨论^[44]。

《防卫省设置法》^[45]《自卫队法》^[46]等法律在国民安全意识教育方面具有制度性规定，部分项目（如 2014 年“自卫队课程”^[47]、2018 年“青少年防卫体验计划”^[48]）被用于介绍防卫机构的相关职能。《特定秘密保护法》^[49]涉及国家安全信息管理，对档案公开制度产生影响。围绕历史档案公开（如 2024 年某历史资料公开申请案件）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信息管理要求”与“公共知情需求”之间的平衡问题^[50]。《行政机构持有信息披露法》^[51]与《公共文件管理法》^[52]对档案管理设定标准，为教育研究、资料公开等提供法律依据。

(三) 配套法令：爱国心教育实施细则与领域延伸

日本通过 8 部政令、2 部省令及若干地方条例，实现法律原则的实践转化。

《学校教育法施行令》^[53]规定学校需包含国家历史文化相关内容，各地教材在呈现方式上有所差异。例如，埼玉县使用《日本の心と技》介绍文化主题。《食育推进会议令》^[54]推动饮食文化体验活动。文部科学省通过《学习指导要领》^[55]与《教科书审定基准》^[56]具体指导教育内容，2023 年版社会科强化“地域历史研究”，2024 年修订案关注战后发展经验等主题。

地方条例体现区域特色，例如：东京都将城市景观与文化场所纳入教育参观体系；冲绳县开展以地域历史经验为基础的和平教育；北海道将阿伊努文化纳入课程。

这些实践呈现“国家规范—地方特色”并行格局，也促使对于教育内容呈现方式的进一步讨论。

(四) 政策文件：爱国心教育实践的行动指南

日本通过 4 份政策文件构建起“安全叙事—文化传承—意识塑造”的教育网络。《国家安全保障战略》^[57]提出国家安全与国际环境相关认知教育的必要性。《防卫白皮书》^[58]设置防卫政策说明栏目，强调学校需开展与安全环境相关的基础教育，并加入网络安全主题。《教育振兴基本计划》^[59]强调传统与文化教育、地域研究以及家校社协同。《心灵笔记》^[60]作为指导性教材，涵盖价值教育、情绪管理等内容，其呈现方式在社会上也引发一定讨论。

当前日本正试图通过“传统—安全”双轨教育实现国家主义合法化，但如何平衡历史责任与现实需求，仍是其法律体系面临的根本挑战。这种体系既反映战后对历史教训的制度反思，又暴露全球化时代重构民族认同的深层焦虑，形成“和平宪法框架下的国家主义悖论”。

三、韩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律框架体系

韩国爱国主义教育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体系化建设，体现了国家在历史认知与国民精神塑造上的战略部署。根据现行法律框架与立法动态，其规范体系可划分为 6 个层级，1 部宪法、15 部核心法律、14 件总统令、8 件部令、若干件地方条例、2 种政策文件，形成以宪法为基础、政策文件为指导、法律为核心、法令条例为补充的复合型规范体系。按照法律效力位阶从高到低的顺序，将当前韩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律体系以金字塔图形式绘制，如下图 3 所示。（政策文件本身不具备法律效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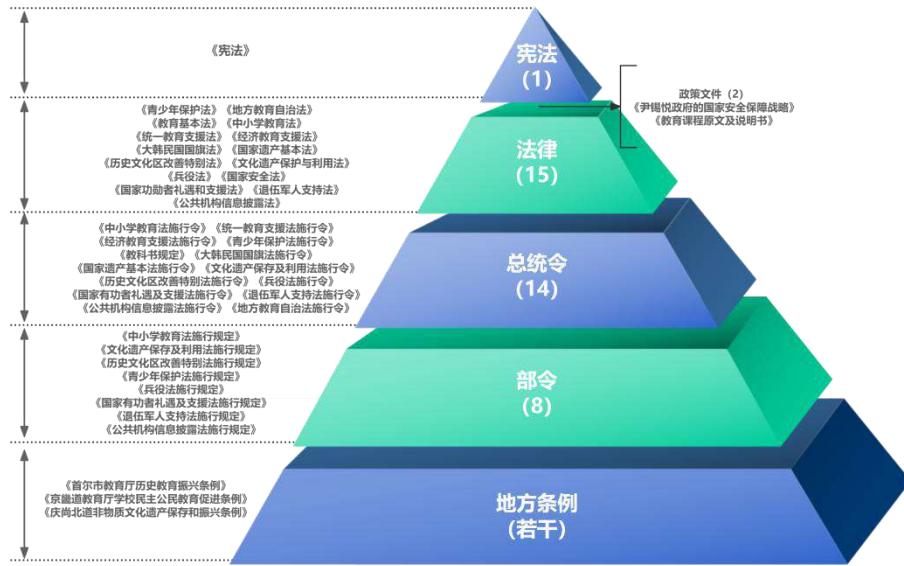


图 3 韩国爱国心教育法律体系图

下面,本研究将基于宪法基础、核心法律、配套政令条例(包括总统令、部令与地方条例)、政策文件4个维度,并列举相关法律条文来展开具体分析。

(一) 宪法基础: 传统伦理与现代理念融合的爱国心教育法理基础^[61]

《大韩民国宪法》通过序言和第3~9条构建起爱国心教育的三重法理基础。序言以“悠久历史与传统”的民族叙事,将3·1运动、4·19民主理念等历史记忆制度化,为爱国心教育提供合法性根基;第3条与第5条确立领土完整与国防义务,将国家安全教育纳入宪法义务体系;第4条与第9条则通过“和平统一”目标与“文化传承”义务,形成“政治统一—文化认同”的双轨教育导向。这种宪法设计既延续了儒家“家国同构”的传统,又融入现代民主理念,为爱国心教育提供了传统与现代的双重合法性支撑。

宪法通过领土条款与国防义务构建起国家认同的刚性框架:第3条明确“领土包括韩半岛及附属岛屿”,为独岛(竹岛)等领土争议提供法理依据;第5条规定“国军以保障国家安全与国防为神圣使命”,第39条要求公民履行国防义务,共同构成“领土完整—国防责任”的教育闭环。第4条将“和平统一”确立为国家目标,要求教育培养“民族共同体意识”,2024年《统一教育促进法》据此将“脱北者证言”纳入教材,塑造“自由民主优越性”叙事。这种宪法表述使爱国主义教育兼具历史延续性与现实紧迫性,成为维护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的制度工具。

宪法第19条与第31条在保障思想自由与教育中立性的同时,为爱国主义教育预留空间。第31条规定“教育的自主性、专业性、政治中立性及大学自治受法律保护”,但允许通过“国民伦理教育”等课程规范,在中立框架内实施“民主公民教育”。这种“原则中立—内容引导”的宪法设计,既避免了战前“皇民化教育”的历史重演,又通过第9条“文化传承”义务,将“弘益人间”“身土不二”等文化符号转化为爱国情感的抽象载体。例如,法院在2019年“教科书历史表述案”中裁定,教材需平衡“民族自豪感”与“历史客观性”,体现宪法对教育中立性的动态诠释。^[62]

(二) 核心法律: 爱国心教育规范化与制度化的四梁八柱

韩国通过15部核心法律构建起爱国主义教育的制度骨架,分为教育领域(6部)、国家象征与文化传承(4部)、国家安全与军人礼遇(4部)三大板块。

教育领域法律以《教育基本法》^[63]为核心,2015年修订后将“国民伦理”设为独立学科,要求教材融入李舜臣、安重根等历史英雄事迹。《青少年保护法》^[64]第9条将“歪曲历史事实或危害国家体制”列为有害信息,2024年修订案进一步限制朝鲜宣传内容传播,形成意识形态过滤机制。《统一教育支援法》^[65]明确“自由民主优越性”叙事,通过“统一教育周”活动强化民族共同体意识。《经济教育支援法》^[66]强调培养“经济公民意识”,通过“身土不二”理念推广国产商品消费,形成经济爱国主义教育模式。

“国家象征与文化传承类”法律通过符号化实践强化国家认同,《国旗法》^[67]强制学校每日升太极旗,2025年新增“国旗设计理念教育”模块。《国家遗产基本法》^[68]要求建立“文化遗产教育认证制度”,将宗庙祭礼乐、江陵端午祭等民俗活动纳入课程。《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法》^[69]指定“独立门”“显忠院”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24

年《历史文化区改善特别法》^[70]要求在考古遗址周边设立“历史体验馆”。

“国家安全与军人礼遇类”法律形成“国防义务—军人荣誉—信息控制”的联动体系。《兵役法》^[71]要求男性服18个月（陆军）现役，2025年将“网络攻防训练”纳入新兵教育。《国家功勋者礼遇和支援法》^[72]允许政府对烈士家属实施“报国自豪感疏导教育”，2024年试点项目通过“烈士日记研读会”强化牺牲奉献精神。《公共机构信息披露法》^[73]将“国家安全相关信息”列为保密对象，2025年政府以“统一利益”为由拒绝公开1980年光州事件档案，引发争议。

（三）配套政令条例：爱国心教育实施细则与领域延伸

韩国通过14件总统令将法律原则转化为可操作的教育规范，如《中小学教育法施行令》^[74]规定每周1课时“国民伦理教育”，2024年新增“韩半岛统一进程”单元。《青少年保护法施行令》^[75]将“美化朝鲜体制”列为有害信息，2023年删除教科书中“朝鲜人权状况”客观描述。这些总统令通过课程控制、教材审查与符号实践，构建起“历史教育—文化认同—意识形态”的三位一体教育网络。

地方自治体通过特色条例形成差异化教育路径。首尔市实施“独立纪念馆年度参观计划”，2024年首尔历史博物馆（馆长崔炳九）以初中、高中生为对象运营志愿活动教育，通过参与体验博物馆教具制作，提高青少年对首尔历史和文化理解^[76]；针对南北韩分裂、多元文化社会、新媒体普及等新形势，京畿道计划在第三阶段（2023年-2025年）投资98亿韩元，将京畿道主导的民主公民教育转变为以市县为重点，加强基层民主教育^[77]；庆尚北道重视非遗文化传承，2025年举办“浦项长期流放文化节”为青少年提供通过体验学习历史事实的机会^[78]。这些条例既落实国家立法要求，又融入地域文化特色，形成“一地一策”的教育创新格局。

（四）政策文件：爱国心教育实践的行动指南

尹锡悦政府《国家安全保障战略》^[79]将“自由、和平与繁荣”确立为全球支柱，通过“四强外交”（韩美同盟、韩日合作、韩中平衡、全球治理）重构爱国主义教育的价值内核。战略要求教育系统强化“自由民主优越性”叙事，2024年修订的《统一教育支援法施行令》^[80]新增“网络国防”模块，要求中学生模拟朝鲜网络攻击案例。这种政策导向在《教育课程说明书》中体现为道德课“国民伦理”单元权重提升至30%，重点讲解“民主公民的责任”与“统一进程中的牺牲精神”。

《教育课程原文及说明书》^[81]通过课程整合与内容调整，将爱国主义教育融入道德、社会、历史三科。道德课以“忠孝—爱国—民主”为主线，新增“国家象征实践”章节；社会课引入“经济爱国主义”模块；历史课通过“选择性记忆”重构民族叙事，删除“日军慰安妇”等殖民创伤内容，将殖民历史的表述重点转向“现代化进程”。这种课程设计既延续了《文化遗产保存及利用法》对传统符号的重视，又通过《国家安全法施行令》规避历史责任，形成“荣耀过去—安全现在”的教育闭环。

当前韩国正试图通过“历史传承—国家认同”双轨教育实现爱国主义合法化，但如何平衡历史责任与现实需求，仍是其法律体系面临的根本挑战。这种体系既反映战后对历史教训的制度反思，又暴露全球化时代重构民族认同的深层焦虑，形成“民主宪法框架下的爱国主义实践”的独特特征。

四、中日韩三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律框架体系的比较

（一）宪法基础：价值导向的差异化建构

三国宪法均以国家认同为核心，但在价值导向上呈现显著差异。中国宪法以“共同缔造”的历史叙事为根基，通过“五爱”公德体系与国家象征条款，构建起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认同框架。日本宪法基于和平主义原则，通过第26条确立教育中立性，形成“和平约束—公民教育”的矛盾统一体。韩国宪法则融合儒家传统与民主理念，通过“和平统一”目标与“文化传承”义务，构建起“传统伦理—现代公民”的双轨认同机制。这种宪法设计差异直接影响了各国爱国主义教育实践：中国强调历史延续性与国家主权完整，日本在和平主义与民族主义间寻求平衡，韩国则侧重反殖民记忆与文化主体性建构。

另外，三国中只有中国明确并且多次在宪法中提到了“爱国主义”，以根本大法的形式赋予了爱国主义教育迫切性、重要性与合理性，而日韩两国的宪法中则并未明确提到“爱国心”等相关概念，这也反映了中日韩三国爱国主义教育的不同显隐属性，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更侧重显性教育，而日韩两国的爱国心教育则以更加隐蔽、委婉、迂回的方式进行。

（二）核心法律：制度路径的类型化分野

在立法模式方面，三国均通过宪法或教育基本法确立了爱国主义教育的法定地位，将其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

重要内容，并注重历史教育与国家认同的融合。差异主要体现在立法形式与内容侧重上：中国采用专门立法模式，以《爱国主义教育法》为核心构建系统化法律框架，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民族复兴叙事的结合；日本则通过《教育基本法》《学习指导要领》等进行隐性渗透，立法中规避直接的国家主义表述，侧重培养“爱国心”与国际视野的平衡；韩国虽未制定专门法律，但通过宪法条款和《教育法》强调“国格”教育，立法内容更突出民族主义与历史悲情叙事，形成“危机—安全”双轨教育的独特立法导向，这种差异反映了三国在历史记忆重构、政治体制特性及全球化应对策略上的深层分歧。

在内容侧重方面，三国均以历史教育为核心载体强化民族认同，但具体路径各不相同。中国侧重通过“革命历史+现代化成就”叙事构建民族复兴话语体系，强调集体主义价值观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意识；日本注重以传统文化传承为纽带培育国民归属，同时通过“战后和平主义”与“安全威胁”话语强化危机意识；韩国则突出“反殖民抗争史”与“分裂现实”的创伤记忆，将爱国主义教育深度嵌入民族苦难叙事以凝聚国家认同。三国都表现体现出将历史记忆工具化的倾向，但在历史解释的开放性、国际视野的包容性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反映出东亚国家在全球化时代重构民族主体性的不同策略选择。

在实施机制方面，三国均注重历史叙事与文化符号的运用，如日本的“文化财”定位、韩国独立纪念馆的抗争记忆、中国红色资源的保护利用。差异主要体现在价值导向与实践策略方面，日本在和平宪法框架下寻求传统主义与安全叙事的平衡，韩国强调“自由民主优越性”的统一教育，中国则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

（三）配套法规政策：实践路径的区域化创新

中日韩三国在爱国主义教育配套法规方面呈现出统一性与差异化并存的特征。统一性体现在三国均通过具体法规、实施细则、课程标准及地方条例实现爱国主义教育法律原则的实践转化：日本依托《学习指导要领》规范历史叙事，韩国通过《教育课程说明书》修订强化统一意识，中国借助《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细化教学要求。差异主要体现在政策导向与实践路径：日本侧重传统文化与现代公民教育的结合，通过道德科教材融入“爱国心”与“国际理解”内容，地方条例在敏感议题上引发争议；韩国强调“统一教育”与“民族苦难”叙事，地方自治体通过“和平教育”“文化遗产”等条例形成差异化实践；中国则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红色资源利用，地方政策注重革命历史教育与现代化成就宣传，如井冈山、延安等地的红色教育基地建设。

总之，三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法律体系既反映各自历史文化基因，又面临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共同挑战。中国的制度化经验、日本的宪法调适智慧、韩国的地方创新模式，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多元治理样本。未来，如何在保持文化独特性的同时构建包容性认同，将成为中日韩三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律体系发展的关键课题。

五、讨论与结论

日韩两国在爱国主义教育立法中展现出独特的治理智慧，其经验对中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在立法模式选择方面，日韩则依赖分散立法，通过宪法条款与领域法间接渗透，灵活性较强且更为柔性和深刻，更利于具体教学实践的推进和展开。在全球化应对方面，日本强调传统独特性，借助“传统输出”（和食、动漫）强化文化符号认同；韩国突出文化创新性，则通过“韩流战略”（K-pop、韩剧）实现文化软输出，2024年《国家遗产基本法》将韩屋、宗庙祭礼乐纳入全球推广计划，通过差异化策略有效回应文化认同与传播方面的挑战。在代际认同转型方面，日韩两国转向“参与式教育”与“数字素养”创新，日本开发“历史模拟”APP（如AR导览）；韩国通过“统一教育游戏化”项目（如模拟朝韩关系决策）提升青少年参与度。这种转型既延续了传统符号（如日本七五三节、韩国太极旗），又融入元宇宙、区块链等新技术，体现了“传统内核—现代表达”的教育革新逻辑。

借鉴韩国《国旗法》对学校升旗仪式的规定与日本《食育基本法》推广传统饮食的经验，中国可在《爱国主义教育法》实施细则中增设“国家象征实践”专章，将国旗、国歌、国徽的教育实践细化为可操作的法律规范。例如，明确中小学每周升旗仪式的程序标准，开发“红色美食”课程（如延安小米粥、井冈山南瓜汤），将饮食文化转化为革命传统教育载体。同时，建立“文化符号认证制度”，将敦煌壁画、故宫建筑等文化遗产纳入国民教育体系，通过法律保障文化符号的教育功能。

参考日韩地方条例差异化实践（如冲绳县“和平教育”、庆尚北道“非遗传承”），中国可授权省级人大制定《区域红色文化教育条例》，结合地域特色创新教育形式。例如，山西省可立法将“右玉精神”纳入必修课，通过“接力造林”实践培养生态报国意识；福建省可制定《海上丝绸之路文化教育条例》，利用泉州世界遗产点开发“海丝少年”课程。这种“中央立法授权—地方特色创新”模式，既能保证国家意识形态的统一性，又能激发地方教育的活力。

借鉴日本《学习指导要领》平衡“民族自豪感”与“历史客观性”的司法经验，中国可在《中小学教材管理办法》

中增设“历史叙事审查”条款，建立“革命历史—现代化成就—人类贡献”三维评价体系。例如，在抗日战争史教学中，既突出敌后战场的中流砥柱作用，也客观呈现正面战场的历史贡献；在航天成就教育中，增加“中国航天对人类文明的贡献”章节，同时建立“历史教育争议解决机制”，由教育部成立专家委员会对教材争议内容进行第三方评估，确保历史叙事的平衡性与权威性。

此外，中国在借鉴日韩经验的基础上，更应构建具有本土特色的爱国主义教育法律体系。这一体系需体现“三个结合”的原则：首先，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如在《家庭教育促进法》中增设“家书家训传承”条款。第二，将革命传统教育与科技创新教育相结合，通过《科学技术普及法》推动“两弹一星”精神融入 STEM 课程。第三，将国家认同教育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结合，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中强化“数字中国”与“数字丝路”教育内容。未来，可进一步探索“爱国主义教育数字化”立法，制定《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化保护与利用条例》，运用区块链技术对不可篡改的革命文物进行数字化档案的建立，通过元宇宙平台重构沉浸式教育场景。这种立法创新既延续了中国“以史为鉴”的传统，又回应了数字时代的教育变革需求，为全球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东方智慧。

参考文献：

- [1] Lin, J. C., & Jackson, L..Patriotism in moral education: Toward a rational approach in China[J]. 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2022,52(3), 343–361.
- [2] Saaler, S.. Nationalism and History in Contemporary Japan[J]. Asia-Pacific Journal,2016,14(20), e4.
- [3] Kim, H., & Kim, S. K.. Global convergabovveaboveaboveveence or national identity making?: The history textbook controversy in South Korea, 2004-2018[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Education,2019,39(2), 252 – 263.
- [4] Kwak, C. H., & Matsuda, K. (Eds.).Patriotism in East Asia[M]. Routledge, 2014.
- [5] 심성보.애국심과 민주주의가 결합된 민주시민교육-애국주의 논쟁을 중심으로-[J].초등도덕교육,2010,0(34):254-291.
- [6] 田中 洋,日本における“爱国心教育”の歴史と展望,教育制度学研究,2007,(14):97-10.
- [7] 张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的爱国主义精神研究[D].河南理工大学,2011.
- [8] 郑萌萌,姜雨彤.《爱国主义教育法》的时代功能和核心任务[J].现代教育,2024,(08):52-58.
- [9]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N].人民日报,2016-02-23(023).
-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J].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15,(03):537-542.
-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J].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20,(05):755-769.
-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93,(26):1191-1198.
-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N].人民日报,2022-04-21(013).
-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N].人民日报,2016-03-30(016).
- [15] 华伟.《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的立法宗旨、法律内涵与实施要求[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03):58-67.
- [16] 郑淑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国歌法、国徽法解读[M].中国法治出版社:201801.246.
- [17] 邱志鹏,黄天娇,梁思思.论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的进步性[J].档案,2020,(07):12-14.
- [18]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J].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17,(06):863-873.
- [19] 许华.新国家安全观视野下的国家安全法律体系建设[D].苏州大学,2008.
- [20] 王自力.国防建设和教育的法制保障——从《国防法》到《国防教育法》看国防法制的完善[J].法学杂志,2001,(05):75-76.
- [21] 许崇德.《反分裂国家法》的立法依据和性质探析[J].中州学刊,2005,(03):94-96.
- [22] 张军.弘扬英雄文化筑牢民族精神之基——解读《英雄烈士保护法》[J].紫光阁,2018,(08):56-57.
- [23] 李桂林.发挥退役军人在爱国主义教育中的优势[J].新湘评论,2024,(04):41.
- [24] 《烈士褒扬条例》和《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修改〈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的决定》解读[J].中国民政,2011,(09):37.
- [25]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03,(18):4-9.
- [26]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实施细则[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17,(35):14-16.
- [27] 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办法[J].北京市人民政府公报,2007,(18):7-11.
- [28] 重庆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办法[N].重庆日报,2020-12-11(014).
- [29]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内蒙古自治区国防教育条例》的决定[N].内蒙古日报(汉),2024-04-06(004).
- [30] 邢栋.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条例》的总体国家安全观考量[J].办公室业务,2024,(20):58-60.
- [31] 吴元元.初中德育工作“多维一体”推进路径探索——上海市卢湾中学落实《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的校本实践[J].现代教学,2023,(06):68-72.

- [32] 刘晖龙,刘紫瑶.以纪念仪式涵育青少年学生爱国主义精神情操[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25,(08):21-26.
- [33]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19,(24):9-15.
- [34] 开创新时代全民国防教育工作新局面[N].人民日报,2022-09-02(004).
- [35] 日本国憲法[EB/OL].(1946-11-03)[2025-04-02].<https://laws.e-gov.go.jp/law/321CONSTITUTION>.
- [36] 宗宮 信次. 砂川事件の判決を読んで[J].自由と正義,1959,10(5):16-19.
- [37] 日本内閣.教育基本法[EB/OL].(2006-12-22)[2025-04-02].<https://laws.e-gov.go.jp/law/418AC0000000120>.
- [38] 日本政府.学校教育法[EB/OL].(1947-03-31)[2025-04-02].<https://laws.e-gov.go.jp/law/322AC0000000026>.
- [39] 小坂憲次,等.食育基本法[EB/OL].(2005-06-17)[2025-04-02].<https://laws.e-gov.go.jp/law/417AC1000000063>.
- [40] 文化委員長.国民の祝日に関する法律[EB/OL].(1948-07-20)[2025-04-02].<https://laws.e-gov.go.jp/law/323AC1000000178>.
- [41] 山本勇造,等.文化財保護法[EB/OL].(1970-05-30)[2025-04-02].<https://laws.e-gov.go.jp/law/325AC0100000214>.
- [42] 斎藤斗志二,等.文化芸術基本法[EB/OL].(2001-12-07)[2025-04-02].<https://laws.e-gov.go.jp/law/413AC1000000148>.
- [43] 日本内閣.国旗及び国歌に関する法律[EB/OL].(1999-08-13)[2025-04-02].<https://laws.e-gov.go.jp/law/411AC0000000127>.
- [44] 日本弁護士連合会.君が代斎唱時の不起立を理由に再雇用拒否された元都立高校教諭らの国賠請求訴訟の上告棄却判決に対する会長声明[EB/OL].(2011-6-10)[2025-04-02].<https://www.nichibenren.or.jp/document/statement/year/2011/110610.html>.
- [45] 日本内閣.防衛省設置法[EB/OL].(1954-06-09)[2025-04-02].<https://laws.e-gov.go.jp/law/329AC0000000164>.
- [46] 日本内閣.自衛隊法[EB/OL].(1954-06-09)[2025-04-02].<https://laws.e-gov.go.jp/law/329AC0000000165>.
- [47] 琉球新報社.高知、私立高に自衛隊コース新設 来年度から[EB/OL].(2015-09-08)[2025-04-02].<https://ryukyushimpo.jp/news/prentry-248584.html>.
- [48] 防衛ホーム新聞社.元気一杯青少年防衛講座[EB/OL].(2019-12-01)[2025-04-02].https://www.boueinews.com/old/news/2019/20191201_11.html.
- [49] 日本内閣.特定秘密の保護に関する法律[EB/OL].(2013-12-13)[2025-04-02].<https://laws.e-gov.go.jp/law/425AC0000000108>.
- [50] 央视网.日本要求公开侵华日军731部队相关资料的庭审结束 日本防卫省拒绝公开更多信息引发不满[EB/OL].(2024-12-26)[2025-04-02].<https://tv.cctv.cn/2024/12/26/VIDEzAlSFXEswpdzb1mEnqh241226.shtml>.
- [51] 日本内閣.行政機関の保有する情報の公開に関する法律[EB/OL].(1999-05-14)[2025-04-02].<https://laws.e-gov.go.jp/law/411AC0000000042>.
- [52] 日本内閣.公文書等の管理に関する法律[EB/OL].(2009-07-01)[2025-04-02].<https://laws.e-gov.go.jp/law/421AC0000000066>.
- [53] 日本内閣.学校教育法施行令[EB/OL].(1953-10-31)[2025-04-02].<https://laws.e-gov.go.jp/law/328CO00000000340>.
- [54] 日本内閣.食育推進会議令[EB/OL].(2003-07-08)[2025-04-02].<https://laws.e-gov.go.jp/law/417CO0000000236>.
- [55] 日本文部科学省.「学習指導要領」とは?[EB/OL].(2021-06-25)[2025-04-02].https://www.mext.go.jp/a_menu/shotou/new-cs/idea/index.htm.
- [56] 日本文部科学省.教科用図書検定規則[EB/OL].(1989-04-04)[2025-04-02].<https://laws.e-gov.go.jp/law/401M50000080020>.
- [57] 日本内閣.国家安全保障戦略について[EB/OL].(2022-12-16)[2025-04-02].<https://www.cas.go.jp/jp/siryou/221216anzenhoshou.html>.
- [58] 日本防衛省.防衛白書[EB/OL].(2024-07-12)[2025-04-02].<https://www.mod.go.jp/j/press/wp/index.html>.
- [59] 日本文部科学省.教育振興基本計画[EB/OL].(2023-06-16)[2025-04-02].https://www.mext.go.jp/a_menu/keikaku/index.htm.
- [60] 森田 美芽.宗教と宗教教育の視点から見た「特別の教科 道徳」の問題[J].大阪キリスト教短期大学紀要,2019,(60):1-16.
- [61] 헌법제정회의.대한민국헌법[EB/OL].(1987-10-29)[2025-04-02].<https://www.law.go.kr/lsInfoP.do?lsId=001444#0000>.
- [62] 조효정."사회교과서 불법수정" vs "朴정부 잘못 바로잡아"[EB/OL].(2019-06-28)[2025-04-02].<https://n.news.naver.com/mnews/article/214/0000959913>.
- [63] 교육부.교육기본법[EB/OL].(2024-12-20)[2025-04-02].<https://www.law.go.kr/LSW//lsInfoP.do?lsId=000901&ancYnChk=0#0000>.
- [64] 여성가족부.청소년보호법[EB/OL].(2023-12-26)[2025-04-02].<https://www.law.go.kr/%EB%B2%95%EB%A0%B9%EC%B2%AD%EC%86%8C%EB%85%84%EB%B3%EB%98%EC%9B%95>.
- [65] 통일부.통일교육법[EB/OL].(2024-01-16)[2025-04-02].<https://www.law.go.kr/%EB%B2%95%EB%A0%B9%ED%86%EC%9D%BC%EA%EB%90%EC%9C%A1%EC%A7%80%EC%9B%90%EB%B2%95>.

- [66] 기획재정부 경제교육지원법
[EB/OL].(2017-12-26)[2025-04-02].<https://www.law.go.kr/%EB%B2%95%EB%A0%B9/%EA%B2%BD%EC%A0%9C%EA%B5%90%EC%9C%A1%EC%A7%80%EC%9B%90%EB%B2%95>.

[67] 행정안전부 대한민국국기법
[EB/OL].(2014-1-28)[2025-04-02].<https://law.go.kr/%EB%B2%95%EB%A0%B9/%EB%8C%80%ED%95%9C%EB%AF%BC%EA%B5%AD%EA%B5%AD%EA%B8%B0%EB%B2%95>.

[68] 국가유산청 국가유산기본법
[EB/OL].(2024-02-13)[2025-04-02].<https://www.law.go.kr/%EB%B2%95%EB%A0%B9/%EA%B5%AD%EA%B0%80%EC%9C%A0%EC%82%EB%8C%80%ED%95%9C%EB%AF%BC%EA%B5%AD%EA%B5%AD%EA%B8%B0%EB%B2%95>.

[69] 국가유산청 문화유산의 보존 및 활용에 관한 법률
[EB/OL].(2024-02-13)[2025-04-02].<https://www.law.go.kr/lsInfoP.do?lsId=001607&ancYnChk=0#0000>.

[70] 국가유산청 역사문화권정비 등에 관한 특별법
[EB/OL].(2023-09-14)[2025-04-02].<https://www.law.go.kr/%EB%B2%95%EB%A0%B9/%EC%97%AD%EC%82%AC%EB%AC%B8%ED%99%94%EA%B6%8C%EC%A0%95%EB%B9%84%EB%93%B1%EC%97%90%EA%B4%80%ED%95%9C%ED%8A%B9%EB%B3%84%EB%B2%95>.

[71] 국방부 병역법
[EB/OL].(2025-4-1)[2025-04-02].<https://www.law.go.kr/%EB%B2%95%EB%A0%B9/%EB%B3%91%EC%97%AD%EB%B2%95>.

[72] 국보훈부 국가유공자 등 예우 및 지원에 관한 법률
[EB/OL].(2024-02-13)[2025-04-02].<https://www.law.go.kr/%EB%B2%95%EB%A0%B9/%EA%B5%AD%EA%B0%80%EC%9C%A0%EA%B3%B5%EC%9E%90%EB%93%B1%EC%98%88%EC%9A%B0%EB%B0%8F%EC%A7%80%EC%9B%90%EC%97%90%EA%B4%80%ED%95%9C%EB%8C%80%ED%95%9C%EB%B2%95%EB%A5%A0>.

[73] 행정안전부 공공기관의 정보공개에 관한 법률
[EB/OL].(2023-05-16)[2025-04-02].<https://www.law.go.kr/%EB%B2%95%EB%A0%B9/%EA%B3%B5%EA%B3%EA%8B%80%EA%84%EC%9D%98%EC%A0%95%EB%B3%EA%8B%80%EA%8B%80%EC%97%90%EA%B4%80%ED%95%9C%EB%8C%80%ED%95%9C%EB%B2%95%EB%A5%A0>.

[74] 교육부 초·중등교육법 시행령
[EB/OL].(2025-01-21)[2025-04-02].<https://www.law.go.kr/%EB%B2%95%EB%A0%B9/%EC%B4%88%EC%A4%91%EB%93%B1%EA%B5%90%EC%9C%A1%EB%B2%95%EC%8B%9C%ED%96%89%EB%A0%B9>.

[75] 여성가족부 청소년보호법 시행령
[EB/OL].(2024-12-03)[2025-04-02].<https://www.law.go.kr/%EB%B2%95%EB%A0%B9/%EC%B2%AD%EC%86%8C%EB%85%4%EB%B3%EA%8B%80%EC%97%90%EA%8B%80%ED%95%9C%EB%8C%80%ED%95%9C%EB%B2%95%EB%A5%A0>.

[76] 서울역사박물관 [서울역사박물관] 2024년 청소년 자원봉사 [서울역사지킴이][EB/OL].(2024-08-12)[2025-04-02].<https://culture.seoul.go.kr/culture/cultureEvent/view.do?cultcode=148925&menuNo=200008>.

[77] 김리원 경기도 민선8기 경기도 민주시민교육 종합계획 수립 ... 참여형 교육·시군 역할 강화
[EB/OL].(2023-02-09)[2025-04-02].<http://www.gynews.co.kr/news/articleView.html?idxno=16998>.

[78] 포항문화재단·포항장기유물문화제[EB/OL].(2025-04-01)[2025-04-02].<https://festival.phfc.or.kr/janggi/subMain.do>.

[79] 외교부·국가안보전략[EB/OL].(2023-06-07)[2025-04-02].https://www.mofa.go.kr/www/wpge/m_25945/contents.do.

[80] 통일부 통일교육지원법 시행령
[EB/OL].(2022-5-9)[2025-04-02].<https://www.law.go.kr/%EB%B2%95%EB%A0%B9/%ED%86%8B%5%EC%9D%BC%EA%B5%90%EC%9C%A1%20%EC%A7%80%EC%9B%90%EB%B2%95%20%EC%8B%9C%ED%96%89%EB%A0%B9>.

[81] 국가교육과정정보센터 교육과정원문 및 해설서
[EB/OL].(2024-08-16)[2025-04-02].<https://ncic.go.kr/dwn/ogf/inventory.c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Legal Framework for Patriotic Education in China, Japan, and South Korea

ZHANG Weiqiong¹, ZHU Guowen¹

¹ Yeungnam University, Daegu, South Kore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globalization and counter-globalization, national identity faces multidimensional challenges. The three countries in East Asia—China, Japan, and South Korea—have established legal frameworks to regulate patriotic education and uphold cultural sovereignty and respond to external shocks.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institutional logic and prac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atriotic education legal system in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 from a comparative legal perspective. Research findings show that China has built a hierarchical legal framework centered on the Patriotic Education Law, reinforcing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and human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Japan forms a dynamic "constitutional constraints-political practice" game through implicit infiltration; South Korea emphasizes anti-colonial memory and cultural subjectivity. The co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 differ significantly: China emphasizes multi-ethnic unity and historical continuity, Japan is constrained by pacifism and educational neutrality, while South Korea blends Confucian traditions with democratic ideals. At the core legal level, China employs a specialized legislative model, while Japan and South Korea rely on decentralized legislation for implicit infiltration. In the accompanying regulations and policies, China emphasizes principled provisions while lacking systematic quantitative standards and structured implementation details, resulting in stronger operational coherence and consistency between Japan and South Korea. Research reveals challenges such as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balance, globalization responses, and generational identity transformation. China needs to draw on Japan and South Korea's local differentiation practices and implicit education to build a "traditional core-present representation" system, seeking dynamic balance between ideological integration and openness.

Keywords: patriotism; patriotism education; Japanese and Korean Patriotic Educa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moral education; national identity

教育强国背景下高素质专业化体育教师队伍建设的困境与路径研究

秦淼¹

(1.邢台市信都区第一幼儿园, 河北 邢台 054000)

摘要: 研究基于教育强国背景, 运用文献资料法与逻辑分析法, 系统讨论了高素质专业化体育教师队伍建设的现实困境与解决路径。通过梳理教育部相关政策文件与中国知网的有关文献, 整理政策文本, 结合国内研究成果, 分析当前体育教师队伍建设的关键问题与解决方向。研究发现, 我国体育教师队伍建设面临着: 1.结构失衡矛盾, 城乡师资队伍数量与教育资源失衡、乡村教师老龄化与“兼职化”现象严重; 2.能力断层矛盾, 当前培养模式与新课程标准要求脱节, 教师在新兴项目教学等方面出现能力短板; 3.发展动力矛盾, 体现为制度保障不足与社会认知偏差, 体育教师“污名化”现象严重, 导致体育教师出现职业认同危机。针对现实困境, 研究提出: 1.强化政策执行刚性, 通过“红黄绿”预警系统监督政策落地, 明确责任主体, 破除“学科鄙视链”; 2.重塑师德师风, 将教育家精神融入教师培养体系, 实施“职业精神唤醒工程”, 构建动态化师德评价机制; 3.建立“培养-补充-激励”三位一体机制, 优化职前职后教师培养模式, 完善偏远地区教师津贴制度, 推动城乡教育资源均衡发展。

关键词: 高素质; 专业化; 体育教师队伍建设

DOI: doi.org/10.70693/jyxb.v1i3.74

百年大计, 教育为本; 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 是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力量^[1]。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 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阐明了党的二十大之后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价值遵循和核心主题。强教必先强师, 教育强国建设对教师队伍的建设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目前我国已构建起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 教师队伍在数量上持续增长, 在结构上日益优化, 整体素质也在不断提升, 为加速教育现代化进程、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师资基石。加强高质量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是解决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抓手, 是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根本途径, 体育教师作为教师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队伍专业化、高质化建设刻不容缓, 且教育部于2025年1月发布的《教育部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体育教师队伍建设若干举措的通知》也明确要求到2027年, 推动中小学体育教师队伍数量结构更加合理, 教育教学水平明显提升, 评价激励和保障机制不断健全, 满足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

关于高素质专业化体育教师队伍的建设, 其核心在于促进体育教师的专业化发展, 提升体育教师的素质能力。但当前体育教师队伍建设面临诸多问题, 诸如自我角色认识的模糊、专业发展的动力不足、自我反思的缺乏、专业能力的不足、对职业身份的迷失、功利主义的倾向以及职业疲劳感和体育教师污名化等问题。因此, 提升我国体育教师专业水平, 重塑体育教师精神内核刻不容缓。

1. 高素质专业化体育教师队伍建设的内涵

体育教师是体教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教师队伍的建设对于促进体育与教育的深度融合、改善国民健康素质、助力社会整体进步具有重要意义。新时代体育教师既要在体育专业领域具备深厚的造诣, 同时也要具备多元化的知识结构, 以满足新时代教育发展的多元需求。

1.1 物理维度: 从“数量满足”到“质量效能”的政策导向

政策导向是高质量教师队伍建设的实践根基, 教师队伍建设涵盖内容广泛, 是一项全方位、多领域的系统工程, 需要系统规划与协同发展相结合, 各组成部分之间协作共享, 构建起新时代政策制度全方位赋能的高质量队伍建设新型体系^[2]。根据2018年国务院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意见》的战

作者简介: 秦淼(1998—), 女, 研究方向为学校体育;

略部署,到2035年,教师综合素质、专业化水平和创新能力大幅提升,培养造就数以百万计的骨干教师、数以十万计的卓越教师、数以万计的教育家型教师的目标任务。在此框架下,教育部于2025年出台《教育部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体育教师队伍建设若干举措的通知》,进一步细化了体育教师培养的具体路径,文件明确要求“建立符合体育教师岗位特点的招聘办法,严把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关,招聘岗位一般应明确体育专业要求,非体育专业应具有二级及以上运动员等级证书,突出专项运动技能水平的考察”。《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22版)》也明文规定:“体育教师是体育与健康课程最重要的人力资源,对课程教学具有决定性影响。体育教师应具有良好的师德师风、强烈的敬业精神、崇高的使命感和高度的责任感;应从教书匠向育人者转变,从教学型教师向研究型教师转变,从技能型教师向高素质教师转变”。三个文件共同表述了对教师综合素质的要求,而《教育部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体育教师队伍建设若干举措的通知》和《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22版)》则更加明确的要求了体育教师的业务能力和专项水平,此政策导向更加确定了我国对体育教师既要“量”更要“质”的核心方向。

1.2 事理维度: 职前培养、职后培训贯通的可持续模式

教育资源分职前和职后两大类,这两类资源以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两大体系共同发力,协同配合完成教师教育任务。发达国家十分重视教师教育,始终将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作为教师发展的基本途径,并在教育资源上进行合理分配与调适,以取得最佳成效^[3]。这两类资源可通过制度衔接、内容协同和资源共享的形式,构建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贯通的可持续生态。结合新课标的要求和体育学科教学的特点来看,体育教师“专项化”无疑是“专业化”的重要内容与关键表征,以此为导向,理应培养专项型体育师资,并且要认识体育教师专项化必须且只能在在职前阶段实现,只有当体育教师满足“专项化”这一基本条件,建设新时代高质量体育教师队伍的愿景才能真正得以实现^[4]。培养体育教育师范专业的高校应当针对当前新课程标准的要求,优化体育教育学生的课程设置,使得高校对学生的培养目标与社会对岗位的要求一致。并且在专项技能方面,主动破除“运动技术中心论”,让学生在学科课程中,不仅学会运动技术,更要学会如何教运动技术。定期职后培训是提高体育教师核心素养的重要手段和有效途径^[3]。构建“需求导向”的培训机制,建立教师专业发展档案,追踪职前专项能力在在职后的应用情况,并通过定期返校或跨区域培训等方式,形成“培养-就业-培养”的闭环培养模式。

1.3 人理维度: 从“技能传授者”到“育人引领者”的角色重构

“角色”是由美国社会学家乔治米德(George Mead)从戏剧中借用以分析社会情境中的个人行为方式^[5]。在本研究中,体育教师的角色形象由角色期望与角色规范共同构成。角色期望大多是从社会公众的视角出发的,例如,体育教师应具备整洁得体的衣着、健康优美的动作等外部特征,还应该由一颗热爱学生的心,有丰富的知识,充沛的精力和热情以及多变的教学方法等内部特征^[6]。角色规范则是由国家及地方政府颁发的关于特别行动主体的规范与标准引领。基于教育强国战略的大背景下,体育教师的角色形象应由“技能传授者”转变为“育人引领者”。体育育人的实践过程需要全面贯彻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和“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促进学生身心协调发展。在体育学科核心素养的有效推进中,体育教师育人意识和能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着力突破“知识中心主义”和“技术锦标主义”的束缚。相较于其它学科来看,体育与健康学科的先天优势不仅有强身健体的功能,也具有在实践过程中能够为学生提供其它学科无法生成的道德教育实景,其育人价值更为突出,如在排球教学中如何突出我国女排精神,包括身体文化、项目文化、争胜文化、团队文化和精神文化,是其它学科无法实现的独特育人价值^[7]。

2. 当前体育教师队伍建设的多维困境

2.1 结构失衡矛盾: 数量与组成矛盾

从义务教育阶段教师配备的总体情况而言,近年来,我国各地都在强化体育教师队伍建设,义务教育阶段体育师资绝对缺额在逐渐缩小,但是目前体育师资缺口仍然存在,尤其是小学体育师资缺口较大^[8]。根据研究显示,体育课程的课时量应当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全部课时量中占比约为10%-11%,而2022年我国义务教育阶段体育教师数量仅为70万人。并且体育教师除负责课时工作外,仍兼职校内其它职务,如总务、德育等。除数量矛盾外,我国体育教师队伍还存在组成矛盾,具体体现在城乡差异这一层面。我国城乡小学体育教师职称结构虽然相对合理,但他们的平均年龄偏高,特别是乡村小学体育教师的老龄化问题严重,总体呈现出后继乏人的态势^[9]。根据研究显示,城乡小学普遍存在体育教师学历层次和教学水平较低的现象,并且在农村小村,体育教师由其它文化课教师代任的现象严重。城乡基础教育的资源配置、生活保障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若不能对教师的薪资体系和职业保障机制进行有效改善,将会进一步弱化乡村教育对优秀体育教师的吸引力,加剧体育教师队伍的结构矛盾。

2.2 能力断层矛盾：质量短板与专业发展瓶颈

新课程标准要求培养学生运动能力、健康行为和体育品德，并且将运动项目分为球类运动、田径类运动、体操类运动、水上或冰雪类运动、中华传统体育类运动、新兴体育类运动六类，尤其是增加了传统体育项目和新兴体育项目。但是因当前体育教师自身能力欠缺，不能有效培养学生运动能力^[10]。导致出现以上问题的原因在于，我国体育教师队伍运动技术单一且缺乏新兴运动项目的相应培训和体育教师的自我发展动力不足。据研究显示，当前诸多中学体育教师普遍面临行政性专业发展任务的形式化倾向，诸如撰写教案、教学总结、教学研讨、听专家讲座、参加各种培训等，这种外部促进式教师专业发展策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一定进展，但终究由于建立在对教师的压制上而导致体育教师们只会忙于奔命、迫于应付，这既有管理者的领导方法有待创新的问题，也有体育教师自身认识不到位、不深刻的原因^[11]。基于以上种种原因，导致我国体育教师出现没有时间也不愿参加各项培训。许多体育教师在“技术精湛”和“学识丰富”之间难以兼顾^[12]。出现体育教师队伍能力断层的矛盾。

2.3 发展动力矛盾：制度保障与职业认同缺失

我国于2018-2020年相继颁布《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体育教师队伍建设改革意见》和《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等纲领性文件，在确保教师职业保障体系的同时，也对体育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了相应支持。这些政策既彰显了国家对体育教师群体的战略重视，也从侧面折射出当前体育教师职业地位与职业待遇有待提升的现实困境。聚焦体育教师的现实职业地位的社会认同情况，存在“体育教师污名化”现象严重，导致相当一部分体育教师对自身职业存在身份认同危机。据研究表明，当其他学科教师普遍获得专业认可时，体育教师依旧被认为是“非专业”或“亚专业”的，缺乏技术含量，并且工资、社会地位与声望仍旧较低^[13]。另一方面，直到20世纪80年代，部分教师仍持有“体育课等同于军事训练”的传统观念，以至于有其它科目教师声称“会喊‘一二一’就能当体育老师”^[14]。社会大众乃至同样作为教师的其他科目教师都对体育教师的“施污”带有时序上的连续性的，并且以一种惯性的思维偏见认知体育教师的身份，在强大而又持久的“他者向度施污”作用下，相当一部分体育教师群体表现出“自污”以及“自甘受污”的特征，进一步加深了体育教师是身份认同的迷失^[15]。

3 路径构建：高素质专业化体育教师队伍建设的三重向度

3.1 认知维度：体育教师队伍生态改良路径

首先，明确政策目标，细化政策内容，提升政策执行的精准性与可行性^[16]。以《关于印发“体重管理年”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和《“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为总抓手，以学校体育为着力点，在全社会大力宣传学校体育对于“体重管理年”和“健康中国”的重要作用和重大意义。加强学校体育教育在“终身体育”和“幸福生活”中重要基础作用的宣传力度，从而让全社会认识到在现代社会中，在“健康中国”国家战略中体育教师职业的重要存在价值^[12]。具体措施如下：一是完善政策文本的规范性与约束力。针对“开齐开足体育课”、“配齐配强体育教师”等常规性要求，在政策表述中明确执行主体、协作部门及考核标准。例如“体育课程刚性实施”条款应补充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学校管理层、教研部门的协同责任，并制定最低师资配置标准，形成可量化评估的指标体系，在根源上防止政策被束之高阁^[17]。需建立责任追溯机制：在政策表述中明确执行主体、协作部门及考核标准。例如“体育课程刚性实施”条款应补充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学校管理层、教研部门的协同责任，并制定最低师资配置标准，形成可量化评估的指标体系。二是设置政策执行检测的“红黄绿”预警系统。由各地方教育部门牵头，组建包括由各校及退休优秀体育教师构成的监督小组。采用对各学校的学校体育相关政策的执行情况进行不定期抽查，及对学校主要领导进行定期线上或线下沟通等方式进行监督，对相关政策落实“不到位”、“较差”和“优秀”的学校分别进行“红色”、“黄色”和“绿色”记录，并反馈至各地方教育部门，由地方教育部门进行定期通报或约谈。通过以上措施逐步破除“学科鄙视链”，对体育教师职业进行社会认知重构。

3.2 价值维度：师德师风与职业精神培育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健全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的专门部署。我们必须把师德师风建设作为教师队伍建设的首要任务，引导广大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以高尚师德引领学生成长^[18]。以党和国家的在教师师德师风建设层面的意见为引领，将教育家精神融入教师培养体系，建立师德考核“一票否决”机制。教育家精神所蕴含的高站位和大气魄，为体育教师塑造了一个可堪追求的共同愿景，不仅关乎体育教师的个人发展，更关乎整个体育教育事业的未来^[19]。具体措施如下：一是将师德师风建设融入至体育教师的日常工作中。以“课程思政”为载体，通过“课程思政”建设，加强体育教师在“政治方向、爱国守法、文化传播、教书育人、关爱学生、言行举止、科学研究、诚信自律、服务社会”等方面意识^[20]。二是实施“职业精神唤醒工程”。依托国家

智慧教育平台的“暑期教师研修”专栏，开设“体育名师成长档案”，教育主管部门、各级各类学校等相关机构可深入挖掘当地体育教师队伍中展现出默默奉献、不计回报等优秀品质的先进典型，将他们的事迹进行整理和宣传，通过报刊、官网、公众号、宣传栏等多种渠道进行广泛传播，让更多的体育教师了解他们的奉献精神和育人成就，激发全体体育教师向榜样学习的热情和动力^[21]，引导教师实现从“职业生存”到“事业追求”的精神跃迁。

3.3 实践维度：体育师资队伍“培养-补充-激励”三位一体建设机制

通过“基础能力-进阶能力-实践能力”的阶梯式培养以及人工智能支持的个性化培训模式对体育师资队伍进行职前专业化培养，确保处于职前阶段的体育教师在例如专项技能、科学研究等多方面均具备专业化能力，以及根据不同教学地点和区域特色开展特色化教学的能力，缩减城乡区间的差距。在师资队伍补充方面，依据体育课时增量及班师比动态调整体育教师数量，采用多种渠道补充体育师资，地方教育部门可将退役运动员、社会教练员纳入兼职教师库，并允许学校根据现实需要设置兼职教练员，但需将聘用教练员上报至地方教育部门，实施“县管校聘”统筹城乡资源。此措施为学校选人、用人、聘人提供了新思路，为优秀退役运动员、体育系统教练员转型进入学校担任体育教师或教练员畅通了渠道^[4]。在体育教师工作激励方面，可将学生体质健康测试、竞赛成绩纳入绩效考核，确保职称评聘、评优表彰与其他学科同等待遇。但偏远贫困地区的体育教师在竞赛成绩等方面，由于教育资源等方面的差距，较难与城镇地区的体育教师比较。因此针对于偏远贫困地区体育教师津贴，应在积极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大幅提高这类地区体育教师的津贴等补助，以此来补偿这部分教师的失衡心理^[22]。

4 结论

研究以新时代教育强国战略为背景，系统阐述了高素质专业化体育教师队伍建设的困境与解决路径。研究发现，当前我国体育教师队伍建设存在三大矛盾，第一结构性矛盾，具体表现为城乡师资数量比例、教育资源失衡，并且乡村地区体育教师“老龄化”、“兼职化”现象尤为突出；第二能力断层矛盾，具体体现在我国体育教师缺乏培训，专业能力无法与新课程标准匹配，“技术精湛”和“学识丰富”之间难以兼顾；第三发展动力矛盾，具体体现在制度保障不足，社会认知存在偏差，体育教师污名化现象严重，导致部分体育教师出现职业认同危机。研究进一步提出，通过“认知-价值-实践”三维路径破除高素质专业化体育教师队伍建设的困境，以政策保障破除社会偏见；以师德师风重塑职业精神；最后通过“培养-补充-激励”三位一体机制，帮助体育教师队伍建设实现“量”与“质”的提升。

参考文献：

- [1] 尤传豹, 高亮. 新时代体育教师队伍建设 [J]. 体育学研究, 2021, 35(06): 2.
- [2] 闫建璋, 尚文华. 我国高质量教师队伍建设内容及其路径优化研究——基于政策文本的 Nvivo 质性分析 [J]. 教育学术月刊, 2024, (08): 86-94.
- [3] 陈曙, 王健, 郑澜. 新时代课程改革背景下体育教师核心素养发展路径研究 [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25, 48(03): 90-103.
- [4] 张益铭, 高鹏. 面向强国战略的专项型体育师资培养路径 [J]. 体育学刊, 2025, 32(02): 97-105.
- [5] 蒋衡. 西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关于教师角色的研究 [J]. 高等师范教育研究, 2002, (06): 72-7+57.
- [6] 马莉, 蔡娟. 体育教师是谁——角色理论视域下体育教师的形象解构 [J]. 上海教育科研, 2024, (04): 35-41.
- [7] 赵胜国, 王健, 郁崇禧, 等. 新时代体育教学观转向的实然之需与应然之举 [J].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2022, 37(03): 264-9+88.
- [8] 袁圣敏, 吴键. 新时代义务教育阶段体育教师的数量配备现状与队伍建设路径 [J]. 首都体育学院学报, 2022, 34(04): 393-401+12.
- [9] 熊扬名, 王永安. 我国城乡小学体育师资配置差异研究 [J]. 教学与管理, 2018, (03): 28-31.
- [10] 陈双娇, 汪明春, 徐苗苗. 新课标背景下体育教师队伍的高质量建设研究 [J]. 教学与管理, 2024, (09): 61-5.
- [11] 舒宗礼, 王华倬. 教育生命视阈下的体育教师专业发展的现实状态及未来愿景 [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18, 41(12): 91-8+106.
- [12] 毛振明, 李海燕, 邱丽玲, 等. 体育教师地位之殇与解决之策:对全面深化新时代体育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建言(之一) [J]. 首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8, 30(04): 327-30.

- [13] 王先茂, 凌晨, 董国永, 等. 污名化背景下优秀体育教师专业成长的经验与启示 [J]. 体育学研究, 2021, 35(06): 25-33.
- [14] 赵刚, 陈民盛. 对我国中小学体育课程改革关键问题的反思与探讨 [J].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 2017, 33(05): 114-8.
- [15] 李阳, 赵刚. 论我国体育教师身份认同的迷失与重构 [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19, 42(09): 117-26+47.
- [16] 刘特, 董国永. 体育教师政策何以遭遇执行偏差——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的分析 [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24, 58(12): 84-9.
- [17] 李游, 李笋南, 张少杰. 卓越体育教师的内涵厘定、问题溯源与培养策略 [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24, 50(06): 89-97+158.
- [18] 俞伟跃. 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支撑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J]. 中国基础教育, 2024, (09): 1.
- [19] 王先亮, 廖粤生. 认识·价值·实践: 教育家精神引领体育教师队伍高质量建设的三重向度 [J].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2025, 44(02): 9-15.
- [20] 尹志华, 刘皓晖, 万雪, 等. 新时代体育教师师德师风建设的维度表征、主要问题与推进路径 [J].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 2024, 40(05): 10-8+96.
- [21] 张瑞林. 学校体育以体育人“非学科”化的生成逻辑、现实审视与路径探寻 [J]. 体育学刊, 2024, 31(01): 1-7.
- [22] 谢辉强, 李冰. 政策文本视角中的我国体育教师待遇发展问题研究(1949-2021) [J]. 广州体育学院学报, 2021, 41(06): 111-4.

Research On The Dilemma And Path Of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 Quality Professional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ducation Power

Power

Qin Miao

¹ Xingtai Xindu first kindergarten, Xing Tai,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education power,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and log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discusses th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and solution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quality professional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By combing the relevant policy documents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of CNKI, sorting out the policy text, combining with the domestic research resul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key problems and solutions of the current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 team construct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P.E. teachers in China faced the following problems: 1. structural imbalance, imbalance between the number of teachers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educational resources, aging of rural teachers and "part-time" phenomenon; 2. the contradiction of ability fault, the current training mode is out of lin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 and teachers' ability is weak in emerging project teaching and other aspects; 3. the contradiction of development motivation is reflected in the lack of system guarantee and social cognitive deviation, and the serious "stigmatiz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which leads to the crisis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In view of th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the research puts forward: 1. strengthen the rigidity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supervise the implementation of policies through the "red, yellow and green" early warning system, clarify the responsibility subject, and break the "chain of discipline contempt"; 2. reshape teachers' morality and style, integrate the spirit of educators into the teacher training system, implement the "professional spirit awakening project", and build a dynamic evaluation mechanism of teachers' morality; 3. establish a "training supplement incentive" Trinity mechanism, optimize the pre-service and post-service teacher training mode, improve the teacher allowance system in remote areas, and promote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education resources.

Keywords: High quality; Specialization; Construc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高校啦啦操运动员不同性别赛前心理状态的对比趋势分析

李怀哲¹ 徐文峰¹ 韩君翊¹

(1.吉林体育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00)

摘要: 本研究以参加2025年全国啦啦操锦标赛合肥站的高校运动员为样本, 通过对比不同性别运动员在赛前不同阶段(1个月、15天、7天、1天)的心理状态(主观锻炼感觉、心境状态、压力状态), 揭示高校啦啦操运动员赛前心理状态的性别差异及动态变化趋势, 为运动员赛前心理调控提供理论依据。研究对象, 选取4所高校30名运动员(男15人, 女15人)。研究方法采用POMS量表、主观锻炼量表、CSAT-2量表进行心理状态监测, 通过SPSS和Excel进行T检验与皮尔逊分析。研究发现, 主观锻炼感觉上, 男女性在幸福感、心理烦恼、疲劳度无显著差异, 但幸福感下降、疲劳累积, 男性烦恼感略升。心境状态方面, 赛前男性早期负面心境显著高于女性, 随赛事临近性别差异缩小。压力状态中, 男女性核心压力特征无显著差异, 但女性短期压力敏感, 男性生理应激增幅大, 女性自信心更稳定。研究表明, 男性赛前早期负面心境突出, 后期聚焦抑郁。女性负面情绪增长趋势显著, 短期压力敏感。赛前心理性别差异随时间收窄, 心理应激呈“累积-爆发”规律。本研究旨在丰富啦啦操赛前心理性别差异研究, 为赛前心理调控提供理论依据, 助力提升备赛与竞赛表现。

关键词: 啦啦操; 高校运动员; 赛前心理状态

DOI: doi.org/10.70693/jyxb.v1i3.69

1 引言

在高校体育文化蓬勃发展的背景下, 啦啦操作为集技巧性、艺术性与团队协作于一体的运动项目, 不仅是体育赛事的重要组成部分, 更成为展现大学生青春活力与精神风貌的舞台。赛前心理状态作为影响运动员竞技表现的关键因素, 一直是运动心理学领域的研究热点(Abramsen et al., 2008; Correia & Rosado, 2019)。

现有阶段针对高校啦啦操运动员这一特定群体的赛前心理状态研究相对匮乏(张宠, 2020; 刘芷溪等, 2025)。啦啦操项目兼具技巧展示与艺术表现的双重属性, 其评分规则对运动员的动作难度、团队一致性及舞台表现力均有极高要求, 这种独特的项目特征可能使运动员在赛前面临更为复杂的心理挑战, 如对动作失误的担忧、对团队配合的焦虑、对裁判评分的过度关注等(Lundqvist, 2024)。

啦啦操运动员的赛前焦虑水平受性别、比赛经验、比赛场地等因素的影响, 不同性别和参加比赛次数的不同都较大幅度地影响着运动员的焦虑水平(Soós et al., 2016; 符明秋, 2004)。基于此, 本研究立足高校啦啦操运动的发展现状, 通过对四所高校30名啦啦操运动员展开调查研究, 聚焦运动员赛前心理状态这一关键议题, 为构建符合啦啦操项目特点的心理训练体系提供理论依据, 更能为教练员制定个性化心理干预方案、提升运动员赛前心理调控能力提供实践指导, 助力高校啦啦操运动员在比赛中发挥最佳水平, 推动校园啦啦操运动的专业化发展。

2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人员的选定根据参加2025年全国啦啦操锦标赛(少年、青年、特别、技术星级)合肥站比赛的吉林体育学院(男: 5人, 女: 9人)、临沂大学(男: 3人, 女: 3人)、安徽师范(男: 2人, 女: 3人)、成都体育学院(男: 5人), 在校啦啦操运动员, 男生15人, 女生15人, 为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基本情况详见表1。在运动心理学研究中, 大学生运动员常作为重要样本群体, 他们在赛前心理状态方面的表现具有较强代表性(Soós et al.,

作者简介: 李怀哲(1996—), 男, 硕士, 研究方向为体育教学

韩君翊(2001—), 男, 硕士, 研究方向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

通讯作者: 徐文峰

2016; 符明秋, 2004)。因此, 本研究以高校啦啦操运动员为研究对象, 旨在为相关群体的心理调控与实践干预提供实证依据。

表 1 研究对象基本情况 (N=30)

性别	身高 (CM)	体重 (KG)
M (15)	178.2±3.668	71.87±6.289
F (15)	166.33±5.233	54.967±10.6544

表 1 可知, 该表格为 30 名研究对象 (男、女各 15 人) 的基本情况, 呈现身高与体重数据。从身高看, 男性平均为 178.2CM, 女性平均 166.33CM, 男性平均身高高于女性, 且男性身高数据离散程度 (标准差 3.668) 小于女性 (标准差 5.233)。体重方面, 男性平均 71.87KG, 女性平均 54.967KG, 男性平均体重大于女性, 同时女性体重数据离散程度 (标准差 10.6544) 远大于男性 (标准差 6.289), 反映出女性体重个体差异相对更大。

表 2 研究对象基本信息 (N=30)

学校	姓名 (M)	姓名 (F)
吉林体育学院	撖**、王**、庞**、刘**、宋**	朱**、刘**、彭**、王**、李*、武**、马**、高**、李**
临沂大学	赵*、宋**、姚**	张**、赵**、马**
安徽师范大学	曾**、刘**	何**、闫**、陈**
成都体育学院	刘**、武**、贾*、李**、侯**	

2.2 研究方法

2.2.1 问卷调查法

本研究运用问卷调查法, 以参加 2025 年全国啦啦操锦标赛合肥站的吉林体育学院、临沂大学、安徽师范大学、成都体育学院啦啦操运动员比赛前的心境状态、心理压力、心理焦虑趋势为研究内容, 分别在赛前一个月、十五天、七天采用“世界卫生组织 (WHO) 情绪状态问卷 (POMS 量表)”和主观锻炼量表对运动员赛前心理状态进行监测。在比赛前一周和比赛前一天进行竞赛焦虑问卷 (CSAT-2 量表) 进行运动员赛前压力的监测。

2.2.2 数据处理

本文通过运用 SPSS、Excel, 进行数据整理分析。通过 SPSS 数据 T 检验和皮尔逊 (Pearson) 检测, 对高校啦啦操运动员不同性别运动员心理测量结果, 赛前 1 月、赛前 15 天、赛前 7 天、赛前 1 天的各项数据进行不同性别对比分析, 结果用均值来表示。

3 高校啦啦操运动员心理状态

3.1 不同性别运动员赛前主观锻炼感觉状态变化

通过主观锻炼量表测试运动员的积极幸福感、心理烦恼和疲劳情况, 对运动员的心理感觉进行监测, 数据的采集为赛前 1 个月、赛前 15 天、赛前 7 天, 测试结果详见表 3。

表3 不同性别运动员主观锻炼感觉状态变化 (N=30)

指标	赛前1月			赛前15天			赛前7天		
	M	F	P	M	F	P	M	F	P
幸福感	21.13	21.67	.756	19.47	21.07	.352	19.47	21.13	.342
心理烦恼	9.53	11.00	.376	11.00	9.73	.507	12.13	10.47	.473
疲劳	15.33	12.00	.136	17.47	16.07	.612	18.27	17.20	.646

注: **P<0. 01 非常显著性差异, *P<0. 05 显著性差异

通过主观锻炼量表监测幸福感、心理烦恼和疲劳的变化情况 (表3)。结果显示, 三项指标在性别间均未达到显著差异 ($p>0.05$)。尽管如此, 整体趋势呈现出随比赛临近, 幸福感下降、烦恼感增加、疲劳感累积的特点。尤其是男性运动员在赛前1个月至7天期间幸福感下降更明显, 而女性保持相对稳定。这一结果与张宠 (2020) 在云南高校啦啦操运动员中发现的“认知焦虑与躯体疲劳随赛前推进而增加”的规律基本一致。

3.2 不同性别运动员赛前心境状态变化

研究针对30名运动员, 从赛前1月、赛前15天、赛前7天三个阶段, 分析不同性别运动员心境状态, 指标涵盖紧张、抑郁等7项, 测试结果详见表4。

表4 不同性别运动员心境状态变化 (N=30)

指标	赛前1月			赛前15天			赛前7天		
	M	F	P	M	F	P	M	F	P
紧张	23.27	17.73	.008**	23.93	19.53	.091	22.73	22.33	.865
抑郁	34.27	21.60	.002**	35.47	24.87	.018*	35.94	26.27	.035*
愤怒	28.27	19.20	.005**	31.07	22.73	.018*	31.13	24.80	.088
有力	25.73	28.47	.074	24.27	25.47	.476	25.60	26.27	.644
疲惫	18.80	13.60	.004**	19.47	15.33	.037*	18.53	15.73	.160
困惑	18.73	15.20	.037*	18.00	15.13	.164	17.67	16.13	.405
自我有关的情绪	24.73	28.33	.008**	23.67	26.47	.090	23.47	26.20	.104

注: **P<0. 01 非常显著性差异, *P<0. 05 显著性差异

POMS 测试结果如表4所示。赛前1个月, 男女在紧张、抑郁、愤怒、疲惫和自我相关情绪等维度上均存在显著差异 ($p<0.01$), 男性负性情绪水平普遍高于女性。这表明在赛前早期, 男性可能更敏感于比赛压力。至赛前15天, 差异集中在抑郁、愤怒与疲惫维度 ($p<0.05$), 其他维度趋于接近; 到赛前7天, 仅抑郁维度仍存在性别差异 ($p<0.05$)。整体呈现出性别差异随赛期临近逐渐收窄, 但男性抑郁情绪在后期依然突出的特点。

这一趋势与国际研究存在一定差异。Correia & Rosado (2019) 在葡萄牙样本中发现, 女性运动员焦虑和负性情绪更高, 而本研究却显示男性在负性心境上更突出, 可能与啦啦操运动强调团队协作、表演性和技术动作难度相关。此外, 这一结果也印证了符明秋 (2004) 的结论, 即性别差异与心境状态的交互作用复杂, 需结合项目特点综合解读。

3.3 不同性别运动员赛前压力状态变化

本研究通过竞赛焦虑问卷 (CSAT-2量表) 进行运动员的心理压力检测, 测试结果如下:

表 5 不同性别运动员赛前压力状态变化 (N=30)

指标	赛前 7 天			赛前 1 天		
	M	F	P	M	F	P
认知状态焦虑	18.07	18.60	.785	17.80	19.60	.384
躯体状态焦虑	15.60	17.33	.279	17.67	18.20	.788
状态自信心	27.27	27.60	.852	26.67	27.80	.510

注: **P < 0.01 非常显著性差异, *P < 0.05 显著性差异

通过 CSAI-2 量表对认知焦虑、躯体焦虑和状态自信进行分析 (表 5)。结果显示, 在赛前 7 天与 1 天, 三项指标的性别差异均不显著 ($p > 0.05$)。不过趋势上, 女性的认知焦虑在临近比赛时略有升高, 男性则略有下降; 躯体焦虑男女均有增加, 但男性增幅更大, 状态自信方面, 男性轻微下降, 女性保持稳定。这说明女性在赛前短期内对压力更敏感, 但整体自信更稳固。

类似结果在刘芷溪等 (2025) 对学青会运动员的研究中也得到体现, 即性别差异不显著, 但经验与运动等级对焦虑有更大影响。而在更大样本的跨文化研究中, Abrahamsen et al. (2008) 和 Soós et al. (2016) 均强调性别在焦虑模式上的差异性, 提示不同文化背景和项目特征会导致结果的不一致。

3.4 赛前不同阶段运动员心理状态变化特点

表 6 赛前不同阶段运动员心理状态变化特点 (N=30)

测试时间	幸福感			心里烦恼			疲劳
	紧张	抑郁	愤怒	有力	疲惫	困惑	
比赛前 1 月	21.40			10.27			13.67
起赛前 15 天	20.27			10.37			16.77
比赛前 7 天	20.30			11.30			17.73
自我有关的情绪							
比赛前 1 月	20.50	27.93	23.73	27.10	16.20	16.97	26.53
起赛前 15 天	21.73	30.17	26.90	24.87	17.40	16.57	25.07
比赛前 7 天	22.53	31.10	27.97	25.93	17.13	16.90	24.83
认知状态焦虑				躯体状态焦虑			状态自信心
比赛前 7 天	18.33			16.47			27.43
比赛前 1 天	18.70			17.93			27.23

综合表 6 与图 1, 心理状态整体呈现随比赛临近而逐渐恶化的“时间梯度效应”。赛前 1 个月: 处于“动态平衡期”, 正性情绪 (幸福感、自我相关情绪) 较高, 负性情绪尚处低位; 赛前 15 天: 进入“压力累积期”, 抑郁、愤怒和疲劳明显上升, 幸福感下降, 提示应激反应增强; 赛前 7 天: 表现出“应激启动期”特征, 紧张和焦虑全面上升, 状态自信虽维持一定水平但出现波动; 赛前 1 天: 进入“应激峰值期”, 认知和躯体焦虑均达到最高, 自信心略有下降, 身心调适处于紧张对抗状态。

这一变化轨迹与 Morgan (1978) 提出的“冰山假说”高度契合, 即优秀运动员赛前应具备低负性、高正性情绪的心理曲线。同时也与 Yang et al. (2024) 的研究呼应, 说明焦虑和疲劳在赛前逐步积累, 并可能通过心理需求满足影响倦怠与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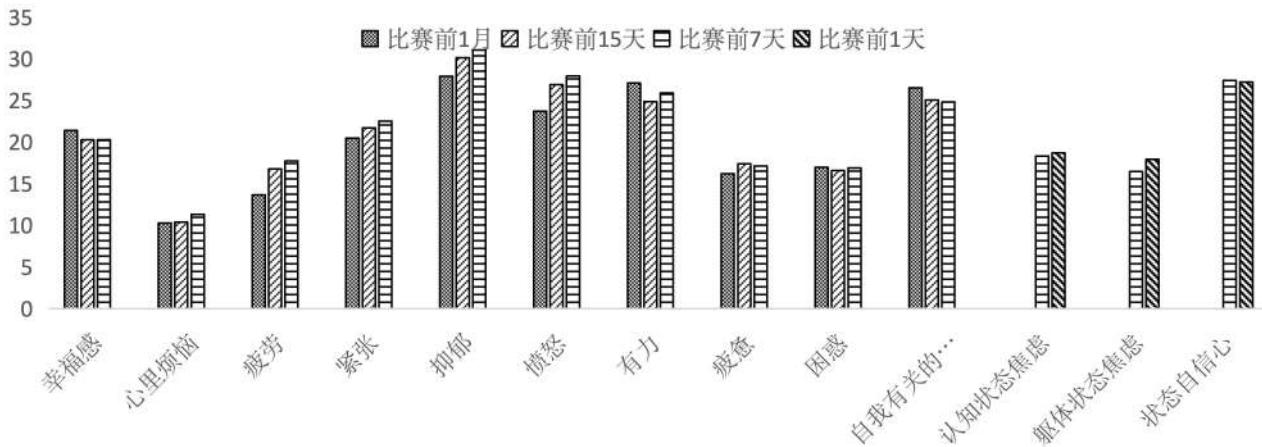


图 1 赛前不同阶段运动员心理状态变化特点

4 讨论

4.1 不同性别啦啦操运动员赛前心理变化特点

本研究发现，男性运动员在赛前负性心境水平较高，尤其集中在抑郁和愤怒维度，但整体增长幅度较小；女性运动员的负性情绪基线较低，却在赛前各阶段呈现更明显的上升趋势。符明秋等（2004）的研究指出，女性运动员往往更关注自身的内心体验，缺乏像男性那样通过直接宣泄释放负性情绪的方式，因此在赛前更容易受到情绪困扰。同时，长期训练和外部支持带来的责任感，也可能使女性在临近比赛时表现出更明显的情绪波动。

然而，本研究在赛前 7 天与 1 天使用 CSAI-2 进行压力检测时发现，男女运动员在认知焦虑、躯体焦虑和状态自信心维度上均无显著性差异。这与刘芷溪等（2025）的结果一致，即性别并非决定性因素，而运动经验与运动等级对焦虑水平影响更大。

因此，可以认为性别差异主要体现在赛前早期的心境变化，而在接近比赛时，男女运动员的核心压力体验趋于一致。换言之，赛前心理干预不应过度强调性别，而应关注全体运动员普遍存在的焦虑与情绪调适问题。

4.2 赛前心里调控

4.2.1 自我调节

自我调节是运动员应对赛前心理压力的基础策略。研究表明，深呼吸等放松技术有助于降低生理唤醒水平，缓解心率加快、思绪紊乱等应激反应（张宠, 2020）。同时，积极自我对话能够替代消极想法，增强自信与控制感（Abrahamsen et al., 2008）。设定具体可控的过程性目标，并通过可视化想象训练反复演练技术动作和比赛情境，可提升熟悉感与成功预期，从而降低焦虑水平（Soós et al., 2016）。此外，建立稳定的赛前准备流程，不仅提供了行为层面的熟悉感，也能在心理层面形成安全感与掌控感。

4.2.2 教练指导

教练在运动员心理调控中扮演关键的外部支持角色。研究表明，积极的教练—运动员关系能有效降低焦虑水平并提升心理安全感（Lundqvist, 2024）。在赛前，教练应营造支持性氛围，强调可控因素如技术与战术执行，而非不可控的比赛结果，帮助运动员聚焦于当下。反馈应具体、建设性，避免消极评价带来额外压力。对于出现紧张或动力不足的运动员，教练可通过简短积极的沟通或提醒使用放松技巧进行及时干预。同时，制定以过程为导向的目标，有助于运动员明确努力方向，减少对结果的过度担忧。总体而言，自我调节是心理适应的内因，而教练指导则是外部支持，两者结合才能更有效地帮助运动员在赛前保持最佳心理状态。

5 展望与不足

运动员的心理状态始终是需要高度关注的核心要素，它直接关系到运动员的运动生涯周期、运动损伤的预防以及运动成绩的提升，因此也是各竞技体育学科研究的热点问题。本研究聚焦于高校啦啦操项目，对不同性别运动员的心理状态进行了阶段性监测。然而，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未能对不同年龄段运动员表现出的心

理状态特征进行明确划分，其次，监测频率尚有提升空间；再者，由于啦啦操是一项高度依赖团队协作的项目，受限于多种客观因素（如团队整体状态的复杂性、难以单独量化个人心理对成绩的影响等），未能深入探究运动员心理状态与比赛成绩之间的相关性。未来研究可考虑引入人工智能技术进行多模态数据采集（如生理信号、面部表情、动作分析等），并结合客观比赛数据进行综合分析，以期更全面、精准地评估心理状态及其与运动表现的关系。

参考文献：

- [1] Abrahamsen F E, Roberts G C, Pensgaard A M. An examination of the factorial structure of the Sport Anxiety Scale-2: Support for a multidimensional anxiety model. *Psychology of Sport and Exercise*, 2008, 9(4): 449-465.
- [2] Correia M E, Rosado A. Anxiety in athletes: Gender and type of sport differences. *Revista Iberoamericana de Psicología del Ejercicio y el Deporte*, 2019, 14(1): 83-93.
- [3] 张宠. 啦啦操运动员赛前心理焦虑研究[J]. 文体用品与科技, 2020(9): 45-47.
- [4] 刘芷溪, 张卓, 岳文. 第1届学青会健美操(啦啦操)项目运动员赛前心理焦虑研究——以北京队为例[J]. 体育科技学报, 2025, 33(1): 32-39.
- [5] Lundqvist C. Prevalence of harassment, abuse, and mental health among current and retired senior Swedish cheerleaders. *Journal of Sports Sciences*, 2024, 42(5): 499-510.
- [6] Soós I, Van den Berg C, et al.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e-competition mood states, age, gender, and a national ranking in artistic gymnastics. *Contemporary Sports Technology*, 2016, 6(35): 44-51.
- [7] 符明秋, 于志涛, 周喜华. 运动员赛前心境状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体育科学, 2004, 24(2): 48-51.
- [8] Yang X, Chen Y, Zhang J, et al. Competition anxiety and athlete burnout: The mediating role of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s. *BMC Psychology*, 2024, 12(1): 188-198.

A Comparative Trend Analysis of Pre-Competition Psychological States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College Cheerleading Athletes

Li huaizhe, Xu wenfeng, Han junyi

(Jilin Sport University, Jilin, Changchun)

Abstract: This study takes college athletes participating in the 2025 National Cheerleading Championship (Hefei Division) as the sample and compares the pre-competition psychological states of male and female athletes across different time points (1 month, 15 days, 7 days, and 1 day before the event). The focus is on subjective exercise feelings, mood states, and stress states, aiming to reveal gender differences and dynamic trends in athletes' pre-competition psychological states, and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psychological regulation before competition. The research subjects included 30 athletes from four universities (15 males and 15 females). The research methods involved psychological monitoring using the POMS scale, the Subjective Exercise Experience Scale, and the CSAT-2 scale. Data analysis was conducted with SPSS and Excel through t-tests and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The findings showed that in terms of subjective exercise feeling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gender differences in well-being, psychological distress, or fatigue, although well-being declined and fatigue accumulated, with males reporting a slight increase in distress. Regarding mood states, male athletes exhibited significantly higher negative moods in the early stages, while the gender gap narrowed as the competition approached. For stress state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gender differences in core stress characteristics, but females displayed greater short-term stress sensitivity, whereas males showed a larger increase in physiological stress; female athletes also demonstrated more stable self-confidence. Overall,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male athletes exhibit more prominent negative moods in the early pre-competition stage, with a later shift toward depressive tendencies, whereas female athletes show a marked increase in negative emotions and short-term stress sensitivity. Gender differences in pre-competition psychological states narrow over time, and psychological stress follows a "cumulative-outbreak" pattern. This study enriches research on gender differences in pre-competition psychology among cheerleading athletes and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psychological regulation strategies to enhance preparation and competition performance.

Keywords: Cheerleading; College Athletes; Pre-Competition Psychological State

小学高年级学生性教育认知现状研究：以 W 市为例

吴慧玲¹ 陆一丹¹ 宋方港¹ 吴奕冉¹ 郑呓烙¹ 侯利兵¹ 薛彬鹏^{1*}

(1.温州大学教育学院, 浙江 温州 325035)

摘要：目的 了解 W 市小学生性健康知识水平现状, 评估性教育课程干预的有效性, 为优化小学性教育体系提供依据。方法 用整群随机抽样法选取 W 市 6 所小学五至六年级学生 438 人 (男生 224 人, 女生 214 人), 通过自编性教育问卷进行基线调查。结果 学生性知识总分平均 46.24 分 (满分 85 分), 性道德维度得分最低 (43.3%), 性心理维度最高 (72.4%)。男生性知识总分显著高于女生 ($47.09 > 45.34$, $p < 0.001$), 但性道德无性别差异 ($p = 0.449$)。而不同生源地学生的性认识水平的总成绩不存在显著差异, 表明生源地并非小学性认识水平的影响因素。结论 小学高年级学生性教育存在性别差异与内容不均衡问题, 系统性教育课程可有效提升知识水平。需加强性道德教育, 推动家校协同及课程本土化设计。

关键词：性教育; 小学高年级; 性认识水平

基金项目：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JWXC2024023); 浙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计划 (新苗人才计划) 项目 (2025R444A010)

DOI: doi.org/10.70693/jyxb.v1i3.75

性教育对儿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国际上许多国家已建立成熟的性教育框架, 如美国《国家性教育标准》从幼儿园至高中分阶段教授性知识, 瑞典则将性教育设为必修课^[1]。尽管国内《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政策明确要求学校开展性教育, 但实施中存在课程边缘化等问题。我国中小学性教育覆盖率低, 尤其在农村及非一线城市, 家长大多持保守的态度, 由于教师专业性和课程设计的不足, 性教育课程并未纳入常规课程中^[2]。

性教育是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有利于儿童身心健康发展, 是国家的百年大计^[3]。教育部 2008 年颁布的《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明确了性教育内容, 并提出每学期应规划 6-7 课时进行性教育^[4], 但应试教育下, 性教育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严光为的调查显示, 部分家长觉得对青少年进行性教育有可能引发不良后果^[5]。刘文利等研究表明, 85% 的父母从来没有对孩子进行过性教育^[6]。因此, 很多儿童对性知识一知半解但又感到好奇, 很容易产生不安全性行为、意外怀孕等后果^[7]。基于此, 本研究通过对 W 市 6 所小学的性教育现状的调查, 希望为进一步制定科学的性教育方案提供依据, 提高学生的性知识水平, 为儿童和青少年创造一个安全、健康的成长环境。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 W 市为重点调研地, 抽取 W 市 5 个区县共 6 所学校为调研地, 其中 3 所学校分布于 W 市城区, 3 所分布于 W 市农村与城郊,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法对这六所的学校抽样。考虑到小学高年级学生不仅具备理解问卷所需的认知能力, 更处于青春期发育前夕的关键阶段, 能为研究提供更真实、配合度更高的反馈, 所以研究从五到六年级中各随机抽取 2 个班级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样本总数共 500 人, 其中男生 254 人, 女生 246 人。剔除无效问卷后, 有效问卷数量为 438 份 (男生 224 人, 女生 214 人), 男女生比例 (51.1:48.9) 与全国小学高年级学生性别分布接近^[8], 问卷有效率达到 87.6%。

作者简介：吴慧玲 (2004—), 女, 温州大学教育学院应用心理学专业本科生

陆一丹 (2004—), 女, 温州大学教育学院应用心理学专业本科生

通讯作者：薛彬鹏 (1992—), 讲师, 研究方向: 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健康教育

1.2 研究工具

研究采用自编性教育调查问卷《小学高年级学生性教育认知水平调查问卷》（分男/女生版），旨在系统评估男女学生对性知识、性心理、性交往、性道德及性教育学习方式的认知水平，并探讨两者在其中所存在的性别差异性。

测评问卷包含五个分量表，共 24 题，总分为 85 分：性知识（6 题/19 分）为青春期生理发育与生殖健康基础知识（如“你知道男（女）生第二性别特征有哪些？”），性心理（5 题/15 分）评估对性现象的态度与情绪反应^[9]（如“你对性有什么看法？”），性交往（4 题/16 分）考察异性交往与边界意识^[10]（如“与异性相处时，你有什么感觉？”），性道德（4 题/16 分）聚焦性别平等与自我保护（如“你认为学校、社会和国家用规定能保护好嘛？”），性教育学习方式（5 题/19 分）了解学生获取知识途径与需求^[11]（如“你是怎么知道性知识的？”）。

计分采用科学赋分法，对正向认知选项赋予高分，错误或消极选项赋低分，总分累加越高表明性认知水平越科学全面。经检验，问卷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729，证实测量工具具有良好稳定性。

1.3 质量控制

研究者以班级为单位对目标学生开展问卷调查，调查前已向学生明确说明研究的伦理规范，确保其了解问卷调查属于匿名性质且所有填写信息将得到严格保密；本次调查采用编码唯一、当场有序填写问卷的方式。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27.0 软件对研究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运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处理，其中 $p < 0.05$ 表示两者之间有显著差异，且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小学高年级学生整体性认识水平概况

样本性别分布均衡，未表现出明显偏向。但生源地以城镇地区为主，这可能影响性认识水平，还需进一步分析。小学高年级学生总成绩的平均分为 46.24 分（满分 85 分），表明整体水平处于中等偏下，有较大提升空间。同时标准差为 4.71，说明学生的性认识水平相对同质，存在普遍性问题，但也暗示未来性教育普及有利于整体提升。根据不同维度的分量表的平均分占比（平均分/满分×100%），可直观比较学生在各维度的水平如何。分析显示，学生在不同维度的认识水平不同，即性心理认识水平最佳，性道德认识水平最弱。

性心理认识水平维度平均分最高，表明学生的性心理认识（对性现象的态度、自我认知等）水平相对较好。可能由于性心理认识水平的相关问题（如“当你发现男孩子开始有喉结，女孩子身体变得丰满，你会怎么对待？”）主要考察学生对第二性征发育和性别交往的态度，更加具象和容易理解。但标准差较高，说明个体间差异较大，部分学生可能存在认识误区或刻板印象。

而性道德认识水平维度平均分最低，显著低于其他维度，学生在性道德认识水平方面认知存在不足。性道德认识水平主要考察学生对性别平等、自我保护、性行为伦理及社会责任等方面的认知，具体包括个人、学校、国家和社会是否有责任保护、是否具备防范性侵害的意识（如“你了解过有关儿童性侵害的新闻吗？”）、对浏览色情信息的道德判断、是否理解性行为应建立在尊重与同意基础上等。性道德认识水平维度分值较低说明小学基础教育和家庭教育对此可能缺乏系统教育和一定的规范，同时学生年龄较小，对抽象的道德概念理解能力有限。该维度标准差也最小（1.56），说明分数集中，多数学生表现较差，问题具有普遍性。

表 1 整体性认识水平概况 (n=438)

	M	SD	平均占比
性别	1.49	0.5	
生源地	1.64	0.479	
性知识	9.96	1.718	52.4%
性心理	10.86	1.938	72.4%
性交往	8.37	2.053	52.3%
性道德	6.93	1.56	43.3%
性教育学习方式	10.12	2.092	53.3%
分值	46.24	4.71	54.4%

2.2 不同性别小学高年级学生性认识水平比较

根据独立样本 t 检验发现, 男女生性认识水平的总成绩存在显著差异 ($t=3.958$, $p=0.000$), 这表明性别因素对性认识水平的影响较大。经过进一步检验, 除性交往认识水平维度外, 男生的各维度分值均略高于女生。而男生性交往维度得分略低的原因在于, 异性交往边界及自我保护意识显著低于女生, 这一差异尤其体现在对隐私触碰行为的回应上: 在“如果你的一位平时玩得很好的异性朋友, 在开玩笑或打闹时, 突然要触碰你背心或内裤遮盖的身体部位(隐私部位), 你会怎么做?”这一题上, 男生的平均分值明显低于女生 ($M_{男}=1.45$, $M_{女}=2.06$)。男女生的性道德维度分值均显著低于其他维度, 这也反映了男女生在性道德教育上的普遍存在不足。具体结果详见表 2。

表 2 不同性别小学高年级学生性认识水平 (n=438)

性别 (M±SD)		t	p
男 (n=224)	女 (n=214)		
性知识	10.54±1.488	7.647	0.000
性心理	11.06±2.058	2.163	0.031
性交往	8.04±2.03	8.71±2.026	-3.457
性道德	6.98±1.601	6.87±1.517	0.757
性教育学习方式	10.47±2.255	9.74±1.84	3.704
分值	47.09±4.561	45.34±4.706	3.958

2.3 不同生源地小学高年级学生性认识水平比较

根据独立样本 t 检验发现, 不同生源地学生的性认识水平的总成绩无显著差异 ($t=-0.424$, $p=0.672 > 0.05$), 由于 W 市属于沿海教育较发达区域, 当前城乡学校性教育覆盖相对均衡, 性教育成效可能不受地域资源限制。这表明在 W 市此类教育较均衡地区, 生源地并非小学性认识水平的影响因素, 当前城乡差异可忽略不计。进一步分析发现, 在性道德维度上, 农村地区的学生成绩略高于城市地区, 可能与农村传统价值观影响有关; 性交往和性教育学习方式维度中, 城市地区的学生成绩略高于农村地区, 可能与城市教育资源多样性优势及更开放的社交环境有关。具体结果详见表 3。

表 3 不同生源地小学高年级学生性认识水平 (n=438)

生源地 (M±SD)		t	p
农村 (n=156)	城市 (n=282)		
性知识	10.04±1.519	9.92±1.820	0.679
性心理	10.84±1.953	10.88±1.934	-0.187
性交往	8.21±2.022	8.46±2.068	-1.232
性道德	7.05±1.498	6.86±1.592	1.241
性教育学习方式	9.97±2.066	10.22±2.106	-1.057
总成绩	46.11±4.332	46.31±4.912	-0.424

3 讨论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 小学高年级学生的性认识水平整体较低, 学生性知识总分平均 46.24 分 (满分 85 分, 平均占比 54.4%), 男女生平均得分均显著低于常模均值, 这一现状凸显了当前学校及家庭性教育的双重困境。尽管《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明确了性教育作为健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在实际执行中, 由于应试教育的影响, 性教育课时往往被挤占, 在学校教育中的实施效果远未达到理想状态^[12]。学校作为性教育的重要阵地, 未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导致学生对性知识的掌握程度有限^[13]。

与此同时, 家庭性教育的缺失问题尤为突出, 本研究调查显示超过半数家庭从未开展性教育, 94%的孩子表示不会经常和家长讨论有关性的话题, 其中“谈性色变”的传统氛围及家长保守的态度与匮乏的性知识是主要障碍^[14]。家校共育的改进方向应以系统性、全面性的性教育课程体系为框架指导, 学校方面增加相应的课时数, 并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 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和学习效果。此外, 家长需要提高自身的性知识及普及意识, 积极与孩

子进行性话题的探讨，帮助孩子建立正确的性观念。

学生获取性知识的渠道较为多样化，但通过规范化的教学获取性知识明显不足。本研究数据显示，超过 50% 的学生表示主要通过“书刊杂志”、“同学朋友间的交流”和“网络”获取性知识，而通过“学校课堂教学”的比例不足 30%，这表明学校的性教育课程开展水平较低，无法满足学生的需求^[15]。此外，性教育受性别因素影响较大——本研究通过独立样本 t 检验发现，除性道德维度外 ($p=0.449$)，男生在性知识 (10.54 ± 1.488 vs 9.36 ± 1.738 , $t=7.647$, $p<0.001$)、性心理 (11.06 ± 2.058 vs 10.66 ± 1.787 , $t=2.163$, $p=0.031$) 等维度得分均显著高于女生，且男生性知识总分 (47.09) 显著高于女生 (45.34, $p<0.001$)。基于此，学校可以采取分性别授课的方式，以提高课程的适应性。此外，性教育受性别因素影响较大，学校可以采取分性别授课的方式，以提高课程的适应性。同时，应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如短视频平台、VR 技术等，为学生提供更加丰富和有趣的学习资源^{[16][17]}，这与本研究中“61.3% 学生希望通过‘趣味视频’学习性知识”的偏好数据相契合。

目前，国外部分性教育课程模式较为成熟。美国构建了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分龄课程体系与《国家性教育标准》并采用同伴教育模式、瑞典将性教育设为必修课且内容融合生理科学与伦理社会知识并要求成年人参与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以 5 岁为起点的国际性教育最低标准框架等方面。但结合本研究中 W 市学生性道德短板(平均占比 43.3%，标准差 1.56) 与性别差异现状，本土化改良需优先解决“性道德具象化教学”与“分性别知识适配”问题：一方面，针对性道德维度“性别平等、性侵害防范”认知不足(本研究中仅 41.2% 学生能正确回答“性侵害防范措施”)，可借鉴瑞典“伦理融合”经验，通过情景剧模拟“身体边界”；另一方面，针对男生“网络渠道依赖度高(58.9%)”、女生“生理知识薄弱”的差异，可参考美国分龄模式设计性别专属模块。

这些成熟经验为我国提供了参考，但在国内实施需进行本土化改良。由于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性污名化现象依然存在，给性教育本土化改良带来了挑战。未来应探索更多适合小学生的性教育模式，如绘本、科普短视频等，不仅可以提高课程的吸引力和教育效果，还能以更温和的形式逐步普及性教育。世界卫生组织 (WHO) 强调，全面的性教育是实现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权利的基础，应涵盖性健康、性同意、性别多样性等多个方面^{[18][19]}。因此，在未来设计性教育课程体系时，应充分参考国际经验，结合本地文化和教育需求，如性别平等和尊重多元性别，可以培养学生的包容性和同理心^[20]。

性教育是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性教育的缺失可能导致青少年在性知识获取上存在诸多误区，甚至面临性侵害的风险。数据显示，2024 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性侵、伤害未成年人等犯罪 7.4 万人^[21]，这与本研究中性道德维度“性侵害防范认知不足”的结果相呼应，进一步凸显了强化小学性道德教育的紧迫性。。因此，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儿童性教育课程尤为重要。尽管本研究对小学高段学生的性知识情况进行了调查，未来可以开展性教育课程干预研究，探索不同性别、地域等因素对干预效果的影响，为优化性教育课程提供更全面的依据。

4 结论

本研究主要调查了小学高年级学生的性认识水平情况及性教育普及度，揭示了学校与家庭性教育与在此的缺失与问题。研究发现，学生的性认识整体水平较低，且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男生在性知识、性心理、性交往和性教育学习方式维度上得分高于女生，尤其是在性知识和性教育学习方式方面表现更为突出；而在性道德维度上，男女生的得分相近，无显著差异。进一步分析表明，家庭性教育的完善与重视程度与学生的性认识水平呈正相关，凸显了家庭在性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在性教育学习方式方面，学生偏好多样化渠道，这提示学校应整合线上线下资源，提供个性化学习体验。

参考文献：

- [1] UNESCO.International technical guidance on sexuality education [EB/OL].[2018].[2025-03-25].<http://www.unesco.org/education/sectors/education-systems/curriculum/sexuality-education>.
- [2] 张淑芳.小组工作介入农村小学高年级留守儿童性教育研究[D].福州: 福州大学,2022.
- [3] 周韵曦.全面性教育始于幼儿阶段[N].中国妇女报,2022-03-21.
- [4] 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印发《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的通知 [EB/OL].(2008-12-01)[2019-04-22].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2643/201001/xxgk_80266.html.
- [5] 严光为.青春期学生家长的性知识及其对性教育态度的调查[J].中国校医,2005(1): 15.
- [6] 刘文利,卡罗琳·爱德华兹.城市父母对孩子性教育的实践调查[J].当代青年研究,2006(9): 76-80.
- [7] Ding R,Guo C,Song X,et al. Male knowledge,attitude and practice and partner pregnancy among Chinese unmarried youth [J]. PLOS ONE,2019,14(3): e0124452.

-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R].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21.
- [9] Kodagoda N. Some psychosexual problems of asian adolescents [J]. Journal of Biosocial Science, 1978, 10(S5): 227-233.
- [10] Lau M, Markham C, Lin H, et al. Dating and sexual attitudes in asian-american adolescents [J]. Journal of Adolescent Research, 2009, 24(1): 91-113.
- [11] Mahajan P, Sharma N. Parents attitude towards imparting sex education to their adolescent girls [J]. Anthropologist, 2005, 7(3): 197-199.
- [12] 教育部. 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J].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2009(14): 13.
- [13] 魏良辰, 周舒, 郭志远等. 芜湖市学龄前儿童家庭性教育状况及其影响因素[J]. 中国学校卫生, 2021, 42(5): 675-678.
- [14] 王争艳, 赵冬艳, 雷雳. 亲子性话题沟通风格对青少年性行为和性态度的预测: 依恋的调节效应 [J]. 心理学报, 2007, 39(6): 1063-1073.
- [15] 刘文利, 李佳洋. 推动学校性教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J]. 中国学校卫生, 2023, 44(11): 1601-1605.
- [16] 秦素, 张厚彬, 甘德春等. 宜宾市 2770 名中学生性生理、性心理发展的调查研究[J]. 中华男科学杂志, 2005, 11(1): 42-46.
- [17] 郭凌风, 刘爽, 许雯. 陕西省宝鸡市初中生性教育直播课程效果评价 [J]. 中国性科学, 2023, 32(8): 144-148.
- [18] 杨巧娟, 赵慧娟, 张蓉等. 初中生性暴力知识水平及性教育干预有效性评估 [J]. 中国性科学, 2024, 33(9): 137-140.
- [19] 郭凌风, 刘文利. 全面性教育对基于性别的校园欺凌有预防作用[J]. 中小学德育, 2021(5): 79.
- [20]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Redefining sexual health for benefits throughout life [EB/OL]. WHO, 2022-02-11. <https://www.who.int/news-room/fact-sheets/detail/sexual-health>.
- [21]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and rights [EB/OL]. WHO, 2024-04-10. <https://www.who.int/teams/sexual-and-reproductive-health-and-research>.
- [22] UNESCO. International technical guidance on sexuality education [EB/OL]. [2018]. [2025-03-25]. <http://www.unesco.org/education/sectors/education-systems/curriculum/sexuality-education>.
- [23] 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审议稿) [EB/OL]. (2025-03-08) [2025-03-25]. https://www.spp.gov.cn/tt/202503/t20250308_688283.shtml.

Study on the Current Status of Sex Education for Upper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A Case Study of W City

Wu Huiling¹, Lu Yidan¹, Song Fanggang¹, Wu Yiran¹, Zheng Yiluo¹, Hou Libing¹, Xue Binpeng¹

¹School of Education,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325035, Zhejiang,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tatus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sexual health knowledge,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sexual education curriculum intervention, and provide a basis for optimizing the primary school sexual education system. **Methods** A cluster random sampling method was used to select 438 students (224 boys and 214 girls) from grades 5 to 6 in 6 primary schools in W city, and a baseline survey was conducted using a self-developed sexual education questionnaire. **Results** The average total score of students' sexual knowledge was 46.24 (full score: 85). The sexual morality dimension had the lowest score rate (43.3%), while the sexual psychology dimension had the highest (72.4%). The total sexual knowledge score of boy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girls ($47.09 > 45.34, P < 0.001$), but there was no gender difference in sexual morality ($P = 0.449$). Additionally,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in the total scores of sexual cognition among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sources, indicating that the place of origin is not an influencing factor for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sexual cognition level. **Conclusion** Sexual education for upper-grade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has problems of gender differences and content imbalance. Systematic education curricula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knowledge levels.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sexual morality education, promote home-school collaboration, and advance localized curriculum design.

Keywords: Sexual education ;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 Level of sexual cognition

从废墟中振兴：威廉三世在柏林大学创立中的角色探析

田叶景

(中南民族大学, 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探究事物本质，必究其历史根源。对威廉三世和柏林大学的探讨，必然要去了解其背后的历史。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时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普鲁士帝国的建立。这一段时期为威廉三世建立柏林大学提供了内部动力和外部压力。前几任国王的辉煌事迹但是未能造就普鲁士帝国的持续辉煌，以至于到了第四任国王时，国家就走向了衰败。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局面下，威廉三世极力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柏林大学由此诞生。本文从两条线出发，一条以普鲁士帝国为线索，去了解普鲁士帝国的辉煌与落寞，从而知道威廉三世是处于一个怎样的历史局面下；另一条以柏林大学为线索，从柏林大学的建校历程、办学理念和办学模式出发，了解柏林大学成为那个时代曙光的原因。

关键词：威廉三世；普鲁士帝国；“洪堡”的理念；柏林大学

DOI: doi.org/10.70693/jyxb.v1i3.68

一、普鲁士的辉煌与落寞

(二) 普鲁士的辉煌

腓特烈一世，全名腓特烈·威廉·冯·霍亨索伦，是霍亨索伦王朝的首位普鲁士国家。1688年，大选侯去世，腓特烈继承了勃兰登堡选帝侯兼普鲁士公爵之位，称腓特烈三世。腓特烈建立了庞大而精良的军队和宫廷机构。他联合奥地利、英国、荷兰等国对抗法国，在反对路易十四的战争中普鲁士军队表现出色。在宰相埃伯哈德·唐克尔曼帮助下，领地逐渐摆脱神圣罗马帝国的控制。1701年，皇帝利奥波德一世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陷入孤立的境地，腓特烈与皇帝结盟并派出援军，皇帝感激并授予其国王的称号。1701年1月18日，腓特烈在柯尼斯堡加冕为王，称腓特烈一世。由此，普鲁士第一任国王腓特烈一世就此诞生。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由于父亲得到了国王的称号，他成为了普鲁士王储。他参加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13年2月25日，父亲腓特烈一世去世，他继位成为国王。制度上施行极端的军国主义政策，他以极其粗暴的军人作风对待臣民，把军事训练的严酷推向极至，创立了“服从、服从、再服从”的“普鲁士精神”。同时他实行分区征兵制，并强迫农民当兵提供半数的兵源，另一半为外国雇佣军；经济上，他解放自己领地上的所有农奴，废除世袭租佃制度。他提倡重商主义，发展工业；文化上，在普鲁士禁止法国文学、拉丁文和音乐。由于他生活简朴吝啬，又舍不得在经济文化建设上花钱。故而又称“乞丐国王”。^[2]

腓特烈二世，受法国启蒙思想熏陶的他，被人们认为将是一位善于思考的开明国王，甚至可能偏于文弱。但是腓特烈二世拥有祖父遗留下来的精良军队和充足国库。军事上，他对战争也不是生手，当年在波兰王位继承战争期间，腓特烈就曾赴当时欧洲第一名将欧根亲王身边见习军事，欧根亲王曾盛赞腓特烈二世在战场上的冷静态度。实现了对奥地利的扩张、参加了瓜分波兰；经济上，改革国家经济管理部门，以利于中央对经济的统一领导。采取不同政策促进采矿业和冶金业的发展。力图改变国际贸易模式，积极扶植纺织业的发展。扩张领土、发展经济等卓越的功绩，故而被后世称为腓特烈大帝。普鲁士三任国王都是实行军国主义的形式，长期战争也为后世国内穷兵黩武埋下伏笔。^[3]

(二) 普鲁士的落寞

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腓特烈大帝的弟弟，由于弗里德里希二世没有子嗣，他的父亲奥古斯特·威廉成了普鲁士王位的继承人。1758年父亲去世（去世时间为腓特烈大帝在位期间），他成了普鲁士的王储。他大幅减税以减轻人民负担、改革沉重的法国式的征税制度、通过减少缴纳关税来鼓励贸易、修建道路和水渠，还对教育

作者简介：田叶景（1999-），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学。

[2]唐中华.一半铁血,一半文艺:普鲁士君主腓特烈大帝的传奇人生[J].世界文化,2018(03):10-14.

[3]王明芳.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形成及其影响[J].兰州学刊,2005(06):36-38.

进行改革。1788年，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颁布了“宗教敕令”，确认了宗教自由（给予犹太人、门诺会与摩拉维亚弟兄会充分的保护），维护基督教反抗“启蒙运动”，加以诸多限制，如限制传教，限定神职人员只能信仰新教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在位期间，普鲁士的国土面积由30万平方公里增加到87万平方公里，人口从540万增加到870万。国土面积的扩大并没有给其带来充盈的收入，普鲁士在欧洲的威望下降，政府无能，财政因为减税与浪费而一片混乱，国债高达4800万塔勒；军队虽扩张到有史以来的最高数量——近24万（189,000步兵和48,000骑兵）但守旧老化的情形日趋严重。1797年11月16日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在波茨坦去世，留下一个近乎破产的国家。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是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的长子，他对拿破仑战争保持中立态度，成为国王后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在第二次反法同盟中保持中立，普鲁士在欧洲的威望下降。1803年，普鲁士的中立立场使她得到了希尔德斯海姆和帕德博恩教区、明斯特教区的一部分、库尔美因茨的艾希斯菲尔德、爱尔福特等地。1805年8月24日，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与法国皇帝拿破仑签定条约，法国将汉诺威让给普鲁士，普鲁士保持在未来战争中的中立态度。俄罗斯曾诱劝普鲁士加入反法同盟，但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由于对拿破仑的恐惧和汉诺威的诱惑没有出兵。奥斯特里茨战役后，神圣罗马帝国瓦解，拿破仑建立了依附于法国的莱茵联邦，这威胁到了普鲁士的利益，引起了普鲁士的不安。由于拿破仑在与英国和谈中表示出将汉诺威归还英国的想法，普鲁士宫廷感觉受到了欺骗，反法情绪高涨。1806年7月25日，普鲁士与俄罗斯签订条约，第四次反法同盟形成。在1806年10月的耶拿-奥厄施塔特战役中，普鲁士军队由于武器落后、战术保守、动作迟缓，几乎全军覆没。10月27日，拿破仑进驻柏林，普鲁士王室逃亡东普鲁士，受到俄罗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保护。1807年6月弗里德兰战役后，法军占领整个普鲁士领土。7月9日普法签订《提尔西特和约》，普鲁士割让16万平方公里土地，包括普属波兰的绝大部分领土（第二次、第三次瓜分波兰所得，以及第一次瓜分波兰所得领土的南半部），以及易北河以西的全部领土，并赔款1.3亿法郎。普鲁士王国只剩下了“旧普鲁士”、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和西里西亚四个省。易北河以西的领土被拿破仑整合为威斯特法伦王国，他的弟弟热罗姆成为国王；普属波兰成为华沙公国。国土的丧失、巨额的赔款，令本就潦倒的普鲁士变得更加不堪。随之，在大学中享有盛名的哈勒大学和哥廷根大学也因割地的原因被关停。此时，威廉三世在遭受战败的痛苦后，曾对从拿破仑占领下的哈勒大学逃出来的教授们讲到：“这个国家必须用它精神上的力量来弥补它物质上的损失。正是因为贫穷，所以要办教育。我还从未听说过一个国家是因为办教育而办穷了的，办亡国了的。教育不仅不会使国家贫穷，恰恰相反，教育是摆脱贫穷的最好手段！”国王甚至喊出了这样的口号：“大学是科学工作者无所不包的广阔天地，科学无禁区，科学无权威，科学自由！”^[4]紧接着在政治层面上，令普鲁士首相卡尔·施泰因开始推行改革，其措施包括让公民参与政治以唤醒其民族主义情感；释放农奴；实行地方自治；改组中央政府机构等。教育层面上，让威廉·冯·洪堡对普鲁士的教育进行了改革。洪堡重新改革了普鲁士引以为傲的义务教育制度，让所有阶层的子女都有相同的机会接受教育，并建立了柏林洪堡大学，又陆续建立了布累斯劳大学、波恩大学。这段时期的教育改革为普鲁士迟到的工业化飞速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科学技术人才基础，成为普鲁士重新崛起的动力。

二、黑暗时代的曙光：柏林大学

在18世纪后期由于普鲁士前几任国王多年的穷兵黩武且战争多次失败，普鲁士出现了财政困难，给普鲁士威廉·三世留下了近乎破产的国家。此时国家内部混乱，外部还有拿破仑、沙俄等国虎视眈眈。可谓是处于内忧外患的局面下。可就是这样的黑暗时代下，威廉三世领导着洪堡兄弟创立了独特的柏林大学。柏林大学在当时的普鲁士国家里就宛如黑暗时代的曙光一般，一方面是全国经济愈加下降的情况下以举国之力进行创办；另一方面柏林大学创立所表现不同于时代的“学术自由”和“科教结合”思想令人们所向往。

（一）柏林大学的办学背景

国内许多学者对柏林大学建校背景发表自己的观点，认为“柏林大学的建立是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等积极因素，财政困难、行政掣肘等消极因素，以及君主意志、官员和学者意愿等不确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的建立经历了反复起伏的过程，其最终建立的关键是洪堡所拥有的融合了历史感和自身前途的动机与卓越政治智慧及行政技巧的结合物。”^[5]。

前几任国王有想过进行教育改革，但是其根本思想还是崇尚军事教育和国土的扩张，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普鲁士帝国的军事技术不再领先于当时的法国。屡次战败后，普鲁士在欧洲的影响力下降，自身国家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技术水平均受到了严重的打击。继威廉二世后，威廉三世继任，将普鲁士教育改革提上了日程。在1806年，普鲁士战败前他就已经比几位前任国王更加重视教育改革，在促进大学与科学院发展的问题上给予了更多的重视。也正是这一举动开启了普鲁士大学的“学术自由”和“教学科研相结合”思潮。^[6]

（二）柏林大学的办学理念

[4]全守杰.德国大学的崛起与式微(1810-1945)[J].现代大学教育,2013(01):85-91.

[5]张斌贤,王晨,张乐.柏林大学建校史:1794-1810[J].高等教育研究,2010,30(10):83-93.

[6]别敦荣,李连梅.柏林大学的发展历程、教育理念及其启示[J].复旦教育论坛,2010,8(06):8-15.DOI:10.13397/j.cnki.fef.2010.06.016.

1. “启蒙运动”思潮

柏林大学的办学理念源于当时的社会背景，柏林大学的成功，既是欧洲启蒙运动的成果，也与德国社会的特殊性有一定的关系。^[7]如果没有欧洲启蒙运动对人性的解放、对于理性的推崇，则不会有柏林大学；如果没有德国对自由探索纯粹知识的崇尚以及若干有利于大学发展的社会条件，现代大学模式则不会从德国诞生。自由和理性既是启蒙运动的核心思想，也是造就现代大学成功的关键所在。^[8]

2. “洪堡理念的影响”

如果谈及柏林大学，许多人就会说起“洪堡”这个人，的确如此，洪堡对柏林大学做出的贡献是卓越的。^[9]洪堡是哥廷根大学的毕业生，哥廷根的教育让他意识到，大学只有与时俱进才能一直拥有生命力。^[10]以至于他在后来接受了歌德和席勒等新人文主义思想。他创办柏林大学的依据准则有三方面：第一，独立、自由与合作相统一的原则；第二，教学与研究相统一的原则；第三，科学统一的原则。洪堡的办学思想，既是欧洲普适理性思想的反映，也是德国社会特殊性的反映。^[11]洪堡既反对将高等教育完全纳入国家和工业发展轨道的法国实用主义，也反对仅注重个体道德修养的英国古典自由教育。与英国和法国的教育思想不同，把追求纯粹知识作为举办柏林大学的最高形式。^[12]

在大学的办学理念上，洪堡首先认为，大学应该保持孤独和自由的原则。这是指大学及其大学生、教师和研究人员等不仅应该对世俗社会，特别是功利主义教育价值观保持一定的距离，更重要的是，大学还必须摆脱国家和教会的制约以及来自工业社会的世俗压力与影响。另一方面，洪堡认为，国家绝不应该指望大学同政府的眼前利益直接联系起来；却应相信大学若能完成它们的真正使命，则不仅能成为政府眼前的任务服务而已，还会使大学在学术上不断地提高，从而不断地开创更广阔的事业基地，并且使人力物力得以发挥更大的功用，其成效是远非政府的近前布置所能预料的。他还强调大学办学的学术自由原则。他所强调的学术自由有两层涵义，即学习自由和教学自由。学习自由指学生有选择学习任何课程内容和在大学中独立生活的自由；教学自由是指大学教授具有在其学术领域内不受干涉、探索和传授真理的自由。

洪堡强调，在新型大学必须将教学和科学研究相结合统一。他反对将传授知识作为大学的主要职能，他认为大学的根本职能在于追求真理，大学教学必须与科学研究结合起来。洪堡不主张大学传授实用的专门化的知识，而应该是纯粹知识的传授和研究，这样有利于学生形成良好的思维方式以及高尚的品格。只有教师在创造性活动中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才能作为知识加以传授。洪堡认为，这种形式的教学和学习才真正称得上是大学教学和大学学习。基于这样的定位，柏林大学的各学部都设立研讨班和研究所，这是新大学区别于德国传统大学的根本所在。在柏林大学之前，德国传统大学中的研讨班，作为一种教学形式和教学手段，只是以辅助性的性质存在，并没有真正将教学和研究真正结合起来。柏林大学的此项实践标志着世界高等教育历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从此现代大学进入一个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新阶段。^[13]

（三）柏林大学的办学模式

柏林的大学模式紧紧围绕着其“学术自由”和“科教结合”的理念构建而成，在前期有“研讨会”、“哈勒大学”、“哥廷根大学”为其奠基。而后柏林大学的办学模式也是由前面几所大学或机构遗留下的教师学生所共同创建的。

1. 哲学院变成大学的中心

1809年创建的柏林大学由哲学、法学、医学和神学四个学部组成。其中的哲学学部不再被看作是低一级的学院，不再是实施普通教育为升入其他学部所做准备打基础的学部。而是各学部的地位平等，废除了各学院的等级差别，另外，课程设置以及其功能生了重大改变。柏林大学的哲学学部在科学知识和教学方法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是柏林大学中师资力量最雄厚、规模最大和地位最高的学部，成为其科学研发源地，是其他学部效仿的对象。

2. 学生教师“自由”的权利

[7]王永强.19世纪初德国柏林大学的创建及其影响[J].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3(08):60-63.

[8]别敦荣,李连梅.柏林大学的发展历程、教育理念及其启示[J].复旦教育论坛,2010,8(06):8-15.DOI:10.13397/j.cnki.fef.2010.06.016.

[9]田园.现代教育之父洪堡的前世今生[N].光明日报,2017-05-17(015).

[10]徐丹.19世纪初洪堡对德国大学的改革[J].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12,16(02):26-30.DOI:10.19411/j.cnki.1007-8606.2012.02.007

[11]宋龙飞.以柏林洪堡大学为例谈德国高等教育的精髓[J].教书育人,2013(33):14-16.

[12]黄福涛.外国高等教育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160.

[13]刘亚平.从柏林大学的兴盛看德国的“兴国”之路[J].中国轻工教育,2012(02):6-8.

鉴于洪堡所强调的学术自由的两层涵义，学习自由和教学自由。^[14]学习自由使得柏林大学的学生有选择学习任何课程内容，选择教师的自由，拥有极大的自由完善发展的空间和机会；教学自由使得大学教授具有在其学术领域内不受干涉，教授有选择讲授内容和传授方式的自由，有探索和传授真理的自由。这形成了柏林大学独特的教学原则。

3、教授会制

柏林大学实行教授治校，给教师以充分的自由。体现在行政管理上，即是采用教授会制。教授会成员为全体正教授，大学内的所有事务皆由教授会决定。比如校长的遴选、教授的选聘等。教授治校实质是民主治校、学术主导。教授治校的关键，在于教授阶层在学校重要决策和事务中的地位与作用，在于他们的意志能否通畅地表达并发生实际的影响。这对柏林大学学术氛围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对教授学者们科学研究热情的提高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意义。

柏林大学改革不仅仅是德国高等教育发展史的重要转折点，同时也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15]修养、自由、科学、寂寞四个核心的大学观念在德国大学中确立起来并且根深蒂固。科学研究成为德国大学的中心活动和核心任务，教员同时必须同时是研究者，科学研究的地位突出，这在大学中促成了浓厚的学术研究气氛，对以后德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和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另外，自由的原则随着柏林大学的全面改革的完成逐渐成为德国大学不可动摇的核心价值，成为德国大学的突出特色。改革还形成德国大学对纯科学价值的重视，追求科学本身的目标，大学教授安心于象牙塔中，排斥任何实用的考虑，以防其掺杂学术研究工作。柏林大学的改革理念和实践使得德国大学特色的形成和建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6]

三、国王的支持

(一) 经济上的划拨

大学创办之时，得到当时的国王弗里得里希·威廉三世的大力支持，他将其家族的一座宫殿建筑捐赠学校作教学大楼，并下令把柏林当时有助于教学研究的博物馆并入该校。为纪念此举，创办者以国王的名字命名大学校名（即弗里得里希·威廉大学），一直沿用到1949年2月。

(二) 态度上的坚定

两次世界大战曾给这所大学带来很大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分为东西两部分，柏林也被一分为二，而这座大学也因处境两边，逐渐变为两所大学。在柏林东部民主德国首都的一部分以其创始人之名重新命名为柏林洪堡大学，而在柏林西部联邦德国一部分称为柏林自由大学。1990年德国统一，原本一所大学分而复合，统称柏林洪堡大学。

四、柏林大学对现世的影响

虽然说柏林大学是在威廉三世时期建立起来的，但是在柏林大学以前的哈勒大学和哥廷根大学已经对学术自由、注重现代科学和哲学等现代大学所具有的特征。^[17]不幸来自于1806年，普鲁士大败于拿破仑的法国军队，10月14日签署了“提尔西特和约”，普鲁士一半以上的国土被割让，法军进驻首都柏林。胜利者关闭了普鲁士的七所大学，包括著名的哈勒大学，皇室逃到了东普鲁士的麦默尔（Memel）。1807年8月，哈勒大学教师代表在法学教授马尔茨（H.Schmalz）的带领下来到麦默尔，请求主政的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以哈勒大学教师为基础在柏林重建大学。威廉三世回应道：“好，有勇气！国家应以精神的力量来弥补在物质方面所遭受的损失。”随后，他给内阁大臣拜默写道：“亲爱的拜默，由于易北河彼岸地区已被割让，国家丧失了哈勒大学，从而失去了最重要、最完备的教育机构。填补这个空缺应该是国家重新缔造时期的首要任务……我决定在柏林建立这样一所大学，并使之与科学院建立适当联系……”^[18]尽管当时普鲁士王国处于极端贫困之中，威廉三世还是下令从中央和各州财库中将原来拨给哈勒大学的一切费用全部拨给了柏林大学。后来，经过拜默、洪堡等人的努力，柏林大学于1810年秋正式创立。洪堡等人把大学看作是民族文化最崇高的所在，他认为普鲁士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德国教育的失败，因此认为柏林大学的建立有助于增强普鲁士乃至德国文化的自信和地位，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柏林大学对德国社会、科学和文化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及其后来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的地位正是体现了一流大学对于体现国家意志和弘扬民族精神的独特作用。

[14]崔乃文.回应“洪堡神话”：德国大学现代科学辉煌的组织适应机制分析[J].复旦教育论坛, 2016, 14 (06) : 99-105.DOI:10.13397/j.cnki.fef.2016.06.016.

[15]赵锋,白政.探问历史中的辉煌——柏林大学何以成为传奇?[J].现代教育论丛,2016(05):44-49.

[16]宋龙飞.以柏林洪堡大学为例谈德国高等教育的精髓[J].教书育人,2013(33):14-16.

[17]张敏,韩文峰.洪堡的大学理念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启示[J].教育教学论坛,2013(51):85-86.

[18]荀渊.关于柏林大学创建与洪堡教育观念的历史叙事[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1, 39 (07) : 62-71.DOI:10.16382/j.cnki.1000-5560.2021.07.006.

参考文献:

- [1]唐中华.一半铁血,一半文艺:普鲁士君主腓特烈大帝的传奇人生[J].世界文化,2018(03):10-14.
- [2]王明芳.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形成及其影响[J].兰州学刊,2005(06):36-38.
- [3]全守杰.德国大学的崛起与式微(1810-1945)[J].现代大学教育,2013(01):85-91.
- [4]张斌贤,王晨,张乐.柏林大学建校史:1794-1810[J].高等教育研究,2010,30(10):83-93.
- [5]别敦荣,李连梅.柏林大学的发展历程、教育理念及其启示[J].复旦教育论坛,2010,8(06):8-15.DOI:10.13397/j.cnki.fef.2010.06.016.
- [6]王永强.19世纪初德国柏林大学的创建及其影响[J].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3(08):60-63.
- [7]别敦荣,李连梅.柏林大学的发展历程、教育理念及其启示[J].复旦教育论坛,2010,8(06):8-15.DOI:10.13397/j.cnki.fef.2010.06.016.
- [8]田园.现代教育之父洪堡的前世今生[N].光明日报,2017-05-17(015).
- [9]徐丹.19世纪初洪堡对德国大学的改革[J].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12,16(02):26-30.DOI:10.19411/j.cnki.1007-8606.2012.02.007
- [10]宋龙飞.以柏林洪堡大学为例谈德国高等教育的精髓[J].教书育人,2013(33):14-16.
- [11]黄福涛.外国高等教育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160.
- [12]刘亚平.从柏林大学的兴盛看德国的“兴国”之路[J].中国轻工教育,2012(02):6-8.
- [13]崔乃文.回应“洪堡神话”:德国大学现代科学辉煌的组织适应机制分析[J].复旦教育论坛,2016,14(06):99-105.DOI:10.13397/j.cnki.fef.2016.06.016.
- [14]赵锋,白玫.探问历史中的辉煌——柏林大学何以成为传奇[J].现代教育论丛,2016(05):44-49.
- [15]宋龙飞.以柏林洪堡大学为例谈德国高等教育的精髓[J].教书育人,2013(33):14-16.
- [16]张敏,韩文峰.洪堡的大学理念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启示[J].教育教学论坛,2013(51):85-86.
- [17]荀渊.关于柏林大学创建与洪堡教育观念的历史叙事[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1,39(07):62-71.DOI:10.16382/j.cnki.1000-5560.2021.07.006.

Revitalization from the ruins: a reappraisal of Frederick William III's role in the founding of the University of Berlin

Tian Yeqing

(South-Central Minzu University, Hubei, Wuhan)

Abstract: To explore the essence of things, one must trace their historical roots. Understanding Friedrich Wilhelm III and the University of Berlin requires delving into the history behind them. The historical period of Friedrich Wilhelm III dates back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russian Empire. This era provided both internal impetus and external pressure for Wilhelm III's founding of the University of Berlin. The glorious achievements of earlier kings failed to sustain the lasting brilliance of the Prussian Empire, leading to its decline by the reign of the fourth king. Faced wi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challenges, Wilhelm III vigorous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leading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Berlin. This paper follows two narrative threads: one trac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Prussian Empire to contextualize the historical circumstances under which Wilhelm III acted; the other examines the founding process,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model of the University of Berlin to understand why it became a beacon of hope in its time.

Keywords: Friedrich Wilhelm III; Prussian Empire; Humboldtian Model of Higher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Berlin

针对“双非”院校文科硕士生就业难的网络舆情分析

叶新雨

(中南民族大学 教育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 随着经济结构供给侧改革的调整及社会发展趋势的影响, 就业问题逐渐成为高校学生的突出问题。学校在面临双一流学科建设的挑战时, 工科专业的比重逐渐增大, 而文科专业则有削弱的趋势, 文科专业学生的就业形势更加严峻, 本文旨在分析“双非”院校文科硕士就业困难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以期为解决其就业问题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 文科生就业; 就业现状; 文科生培养

DOI: doi.org/10.70693/jyxb.v1i3.76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进步和新媒体的蓬勃兴起, 网络舆情已成为反映社会舆情的重要窗口。网络舆情是“以网络为媒介, 以社会事件为内核, 是对公众的感受、态度、意见、观点的表达、传播、互动以及后续影响的集合”^[1], 展现出极高的表达自由性、匿名性, 以及载体的多样性^[2]。智能手机的普及以及QQ、微信、微博等多元化平台的涌现, 人们能够跨越时空限制, 轻松通过网络分享信息、表达观点, 进一步加速了网络舆情的传播与扩散, 任何微小的社会波动都可能迅速发酵, 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

当今社会经济结构深刻调整与供给侧改革持续深化的背景下, 就业市场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 高校学生的就业问题日益凸显, 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特别是在双一流学科建设浪潮的推动下, 众多高校纷纷加大对工科专业的投入与建设, 导致学科结构发生显著变化, 工科专业比重持续上升, 而传统文科专业则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 其发展空间与资源分配受到一定程度的压缩。这一趋势不仅加剧了文科专业学生本就存在的就业压力, 更使得文科硕士研究生这一高学历群体在求职道路上遭遇了更为严峻的挑战。相较于双一流高校, 双非院校硕士毕业生(指中国内地非“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其他本科高等学校的硕士毕业生, 简称双非硕士)的就业问题尤其突出^[3]。随着网络信息的快速传播与公众舆论的日益活跃, 关于双非院校文科硕士研究生就业难的网络舆情逐渐升温, 成为社会各界广泛讨论的话题。

因此, 本文旨在通过对当前双非院校文科硕士研究生就业状况的网络舆情进行深入分析, 不仅能从侧面反映出社会公众对政府相关决策的接受与认可程度, 还能揭示出民众对于高学历文科大学生就业责任归咎的认知状况。这样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更精准地选择与制定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题的策略与措施。

二、研究设计与统计分析

(一) 数据来源

为了深入研究“双非文科硕士就业”这一议题, 我们选择小红书、抖音、这两个具有代表性的社交媒体平台, 对其上的网民评论进行统计分析。以“双非文科硕士就业”为关键词, 在每个平台上, 我们聚焦于热度最高的帖子, 每个平台分别选择了两条帖子, 以确保数据的广泛性和代表性, 经统计抖音与小红书的直接评论为6676条, 回复评论(代指对直接评论进行回复的评论)未纳入分析数据, 经过对表情包、标点符号、数字等无效数据和与主题相关度低的以及重复数据进行筛选剔除, 最终获得有效评论2277条。

数据收集后，在Nvivo12.0软件中对有效评论进行词频查询操作，并根据查询结果生成词语云。考虑到本文是以普职分流政策公众阻抗分析为研究立脚点，所以本文把“每个”“没有”“一些”等与主题无关的词组添加到停用词列表。最后的运行查询结果显示，努力、能力、环境、公务员、学历等是社会公众评价“双非文科硕士就业”的关注焦点词（见下图）。



图 1

(二) 分析框架

我们针对每个网民发表的评论进行记录，并特别关注每条评论后附带的支持（或类似意义的正面反馈）投票数。为了科学计量评论的数量，我们设定了一个计算规则：每条评论的数量不仅包含该评论本身（计为1），还加上其他网民对该评论的支持投票数（N）。这样，如果网民甲发表了一条评论A，并且该评论后显示有N个支持投票，那么这条评论的数量就被计为N+1。注意在该统计中不包括网民对该现象鼓励（如“万事开头难”、“慢慢来，总会找到的”等）以及其他无明显主题的评论，通过这种方法，我们能够更加科学、客观地统计和分析这三个社交媒体平台上关于“双非文科硕士就业”议题的网民评论数据，从而为相关研究提供有力的支持。

我们将所有的评论分为七大类：第一类认为文科就要考公考编（包括事业编，教师编，公务员等）；第二类认为人脉资源在就业中不可或缺（包括社会关系、家庭背景等非能力因素）；第三类认为能力及努力在就业中起重要作用（包括专业技能、综合素质、适应能力等）；第四类认为文科生因市场需求、专业特点、学历背景等本身就很难找到工作；第五类认为部分“双非”文科硕士生缺乏个人职业规划或对就业市场现状的认识不足而导致与理想预期不符，感到迷茫和困惑（如工资较低，专业不对口，要求过高，学历自卑等）；第六类认为就业市场竞争激烈，经济走势不好而影响就业环境；第七类认为学历贬值，中国不缺高学历的人。基于以上七种类别我们将从教育维度，社会维度，家庭维度，学生个人维度，进行分析。各类评论的计量与所占比率，见下表：

表 1 评论统计

类别	计量	所占比例 (%)
考公考编（铁饭碗）	1445	10.4
个人期待与现实冲突	462	3.32
个人能力和努力	197	1.42
对文科类专业的质疑	10607	76.33
人脉资源及背景	399	2.87
大环境与就业形势	364	2.62
学历贬值	423	3.04

我们依据网民言论的支持率高低将“双非文科硕士就业”的各类代表性观点有选择性地呈现如下（为了保持网民言论的原色，在复述这些评论时仍然保留其中的部分错别字）：

(1) 第一类是认为文科就要考公考编。“当老师就好了，小地方人才引进政策了解一下。”“考公啊，文科不就为的是考公吗。”“考公考编吧，文科真的不让人活。”“文科，不论你是92还是双非，无论你是本科还是硕士，考公考编才是正路！”“抓紧考编去，发狠能上。”

(2) 第二类认为学生个人期待与现实冲突。“不是找不到，而是低的看不上高的够不着。”“是文科不行还是因为自己觉得自己应该月薪三万实际只拿了六千觉得文科不行。”“我说句打击人的话，觉得文科找不到工作，是不想找，是眼高手低。”“放低心理预期，别想着要太高工资，文科工资普遍比较低的。”“不可能找不到，可能是理想有点大。硕士找不到工作，大概率都是自己期望要求太高。”“有硕士毕业，即使是双非硕士，工作应该不成问题，只要刚出社会要求不要太高。”“很多人读书出来的工作和专业不一样。”“降低工资待遇期望就好了。”“放低身段没有人找不到工作。”

(3) 第三类认为个人能力及努力程度很重要。“能力高工资高。”“文科也可以很牛，比如王阳明，曾国藩。”“不要制造焦虑，只能说能力不行，文科理科都要出类拔萃，毕业能有拿出手的硬件证书，一份能让HR看到有实力的简历。”“找不到工作还是能力有限，那么多文科生不都工作了吗。”

(4) 第四类是对文科专业的质疑。“感觉连吃饭的家伙事儿都没有。”“我就搞不懂这些大学开设一些对社会一点作用的专业都没有，大学之后管你是死是活，找不找得到工作。”“文科本来就是作用不大，这个控制在25%左右。这个比例还是偏高文科到底可以干什么。”“当年学的行政管理专业，毕业了大部分同学都考的公务员，跟专业没关系，但文科真的没太多出路。没啥含金量，也没啥过硬的专业，然后专业的做不了，打螺丝又觉得委屈…。”“文科出路少，大家都是普通人，需要学理科，学一些技术类专业，才能养家糊口。”“文科主要没有专业壁垒，没有任何学习难度，只要你认识字认学习就可以了，饱和度非常高。”“文科就是服务生，岗位又没技术含量，就业难，正常。”“我就想问这种研究生读着有意义吗？……像这种毕业就失业的，研究生，大家都怎么想的？？”

(5) 第五类认为人脉资源在就业中起关键性作用。“看着身边的人本科生工作单位比硕士生好，有时发现人脉资源比学历重要。”“普通家庭，普通学校的孩子都差不多，工资一万出头到顶了。”“家里有什么渠道，就选什么专业方向。普通百姓，跨越阶段很难，很难。”“考公考编吧。。。不然家里有啥关系就干啥。”“父母的高度是孩子的起点，这高度包括钱势和眼界。”

(6) 第六类认为是当前社会环境与就业形势不好。“不是文科的问题，问题是找工作都不容易。”“经济形势差，就业市场竞争激烈。”“现在就业就这个情况，不是工科有多好，是都很差文科更差一点而。”“经济不好，大环境生意不好，你双非研究生，职位不好安排。”“今天去国企面试，报名人数超过1000。”

(7) 第七类认为当前时代学历贬值严重。“双非研究生，读了也白读。”“社会不缺高学历，中国不缺高学历的人。”“学历贬值，大学生从人才变成了商品，大学变成了公司。”“现如今贬值最严重的就是学历，辛苦上学这么多年，结果没有对等的价值。”“学历高的太多了，工作了才知道用人单位简历会分类，985.211. 双非，双非的瞟一眼没有特别出色的都扔了，剩下的看看符不符合岗位要求，很现实。”“不是985.211读什么研？好点单位都要985.211起步的。”

近年来，理工科专业技术能力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国家也在大力发展理工科专业，文科毕业生的就业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基于以上背景，第一，通过分析网友评论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对文科类专业性的质疑这一类别的数量高达10607，占到了所有评论的76.33%，这一比例非常突出。这种广泛的质疑和担忧，与文科生就业难的现象相吻合，即文科专业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相对较弱。第二，从网友评论看出，在岗位选择上，网民对体制内的工作呼声最高，即“找不到工作就去考公考编”这类呼声占10.4%，表明，相较于其他类别，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岗位受到一定关注，但除行政党建岗位等传统文科对口工作外，可选岗位也不多，便形成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考公盛况，从而影响就业率。第三，“个人期待与理想预期不符”这一类别计量为462，占比3.32%，虽然在所有类别中占比不高，但它揭示了一个重要现象：双非文科硕士生在职业发展上面临的心理和现实挑战：如眼高手低现象，高估计了自己的市场竞争力和价值在求职时对职位和薪资有过高的期待；学历自卑感，“双非”背景可能导致一些硕士生在与来自更知名高校的毕业生竞争时感到自卑，可能影响他们的自信心和求职策略；社会认知的影响，社会对双非文科硕士生的认知可能影响了他们的自我期待，从而影响自我评价和

职业追求等。最后,以上统计数据中,民众对个人能力、人脉资源、学历贬值以及社会大环境相关评论的所占比例并不高,但毫无疑问,它们共同构成了对当前就业难问题多维度的解读,不仅局限于岗位选择以及对文科类专业持怀疑否定态度,而是试图从更广泛的社会经济背景和教育体系中寻找问题的根源,从背后可能的原因出发去理解当下“双非文科硕士生”就业难的问题。

三、讨论

(一) “双非”院校文科硕士就业是“真难”还是“假难”

从上述统计的评论中,将造成“双非”院校文科硕士就业难的原因分为了六大类,但实际上其中一些原因并不是真正意义上导致“双非”院校文科硕士就业难这一困境的原因,将就业难简单归咎于以上原因是片面的,现从以下两方面展开讨论。

1. “假难”在何处

从学生自身主观因素出发,我们可以认为“双非”院校文科硕士就业并不是“真难”,将从下面几方面进行叙述:

首先,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网民对“双非”院校文科硕士就业的选择,大部分都觉得文科生就应该考公考编,这说明人们对文科生就业选择观念较为传统,考公比重较大,认为只有事业单位、公务员等文科生对口工作,很少选择企业或别的工作岗位。也侧面反映出学生长期处在父母庇护之下,对家庭的依赖性较强。面临就业挑战时,既缺少主动收集信息和开发职业资源的能力,又存在自我规划意识不足的问题^[4]。这可能导致文科毕业生,错过找工作的黄金期,而忽视了其他行业和职业的发展机会,考公考编一旦落榜,就业选择机会明显减少。

其次,根据以上评论,可看出找不到工作是因为学生就业期望值过高,多学生在读完三年硕士研究生后,一部分学生则过于自信,还停留在过去的以学历为本的时代,认为拥有研究生学历就应该找一份社会地位高、薪资稳定的工作,而不愿去基层单位、小型企业以及销售岗位等,在就业时存在“一步到位”或“骑驴找马”的心态。;再者,由于长时间在校生活,脱离社会的现象比较严重,对就业形势及社会发展状况没有清晰的认识和了解,局限于自身的思维认识,不能客观、公正地进行自我评价和认知,较高或较低地估计了自身的实力,求职匹配度比较低,就业渠道过于狭窄。

最后,根据上文数据,小部分网民认为“双非”文科女硕士就业难与其与岗位所需存在差距也有很大关系,其就业能力低下可能表现为:1.专业技能匹配度低,求职者的专业能力与岗位要求不匹配,可能缺乏与所申请职位相关的必要技能和知识,无法满足用人单位的需求。2.综合职业素养不足,求职者可能在沟通能力上存在一定的不足,无法有效表达自己的观点和能力,无法与他人良好地合作和协调。在快速变化的工作环境中不具备灵活性和适应性,难以迅速适应新的工作任务和要求,无法胜任在工作环境中面临的各种挑战。3.缺乏实际工作经验,文科应届毕业生可能没有相关的工作经验或实习经历,缺乏在实际工作场景中应用技能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中处于劣势。这些就业能力不足可能导致文科女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面临困难,难以获得理想的工作机会。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双非”院校文科硕士就业难的问题并非完全是由外部市场环境造成的,而是受到学生自身主观因素的显著影响。通过改变这些主观因素,毕业生可以提高自己的就业竞争力和适应市场的能力。

2. “真难”在何处

从当前的社会就业背景以及人们对文科专业性的质疑这方面来看“双非”院校文科硕士就业确实存在一定的困难,理由如下:

首先,宏观经济环境对就业市场具有决定性影响^[5]。一方面是市场需求的结构性矛盾。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人才需求呈现出结构性矛盾。特别是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对传统的文科专业就业市场产生了冲击,使得文科生在就业市场上面临更大的挑战。另一方面是

文科专业培养模式与市场需求不匹配。传统文科行业淘汰速度较快，市场对“文科+”的复合型人才需求更大。然而，高校在响应市场需求变化方面存在滞后性，人才培养体系、课程设置等方面的改革较慢，缺乏实践性和应用性，不利于文科研究生实际操作能力和创新意识的培养；

其次，招聘市场的社会认知偏差。部分企业和单位对文科毕业生的认可度相对较低，认为其专业较为宽泛且缺乏实际应用价值。此外，在一些高端职位和知名企业的招聘中，学历背景往往成为筛选简历的第一道关卡。这些单位可能更倾向于招聘来自一流大学或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的毕业生，认为这些学校的学术声誉、师资力量和教学质量通常较高，能够培养出更多具备优秀专业素养和创新能力的人才。

最后，研究生扩招引发的供需失衡。自2020年起，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开始新一轮的扩大，但市场对文科生的岗位需求并未同步增长，导致文科研究生在就业市场上出现供大于求的局面。

综上所述，“双非”院校文科硕士就业难的问题确实存在，其原因包括市场需求的结构性矛盾、文科专业培养模式与市场需求不匹配、招聘市场的社会认知偏差以及研究生扩招引发的供需失衡。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文科硕士生在就业市场上面临较大的挑战。

四、对策分析

上述因素共同作用，导致“双非”院校文科硕士在就业市场上面临一定的困难。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高校、政府和企业共同努力，改革教育培养模式，提高文科硕士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同时打破学历歧视，为所有毕业生提供公平的就业机会。

1. 社会：搭建校企合作桥梁，共育市场所需人才

一是用人单位应该多与高校沟通，反馈企业人才需求。企业可以与高校合作建立实习基地，为学生提供实际工作环境中的学习和实践机会，通过订单式培养、现代学徒制等方式，更精准地培养符合市场需求的人才。二是健全就业市场机制，规范就业市场秩序。改变企业对文科类毕业研究生或非211、985高校毕业生的刻板印象，企业应更加注重应聘者的实际能力和潜力，而非仅仅依据学历背景进行筛选，要消除就业歧视，营造公开透明的就业环境。三是鼓励和支持不同类型的企业和机构参与招聘活动，为毕业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可以设立专项基金或奖学金，鼓励和支持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农村、边远地区等就业，以实现人才的合理配置和流动。

2. 高校：强化文科研究生培养与就业指导服务

第一，在研究生培养方面：一是加强学科建设和教学改革，优化课程设置，利用高校学科优势，加强新文科建设，以“文科+”理念开展文科生跨学科培养，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提高文科研究生的综合素质和专业技能；二是加强与企业的合作和交流，针对文科专业特色，建立对口实践教学基地和实习基地，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和就业资源；三是完善精准化、个性化就业指导服务体系，提供文科个性化的职业规划和就业指导服务，从以往的“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建立个性化求职档案，一生一档，提供针对性的指导和帮助，同时将就业工作前置，尽早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念和求职意识。

第二，鼓励研究生面向基层就业不断转变研究生的就业观念，调整研究生的心理预期；提供科学合理的政策导向，供研究生进行选择；就业不只是面对考公务员、事业单位等形式；高校要响应国家鼓励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政策要求，实现个人与社会价值观的统一；要积极配合有关部门精心组织实施好“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三支一扶计划”并增加其他基层就业的渠道。高校要结合当前形势和就业政策，引导毕业研究生调整就业期望值、合理定位^[6]。

3. 家校合作：培育新时代职业人才

在孩子即将踏入职场的关键时期，我们倡导加强家校之间的紧密联系。家长需要跟上时代的步伐，深入了解市场的最新需求和就业趋势，以便为孩子提供既实际又前瞻性的建议和支持。重要的是，家长应当尊重孩子的兴趣和天赋，支持他们自主选择职业道路，鼓励他们去追求内心真正的职业热情和理想。同时，呼吁家长不要局限于传统就业观念，不应仅仅因为稳定性、收入保障和低风险，就倾向于鼓励孩子选择公务员或事业单位等传统职

业路径。相反，家长应该认识到多元化职业路径的价值，支持孩子探索更广阔的职业机会，包括创业、新兴行业、非营利组织等多种可能。此外，家长还应该传递积极的就业观念，帮助孩子树立自信，学会适应变化，勇于面对挑战。

4. 个人：明确求职规划，提升个人素质

一要积极了解市场需求和就业形势，这不仅包括对整个就业市场的宏观了解，还包括对自己所学专业的行业状况、发展趋势以及未来就业前景的深入了解；二要正确自我认识，尽早明确就业规划，既不盲目自信，也不妄自菲薄，根据自身个性特点制定合理的职业规划和求职计划；三要注重提升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除了在课程学习中积累专业知识，学生还应该通过参与校内活动、实习实践来提升自己的实践能力，充分利用行业特色型高校优势，跨专业、跨领域开展实习实践，不仅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和应用所学知识，还可以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四要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念和求职意识，求职过程中，不应只看重薪资和稳定性，而应更多地考虑个人的职业发展和兴趣。同时，要应积极主动地寻求就业机会和资源，如参加招聘会、主动投递简历等^[7]。

总结

通过深入分析“双非”院校文科硕士生的就业难题网络舆情，我们发现公众普遍对文科专业的必要性和实用性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并且就业观念较为传统，过分偏好公务员和教师等稳定性职位。这些现象背后，是当前经济形势、教育体系、市场需求、个人素质等多重因素的交织影响。为有效应对这一挑战，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企业应公平、全面地评估应聘者，重视其实际能力和潜力，而非仅仅关注学历背景；高校应改革教育模式，加强实践教学和职业指导，以提升学生适应市场需求的能力；家庭应鼓励和支持子女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专长选择职业道路；学生个人也应不断提升自身能力，合理设定职业期望，并积极适应市场的变化。通过这些综合性的措施，我们有望缓解“双非”院校文科硕士生的就业困境，帮助他们找到既符合自己能力和又满足期望的工作岗位，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需求的双赢。

参考文献：

- [1] 陈学智, 王春江. 网络舆情危机特点、成因及引导力[J]. 人民论坛, 2015, 20.
- [2] 汪锐. 网络舆情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挑战和原因分析[J]. 产业与科技论坛, 2023, 22(24): 69-71.
- [3] 聂戈, 田静. 就业难成：双非院校硕士研究生的就业困境[J]. 东莞理工学院学报, 2025, 32(04): 95-101.
- [4] 何珺, 方晓田. Z世代大学毕业生“慢就业”的成因与纾解之道[J].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1): 101-112.
- [5] 王婷. 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的现实问题与对策研究[J].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1(5): 116-126.
- [6] 王莹. 文科院校研究生就业问题探讨[J]. 教育教学论坛, 2019, (31): 11-12.
- [7] 李萍. 文科研究生高质量就业的路径探究[J]. 中国就业, 2024, (09): 62-63.

Analysis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 on the Employment Difficulties of Liberal Arts Master Students in Non-Famous Colleges

Ye Xin Yu

1. School of Education, South-Central Minzu University,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ongoing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s in China's economy and evolving social development trends, employment challenges have become a pressing issu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As institutions grapple with the demands of Double First-Class discipline development, the proportion of engineering programs has been steadily increasing while liberal arts disciplines face declining enroll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mployment difficulties faced by liberal arts master's graduates from non-famous Colleges and non-excellence institutions, proposes targeted solutions, and aims to provide actionable insights for addressing these challenges.

Keywords: Employment of liberal arts students; Employment status; Training of liberal arts students

新课标视角下：中美体育教育课程对比分析

姜亦宣¹

(1.吉林体育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13)

摘要：美国学校体育课程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广泛性，本文采取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对中美两国校园体育课程中的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方式、课程评价体系4个方面进行分析，再通过分析中美两国在文化因素、政策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差异来探寻中美两国学校体育课程发展差异的根源，得出对比之下美国校园体育课程中良好发展的妙思，以此为中国未来学校体育课程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与方向。在课程目标上，我国聚焦学生核心素养培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美国则侧重学生个性化、终身参与及社会责任养成，强调运动技能掌握；课程内容方面，我国重视基础技能学习、专项强化以及传统文化融入，课程按水平分层设置丰富内容；美国则重视培养“身体素养个体”，强调运动模式示范能力、侧重运动技能的应用表现与策略运用、培养个人和社会责任意识、重视价值观教育、维持健康增强型体育活动水平，其中身体能力培养约占比60%，知识理解约占比20%，社会情感约占比20%；在课程实施方式上，我国以传统教学为主，结合大课间、课外锻炼与竞赛等，在科技的借助方面我国各个地区发展不同，整体有待加强；美国采用以学生为中心的探究式教学，推行“模块化选修”，融合丰富的科技手段；在课程评价方面，我国构建了以核心素养为主线的学业质量评价框架在运动能力、健康行为和体育品德三个维度上制定标准，在日常学习中强调多元评价主体采用“情景化评价”模式，学业水平考试由省级行政部门统筹实施，重点考察义务教育阶段核心素养达成度；美国则构建以体育素养为核心的多维评价体系，涵盖多方面指标且采用三维评价系统。在文化上，中国“重文轻武”、集体利益至上，美国崇尚个人主义、重视身心融合；政策上，中国推进体教融合，美国地方分权制下体育教育利弊兼具，招生与管理机制也各有不同；社会层面，我国体育发展在社会文化认同、配套措施等方面存在待完善之处，美国则形成全面发展的体育教育生态。

关键词：体育教育；体育课程；新课程标准；

DOI: doi.org/10.70693/jyxb.v1i3.77

在全球教育交流日益频繁的当下，各国教育理念与实践的对比研究备受关注。2022年4月我国颁布了《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22年版）》，为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体育教育指明了新方向。这一版本的课程标准以培养学生核心素养为导向，首次明确提出以“运动能力、健康行为、体育品德”三大核心素养为统领，构建了全新的课程目标体系。标志着我国体育课程从“知识技能本位”向“育人本位”的全面转型。这一理念突破了传统“三维目标”的局限，与国际教育趋势接轨，同时彰显中国特色。课程内容上，涵盖了基本运动技能、体能、健康教育、专项运动技能和跨学科主体学习，强调了“学、赛、练”一体化，注重真实情境中的问题解决能力，充分体现了“健康第一”“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以及“五育并举”的育人要求。美国作为教育强国，在体育教育方面也有着独特的经验与实践成果。其2013年颁布的《K-12体育课程标准》，围绕体育教育和健康教育，以学生为中心，聚焦科技发展和终身健康意识培养。通过对比两国的体育课程，能更清晰地认识我国体育课程的特色与优势，也能借鉴美国体育教育的先进理念与方法，为我国体育教育改革提供有益参考。本文将从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实施方式和评价体系四个方面，对中美校园体育课程展开深入对比分析，探寻两国体育教育的差异根源，以期为我国义务教育阶段体育教育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与启示。

1 中美校园体育课程对比分析

1.1 课程目标对比

1.1.1 我国学校体育课程目标

作者简介：姜亦宣(2001—)，女，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为体育教学

在新课标视域下,我国学校体育课程目标正在经历深刻变革与重塑。《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22年版)》以核心素养为导向,从运动能力、健康行为、体育品德三个维度构建课程目标体系,为体育教育的革新指明方向。新课标以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为导向提出了课程目标,根据小学、中学、高中不同阶段的学生,针对其年龄特点设置了不同阶段的水平目标,提升不同水平阶段的学生的运动能力、健康行为和体育品德三大核心素养。^[1]通过体育与健康教育,促进学生在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能力上的综合提升使学生全面发展;使学生有终身体育意识,培养学生的运动兴趣,形成终身体育锻炼的意识和能力;重点强调“学、练、赛”一体化,注重真实情境中的问题解决能力;实施将体育与德育、智育、美育、劳动教育相结合的融合育人,落实“五育并举”。我国学校体育课程目标在新课标引领下,从多维度致力于学生全面发展,在实践中应紧密围绕这些目标创新教学方法、丰富教学内容,切实提升体育教育质量,助力学生成长为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新时代人才。

1.1.2 美国学校体育课程目标

美国在2013年颁布最新版本的《K-12体育课程标准》。美国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制定的主体围绕着体育教育和健康教育,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的技能发展和终身健康意识。在相关学者研究中得出,其中的五个标准表现出了体育课程标准的目标:1.具备体育素养的个体在各种运动技能和运动模式中展示能力;2.具备体育素养的个体应用与运动和表现相关的概念、原理以及战略和战术的知识;3.具备体育素养的个体展示知识和技能,以实现和保持体育活动与健身,来增进健康水平;4.具备体育素养的个体表现出尊重自我和他人的社会行为;5.具备体育素养的个体认识到体育活动对健康、快乐、挑战、自我表现和社会交往的价值。^[2]目标体系以学生为中心,各维度目标相互关联、层层递进,从不同层面构建起培养全面发展个体的体育教育蓝图,对推动美国青少年体育素养提升与终身健康意识养成具有重要引领作用,也为全球体育教育课程目标的制定与完善提供了宝贵的借鉴范例。

1.1.3 中美学校体育课程目标差异分析

中美体育课程在目标导向与核心侧重上差异显著。中国以核心素养为导向,紧扣“立德树人”,落实“五育并举”,将体育融入国家教育战略,重视其塑造健全人格与培养社会责任感的作用;美国以学生为中心,分阶段聚焦兴趣激发、技能深化与终身健康意识培养,强调个体自我实现。运动能力培养方面,中国追求基础与专项技能全面发展,注重体能提升;美国鼓励学生在实践中灵活运用技能。健康行为教育上,中国系统培养健康生活方式,美国强调学生自主运用健康知识维持健康。体育品德塑造时,中国将品德教育贯穿体育教学全程,美国通过体育活动培养学生尊重意识与社会交往能力。课程目标融合上,中国推动“五育”融合与“学、练、赛”一体化,美国构建跨学科实践体系,强调体育的多元价值。

1.2 课程内容对比

1.2.1 我国体育课程内容

我国《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22年版)》依据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将体育课程学段划分为水平一至水平四,并系统构建五大学习板块。基本运动技能涵盖移动性、非移动性与操控性技能,筑牢运动基础;体能训练聚焦身体成分、心肺耐力等十一项指标,提升综合运动素质;健康教育包含健康行为、青春期保健等六大模块,强化健康意识与应急能力;专项运动技能包含球类、田径、体操等六大类,满足多样化运动需求;跨学科主题学习推动体育与德育、智育等多领域融合,实现协同育人。该标准强调基础技能与核心素养并重,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全方位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教学内容强调灵活而不是死板;注重学生的理解与运用,杜绝机械化练习、磨灭学生的兴趣;把内容与知识点良好结合,注重优化课堂课程结果^[3]

1.2.2 美国体育课程内容

根据美国K12体育课程标准,美国体育课程内容涵盖多个方面,旨在培养具备体育素养的个体,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发展,课程内容丰富多样,具有系统性和针对性,从基础运动技能培养到健康知识的普及,再到体育品德塑造,都进行了明确的规划。美国的体育课程一般以选项教学为主,学生自主根据每学期的课程安排,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自己相练习的运动项目^[4]。美国K-12体育课程以“技能+体能+社会情感”为核心通过多样化的运动选择、技术赋能和跨学科实践,培养学生成为终身运动者和负责任的公民。小学阶段(K-5年纪)通过游戏建立基础的动作模式,激发运动兴趣,并且搭配健康知识启蒙,通过绘本学习营养搭配,了解“每天运动60分钟”的意义;初中阶段(6-8年级)深化专项技能,培养自主锻炼的能力。根据体能测试的结果制定个人的体能训练目标;在社会情感活动上,组织班级联赛,讨论怎样面对比赛压力;进行运动专项模块的训练;高中阶段(9-12年级)精通运动技能,为终身健康奠定基础,参加高阶运动课程,参加社区实践。

1.2.3 中美体育课程内容差异分析

中国体育课程更注重系统性、政策性和文化传承,美国则更强调个性化、实践性和社会衔接。内容结构上中国侧重于“基础+素养”,强调“全领域覆盖”,从基础技能到综合素养层层递进,突出“健康知识”与“学科融合”的系统性;美国侧重于“技能+情感”,聚焦于“实用技能与情感发展”,以兴趣驱动为主,重在运动项

目的选择性和社会情感的实践性。对于体育课程内容的学段划分，中国是水平一至水平四，对应从小学到初中。严格按照水平进行递进，每个阶段目标明确，注重技能与知识相结合的螺旋式上升。美国 K12 涵盖从小学到高中，小学重在兴趣，初中重在自主性的培养，高中重在实践，课程内容强调了“终身运动”的连续性。课程内容教学方式上，中国统一性与规范性强，侧重集体性、标准化技能的培养；美国则是灵活性与自主性强，尊重个体兴趣，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的体验式学习。

1.3 实施方式对比

1.3.1 我国体育课程实施方式

在新课标的视域下，我国体育课程实施方式呈现出多元化特点，围绕“教会、勤练、常赛”展开，注重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强调通过多种方式提升学生的运动能力、健康行为、体育品德。具体表现为：结构化知识技能教学与大单元教学设计相结合；传统体育课程教学、大课间体育活动与课外体育锻炼相结合；体育与健康教育融合；“家校社联动”模式；对运动负荷有明确要求运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创设真实情境教学。我国学校体育课程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这一方面还是比较薄弱，还需要进行一定的突破，数字化体育教学设施不完备；教师应用数字技术能力不足；运动科技与体育教育融合度不够；信息数据安全存在隐患；技术普及与推广面临困难；在科学技术方面、对传统体育教学的跳脱、对现代高科技技术辅助体育教学应有更深程度的认可等。

1.3.2 美国体育课程实施方式

美国 K12 体育课程标准从教学模式、课程结构、教学方法等多个维度，清晰的表明了其体育课程的实施方式，以实现培养具备体育素养个体的目标。美国主要采用“学生中心”的探究式教学，强调个性化发展。教师主要扮演引导者角色，鼓励学生通过实践探索运动技能，实行“模块化选修”制度：例如主流运动（篮球、橄榄球等）、休闲体育（攀岩、滑板等）、终身体育技能（游泳、急救等）。^[5]具备多样化的课程结构，课程实施包含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两个方面。强调技术赋能，在体育课程实施过程中与科技进行整合，越来越注重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辅助教学、采用可穿戴设备、运动分析软件等技术工具；注重方法多元性，典型采用“多样组合”模式，形成教学方法“复方”、不同教学场景采用差异化方法组合；重视基于证据的教学研究、强调教学方法与实际效果的证实关联。^[6]

1.3.3 中美体育课程实施方式差异分析

中美体育课程实施方式在四大维度存在显著差异。核心理念上，我国以“教会、勤练、常赛”为框架，立足“立德树人”与“核心素养”，强调体系化育人；美国则围绕“学生中心”和“终身运动”，侧重个体个性化发展。教学模式方面，中国采用“结构化教学”，依托大单元设计，系统传授技术动作，课程由知识讲解、技能练习、实战应用构成；美国推行“探究式与选修制”，设置多元课程板块，学生按兴趣选学，教师引导学生在实践中自主探索规律。科技融合层面，我国体育课程数字化发展不均衡，存在教师数字素养不足、技术应用浮于表面等问题；美国已实现科技与课堂深度融合，能借助数字化手段追踪学生运动数据，制定个性化教学方案。社会协同上，我国推行“家校社联动”，以学校为主导，但社区参与度有限；美国秉持“社区与实践导向”，通过组织学生开展社区体育服务等活动，培养社会责任感。总体而言，我国体育课程在规范性与育人融合上优势明显，未来可借鉴美国经验，强化科技赋能、深化个性化教学并优化社会资源整合。

1.4 评价体系对比

1.4.1 我国体育课程评价手段

我国《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22 年版）》构建了全面、系统且具有发展性的体育课程评价体系，旨在通过多元化评价，推动学生在体育学习中实现知识、技能、素养的全面提升，旨在使学生养成良好的体育习惯，实现身心健康发展。我国体育新课标强调通过“立德树人”和“健康第一”的理念，评价不仅关注学生运动能力、健康行为、体育品德的发展，还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形成终身体育意识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助力学生成为全面发展的人。强调多样化评价方式相结合、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并重、多元主体参与评价。评价标准要充分考虑学生的个体差异和学段特点，制定差异化的考核项目与标准，评价结果以等级形式呈现，并向学生发放《体育成长档案》，为学生提供明确的努力方向。教师依据评价结果挑战教学策略，改进教学方法，优化教学内容，以提高教学质量，促进学生良好发展。

1.4.2 美国体育课程评价手段

美国对学生体育学习的评价经历了从单一指标向多元化体系的转变^[7] 早期主要以体适能测试（有氧运动、肌肉力量、柔韧性等生理指标）为核心评价内容，在 2013 年发布的《K-12 国家体育标准》提出以体育素养为核心的多维评价体系，包括运动技能、知识与策略、健康体适能、个人与社会责任、参与意识，截止到 2016 年，仅有部分州采纳了这一新标准，整体普及率较低。美国的体育课程评价采用三维评价系统，其中过程性评价占比 50%，包括：电子档案袋追踪（每周技能视频上传）、同伴互评量表（如团队合作评分）、表现性评价占比 30%，

包括:情绪化任务(如设计健身方案)、比赛模拟评估(裁判角色体验)、标准化测试占比20%,包括:FITNESSGRAM体能测试、技能达标测验。^[8]主要特点是以国家标准和年级成果为导向,注重评价与课程的紧密关联;身心一元融合五维模块,强调整体性发展;师生双中心模式;以及共同要素迁移。^[9]

1.4.3 中美体育课程评价体系差异分析

中国的体育课程评价体系在核心理念中强调全面育人,德育融合,以“立德树人”“健康第一”为导向,强调体育与德育、智育等进行融合,注重集体主义精神的塑造;而美国强调的是体育素养和个体发展,评价聚焦学生个体发展需求,强调通过多元化评价提升运动技能、健康行为和社会适应能力。评价内容中国主要总结为“三维核心素养”,对学生运动能力、健康行为、体育品德进行深入评价;美国的评价内容为“五维体育素养”,包括对运动技能、知识与策略、健康体适能、个人与社会责任和参与意识的评价。评价方法中国为多元整合的评价,美国则是简单直接的三维量化。评价的标准逻辑中国是分为水平差异以及注重个体差异化;美国则是以国家标准和年级成果为导向。美国具有先进的技术支持评价,如运动视频分析,可穿戴设备的具体分析;中国在这方面还在初步探索中。两者之间评价体系不同的本质上是教育目标与文化背景的映射,借鉴时需要根据自身实际进行适应性改造。

2 中美学校体育差异的根源

2.1 文化因素

有学者认为,中美在学校体育的精神文化层面存在差异,中国存在“重文轻武”的传统观念,认为体育训练是文化素质低下的表现。多数学生运动员为升学选择体育训练,中国强调集体利益至上,个人为集体做贡献,“重物轻人”倾向明显;美国体育价值精神文化源自于古希腊海洋文化,重视身心融合,将体育视为智力训练过程和个人发展途径,崇尚个人主义,赞赏通过“个人努力”获得幸福,鼓励个人价值的实现。^[10]中国是一个推崇儒家思想的国家,重理论道德,轻科技与自然知识的探索,正是儒家思想的根深蒂固从而导致几千年来中国教育部存在这样的观点思维。

2.2 政策因素

体教融合是新时代我国教育和体育工作的顶层设计,其核心是将竞技人才培养(体)融入国民教育体系(教)。^[11]2020年9月发布的《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明确指出,需推动青少年文化学习与体育锻炼协调发展,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12][11]}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学校体育需实现青少年“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的目标,并发挥其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中的作用。美国在地方分权制教育体系下的体育教育具有一定的优点,可以因地制宜,特色发展、激发地方积极性、促进校际竞争与交流,也会有一定的缺点挑战,比如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教育质量参差不齐、课程设置缺乏系统性。中美两国的招生以及管理机制不同,中国由行政部门主导招生,教练无决策权,专业选择限于文科类,管理依赖伦理规范,制度更新滞后;美国教练可以自主招生, NCAA 制定详细契约化管理制度,学生可自由选择理工科等专业。^[10]

2.3 社会因素

我国学校体育的发展在社会文化认同存在差异,在历史定位上存在差异:我国体育长期承担“国际影响力塑造”的政治功能,而美国更注重体育的社群构建与商业价值;我国虽然已经出台《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等文件,但在校园文化培育、教师激励机制等配套措施仍待完善。^[13]在“双减”政策的影响下,对我国学校体育的发展虽然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部分学校还存在着体育教师超负荷、家长矛盾心理(如寻求隐性补课)等问题、家庭与社区体育资源匮乏,需探索社会培训机构规范化参与路径、以及长效性考验:需避免政策热度后的沉寂,需国家层面组建专项团队推动系统性改革。^[14]美国社会对体育的重视体现在政策、教育、学术和社会价值的多维度整合,形成了一套以全面发展为核心的体育教育生态,美国社会及其重视学校体育的发展,在政策层面的系统支持: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课程体系开始强调学科间的联系性,体育与其他学科的融合政策逐步完善。例如马里兰州依据劳森和普拉克的《中学体育:课程选择》提出了首个现代体育多学科课程方法;2015年后,美国通过《体育与运动教育工作者》等专业期刊推动体育课程改革,将体育素养(如运动生理学、生物力学等四大学科标准)纳入21世纪核心课程框架。^[15]

3 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中美体育教育课程在目标、内容、实施方式和评价体系的系统对比,并深入挖掘文化、政策和社会因素对差异形成的影响,全面呈现了两国体育教育的特点与差异。我国体育课程以核心素养为导向,注重全面发展和文化传承,在体系化育人方面表现突出;美国则强调个性化发展,在科技融合和实践教学上颇具优势。文化上,两国价值观念差异影响体育教育定位;政策上,不同体制导致体育教育发展路径不同;社会层面,资源

整合与重视程度的差异塑造了不同的体育教育生态。通过对比可知，我国体育教育应在保持自身优势的基础上，积极借鉴美国经验，加强科技在体育教学中的应用，深化个性化教学，提升社会资源整合能力，推动体育教育迈向更高水平，实现学生体育素养与综合能力的全面提升

参考文献：

- [1] 毕舒惠. 《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22 版与 2011 版的比较研究[J]. 运动与健康, 2024, 3(6): 89-92.
- [2] 曾玉山. 美国新版 K-12 体育课程国家标准探析[J/OL].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15, 38(6): 109-113, 144.
- [3] 我国《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标准 (2022 年版)》解读_季浏[Z].
- [4] 周岩峰, 张伟刚. 美国学校体育概况及经验借鉴[J/OL]. 广州体育学院学报, 2020, 40(6): 125-128.
- [5] 中西方体育教学差异对比研究——以美国为例_张舒畅[Z].
- [6] 郝瑞枝和高飞 - 2023 - 中美小学体育教学方法比较研究.pdf[Z].
- [7] 近 30 年美国中小学体育教育...育发展现状报告》的文本分析_胡小清[Z].
- [8] 中美两国中小学体育课程标准特征变化研究_刘博轩[Z].
- [9] 刘皓晖 等 - 2022 - 基于美国国家课程标准的体育素养评价指标体系内容、特点及启示.pdf[Z].
- [10] 杨丹 等 - 2018 - 体育文化差异视角下中美大学生运动员运动动机比较.pdf[Z].
- [11] 新时代体教融合的目标与学校体育的改革方向_王登峰[Z].
- [12] 体育总局_教育部关于印发...进青少年健康发展意见的通知[Z].
- [13] 罗锦郎, 刘静民. 基于文化视域下的中美学校体育比较研究[J]. 文体用品与科技, 2021(15): 183-185.
- [14] 专家组 - 2021 - “双减”政策与学校体育发展.pdf[Z].
- [15] 美国学校体育课程与各学科融合的特征研究_周珂[Z].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a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s

Jiang Yixuan¹

¹ Jilin Sport University, ChangChun,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a in American schools holds significant authority and widespread influence globally. This paper employs literature review and logical analysis to examine four dimensions of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a in Chinese and American schools: curriculum objectives, content, implementation methods, and evaluation systems. By analyzing differences in cultural, policy, and social factor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t explores the root causes of disparities in their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development. The study identifies insights from the well-developed American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to provide new perspectives and direction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programs. Regarding curriculum objectives, China focuses on cultivating students' core competencies to fulfill the fundamental mission of fostering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The United States emphasizes personalized development, lifelong participation,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cultivation, prioritizing the mastery of athletic skills. In terms of content, China prioritizes foundational skill acquisition, specialized reinforcement, and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with curricula structured by proficiency levels to offer diverse content. The United States emphasizes cultivating “physically literate individuals,” prioritizing demonstration of movement patterns, application of motor skills and strategies, development of personal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values education, and maintaining health-enhancing physical activity levels. Physical ability development accounts for approximately 60%, knowledge understanding for about 20%, and social-emotional aspects for roughly 20%. Regarding implementation methods, China primarily employs traditional teaching approaches supplemented by extended recess periods, extracurricular exercise, and competitions. Technological integration varies regionally and requires overall enhancement. The United States adopts student-centered inquiry-based teaching, implements “modular electives,” and integrates diverse technological tools. Regarding curriculum assessment, China has established an academic quality evaluation framework centered on core competencies, setting standards across three dimensions: athletic ability, health behaviors, and sports ethics. Daily learning emphasizes diverse evaluators using a “contextual assessment” model, while academic proficiency exams are administered by provincial authorities, focusing on core competency attainment in compulsory education. The U.S. has developed a multidimensional evaluation system centered on physical literacy, encompassing multiple indicators and employing a three-dimensional assessment framework. Culturally, China prioritizes academics over athletics and collective interests, while the U.S. values individualism and emphasizes mind-body integration. Policy-wise, China promotes the integr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academic education, whereas the U.S. decentralized system presents both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in physical education, with distinct enrollment and management mechanisms. At the societal level, China's sports development requires refinement in areas such as social-cultural recognition and supporting measures, while the U.S. has cultivated a comprehensive physical education ecosystem.

Keywords: Physical Education;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New Curriculum Standards

供应链可持续尽职调查的框架与实施 ——基于供应商 ESG 审核的视角

马杰

(奥瑞威士顿科技大学, 墨西哥 下加利福尼亚州 提华纳市 22044)

摘要: 在全球价值链治理日益强调合规性与可持续性的背景下, 供应链 ESG 风险尽职调查成为企业实现长期稳健发展的核心举措。本文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三重底线框架及企业社会责任理论, 系统探讨了供应链可持续尽职调查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研究指出, 内部审核机制在提升供应链透明度、风险管理效能及持续改进能力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能够有效识别环境、社会与治理维度的潜在风险, 并通过 PDCA 循环实现闭环管理。本文进一步构建了涵盖审核策划、实施、跟踪与申诉的全流程管理体系, 提出了基于组织规模与风险等级的差异化审核方案, 包括审核人天分配、抽样方法及不符合项分级处理机制。最后, 通过案例分析了 ESG 现场审核流程的关键环节与方法论要求, 为企业构建韧性供应链、提升可持续发展绩效提供了理论支持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 供应链可持续性; ESG; 尽职调查; 供应商审核; 利益相关者理论; 三重底线; PDCA 循环

DOI: doi.org/10.70693/jyxb.v1i3.71

1. 供应链 ESG 风险尽职调查概述

1.1 引言

在全球价值链治理日益强调合规性与可持续性的背景下, 构建可持续供应链并健全尽责管理体系已成为企业实现长期稳健发展的核心举措 (ISO 20400:2017; GB/T 36000-2015)。供应商合规性审核不仅是保障其严格遵循合同条款、法律法规以及环境、社会与治理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ESG) 规范的重要手段, 更是降低供应链潜在风险、实现稳健运营的关键环节 (ISO 9001:2015; Seuring & Müller, 2008)。与完全依赖外部审计相比, 企业通过建立内部审核机制来执行相关工作具有显著优势 (Walker et al., 2008)。内部审核员因对组织的运营流程和业务特征具备深入理解, 能够更精准地识别潜在问题, 从而提升审核的针对性与有效性 (Pagell & Wu, 2009)。内部审核机制为供应链绩效的持续监控与系统化评估提供了工具, 能够及时发现改进空间, 推动持续优化, 并强化组织内部对可持续发展及社会责任的认同 (Zhu & Geng, 2013; GB/T 36001-2015)。面对外部环境及监管政策的快速变化, 内部审核机制展现出更高的灵活性, 通过及时调整审核计划与方法, 确保活动与法律要求及企业战略目标保持一致 (ISO 19011:2018)。在治理层面, 内部审核机制还能促进跨部门协作与信息共享, 从而提高整体运营的协同效率。减少第三方介入也有助于降低商业秘密和敏感信息泄露的风险 (GB/T 29490-2013)。内部审核结果能够作为企业遵循可持续供应链标准的有力佐证, 从而增强客户、监管机构与投资者等外部利益相关方的信任 (ISO 20400:2017; Seuring & Müller, 2008)。内部审核机制不仅在落实供应链尽责管理要求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同时也在提升企业管理效能与可持续绩效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意义, 为企业实现长期稳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1.2 从股东利润到三重底线

在理论层面, 约翰·埃尔金顿 (John Elkington, 1997) 提出的“三重底线” (Triple Bottom Line, TBL) 理论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系统性框架。该理论强调, 企业不仅要关注经济利润, 还需在社会公平、环境可持续和经济繁荣三大维度上实现协调发展, 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Elkington, 1997)。在社会维度, 企业应当重视员工、社区、

作者简介: 马杰(1981—), 男, 博士, 研究方向为管理科学。

政府以及供应链伙伴等多元利益相关者关系，遵循道德规范，保障产品安全，维护劳工权益，从而提升社会合法性与公众信任 (Carroll, 1991)。在环境维度，企业应坚持绿色运营原则，提升能源与资源利用效率，推动可再生能源与环保材料应用，减少废弃物与排放，最大限度降低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 (Hart, 1995; ISO 14001:2015)。在经济维度，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优化提升竞争力，在实现利润增长与市场扩张的同时，创造就业、贡献税收，推动包容性经济增长，为宏观层面的可持续发展注入动力 (Elkington, 1997; Porter & Kramer, 2006)。因此，三重底线框架不仅拓展了企业绩效评价的范畴，也为企业在可持续转型过程中承担多重角色提供了理论依据，其现实意义在全球面临社会不平等与生态挑战的背景下尤为突出。值得注意的是，传统企业观强调企业是以盈利为核心的经济实体，其唯一责任是为股东创造最大利润 (Friedman, 1970)。然而，现代商业理论与实践逐渐强调，企业作为嵌入社会网络的组织，处于社会中的生意必须有效管理多元利益相关者关系 (Freeman, 1984)。这些利益相关者不仅包括股东，还涵盖员工、消费者、社区、政府、供应商以及自然环境，他们既为企业生存提供资源，也深受企业行为的影响 (Freeman et al., 2010)。由此可见，企业能否有效管理并回应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已成为其长期价值创造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关键 (Clarkson, 1995)。忽视员工福祉、社区影响或环境足迹，可能带来声誉损害、法律风险甚至经营许可危机；反之，积极整合利益相关者利益则有助于构建韧性、激发创新、获取竞争优势，并最终实现长期包容性的繁荣 (Freeman, 1984; Porter & Kramer, 2011)。

1.3 从识别到响应

在现代企业治理结构中，董事会不仅是战略决策的核心机构，也是利益相关者管理的中枢。其角色类似于组织的“神经系统”，负责整合内部运营与外部环境信息，协调战略制定与执行，从而确保企业在高效运营的同时能够回应多元利益相关者的需求 (Freeman, 1984; Mitchell et al., 1997)。从组织架构来看，董事会位于最高决策层，其下属高级管理层，再往下为中低层员工，而企业外部则由各类利益相关者所环绕。董事会通过自上而下的决策传导推动战略实施，而员工和管理层则通过自下而上的反馈机制提供执行信息、改进意见与运营反馈，为战略修正提供依据。同时，董事会还需与外部利益相关者保持紧密互动，其诉求和期望直接影响战略方向。Mitchell 等 (1997) 提出的利益相关者属性模型为董事会的管理提供了理论依据。该模型基于权力 (Power)、紧急性 (Urgency) 与合法性 (Legitimacy) 三类属性对利益相关者进行分类：确定性利益相关者 (Definitive)：同时具备三种属性，对战略具有直接与关键影响。预期利益相关者 (Expectant)：具备两种属性，分为支配型 (Power+Legitimacy)、依赖型 (Legitimacy+Urgency)、危险型 (Urgency+Power)。潜在利益相关者 (Latent)：仅具备一种属性，分为不活跃型 (Power)、酌情型 (Legitimacy)、需求型 (Urgency)。非利益相关者 (Non-stakeholder)：不具备任何属性，通常不在战略优先考虑范围内。通过该模型，董事会能够科学识别并优先回应对战略具有实质性影响的群体，从而在治理中兼顾全局战略视角与合法诉求的响应，实现企业的长期价值创造与可持续发展 (Freeman, 1984; Mitchell et al., 1997)。

1.4 企业社会责任 (CSR) 与供应链 ESG 风险尽职调查的理论融合

企业社会责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理论强调，企业在追求股东价值与经济利益的同时，应兼顾员工福利、消费者权益、社区发展和环境保护 (Carroll, 1991)。这一理念为可持续供应链的尽职调查提供了制度化框架与理论支持。在全球供应链运作中，企业面临环境破坏、劳工权益侵犯、商业不端以及原料溯源不透明等复杂风险。为应对这些挑战，企业亟需建立系统化的 ESG 尽职调查框架 (OECD, 2018)，以实现风险识别、评估与管控 (ISO 20400:2017; GB/T 36000-2020)。该框架通常涵盖三大核心维度。环境风险：碳排放、能源与水资源利用、生物多样性保护、零毁林、废弃物与污染控制；社会风险：劳工标准、人权保障、多元包容性、职业健康与安全；治理风险：供应链合规性、反腐败、透明度、物料追溯等。通过这些维度的系统化管理，企业不仅能实现风险的量化评估与动态监控，还能确保可持续目标与战略目标的有效一致性 (ISO 19011:2018; GB/T 36001-2015; UNGC, 2021)。

1.5 从合规到共赢

供应商合规性审核已成为企业履行供应链尽责管理的核心机制。它能够识别潜在风险、优化管理流程、支持绩效的常态化监测，并强化组织内部对可持续发展的认同感。同时，该机制具备灵活性，能快速应对外部政策与法规变化，保障企业合法合规运营，并增强客户、监管机构和投资者的信任度。此外，审核结果若纳入激励与绩效管理体系，还能推动供应链各环节形成持续改进的闭环管理模式，实现风险管控与战略目标的有效衔接，从而构建“合规—信任—竞争优势”的良性循环 (Drucker, 1999)。

1.6 构建韧性供应链

在风险管理层面，系统化审核机制借助数据收集、分析与评估工具（如可能性—影响矩阵，见图 1），使企业能够对潜在风险和潜在机遇进行量化判断，并制定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Friedman, 1970; Freeman, 1984）（见图 2：风险管理流程图）。针对负面风险，可采取规避、减轻、转移或接受的措施；而对于潜在机遇，则可通过利用、增强、分享或接受来最大化其战略价值。社会责任合规作为风险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降低法律与声誉风险，也为企业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从业务连续性角度来看，审核机制通过定期评估供应商，能够识别薄弱环节，优化资源配置与流程控制，提升关键业务在中断情境下的抗干扰与恢复能力，从而降低经济与声誉损失。综上，系统化审核机制不仅具备传统合规职能，更深度嵌入企业治理结构，成为推动主动风险管理、强化业务连续性与战略机遇把握的重要实践。将 ESG 尽职调查框架与供应商审核机制有机结合，企业便可实现供应链风险的系统化、量化与动态管理，在保障合规与履责的同时，提升韧性、优化效率，并为长期稳健发展与竞争优势奠定坚实基础（ISO 20400:2017; ISO 19011:2018; UNGC, 20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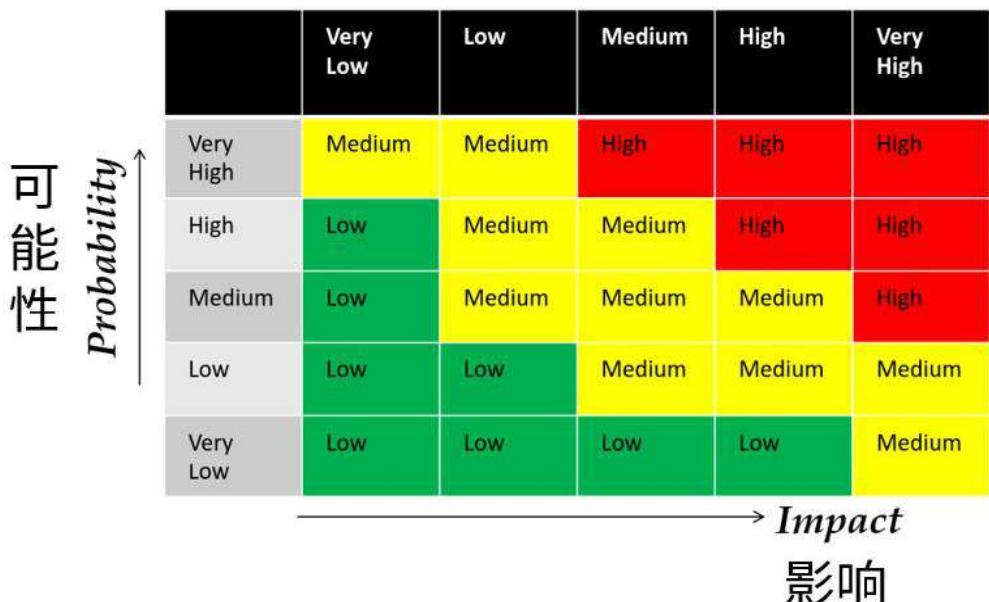


图 1：可能性-影响矩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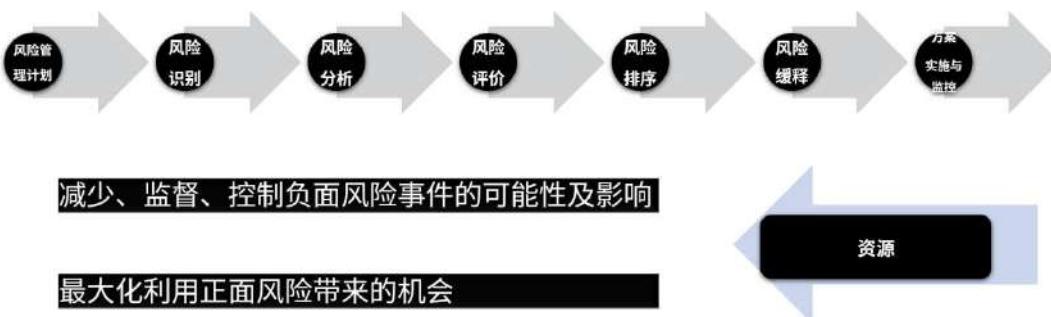


图 2：风险管理流程图

2.企业竞争力演进与供应链审核的战略必要性

2.1 企业竞争力内涵的演进

企业竞争力的内涵已从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逐步演化为基于价值链的整体能力衡量标准，这一演变反映了现代商业对可持续发展的高度重视（APICS, 2020）。以“三重底线”（Triple Bottom Line, TBL，即经济、社会与环境）为核心的价值评估体系要求企业在供应链管理中，不仅关注盈利能力与成本控制，还需从经济绩效、社会责任与环境保护三个维度对价值创造进行综合考量（Elkington, 1997; Carroll, 1991）。企业竞争力演进呈现显著的历史阶段性特征：20 世纪 70 年代，竞争主要集中于价格优势；80 年代逐步引入产品质量因素；90 年代进一步

将环境因素纳入考量；进入21世纪后，企业竞争核心全面转向可持续发展，体现为企业社会责任（CSR）与环境、社会及治理（ESG）框架的深度融合（Freeman, 1984; OECD, 2018）。在此背景下，供应链管理不仅需要构建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与严格的运营文化，还需关注渠道绩效与运营灵活性。通过内部协同和外部合作，供应链系统能够有效应对市场波动，保持竞争优势，并在经济、社会及环境三个维度实现平衡发展。由此，可持续供应链不仅是应对监管与市场需求的战略选择，更是企业构建长期韧性和持续价值创造的核心基础（UNGC, 2021）。

2.2 供应链结构解析

供应链作为由相互关联的组织、活动、信息及资源构成的网络，其核心功能在于将原材料转化为最终产品并交付给终端消费者（Chopra & Meindl, 2019）。典型供应链结构包括原材料供应商、制造商、中间部件生产商、一级供应商，到核心企业（终端产品制造商）、批发商、分销商，再至零售商及最终消费者的多层级网络。在这一过程中，产品与服务流、运输与仓储活动，以及回收与逆向物流构成供应链的主要物理和服务流程。现代供应链管理不仅关注效率和成本控制，更强调全链条透明度、协同性和可持续性（ISO 20400:2017; GB/T 36000-2020）。在此背景下，供应链及供应商能力建设被视为实现可持续和韧性价值链的核心环节。企业通过建立共同愿景、开展培训与知识共享、落实行为守则并实施反馈改进机制，实现全流程的协同管理。这不仅提升运营效率，还增强供应链透明度与抗风险能力，并通过构建基于信任与合作的伙伴关系，实现价值链的长期韧性与共享价值创造（ISO 19011:2018）。

2.3 未通过供应链审核的多层面风险

未通过供应链审核可能对企业运营与可持续发展带来多层面风险。在客户层面，如果供应链未达到合规要求，企业可能面临订单减少或合作中断，影响经营收益与市场稳定性。在员工层面，工作条件或职业健康安全不达标可能导致生产效率下降、员工满意度降低及人才流失，从而削弱核心人力资源优势。在合规层面，若未符合环境、安全或劳动法规，企业可能面临行政处罚、罚款或停产整顿。在事故风险方面，管理漏洞未被审核识别可能引发重大安全事故或环境事件，甚至导致民事赔偿或刑事责任。同时，未通过审核还可能暴露管理缺陷，损害企业声誉和品牌形象，使投资者、消费者及公众产生信任危机，从而制约企业长期发展与市场竞争力。由此可见，实施并通过系统化供应链审核不仅满足外部合规要求，更是企业构建韧性、规避风险及实现可持续治理的战略性内在需求（Drucker, 1999）。

3. 审核的核心概念与方法论体系

3.1 审核的定义、范围与目标

在供应链风险管理中，审核被视为核心管理工具，通过系统化、结构化的方法为企业识别、评估及应对潜在风险提供关键机制（ASQ, 2018）。国际标准将审核界定为一种系统、独立且形成文件的过程，其核心在于获取审核证据并进行客观评价，以确定审核准则的满足程度（ISO 19011:2018）。在供应链背景下，审核范围通常涵盖物理及虚拟场所、功能部门、组织单位、关键活动与流程，以及所涉及的时间周期。通过实施系统化审核，企业能够及时发现供应链运作中的合规漏洞、操作缺陷及潜在风险，从而采取针对性措施，提升供应链透明度、韧性及可持续性（GB/T 36001-2015）。审核项目的目标应与组织战略方向高度一致（ASQ Auditing Manual）。具体目标包括：发现改进机会、评估供应商能力、确保法律法规遵循，以及验证管理体系的持续适宜性、充分性和有效性（ISO 19011:2018）。审核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系统化评估机制，既验证组织运作的符合性与有效性，也推动持续改进与能力提升。一方面，审核通过“5W1H”系统方法，全面收集客观证据，以判断组织活动、流程及管理体系是否符合标准、法规及内部政策，并评估其在实际运行中是否有效实现预期目标（Drucker, 1999）；另一方面，审核旨在促进系统性改善与组织学习，其功能已由传统合规检查转向赋能组织、推动成长的学习工具。通过识别不符合项及根本原因，审核帮助组织消除问题根源、优化流程、增强韧性并建立预防机制，从而支持企业在复杂环境中持续提升绩效与成熟度（Carroll, 1991）。

3.2 现代审核方法论

现代审核方法依托多种系统化工具，形成全面、多维的评估体系，以确保审核结果可靠、科学且具有可操作性。全局视野法（Holistic Approach）强调从宏观与系统角度审视组织运营，重点关注ESG风险领域，并揭示风险间的相互关联及综合影响（OECD, 2018）；过程方法（Process Approach）聚焦关键活动与流程，通过评估输入、转换及输出，系统识别流程优势、薄弱环节及改进机会（ISO 20400:2017）；三角测评法（Triangulation Approach）通过跨来源、多方法的信息交叉验证，增强审核发现的信度与效度，例如结合文档审查、人员访谈及现场观察，

对同一绩效领域进行多角度评估，从而全面、客观地反映组织整体表现（UNGC, 2021）。上述方法相辅相成，能够兼顾战略与操作层面，系统掌握合规性、风险及绩效，为企业提供深度洞察及可行改进方向。



图3：审核的实现方法

3.3 PDCA 循环

在管理体系领域，PDCA 循环（Plan-Do-Check-Act）被广泛认为是经典且高效的持续改进模型。该模型通过计划、实施、检查与处置四个阶段系统推动组织实现目标并提升整体绩效（ISO 9001:2015）。计划阶段（Plan）：明确目标、分析现状、识别问题或机会，并制定行动方案及指标；实施阶段（Do）：执行计划、分配资源、开展具体活动并收集数据；检查阶段（Check）：监测与评估实施结果，对比实际绩效与预期目标，识别偏差及根本原因；处置阶段（Act）：基于检查结果采取纠正与预防措施，对成功实践标准化并推广，对未解决问题纳入新一轮循环进一步优化。PDCA 模型强调数据驱动、持续学习与动态调整，通过不断循环增强组织应对内外部变化的韧性，实现流程持续优化与管理成熟度提升（GB/T 36000-2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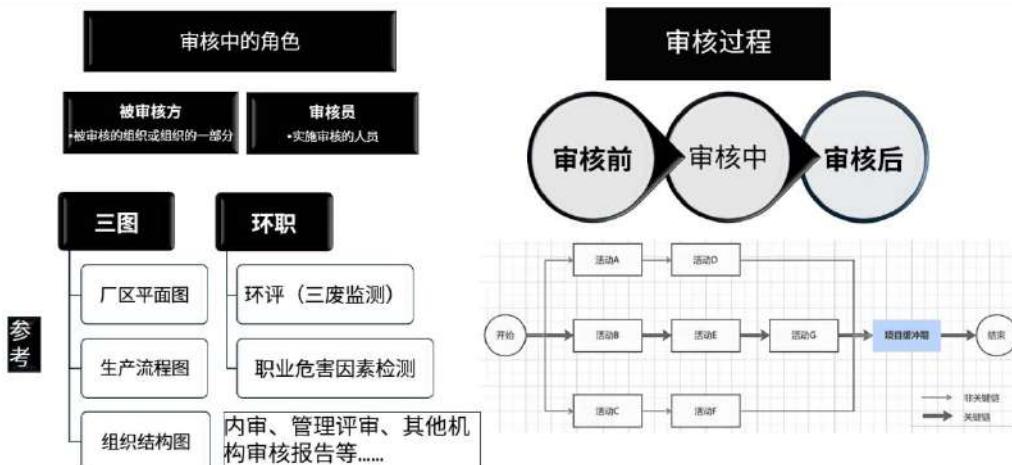


图4：审核中的角色、参考、审核过程及关键链

4. 审核策划

4.1 审核方案的目标确立与风险机遇评估

审核策划是确保审核活动系统性、有效性及价值实现的核心基础。国际通行的审核实践框架强调策划过程的结构化、风险导向及持续改进（ISO 19011:2018; GB/T 36001-2015）。审核策划的关键环节包括：首先，确立审核方案的目标。目标应紧密结合组织战略方向及受审核方背景，例如验证管理体系符合性、评估风险控制有效性或识别改进机会（ISO 19011:2018）。其次，识别与评估审核方案的风险与机遇。在策划阶段，需系统分析可能影响审核目标实现的内外部因素，如资源不足、受审核方配合度低、数据获取困难等风险，以及应用新技术、提升审核效率等潜在机遇。通过前期全面识别与评估，审核团队可制定针对性措施，保障审核目标的有效达成。

4.2 审核方案的建立与实施

在明确目标与风险机遇后，需建立完整的审核方案。这包括确定审核频次、范围与方法，分配必要资源，明确审核组职责，并建立评价审核成果的准则。审核方案进入实施阶段后，主要环节包括：启动审核（如确认审核可行性及选择审核组成员）、准备审核活动（如编制审核计划、准备检查表及分配具体任务）、执行审核（按照计划开展现场或远程审核活动）。审核结束后，需编制并分发审核报告，准确反映审核发现，并将结果传达给相关方，以支持决策与持续改进。

4.3 审核方案的监视、评审与改进

审核方案本身也需通过监视、评审和改进实现闭环管理。通过定期评估审核方案绩效并依据评审结论采取改进措施，确保方案持续适应组织需求及外部环境变化。整个策划与管理过程体现了“计划、实施、检查与处置”

（PDCA）循环理念，使审核从简单的符合性检查升华为支持组织治理与战略目标实现的重要管理工具（ISO 9001:2015; GB/T 36000-2020）。根据 ISO 标准定义，审核方案（audit programme）是“针对特定时间段策划并具有特定目的的一组一次或多次审核”。在实施特定类型审核前，组织需制定并管理有效的审核方案，明确审核类型与次数，并识别及提供实施审核所需的必要资源（ISO 19011:2018）。

5. 审核内容与类型设计

5.1 核心审核内容

在供应链风险管理及供应商尽职调查中，审核内容主要涵盖“零容忍项目”及其他核心 ESG 议题（ISO 20400:2017; OECD, 2018）。所谓“零容忍项目”，是指因违反法律法规或潜在 ESG 风险级别极高而被严格禁止的行为和事件，包括但不限于虚假文件、商业贿赂、童工、恶劣用工形式、冲突矿产使用及未经授权的分包等。针对零容忍项目，企业通常采取严格管理措施，如保留终止新供应商引入程序的权利，或在发现重大风险事件时停止与已入库供应商的合作，以确保供应链合法、合规及可持续。除零容忍项目外，供应商审核还涉及广泛的 ESG 核心议题。通过对这些关键风险维度进行系统化审核与量化评估，企业能够及时识别潜在薄弱环节，并采取针对性措施优化供应链管理，从而提升整体运营韧性与可持续发展绩效（GB/T 36000-2020; UNGC, 2021）。

5.2 审核类型划分

在供应链管理及供应商尽职调查中，审核类型可依据其范围、目标及执行时机进行分类，每类审核在覆盖范围、关注重点上存在差异（ISO 19011:2018; ASQ Auditing Manual）。全面初审/定期审核（Full Initial Audit / Periodic Audit）：覆盖管理体系的全部要求，通常用于新供应商认证或周期性再认证。在此类审核中，企业需调阅过去 12 个月的工资与工时记录，对于新成立工厂，则至少需提供近 3 个月的记录，以充分评估劳动条件与合规性。全面跟进审核（Full Follow-Up Audit）：同样为全范围审核，其核心目的是验证前次审核发现的不符合项是否得到有效纠正，同时在审核过程中可能发现新的问题。通常需审查自上次审核以来的全部工资与工时记录，至少包含 2 个月的新增记录，以确保整改措施的持续有效性。部分跟进审核（Partial Follow-Up Audit）：针对上一次审核中发现的特定问题进行验证，审核范围相对局限，主要关注相关纠正措施的实施情况，一般不涉及管理体系其他部分的运行情况。上述差异化的审核类型设计旨在平衡资源配置与管理体系持续改进的需求。通过不同范围和深度的审核，企业既能确保供应链管理体系的全面符合性，又能有针对性地推动关键问题的纠正与优化，从而提升供应链的合规性、透明度与韧性。

5.3 审核通知类型与标准遵循

在供应链管理及企业内部控制体系中，审核通知类型构成审核策划与管理的重要维度，其核心在于提前告知受审核方的程度。根据告知方式的不同，审核可划分为三类：通知型审核（Announced Audit）：在审核计划制定后，将具体日期、范围及目的提前充分告知受审核方。适用于多数体系审核及合规性检查，有助于受审核方提前准备必要的文件、资料及人员，从而确保审核顺利开展。半通知型审核（Semi-Announced Audit）：仅提前告知部分信息，例如审核月份或大致周期，而具体日期保持不披露。此方式可在减少运营干扰的同时，更真实地反映受审核方日常管理状态，为发现潜在操作风险提供参考。不通知型审核（Unannounced Audit）：未提前告知受审核方，通常用于高风险领域或特定合规性验证。通过随机、即时的审核活动，可有效揭示系统性风险及日常操作中潜在违规行为，避免受审核方因提前准备而产生“临时应对”现象。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审核需严格遵循国家及地区法律法规、ISO 及行业技术规范、客户合同要求，以及企业内部管理制度与承诺。合理选择审核通知类型并严格依照准则开展审核，不仅提升审核结果的真实性与可靠性，也为实现审核的客观性、公正性及有效性提供重

要保障。

6. 审核资源的科学配置与抽样策略

6.1 审核人天分配

在供应链风险管理及社会责任审核中, 审核人天 (Audit Man-Days) 构成审核策划与管理的重要考量因素。审核人天通常用于衡量完成一次完整审核活动所需的总工作量, 并以“人天”为单位进行计量 (ISO 19011:2018)。确定审核人天需综合考虑受审核组织的规模、业务复杂程度、风险水平以及审核范围等因素。

表 1 审核人天分配表

员工人数范围	建议审核人天
1 – 100	1
101 – 500	2
501 – 1000	3
1001 – 2000	4
2001 – 5000	5
≥ 5001	6

该分配方案体现了审核资源投入与组织规模的正相关关系。员工数量越多, 通常意味着流程复杂度增加、场所分布多样、管理体系覆盖范围扩大, 因此需要更多审核时间以保障审核深度与覆盖度。科学确定审核人天不仅有助于保证审核质量, 确保客观证据收集充分、评价准确, 也为审核方案的资源规划与预算制定提供了依据, 是实现有效审核管理的基础之一。

6.2 抽样方法

抽样方法是确保审核结果代表性及可靠性的关键。针对不同规模企业, 员工访谈与文件审查的抽样方案可参考下表:

表 2 审核抽样方法

员工人数	个别访谈人数	集体访谈组数与人数	访谈员工总数	员工档案、工资与工时记录审查份数	访谈时长
1–100	5	1 组, 每组 5 人	10	10	2 小时
101–500	10	2 组, 每组 5 人	20	20	4 小时
501–1000	15	3 组, 每组 5 人	30	30	6 小时
1001–2000	20	4 组, 每组 5 人	40	40	8 小时
≥ 2001	25	5 组, 每组 5 人	50	50	10 小时

该抽样策略系统设定了不同规模企业在员工访谈数量、集体访谈组数、员工档案、工资与工时记录抽查数量及访谈时间上的要求, 旨在通过结构化方法平衡审核深度与操作可行性, 从而全面评估企业在劳工权益、工时薪酬及社会责任履行方面的合规状况。此类方案体现了审核实践中证据收集的规模适配原则, 不仅保障了覆盖面和代表性, 也提升了审核效率与结果可比性, 是开展高质量社会责任审核的重要工具 (ISO 19011:2018)。

7. 审核发现的分级管理与闭环处理机制

7.1 不符合项分级的界定标准与处理

为确保审核发现能够实现有效闭环并推动供应商管理的持续改进, 审核结论通常依据问题的严重程度与潜在风险进行分类, 并相应设定差异化的整改要求与复审周期, 以实现风险控制与资源配置的最优平衡。具体分级及处理机制如下: 1) 关键不符合项 (Critical): 关键不符合项系指可能对法律法规符合性、劳工权益或环境保护

造成严重且直接危害的缺陷。此类问题一旦发现，供应商须在1个月内完成风险补救与纠正措施，以确保相关风险得到消除或显著降低。同时，整改结果必须经审核员现场验证并确认合格。该类不符合项通常涉及高风险领域，要求立即启动纠正与预防措施，属于最高优先级。2) 严重不符合项 (Major)：严重不符合项指管理体系在某一个环节或区域的系统性失效，虽未造成立即性严重后果，但可能影响整体体系的有效运行并带来较大运营风险。对此类问题，供应商须在3个月内完成纠正措施，并由审核员进行整改效果的跟进与验收。虽然此类风险不具备“紧急性”，但其长期性与系统性影响不可忽视。3) 次要不符合项 (Minor)：次要不符合项通常表现为局部或偶发性问题，对整体体系运行或合规性未造成实质性影响。例如，文件记录不完整、流程执行偶发偏差等。供应商可自行组织整改，审核方一般不要求专项跟进，但需在后续定期审核中对整改措施的有效性进行验证。此类问题虽未引发法律或安全风险，但仍具有潜在累积效应，需要在持续改进过程中予以关注。通过上述分级标准与差异化处理机制，不仅能够体现基于风险的审核管理原则，而且有助于推动供应商将有限资源优先投入重大问题整改，从而提升供应链整体的合规性与韧性。

7.2 审核过程的透明度、及时性及申诉机制保障

为确保审核过程的透明度、及时性及申诉机制的公正性，供应商在收到审核计划后，审核工作将于一个月内完成，并及时通知其审核结果。若供应商对评价结果存在异议，可在收到结果后的15个工作日内提出申诉，并补充相关证明材料至审核方。审核方将在收到反馈后的15个工作日内完成申诉材料的评估，并通知最终评定结果。该流程不仅确保了审核的效率，还为供应商提供了申诉与纠偏的机会，体现了审核活动中程序正义与持续改进的原则。通过这一机制，审核方能够确保各方责任明确，同时为供应商提供有效的争议解决渠道，从而促进持续改进与双方协作。

7.3 桌面审核跟进机制

桌面审核作为一种高效、灵活的远程跟进方式，主要用于对审核过程中发现的不符合项整改措施进行验证。其核心目标在于通过标准化流程，评估被审核方所提交证据的充分性、符合性与有效性，从而判定问题是否得到有效关闭。桌面跟进的基本流程如下：1) 整改证据提交：针对审核中识别的不符合项，被审核方需通过在线审核管理平台提交纠正与预防措施的证明材料，如制度文件、培训记录、照片或操作记录等。2) 证据接收与处理：审核方在接收整改证据后，进入正式的审查环节。此阶段由审核员对证据的完整性与逻辑一致性进行初步核查。3) 证据核实与状态判定：审核员根据风险等级和整改要求，评估所提交证据是否充分、符合标准及能有效消除不符合项根源，并据此作出判定。审核结果可能包括“已关闭”、“待补充”或“未解决”等状态。4) 系统状态更新：审核员在审核管理系统中更新不符合项状态，并根据需要生成相关的整改跟进记录，确保审核闭环的可追溯性。5) 报告更新与归档：若桌面审核导致审核结论发生实质性变化，审核员需及时修订正式审核报告并完成归档，以保障审核文档的完整性与历史可追踪性。与现场跟进相比，桌面审核虽缺乏实地验证环节，但其优势在于响应迅速、成本较低、数字化管理便捷，尤其适用于一般不符合项或程序性问题的闭环管理。在多层次审核体系中，桌面审核作为对现场审核的补充，不仅提升了审核资源利用效率，还为企业在常态化供应链治理中提供了高效工具。

综上所述，通过分级管理机制、透明公正的申诉流程以及高效的桌面审核手段，企业能够在不同风险等级下采取差异化的整改与复审措施。这一机制既保障了供应链风险的可控性与合规性，也增强了组织的应变能力与韧性。最终，借助审核活动的数字化与制度化管理，企业能够在风险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实现更高水平的平衡与协同。

8. 审核流程的系统化设计与实施

8.1 审核全生命周期管理

审核流程作为评估管理体系符合性、有效性与成熟度的关键机制，贯穿于从策划到跟踪的完整生命周期。其科学设计与规范实施，对于组织内部改进以及供应链的协同治理具有重要意义。一个完整的审核流程通常包括以下四个主要环节：1) 准备阶段：准备阶段旨在为后续审核活动奠定坚实基础。其任务包括：明确审核目标、范围与准则，确保与组织战略目标及受审核方实际情况相一致；评估审核可行性，组建具备资质与专业能力的审核小组；开展文件评审，检验管理体系文件的适宜性与充分性；制定详细审核计划，明确审核方法、组内分工及相关工作文件准备。2) 现场审核活动：现场审核是审核流程的核心环节，以首次会议为起点。审核组通过现场观察、文件与记录查阅、员工访谈等方法收集客观证据，并通过交叉验证与数据分析确保信息的真实性与可靠性。在此过程中，审核组与受审核方保持沟通，形成初步发现与结论。末次会议则作为阶段总结，向管理层汇报主要

审核结果与改进建议，为后续整改与管理决策提供依据。3) 报告编制与分发：审核结束后，进入报告阶段。审核报告应做到客观、清晰、完整。涵盖审核过程、关键发现、不符合项、潜在风险及改进建议。报告经审核组批准后分发至相关利益方，其准确性与透明度直接影响供应链管理及合作决策。报告同时为后续整改与验证提供了基础数据与证据支撑。4) 跟踪与持续改进：审核的完成并不意味着流程的结束。针对不符合项的整改与验证通常被视为审核活动的延伸。通过系统化的跟踪与验证，组织能够确保纠正措施落实到位，并推动管理体系在动态环境中持续优化，从而实现持续改进与韧性增强。

8.2 供应链审核中的多角色互动与多目标平衡

在供应链情境下，审核流程不仅是一种单向评估活动，更体现了多角色互动与多目标平衡的特征：审核方作为审核的发起方，负责设定审核准则并将其传达至供应商，以确保供应链运作符合合同要求与行业标准。审核小组独立执行现场审核，基于审核证据作出客观结论，并提出改进建议。供应商作为被审核对象，不仅需接受审核，还需根据审核结论实施纠正措施。根据审核结论（如合格、待定、不合格），客户将制定相应的供应商控制策略，包括协助改进、实施跟进或终止合作。该过程体现了审核在供应链风险管理中的系统性、规范性与决策导向作用。

8.3 审核作为持续改进机制

综上所述，审核不仅是评估管理体系运行状况的工具，更是推动组织与供应链持续改进的重要机制。通过严格遵循计划、实施、检查与处置（PDCA）循环，审核能够提升合规性，确保企业及供应链各环节符合国际标准与法律法规；优化运营绩效，通过发现问题与提出改进建议，促进流程效率提升；增强供应链韧性，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提高组织的风险应对能力。审核的科学设计与规范实施不仅为利益相关方提供了可信赖的管理信任基础，更助力组织及供应链在全球竞争环境中实现可持续发展与战略目标落地。

9.案例研究：ESG 现场审核实施

审核实施作为供应链尽责管理与 ESG 合规性评估中的核心环节，其系统性与规范性直接决定了审核结果的可靠性与有效性。根据 ISO 19011:2018 的要求，完整的审核流程通常包括首次会议、现场走访、员工访谈、文件查阅、末次会议及报告确认等阶段，每一环节均需遵循严格的程序设计与方法学规范。1) 首次会议：首次会议标志着审核工作的正式启动，参会人员应涵盖被审核方在 ESG 相关领域的主要负责人，包括人事、财务、法务、EHS、生产管理及后勤管理等职能部门。会议的核心任务是明确审核目的、范围、准则、流程与时间安排，并界定双方的权责，以确保后续工作的顺利实施。2) 现场走访：现场走访是审核过程中至关重要的实地调查环节。审核人员需通过实地观察与影像记录获取客观证据。如遇特定区域限制拍照，需事先取得书面确认。走访范围通常涵盖企业日常运营的主要区域，包括办公区、食堂、宿舍、生产车间、仓库及化学品仓库等。其重点在于核实员工实际工作状态、现场管理记录及 EHS 措施落实情况。3) 员工访谈：员工访谈作为获取一手信息的重要途径，其有效性依赖于抽样的随机性与访谈环境的独立性。审核组需从生产记录与花名册中随机抽取受访员工，并在无管理层在场、无监控的私密环境中开展访谈，以确保员工意见的真实性与可靠性。4) 文件查阅：文件查阅环节要求企业依据审核方预先提供的文件清单，提交相应的政策文件、过程记录及历史数据。通常情况下，文件覆盖范围需涵盖最近 12 个月的运行周期，以反映企业在常态化管理中的合规性与执行情况。其中部分记录（如综合工时批文涉及的相关工资记录、出勤记录等）可能需追溯一年以上，以确保数据的完整性。5) 末次会议：末次会议旨在向被审核方管理层反馈初步审核发现，并就关键事实进行确认与澄清。与会人员通常与首次会议保持一致。该阶段不仅确保信息传递的准确性，也有助于明确后续整改的责任归属。6) 审核报告：审核报告是审核结果的正式输出文件，需经双方复核。其中末次会议上出示的现场报告需要双方签字确认。审核报告应涵盖审核过程、发现、不符合项、改进建议及最终结论。其作用不仅在于为企业的 ESG 绩效提供结构化评估依据，更是供应链风险管理与持续改进的重要文档（UNGC, 2021）。

综上所述，案例研究表明，ESG 现场审核作为一种多维度、多方法的系统性评估工具，能够帮助企业有效识别与管理 ESG 风险，推动社会责任履行水平提升，并强化供应链的合规性与韧性。在供应链尽责管理的实践中，严格遵循国际标准与科学方法论的现场审核流程，不仅提升了企业透明度与信任度，也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落地提供了坚实保障。

参考文献：

- [1] ISO. ISO 20400:2017 Sustainable procurement—Guidance[S]. Genev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2017.

- [2]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GB/T 36000—2015 社会责任指南[S]. 北京: 中国标准出版社, 2015.
- [3] ISO. ISO 9001:2015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s—Requirements[S]. Genev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2015.
- [4] Seuring S, Müller M. From a literature review to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sustainable supply chain management[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08, 16(15): 1699-1710.
- [5] Walker H, Di Sisto L, McBain D. Drivers and barriers to environmental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practices: Lessons from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J]. Journal of Purchasing and Supply Management, 2008, 14(1): 69-85.
- [6] Pagell M, Wu Z. Building a more complete theory of sustainable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using case studies of 10 exemplars[J]. Journal of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2009, 45(2): 37-56.
- [7] Zhu Q, Geng Y. Drivers and barriers of extended supply chain practices for energy 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among Chinese manufacturers[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13, 40: 6-12.
- [8]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GB/T 36001—2015 社会责任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S]. 北京: 中国标准出版社, 2015.
- [9] ISO. ISO 19011:2018 Guidelines for auditing management systems[S]. Genev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2018.
- [10] 国家知识产权局. GB/T 29490—2013 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S]. 北京: 中国标准出版社, 2013.
- [11] Elkington J. Cannibals with Forks: The Triple Bottom Line of 21st Century Business[M]. Oxford: Capstone, 1997.
- [12] Carroll A B. The pyramid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oward the moral management of organizational stakeholders[J]. Business Horizons, 1991, 34(4): 39-48.
- [13] Hart S L. A natural-resource-based view of the firm[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5, 20(4): 986-1014.
- [14] Porter M E, Kramer M R. Strategy and society: The link between competitive advantage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06, 84(12): 78-92.
- [15] Friedman M.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business is to increase its profits[J].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1970, 13: 32-33.
- [16] Freeman R E. Strategic Management: A Stakeholder Approach[M]. Boston: Pitman, 1984.
- [17] Freeman R E, Harrison J S, Wicks A C, Parmar B, de Colle S. Stakeholder Theory: The State of the Art[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 [18] Clarkson M B E. A stakeholder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and evaluating 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5, 20(1): 92-117.
- [19] Mitchell R K, Agle B R, Wood D J. Toward a theory of stakeholder identification and salience: Defining the principle of who and what really count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7, 22(4): 853-886.
- [20] OECD. OECD Due Diligence Guidance for Responsible Business Conduct[R]. Paris: OECD Publishing, 2018.
- [21] 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 (UNGC). UN Global Compact Progress Report[EB/OL]. (2021-06)[2025-08-31]. <https://www.unglobalcompact.org>.
- [22] APICS.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Fundamentals[R]. Chicago: APICS, 2020.
- [23] Chopra S, Meindl P.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Strategy, Planning, and Operation[M]. 7th ed. Boston: Pearson, 2019.
- [24] ASQ. The ASQ Auditing Handbook[M]. Milwaukee: ASQ Quality Press, 2018.
- [25] Drucker P. Management Challenges for the 21st Century[M]. New York: Harper Business, 1999.

Sustainable Supply Chain Due Diligence:

Framework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pplier ESG Audits

Jie Ma

(Universitario Tecnológico Universitam, 22044 Tijuana, B.C., Mexico)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increasing emphasis on compliance and sustainability in global value chain governance, supply chain ESG risk due diligence has become a critical initiative for enterprises to achieve long-term stable development. Based on stakeholder theory, the triple bottom line framework,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or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practical pathways of sustainable supply chain due diligence. The study highlights the significant advantages of internal audit mechanisms in enhancing supply chain transparency, risk management efficacy, and continuous improvement capabilities. It effectively identifies potential risks in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dimensions and achieves closed-loop management through a data-driven PDCA cycle. Furthermore,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system covering audit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tracking, and appeal processes, proposing differentiated audit schemes based on organizational scale and risk levels, including audit man-day allocation, sampling methods, and non-conformity classification mechanisms. Finally, through a case study, the key steps and methodological requirements of on-site ESG audit processes are analyzed, providing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building resilient supply chains and improv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Keywords: Supply Chain Sustainability; ESG; Due Diligence; Supplier Audit; Stakeholder Theory; Triple Bottom Line; PDCA Cycle

科学微电影创作：中学科学教育与影视艺术融合的实践路径探究

周剑霜¹

(1.上海市向明中学，上海 黄浦区 200020)

摘要：科学教育与影视艺术的融合是培养中学生创新素养的重要途径。科学微电影创作活动为二者提供了有效的融合载体。笔者长期在高中带领学生进行科学微电影创作，通过实践，探索出一条以叙事化、视觉化、项目化为核心的实施路径：借助叙事化将科学原理转化为情感故事，通过视觉化将抽象知识呈现为直观影像，利用项目化将个体学习组织为团队协作创作，从而解决了科学教育项目化学习活动中的表达难、呈现难与组织难问题。实践表明，该路径能显著激发学生的科学探究兴趣与艺术创作热情，为中学开展跨学科融合教育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实践方案。

关键词：科学教育；影视艺术；跨学科教育；项目化学习

DOI: doi.org/10.70693/jyxb.v1i3.78

一、缘起与挑战

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培养其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已成为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年）》明确提出要“提升基础教育阶段科学教育水平，引导变革教学方式，倡导启发式、探究式、开放式教学”；《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年版）》也强调要“强化课程综合性和实践性，推动育人方式变革，着力发展学生核心素养”。在此背景下，推动科技教育与人文艺术的跨学科融合，被视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路径。影视艺术作为一种集视觉、叙事与技术于一体的综合媒介，能为科学教育提供情感化、情境化的表达载体，使科学知识可知可感，从而有效激发学生的探究兴趣与创造热情。

科学微电影创作实践活动旨在引导学生以科学探究为切入点，在对科学原理的了解、分析基础上，将科学原理和科学知识进行故事化的再设计和讲述，最终创作成微电影。这一过程主要面临以下两大挑战：挑战一来自于学生自身，即学生对科学问题发掘和分析的能力与通俗易懂地通过故事讲述科学原理之间存在矛盾；挑战二则指向活动的综合性，微电影创作所需的综合技能与学生电影创作拍摄实践能力之间存在矛盾。这两大矛盾成为了横亘在科技与艺术融合之路上的主要障碍。

为解决上述挑战，本文结合高中科学微电影创作的具体案例，探讨一条以叙事化、视觉化、项目化为核心路径的融合实践模式，通过系统性的教学设计，破解融合障碍，让科学教育与影视艺术的结合真正走向深化与实效。

二、融合路径一：叙事化——从科学原理到情感故事

叙事化的核心在于将严谨的科学逻辑转化为生动的故事逻辑，为冰冷的科学知识注入情感与情节，从而实现其通俗易懂的传播。这正是应对“学生对科学问题发掘和分析的能力与通俗易懂地通过故事讲述科学原理的矛盾”

作者简介：周剑霜（1983-），女，硕士，研究方向为社会表演学、戏剧教育

通讯作者：周剑霜

的关键。叙事化转化主要实施以下策略：

1.生活化选题。引导学生从自身生活经验与观察中发掘科学问题，将创作根植于真实的体验与困惑，确保故事的科学性与共鸣感。例如，从“脱发”现象出发创作了探讨青少年压力的《三号病房》；从“投篮”现象挖掘其背后的物理学原理从而创作了《学着玩》；从对青春期心理状态的关注出发，选择了“鲁伯特之泪”这一兼具坚硬与脆弱特性的科学现象，隐喻内心情感，创作出同名影片。通过“生活化选题”，将科学的起点锚定于学生的真实生活，从而解决了“拍什么”的困惑。

2.差异化创作。依据学生在电影创作各环节所展示出的不同特长进行分流指导，实现人尽其才、协同创作。我们注意观察各个学生在电影创作各环节所展示出来的特长：擅长讲故事的同学，重点引导其仔细观察生活细节，从生活中发掘可以用于电影叙事的场面或小情节加以拓展；擅长科学探究的同学，则鼓励其先去挖掘易于科普的科学原理，并尝试在此基础上创作故事；擅长动画制作的同学，则鼓励其直接挖掘故事进行动画创作。通过“差异化创作”，有效化解了学生能力差异与创作要求之间的矛盾，使每个学生都能在团队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3.课题资源转化。充分利用学校学生已有的科研成果，将获奖课题项目作为现成的叙事蓝本，实现从研究到传播的升华。例如，将某年一等奖学生课题《趁机跳出的小液滴》的实验过程与科学发现，转化为一部逻辑清晰、可视化的科学纪录片，大幅提升了原始研究的传播力和影响力。“课题资源转化”不仅拓宽了创作素材的来源，更形成了“研究—创作”的良性循环，为叙事提供了坚实的科学支撑。

通过叙事化路径，有效地解决了学生创作初期“拍什么”的核心困惑，将科学探究转变为一次有意义的故事建构过程，使知识在与情感、生活的连接中被深刻理解和内化。

三、融合路径二：视觉化——从抽象知识到直观影像

视觉化的核心在于运用丰富的影视语言，将抽象的科学原理和知识转化为可见、可感、易懂的直观影像，从而大幅降低认知门槛，提升科学知识的传播效能。这正是解决“微电影创作所需的综合技能与学生电影创作拍摄实践能力之间的矛盾”的关键环节。

在实践中，我们主要通过以下策略实现视觉化转化：

1.技术整合支持。学校专门开设校本特色课程《微电影创作》，并在多轮实践中对课程内容进行多次调整，将拍摄、剪辑、动画制作等影视专业技能进行融合与转化，为学生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持。例如，在《鲁伯特之泪》的创作中，团队不仅需要理解残余应力的科学原理，更需要运用摄影技术捕捉泪滴尾部被钳断时裂纹瞬间扩展的爆裂过程，通过特写镜头和慢放剪辑，将这一瞬时的科学现象清晰、震撼地呈现给观众，使抽象的力学概念转化为具象的视觉奇观。通过系统化的电影拍摄和制作技能培训，为学生提供将抽象概念转化为视听语言的必要工具支持，夯实视觉化创作的技术基础。

2.形态多样拓展。鼓励学生不将创作形式局限于单一类型的微电影，而是积极拓展至科学纪录片、科普动画等多种体裁，以适应不同科学主题的表达需求。例如，除了《学着玩》这类叙事型微电影和《鲁伯特之泪》这类寓理于情的作品外，也有如《趁机跳出的小液滴》般的科学纪录片、科普动画《基因编辑》等，以动态图形解释肉眼不可见的微观机制。就这样，通过鼓励表现形式的多元化，充分挖掘不同科学主题最适合的视觉表达形式，实现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

3.成果迭代升级。指导学生对原始素材进行专业化打磨与提升，将粗糙的记录转化为精良的视听作品。在由课题资源转化而来的项目中，通过与课题组成员和指导老师的沟通，对原本只是展现课题实验过程的简陋视频提出修改意见，辅导学生重新设计拍摄方案、补拍关键镜头、进行专业级剪辑与配音，最终将一段简单的实验记录升级为一部叙事完整、视听语言丰富的科学纪录片。通过专业化指导和反复打磨，提升作品的最终质量，使学生

经历从“做到”到“做好”的完整创作过程，培养其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通过视觉化路径，有效地解决了“如何呈现”的核心技术难题。学生通过亲手操作摄像机、剪辑软件和动画软件，不仅学会了将抽象思维转化为具象影像的方法，更在实践过程中深化了对科学原理的理解——因为只有真正理解了知识，才能有效地将其视觉化。这极大地提升了科学微电影的创作质量与传播效果。

四、融合路径三：项目化——从个人学习到团队创造

项目化的核心在于采用模拟工业流程的项目制学习模式，将复杂的微电影创作过程分解为可管理的任务，通过高效的团队协作与资源整合，确保作品高质量地完成。这是解决“微电影创作的综合性”与“学生零基础”之间矛盾的关键机制。项目化运作主要通过以下策略来实施：

1.创新“项目招标制”建组。在教学实践中，尝试以项目招标的形式来招募各剧组成员。参与招标的小组要求有完成的剧本和不超过三位的主创成员，在此基础上，可以在课程班和社团内部招募剧组成员来组成剧组。此策略通过引入市场化竞争与双向选择机制，高效地匹配了创意与人力资源，实现了团队组建的最优化，确保了项目核心意图的完整性与执行力。

2.明确角色分工与协作。在剧组组建完成后，学生需经历导演、编剧、摄像、剪辑、美术、演员等各类角色，在协作中学习项目管理、沟通与解决问题。例如，在《鲁伯特之泪》的创作中，擅长叙事的同学负责导演和编剧工作，确保科学隐喻的准确传达；精通技术的同学担任摄像与后期，负责摄影与裂纹特效；而情感表达细腻的同学则出演主角，共同协作完成创作。通过赋予学生明确的专业角色和责任，使其在真实的项目化实践中深度体验职业分工，培养了其责任感、协作力与解决真实问题的能力。

3.保障动态开放的参与通道。我们打破了传统线性创作的流程壁垒，建立了更为灵活的参与机制：一方面，鼓励在前期构思阶段未有成熟方案的学生，在课程中后期产生创意后，仍可随时立项，发起招募组建团队；另一方面，也允许没有参与剧本创作的学生，根据自身兴趣与特长，选择加入任一感兴趣的项目组。例如，以关注罕见病为主题的《埃莱尔-当洛》一片，其创意正是在项目招标阶段才由学生提出，并成功吸引了编剧、摄像和后期人员加入，最终组建团队完成创作。此策略通过创设一种“永不截止”的开放氛围，确保了创作灵感和人力资源在整个过程中都能自由流动，既保护了晚期诞生的优秀创意，也为擅长技术但怯于创意的学生提供了低风险的参与途径，真正实现了“人人可参与、时时可加入”。

通过项目化路径，系统性地解决了“如何组织”这一管理难题。它将一个复杂的综合性创作任务，转化为一个目标清晰、角色明确、流程可控的项目，使零基础的学生也能在各自的岗位上贡献价值，最终协同完成一部超越个人能力的作品，体验了从创意到成果的完整创造过程。

五、实践成效与反思

通过“叙事化、视觉化、项目化”三位一体融合路径的实施，科学微电影创作活动取得了多方面的实践成效。在创作成果方面，学生们成功创作了《鲁伯特之泪》、《三号病房》、《学着玩》等十余部科学影像作品，题材涵盖物理学、生命科学、信息技术等多个领域，充分展现了科学教育与影视艺术融合的丰富可能性。除此之外，通过举办“校园科学微电影展”，将这些作品面向全校师生进行展播，并邀请主创现场互动讨论，使科学影像创作从小组活动扩展为全校性的科学盛宴，实现了“用影像点燃学生探究科学热情”的广泛辐射效应。在能力培养层面，学生们通过叙事化训练提升了将科学原理转化为情感故事的能力；通过视觉化实践掌握了将抽象知识转化为直观影像的技能；通过项目化运作培养了团队协作与项目管理素养。

回顾整个实践过程，“叙事化、视觉化、项目化”实施路径呈现出三个鲜明特点：

重探究——活动引导学生从身边的一个小现象出发，探究一个科学原理，讲明白一个故事，构思一部完整的

微电影，确保了创作内容的科学性与扎实度。

乐创作——通过项目化的开放流程，学生逐渐学会综合运用美术、音乐、戏剧等多样手段，积极参与思考、讨论、创作及评价，培养了自我分析和学习的能力。

易传播——校园微电影是“学生化”的影视，内容思想接近学生口味，通过影展等形式容易引起学生思想共鸣，实现了创作成果从“小众参与”到“大众浸润”的转变，形成了良好的科学文化辐射效应。

实践表明，“叙事化、视觉化、项目化”实施路径流程清晰，易于复制，具有较高的推广价值。教师在过程中也实现了角色转型——从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课程的设计者、资源的协调者与创作过程的引导者，这为中学开展跨学科教学提供了师资层面的可行范式。

六、结语

科学微电影创作作为中学科学教育与影视艺术融合的创新实践，通过“叙事化、视觉化、项目化”的融合实施路径，有效破解了跨学科教学中的核心难题。这一路径不仅为学生提供了激发科学兴趣、培养创新能力的实践平台，更重要的是建立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跨学科教学和项目化学习的实践模式。展望未来，可进一步探索此模式与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课程内容的深度结合，开发系列化项目化学习场景，同时利用新媒体平台扩大优质科学教育资源的传播效能，为培养新时代所需的创新型人才提供更多元的教育实践方案。

参考文献：

- [1] 国务院.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年）[Z]. 2021.
- [2] 教育部. 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年版[S].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
- [3] 王磊, 黄鸣春. 科学教育的新兴研究领域: 学习进阶研究[J]. 课程·教材·教法, 2014, 34(01): 1-7.
- [4] 崔玉华, 杨慧慧. 科学教育视域下高中历史跨学科博物馆课程设计探析[J]. 科学教育与博物馆, 2025, 11(04): 45-50.
- [5] 王爱玲. 科学教育中德性意蕴的遮蔽与澄清[J]. 当代教育科学, 2025(04): 22-27.

Producing Science Video: A Model for Integrating Scientific Literacy and Visual Storytelling in Secondary Education

Zhou Jianshuang¹

I. Shanghai Xiangming High School, Shanghai

Abstract: Producing science videos offers a workable nexus between science education and moving-image storytelling and is increasingly valued as a route to cultivating secondary-school students' creative competencies. Drawing on years of guiding secondary-school learners through science-video projects, we articulate a design framework built around three pillars—narrativisation, visualisation and project-based collaboration. Narrativisation turns principles into emotionally resonant stories; visualisation renders abstract concepts as intuitive on-screen phenomena; project-based collaboration restructures individual inquiry into collective creative work. Together these moves solve the persistent implementation problems of 'how to say it, how to show it and how to organise it' in project-based science learning. Evaluation shows significant gains in students' investigative engagement and artistic motivation, providing a transferable model for interdisciplinary education at the secondary level.

Keywords: Science Education; Video Production; Interdisciplinary Education; Project-based Learning

高校学前教育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协同路径研究

俞雪琴¹ 杨晓岚¹ 谢小华² 顾蓓蕊³

(1.常州工学院, 江苏 常州 213032, 2.常州市新北区三井街道藻江花园幼儿园, 江苏 常州 213032, 3.常州市新北区薛家镇中心幼儿园, 江苏 常州 213032)

摘要: 本文基于新时代课程思政建设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要求, 以《学前儿童科学教育》江苏省一流课程为例, 系统探讨课程思政建设的协同路径。学前教育专业作为培养幼儿教师的主阵地, 其课程思政建设具有特殊价值。本文从课程思政理论内涵与时代要求出发, 分析学前教育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价值意蕴与现实困境, 提出包括顶层设计协同、内容体系融合、教学方法创新、师资素养提升、评价机制完善等五个维度协同路径, 并以《学前儿童科学教育》课程为例, 展示“专业性与思政性相统一”的实施策略与成效, 以期为同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范式。

关键词: 课程思政; 协同路径; 学前儿童科学教育

基金项目: 基于江苏省一流课程开展“课程思政”建设内涵研究及实践——以《学前儿童科学教育》为例 常州工学院教学改革专项研究课题(30120300100-23-yb-jgk34); 《学前儿童数学教育》常州工学院产教融合示范课程一般课题(30120322107)

DOI: doi.org/10.70693/jyxb.v1i3.70

引言: 新时代课程思政建设的理论逻辑与时代诉求

课程思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念的重要创新, 是对“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的时代回应。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 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 形成协同效应。”这为高校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自2020年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 课程思政建设已经从局部试点走向全面推广, 从理念创新走向实践深化。其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逐渐明晰, 但在理论体系建设、标准体系开发、“同向同行”机制建设等方面仍面临挑战^[1]。

学前教育专业是培养幼儿教师的主阵地, 其人才培养质量直接关系到我国学前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该专业学生兼大学生与未来教师的双重身份特征。因此其课程思政建设具有特殊重要意义:既要落实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又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塑造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优秀幼儿教师。

一、学前教育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价值意蕴

(一)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要求

立德树人是我国教育的根本任务与高校办学的使命。课程思政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举措, 其本质是挖掘各类课程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 实现价值引领、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的有机统一。学前教育专业课程占总学时的比例一般占80%以上, 贯穿整个本科阶段, 在人才培养和教育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2]。加强学前教育专业课程思政建设, 发挥专业课程的育人功能, 是高校落实党的教育方针的必然要求。这不仅关系到当代大学生的健康成长, 更关系到未来幼儿教师的培养质量和幼儿的健康成长, 具有双重育人功能和代际传递效应。

作者简介: 俞雪琴(1993—), 女, 硕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学前教育;

谢小华(1982—), 女, 本科, 幼儿园一级, 研究方向为学前教育;

顾蓓蕊(1987—), 女, 本科, 幼儿园一级, 研究方向为学前教育。

通讯作者: 杨晓岚

(二) 完善学前教育人才培养体系的内在需要

学前教育人才培养体系包括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等，而贯通其中的是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娄淑华指出：“建设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必须将思想政治工作体系贯通其中，必须抓好课程思政建设[3]。”学前教育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旨在将思想政治工作体系贯通人才培养全过程，实现育人与育才相统一，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优秀幼儿教师。

推进学前教育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是提升学前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内在要求。学前教育专业培养的学生是未来的幼儿园教师。通过课程思政建设，将价值塑造融入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全过程，可以帮助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树立正确的儿童观、教育观和教师观，培养崇高的职业理想和坚定的职业信念，为成为一名优秀的幼儿教师奠定坚实基础。

(三) 推动学前教育专业内涵发展的重要路径

学前教育专业内涵发展的核心是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关键是强化专业课程的育人功能。课程思政建设通过对专业课程的价值重塑和功能拓展，实现专业课程的价值增值与思想教育的有机融合。深度挖掘思政元素、协同育人与系统化建设是推动学前教育专业内涵的关键。

推进学前教育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是完善课程体系及教学环节的必然要求。“学生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等教育仅依靠思政课、人文讲座是远远不够的，而专业教育作为大学教育的主阵地，在时间上具有先天的优势[2]。”推进专业课程思政建设，实现由思政课程主渠道育人向课程思政立体化育人的转化，有利于各类课程与思政课程协同发挥效应，进一步提升人才培养的有效性。

二、学前教育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现实困境

(一) 内容供给与专业教学的衔接困境

课程思政内容供给与专业教学的有机衔接，是当前教育领域面临的基础性难题。其中教学思维转换困境尤为突出。长期以来，学前教育专业课程教学普遍遵循知识本位理念，以传授专业知识为奋斗目标，从专业知识的逻辑与结构出发，支撑和规范教学活动，形成了相对封闭的教育思维模式。以《学前儿童科学教育》“学前儿童科学教育的内容范围”章节为例，教师通常先讲解内容构成，再总结特点，容易陷入“知识—教学”的线性思维，忽视价值引领，难以转向“知识+价值观+教学”的多维模式。这种思维惯性导致教师在教学设计中，要么生硬地嫁接思政内容，要么完全回避价值引领，难以实现专业知识与思政元素的有机融合。

(二) 教师素养与使命担当的匹配困境

教师是课程思政实施的关键，其素养与育人使命之间存在匹配难题。这种匹配困境主要体现在理论素养不均衡。专业课教师通常具备扎实的专业理论，但思政理论素养参差不齐。直接影响其对课程思政的认同度、元素挖掘的深度和教学实施的价值引导能力。

教学能力短板是实践层面的困境。课程思政要求教师具备将思政元素的挖掘、思政内容的融通、思政话语的转化、思政方法的运用、思政资源的开发等巧妙结合的能力。然而，当前教师的课程思政意识，与依据学科属性、专业特质、课程特征，综合融入思政内容、话语、方法、资源的能力仍显不足。直接影响课程思政教学的贯通性、规范性和灵活性。

(三) 广度覆盖与育人效度的协调困境

在高校教育场域中，课程思政工作的开展虽已实现面上的普及化态势，但育人实效性的提升仍存在显著空间。作为教学改革与课程体系重构的重要抓手，各二级学院正推进实践探索，但校级战略与学科规划尚未将其充分纳入，顶层设计缺失与系统推进不足并存。实例表明，其与专业评估、质量监控等制度耦合度低，制约了建设的延续性。

在运行保障层面显现出机制的不完善化特征。完善的激励考评体系、监督评估框架本应是课程思政建设的基础要件。现实情况却是高校保障机制呈现明显的薄弱化倾向。质量监控渠道与反馈回路的匮乏化现象尤为突出。实施过程中支持力度的不足性与建设质量的差异性由此产生。

资源供给的短缺构成了基础性制约因素。《学前儿童科学教育》《学前儿童数学教育》等专业课程的思政化改造过程中暴露出：面临经费有限、资源共享平台缺失等问题，制约校际与省域协同。

三、高校学前教育专业课程思政五位一体的协同路径体系构建

基于学前教育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价值意蕴和现实困境，需构建系统性协同路径体系。本文提出包括强化顶层设计、深入挖掘思政元素、创新教学方法、加强师资建设、完善评价机制五个维度的协同框架。

(一) 顶层设计协同：构建一体化育人格局

顶层设计为课程思政提供方向指引与制度保障。有效的顶层设计依赖于国家、学校和学院三级协同。教育部

通过《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明确总体要求、内容重点和推进路径,为高校的课程思政建设定位,标准制定与资源平台建设和交流机制提供依据。以江苏省一流课程《学前儿童科学教育》为例,该课程思政建设中具有典型性和示范性,以“培养具有科学素养和教育情怀的优秀幼儿教师”为目标,构建了“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精神—教育情怀”四位一体的课程思政体系。科学知识维度,每次课都保证20分钟的知识传授时间,通过系统化的知识传授和价值引导,帮助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例如授课教师在“观察类科学教育活动的设计与组织指导”这节课,先进行了观察法的概念、特点讲解介绍,保证知识学习的系统性。科学方法维度,课程通过让学生赴幼儿园观摩幼儿如何观察、如何实验探究后,继而要求学生进行相关科学探究方法的训练,培养学生实事求是、严谨细致的科学态度,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科学精神;科学精神维度,课程通过科学家故事、科技成就等内容,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培养奉献社会、服务人民的责任担当。课程特别强调中国科学家的贡献和我国科技发展的成就,如钱学森的爱国情怀、袁隆平的奉献精神、航天精神的时代价值等。通过这些内容,增强学生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教育情怀维度,培养师德师风和教育爱心。课程通过幼儿园科学教育实践,培养学生热爱幼儿、热爱教育事业的专业情感,树立“幼儿为本、师德为先”的教育理念。

(二) 深入挖掘思政元素: 实现专业性与思政性统一

挖掘思政元素是课程思政建设的基础。应坚持系统化和特色化原则,既要梳理专业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形成体系,也要紧密结合专业特点,挖掘特色的思政元素,突出育人针对性。根据《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和学前教育专业特点,本专业应重点聚焦四个方面的思政元素:政治认同元素,包括理想信念、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职业素养元素,包括师德师风、教育情怀、职业操守等;科学精神元素,包括求真务实、批判创新、追求真理等;人文情怀元素,包括关爱生命、尊重差异、包容多元等。

采用科学方法挖掘思政元素。思政元素挖掘应遵循“上行一下行”的双向路径:“上行”路线从政策要求和宏观理念出发,再形成各门具体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知识体系,进一步深入梳理形成专业的思想政治教育知识体系和图谱;“下行”路线为专业的思想政治教育知识体系和谱系,具体化为专业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知识布局,形成具体专业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知识安排,通过有机融入设定具体章节的课程思政教案^[5]。

结合课程特点分类挖掘思政元素。不同课程具有不同的特点和优势,应结合课程特点挖掘思政元素。如《学前儿童科学教育》《学前儿童数学教育》侧重挖掘科学精神、创新精神、追求真理、环保意识、教师职业素养、文化传承等元素;《学前儿童语言教育》侧重挖掘文化自信、语言审美、沟通能力等元素;《学前儿童艺术教育》侧重挖掘审美情趣与创造能力等元素,实现思政教育与专业培养的深度融合。

表1 《学前儿童科学教育》课程思政元素挖掘示例

类型	序号	教学内容(要点)	课程思政元素
理论教学	1	学前儿童科学教育内涵、价值、目标及内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学前儿童科学教育方法与组织形式	四有好老师
	3	观察类科学教育活动的设计与组织指导	教师职业道德和理想信念
	4	实验操作类科学教育活动的设计与组织指导	教学案例
	5	技术制作类科学教育活动的设计与组织指导	共享单车,环保意识
	6	学前儿童区域科学教育活动设计与组织指导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7	学前儿童科学游戏活动设计与组织指导	以幼儿为本
	8	家庭、社区科学教育活动设计与组织指导	“四个意识”“四个自信”
	9	幼儿园集体活动模拟教学	创新精神
实践教学	10	感受现代科技的魅力,学非遗蛋雕,承继中华文化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1	观摩学前科学教育活动,理解科学教育内容及教育价值	文化传承
	12	关爱特殊儿童,认知民情,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	尊老爱幼,奉献社会
	13	开展观察类、实验操作类科学教育活动设计与组织指导,现场实战训练	实践检验方法
	14	与传承人共赴社区开展实践活动,进行非遗蛋雕作品展览及技艺传授	服务社会,奉献社会
	15	社区科学教育活动实践,非遗面塑作品展览及宣讲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三) 创新教学方法,促进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结合

教学方法是课程思政建设的实现路径和有效手段。应坚持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统一,既通过直接、系统的讲授传递价值理念和知识内容,也强化间接、渗透的方式融入思政元素,实现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

课程团队采用了多种教学方法促进专业知识与思政元素的有机融合。常用案例教学法,精选富有时代气息、贴近专业的生动的有思政意义的典型案例,坚持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引导学生感悟其中的价值理念;在学前教育专业中,可以选择优秀幼儿教师的先进事迹、学前教育改革发展的成就等案例,培养学生的教育情怀和专业信念。精用运用问题探究法,设计具有思政价值的探究问题,使学生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实现价值引领目标;例如设计“如何培养幼儿的环保意识”等探究问题,引导学生在解决问题中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合理使用项目学习法,

设计具有综合性和实践性项目，实践过程中渗透价值引领，评价过程注重育人效果，关注学生的成长和发展。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在学前教育专业中，可以设计“幼儿园科学活动资源开发”“社区学前教育志愿服务”等项目，让学生在实践项目中提升专业能力和思政素养。正确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设在线课程和数字化教学资源，拓展课程思政的教学时空。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建设在线开放课程、微课、虚拟仿真实验等数字化教学资源，拓展课程思政教学的时间和空间。利用虚拟仿真技术，创设课程思政虚拟实践环境，借助新媒体平台开展互动，增强课程思政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为促进专业知识与思政元素的有机融合，多种教学方法被课程团队所采用。精选富有时代气息且贴近专业的典型案例，价值性与知识性相统一的理念贯穿始终，引导学生对其中价值理念进行感悟的是案例教学法之运用。优秀幼儿教师先进事迹展示、学前教育改革发展成就呈现等实例，在学前教育专业中可被选择用于教育情怀和专业信念的培养。

具有思政价值的探究问题的实施使得学生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实现价值引领目标成为可能。“如何培养幼儿环保意识”等问题的设计，使正确价值观在学生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得以实现。综合性及实践性项目在设计时注重价值引领的渗透，评价过程则以育人效果为核心关注点的是项目学习法之特点。团队协作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由此得到培养。“幼儿园科学活动资源开发”“社区学前教育志愿服务”等项目在学前教育专业中的实施实例表明，学生专业能力和思政素养在实践项目中获得提升。

在线课程和数字化教学资源的建设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得以建设，课程思政的教学时空由此获得拓展。信息化手段的充分利用体现在在线开放课程、微课、虚拟仿真实验等数字化教学资源的建设中。虚拟仿真技术为课程思政虚拟实践环境的创设提供了可能，新媒体平台的互动开展使得课程思政吸引力和影响力得到增强的事实由此可见。

最后，创设实践教学环节强化思政体验。通过组织社会实践、教育见习、志愿服务等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深化对理论认知，体验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组织学生到幼儿园开展非遗泥塑活动，开展认识共享单车等环保主题实践，赴幼儿园组织认识“身边的二维码”社会活动，在实践中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和社会责任感。

（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强化育人能力与使命担当

教师是课程思政建设的关键力量，其育人意识和育人能力直接决定着课程思政实施成效。系统提升教师思政素养与教学能力，强化使命担当，是推进课程思政的重要保障。

意识层面，通过专题培训、理论研讨、经验交流、实践考察等多种途径，帮助教师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澄清认识误区，树立“教书育人并重”的职业理念，增强价值引领自觉性。通过开展专项培训，帮助教师掌握思政元素挖掘、教学设计和教学评价等方法，提高教师教学能力。通过组织教师集体备课、教学观摩、教学竞赛等活动促进经验交流与能力提升。与此同时，建立思政课教师与专业课教师结对机制，发挥协同指导作用。

加强教师思想政治素质与师德师风建设。坚持教育者先受教育，传道者自己首先要明道、信道。要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水平，丰富教师文化底蕴，夯实文化底蕴与人文素养，使其真正成为学生成长的引路人和先进思想的传播者。同时，增强教师的政治认同和职业信念，塑造教师的人格魅力和榜样形象，引导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增强教师的人格感染力和育人实效性。

（五）完善评价机制，驱动课程思政可持续发展

科学评价机制是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保障。以《学前儿童科学教育》为例，构建多元评价体系，涵盖学生、教师、同行、管理者及用人单位多视角反馈。为保障反馈全面，教师团队里不仅有幼儿园园长、还邀请了高校辅导员等。过程评价方面，采用一人一档案，设计了包括对学生的观察记录，学生的平时作业、小组作业，网络平台的学习日志等跟踪学生科学态度、创新思维；学习成果评价采用实践活动设计、案例分析等途径考查学生知识整合与问题解决能力，实践活动设计采用递进式方案，由听优秀公开课、模仿公开课、课内小组设计、微格教室模拟、幼儿园实习公开课等一系列活动，帮助学生完成由模仿到创新，由演练到实操；由外化到内化的学习过程。学生评价侧重学习体验与收获，教师评价侧重教学反思与改进，同行专家评价侧重专业性与科学性，教学管理者评价侧重规范性与有效性，用人单位评价专业课程教学是一个涵盖教学主体、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载体与教学资源等多要素的综合性系统。在丰富专业课程教学内容的基础上，融入思政元素还要求教学主体、方法、载体与资源之间实现系统性协同。然而，传统专业教学因其经验性与稳定性特点，难以迅速适应思政教育的新要求。学前教育专业课程本身蕴含丰富的思政元素，如科学精神、人文关怀、爱国情怀、社会责任与职业道德等。以《学前儿童科学教育》课程为例，宁灵芝指出，该课程所蕴含的科学精神包括求真精神、理性精神、批判精神与创新精神；人文精神则引导学生关怀人类与社会，培养对生命、环境与自然的敬畏与关爱。^[4]这些元素为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了优质资源与广阔空间。然而，在实际整合过程中，由于未能兼顾一般性要求与学前教育专业特色之间的平衡，往往导致育人潜力未能充分发挥。

通过多元评价体系，全面反映课程思政建设成效。构建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涵盖教学设计、教学实施、教学效果等维度，关注教学目标设定、内容与方法合理性、教学组织、师生互动、课堂氛围等。评价应结合定性与定量方法，注重过程与发展性评价。强化评价结果运用，建立反馈机制，促进教师反思与教学改进，将课程思

政成效纳入考核与激励体系，增强教师参与动力。

结语

课程思政建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举措。学前教育专业作为培养幼儿教师的主阵地，其课程思政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价值意蕴与现实挑战，构建了顶层设计、内容融合、教学方法创新、师资素养提升、评价机制优化五位一体的协同路径体系，并以《学前儿童科学教育》课程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以期为高校学前教育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提供借鉴。

未来研究可深化理论与实践融合，推动专业课程与思政课程协同共建，构建科学评价体系，加强国际比较与本土化创新，持续提升课程思政建设水平。

参考文献：

- [1] 陆道坤. 新时代课程思政的研究进展、难点焦点及未来走向[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43(3):43-58.
- [2] 刘奕琳. 推进专业课程开展思政教育的探索与思考[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1(2):81-83.
- [3] 娄淑华, 马超. 新时代课程思政建设的焦点目标、难点问题及着力方向[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42(5):96-104.
- [4] 宁灵芝. "学前儿童科学教育"课程思政建设的研究[J]. 大众科技, 2022,24(11):136-139.
- [5] 陆道坤. 论课程思政的教学设计与实施[J]. 思想理论教育, 2020(10):16-23.

Research on Collaborative Pathways for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the Curriculum of Preschool Education Majors in Universities

Yuxueqin¹, Yangxiaolan¹, Xiexiaohua², Gubeirui³

(¹Cha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angzhou, Jiangsu, China ; ²Changzhou Zao Jiang Garden Kindergarten, Changzhou, Jiangsu, China; ³Changzhou Xuejia Central Kindergarten, Changzhou, Jiangsu,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s and practical requirement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urriculum in the new era, this paper takes the Jiangsu Province first-class course Science Education for Preschool Children as a case study to systematically explore the collaborative pathways for its construction. As the primary platform for cultivating kindergarten teachers, the preschool education major holds particular value in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its curriculum. Starting from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contemporary demands of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challenges of implementing it within the preschool education curriculum. It proposes a collaborative framework encompassing five dimensions: top-level design coordination, integration of content systems, innovation in teaching methodologies, enhancement of faculty literacy, and improvement of evaluation mechanisms. Using the Science Education for Preschool Children course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demonstrates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and outcomes that achieve a unity of disciplinary knowledge and ideological values. The aim i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insights and practical models for similar professional courses undergo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ntegration.

Keywords: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Collaborative Pathways; Science Education for Preschool Children

“何以为能”：大语言模型时代翻译专业学生核心能力的解构与重塑

陈巧云

(喀什大学, 新疆 喀什 844000)

摘要：生成式大语言模型的迅猛发展对翻译专业教育的价值根基构成了根本性质疑。本文直面“翻译专业学生何以为能”这一时代命题，系统解构了在大语言模型冲击下逐渐失能的传统翻译能力体系。研究发现，以“精准语言转换”“程式化技巧应用”和“有限工具操作”为支柱的传统能力模型正被快速解构。基于此，本文提出以“智能素养”为核心的能力重塑框架，其四大支柱包括：批判性评估能力、策略性交互能力、人机协同流程管理能力以及技术伦理决策能力。本研究旨在为智能化背景下的翻译教育范式转型提供理论参照。

关键词：核心能力；大语言模型；翻译专业；智能素养；能力重构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3.92

一、引言：时代之问与价值危机

2022年被称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元年”，以chatGPT、文心一言和讯飞星火等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先后被应用于翻译实践中，在翻译领域引发了一场深刻的“完美风暴”。相较于传统机器翻译系统，大语言模型在翻译性能上表现更为卓越，其翻译产出的质量可与专业人类译者的作品相媲美，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能够超越人类译者的水平^[1]。当人工智能能够瞬间生成通顺、准确且风格多样的译文时，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翻译教育者与学习者面前：经过多年专业训练的学生，其核心竞争力究竟何在？

这一问题折射出翻译专业教育正面临的价值危机。传统翻译教学多建立在“信息不对称”与“技能稀缺性”的基础上——教师传授学生尚未掌握的语言转换规则、文化知识和专业技巧。然而，随着这些规则与知识被编码进规模达万亿级参数的神经网络，并能被任何用户通过自然语言指令调用，传统的技能传授模式迅速失效。学生群体中普遍出现“学习悖论”：他们辛苦积累的微观语言技能，在人工智能的高效产出面前，价值急剧衰减。

因此，本文认为，翻译专业教育面临“釜底抽薪”式的挑战。我们亟需超越对“是否使用人工智能”的表层讨论，直指问题核心：系统解构已然失能或正在失能的能力要素，并前瞻性地重塑能够定义未来译者价值的新能力体系。对这一问题的回应，不仅关乎翻译专业的存续，更关乎一代语言服务人才在智能时代的定位与发展。

二、解构：传统翻译能力体系的“祛魅”与失能

大语言模型并非否定所有人类能力，而是通过其强大性能，对传统翻译能力体系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检验”与“祛魅”，使其多项核心能力的价值显著降低。

1. 语言转换能力的“规模化”替代

传统翻译教学的核心任务之一是培养学生精准、流畅的语言转换能力，涵盖词法、句法、文体风格等微观语言现象的精确操控。然而，大语言模型基于海量高质量语料训练而成，其内置的“世界知识”与语言模型使其在处理大多数规范性、信息类文本时，能够轻松达到甚至超越高级学习者的水平。例如，在翻译公司年报时，学生需掌握的商务术语、句式与格式，ChatGPT不仅能够瞬间提供标准译文，还可生成多种风格变体。在此情况下，投入大量时间进行重复性“技能演练”的边际效益已大幅降低。

2. 程式化技巧的“算法化”内嵌

翻译专业学生学习大量程式化技巧，如增译、减译、词性转换等。这些曾需教师点拨、学生领悟的“技巧”，如今已被大语言模型以算法形式内嵌于生成过程中。当学生仍在反复练习将中文无主句转为英文被动句时，人工智能已将其作为默认处理策略。这意味着，许多曾被视为“专业知识”的显性技巧，正逐渐转变为技术民主化的“公共品”，其作为专业壁垒的价值正在消失。

3. 工具应用能力的“代际”跨越

传统翻译能力框架中包含对特定工具（如Trados等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的操作能力。然而，大语言模型带来的是工具范式的代际跨越。基于规则与记忆库的传统工具，其交互逻辑与基于自然语言对话的大语言模型截

然不同。前者要求用户适应软件的固定流程,后者则要求具备通过自然语言引导人工智能的能力。这种范式转变,使得对旧有工具的精通在面对新工具时价值大打折扣。

传统能力体系的“失能”并不意味着语言基础不再重要,而是表明仅凭这些能力已无法构成翻译专业学生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我们必须在新的价值维度上,重新锚定“何以为能”。

三、重塑:构建以“智能素养”为核心的新能力框架

在解构的基础上,本文认为翻译专业学生的核心竞争力应从以“技能”为核心的旧模型,转向以“智能素养”为内核的新框架。该素养并非单一技能,而是包含四大核心支柱的综合能力体系。

1. 批判性评估能力:成为译文的“终极仲裁者”

作为新能力体系的基石,该能力旨在培养我们穿透人工智能译文“通顺性”表象,进行深度审视与裁决的能力。具体包括:

- (1) 事实谬误侦测:识别人工智能因“幻觉”而凭空生成或歪曲的事实信息;
- (2) 逻辑矛盾分析:发现译文在叙事逻辑与论证链条上的断裂或矛盾;
- (3) 文化适配性批判:判断译文在文化意象、价值观与社会规范层面是否与目标语境冲突;
- (4) 功能契合度评估:审视译文是否完美服务于特定交际场景,如法律合同、广告文案、文学作品等。

教学实现路径包括在课堂中引入“陷阱式”教学,即故意使用含隐藏瑕疵的人工智能译文,训练学生掌握系统性评估清单与批判性思维方法。

2. 策略性交互能力:从“执行者”到“架构师”

该能力要求学生精通与人工智能的“对话艺术”,即通过精密提示词,将模糊的翻译意图转化为可执行的高质量产出方案。这不仅是指令的简单传达,更属于一种策略性交互,具体表现为:

- (1) 上下文构建:为人工智能提供充足的背景信息、术语表与文体范例;
- (2) 角色扮演引导:通过指令使人工智能扮演特定角色(如“科技杂志资深撰稿人”),以约束其输出风格;
- (3) 迭代式优化:基于初始结果,通过追加指令实现持续优化与风格微调。

教学上可通过开设“提示工程工作坊”,借助大量对比案例分析,帮助学生掌握从“角色—任务—要求”三个维度设计高质量提示词的策略。

3. 人机协同流程管理能力:成为项目的“系统设计师”

未来的译者不再是翻译流水线上的“螺丝钉”,而应成为整个翻译项目的“系统设计师”。这要求其具备宏观流程设计与优化能力,具体包括:

- (1) 任务分解与分配:合理判断在哪些环节、针对何种文本类型使用人工智能,何处必须由人类介入;
- (2) 质量控制流程设计:建立涵盖人工智能初译、人类精编、交叉校验与最终审核的多层次质控流程;
- (3) 项目管理与效能评估:能够统筹协同项目的进度与资源,评估人机协作的最终效能。

教学可采用“项目式学习”,组织学生以小组形式完成真实复杂的翻译项目,并要求提交详细的“人机协同方案设计书”作为核心考核依据。

4. 技术伦理决策能力:担当技术的“伦理守门员”

在人工智能的“黑箱”面前,人类的伦理判断成为最后防线。译者必须成为技术应用的“伦理守门员”,具体能力包括:

- (1) 算法偏见识别:敏锐察觉训练数据中可能存在的性别、文化或种族偏见,并在译文中予以纠正;
- (2) 数据隐私与安全维护:在翻译过程中妥善处理敏感信息,严格遵守数据规范;
- (3) 责任归属与透明度声明:明确向客户说明人工智能的参与程度,并为最终产出的社会影响负责。

教学中可通过嵌入“伦理模块”,分析真实世界中的技术伦理失范案例(如人工智能招聘工具的性别歧视问题),组织伦理辩论,推动制定适用于本领域的《人机协同翻译伦理章程》。

四、学生角度:面向未来的翻译学习路径与自我赋能

面对大语言模型带来的深刻变革,翻译专业学生应如何调整学习路径,实现自我能力的迭代与重塑?本文从学生视角出发,提出以下五个方面的实践方向,以应对智能化时代的挑战,构建可持续的竞争力。

1. 学习目标的重新定位:从“技能掌握者”到“智能协同者”

学生需清醒认识到,单纯追求语言转换的“精准度”或“熟练度”已不足以构成核心竞争力。未来的学习目标应聚焦于成为能够与人工智能高效协作的“智能协同者”。这意味着:我们需要超越工具使用层面,深入理解大语言模型的工作原理与局限,建立对技术本质的认知;从被动接受知识转向主动构建能力,注重培养批判性思维、创造性解决问题与伦理判断力;树立“终身学习”意识,保持对技术发展的敏感度,持续更新知识结构与能力体系。需要注意的是,突出翻译价值的社会认知与评价强调翻译过程中“人”的主导地位和作用,明确人机协调、以人为本的发展原则^[2]。

2. 学习内容的拓展与深化:构建“语言基础+技术应用+翻译能力+专业知识”四维知识结构^[3]

我们应主动突破传统课程边界,构建跨学科、复合型的知识结构:语言与翻译基础仍需夯实,但重点应从重复性训练转向对语言本质、文化深层结构与跨文化传播策略的理解;系统学习技术素养课程,包括人工智能基础、提示工程、数据管理与分析等,提升与技术对话的能力;强化伦理意识与社会责任感,关注技术伦理、数据隐私、算法公平等议题,培养在复杂情境中做出负责任决策的能力。

3. 学习方式的主动变革:在实践中发展“人机协同”智慧

在人机协同过程中,人类介入时机和介入方式是影响人机协同效果的重要因素。人机协同翻译是译者与智能技术取长补短、相互协作、共同决策完成翻译实践的过程^[4]。我们应积极拥抱新型学习方式,在真实或模拟的实践中锻炼核心能力:积极参与项目式学习,在完整翻译流程中承担设计者、管理者与决策者角色,体验人机分工与协作;主动开展“提示词”实验,通过大量尝试、译后编辑提示与对比分析,掌握与AI高效沟通的策略与技巧;组建学习共同体,与同学开展案例研讨、译文互评与伦理辩论,在协作与碰撞中提升批判性思维与沟通能力。

4. 能力评价的自我反思:关注过程与思维,而不仅是结果。

我们应调整对学习成效的评价标准,更加关注能力成长的过程与维度:建立个人学习档案,记录在项目中的决策过程、与AI的交互历史与经验、遇到的挑战及解决方案,用于自我反思与优化;寻求多元反馈,不仅看重教师评价,也重视同伴意见,甚至尝试理解AI评估的逻辑,全面了解自身能力短板;重视“软实力”,在翻译过程中展现流程设计、尤其包括原文整合、翻译调优、质量评估项目管理在内的综合性编辑能力,而不仅仅是语言水平或翻译速度。

5. 职业观念的更新迭代:从“译者”到“语言服务架构师”

对于广大学生而言,机器翻译的“降维打击”可能导致工作机会锐减,生存空间持续压缩。除了及时升级技能、拥抱变革^[5],我们也可以拓宽对职业发展的想象,主动规划更具前瞻性的职业路径:探索新兴岗位,如本地化工程师、AI训练师、语言技术顾问、人机协作流程设计师等;培养跨领域竞争力,结合自身兴趣,补充如法律、医学、游戏、营销等特定领域的知识,形成“翻译+专业”的复合优势;树立“价值创造者”心态,不再视自己为简单的文本转换者,而是跨文化沟通的策展人、技术应用的反思者与复杂项目的协调者。

总结而言,面对大语言模型的浪潮,翻译专业学生唯有主动求变,从学习目标、内容、方式到评价体系乃至职业观念进行系统性升级,才能在人工智能时代创造不可替代的价值。这场变革不仅是挑战,更是实现个人能力跃迁、重塑专业身份的重要机遇。

五、结论

大语言模型带来的并非翻译专业的终结,而是一场推动教育回归本质的“创造性改革”。本文通过系统解构传统能力体系,并基于“智能素养”构建新框架,尝试对“何以为能”的时代命题作出建设性回应。

对学生而言,这场变革意味着学习范式的根本转变:从被动接受知识到主动构建能力,从追求技能熟练到培养智能素养,从适应固定岗位到创造新型价值。未来的翻译人才不应是疲于追赶机器的竞争者,而应是能够驾驭技术、赋予机器以“人文温度”的真正的“语言架构师”。

前路固然充满挑战,但这也是翻译专业学生在技术洪流中确立自身价值的必然选择。当我们从“何以为能”的焦虑转向“何以成人”的思考,便会发现:技术永远无法替代人类对意义的深度理解、对文化的敏锐感知和对伦理的自觉担当。这些人类独有的能力,正是我们在智能时代立足的根本,也是我们与机器共同进化的起点。

我们期待,通过能力的系统重塑,译者将能够自信地站在技术的肩膀上,以更广阔的视野、更深厚的素养和更清醒的自觉,在全球对话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既是翻译教育的未来,也是语言服务行业发展的希望所在。

参考文献:

- [1] 胡开宝,李娟.大语言模型背景下的翻译人才培养:挑战与前景[J].外语电化教学,2024,(06):3-7+105.
- [2] 张威,吕煜.翻译教育的概念界定与框架关系[J].上海翻译,2023,(02):42-48.
- [3] 张威.人工智能时代翻译专业面临的挑战与出路——基于一项大规模社会调查的分析[J].中国翻译,2024,45(05):139-148.
- [4] 杨艳霞,陈莹,魏向清.生成式智能时代的人机协同翻译素养研究[J].上海翻译,2025,(01):39-45.
- [5] 刘松.人工智能翻译与国际传播:现状、问题与展望[J].外语学刊,2025,(03):20-25.

“How to Remain Competent?”: Deconstructing and Reconstructing the Core Competencies of Translation Majors in the Era of Large Language Models

Chen Qiaoyun

Kashi University, Kashi, China

Abstract: The rise of generative large language models has fundamentally challenged translation education. This study addresses how translation majors can maintain their relevance by systematically analyzing the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competencies in the AI era. Findings show that the conventional model—relying on accurate language conversion, formulaic techniques, and limited tool use—is becoming obsolete. We propose a new framework centered on AI literacy, with four pillars: critical evaluation, strategic human-AI interaction, workflow management, and ethical decision-making. This research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updating translation education in the age of AI.

Keywords: Core Competence; Large Language Model; Translation Specialty; Intelligence Literacy; Ability Reconstruction

民国时期文艺作品中的嘉兴方言词汇研究

司琦琳¹ 邓彦¹ 孙婧宜¹

(1.嘉兴大学, 浙江 嘉兴 314001)

摘要: 本研究选取民国时期嘉兴籍作家的文艺作品当作主要语料来源, 采用文献搜集法、问卷调查法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办法, 以民国时期嘉兴方言词汇作为语言调查变项, 调查其语言变体在不同年龄群体的变异分布情况。调查结果发现, 与当代嘉兴方言相比, 部分特色词汇已经趋于消亡或者被普通话同化, 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在民间口语里依然保持着流传度。同时, 本研究通过调查受访者对嘉兴方言的语言态度探讨了嘉兴方言词汇变异的原因, 这为嘉兴方言词汇史的研究提供资料, 为方言资源的保护与传承以及语言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关键词: 嘉兴方言; 语言变异; 词汇研究; 民国时期

基金项目: 2024 年度嘉兴大学 A1 类 SRT 项目 (项目编号: 8517241355)

DOI: doi.org/10.70693/jyxb.v1i3.81

引言

吴语是汉语七大方言之一, 历史悠久且文化底蕴深厚, 嘉兴方言隶属于吴语太湖片苏沪嘉小片, 是承载嘉兴地方文化以及历史记忆的重要载体。民国时期是嘉兴人才辈出的阶段, 出现了茅盾、丰子恺、徐志摩、朱生豪等一批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学大家。他们在此地出生、成长, 其作品里自然地融入了大量带有浓厚乡土气息的嘉兴方言词汇, 成为研究当时语言生态的宝贵资料。本研究旨在通过对民国时期文艺作品中嘉兴方言词汇挖掘分析, 与当代方言使用情况进行比较, 以揭示其百年来的演变规律。

一、研究语料来源

本研究的语料来源主要是民国时期嘉兴籍作家的代表性作品中的词汇。中心语与修饰语倒置是民国嘉兴方言乃至整个吴语词汇系统的一大特征, 最典型的词汇就是“亮月”, 即普通话中的“月亮”, 这种结构在名词中尤为常见, 如“鸡公”、“菜干”等, 这种倒序构词法也反映出了吴语底层语言的某些结构残留。

为了挖掘嘉兴词汇变异程度, 与民国时期嘉兴词汇更好地进行比较, 本文以“灼人的烈日”、“月亮”、“刮风”作为嘉兴方言词汇调查的三个语言变项, “毒日头”“大太阳”“毒太阳”为“灼人的烈日”变项的语言变体, “月亮”“亮月”为“月亮”变项的语言变体, “起风”“发风”为“刮风”变项的语言变体; 分别调查了这三个语言变项的不同变体在年龄、性别、职业群体的分布。同时, 本研究还设计了“嘉兴方言使用情况调查问卷”, 收集了当代嘉兴居民的方言词汇使用情况的相关数据以及他们对方言的态度看法, 进一步探析嘉兴方言词汇变异的原因。

二、民国嘉兴方言词汇调查与变异情况

2.1 词汇的变异与存续

语言是流动的, 一个世纪以来,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的流动以及普通话的推广, 嘉兴方言也经历了深刻变迁。一个语言变项总是有它特定的出现环境。所以对一个语言变项的描写, 总要包括其结构环境以及其具体实现的形式。这些形式就称为“变式”。为了更直观地展示词汇层面的变化, 我们选取了民国时期部分典型词汇, 将其在民国时期的用法与当代调查结果进行对比:

作者简介: 司琦琳(2003—), 女, 本科, 嘉兴大学文法学院汉语言文学学生;

邓彦(1982—), 女, 博士后, 讲师, 博士, 研究方向为社会语言学、城市方言调查、语言规划;

孙婧宜(2006—), 女, 本科, 嘉兴大学文法学院汉语言文学学生。

表 2.1 变项“灼人的烈日”年龄分布统计表

变体	占比	年龄段		
		选项	频数	百分比
毒日头	51.0%	60岁及以上	48	51.0%
大太阳	25.0%	36-59岁	15	32.6%
毒太阳	21.7%	19-25岁	12	30.0%

“毒日头”属于颇具特色的方言表述，“日”有入声发音短促的特点，从图表 2.1 可以得知，“日头”为“太阳”的方言用词，使用范围较为广泛。而在三个变体中，“灼人的烈日”的变体“毒日头”使用比例最高，且年龄大多在 60 岁的老年人群体。“大太阳”和“毒太阳”在构词方面已接近普通话，使用群体多为中青年，占比分别为 25.0% 和 21.7%。可见，“灼人的烈日”这一词汇的老派变体仍为老年人群体所使用，词汇的变异主要发生在中青年群体。

表 2.2 变项“月亮”年龄分布统计表

变体	占比	年龄段		
		选项	频数	百分比
月亮	50%	36-59岁	26	28.2%
亮月	49.4%	60岁及以上	24	26.3%

表 2.2 数据显示，“亮月”主要为 60 岁以上的务农人士与个别新嘉兴人使用，并没有彻底消失，且使用比例接近一半为 49.4%，这体现出普通话的强大影响力以及方言的坚韧性；但同时另一变体“月亮”的使用比例为 50%，已逐渐超越老派词汇“亮月”也说明嘉兴民国时期方言倒序词“亮月”大体上已经被现在普通话词序的“月亮”所替代。

表 2.3 变项“刮风”年龄分布统计表

变体	占比	年龄段		
		选项	频数	百分比
起风	71.7%	19-25岁	31	23.4%
		60岁及以上		
发风	23.3%	19-25岁	14	32.5%

无论是新、老派均主要使用“起风”作为“刮风”方言描写，说明“起风”作为典型的吴语词汇，在嘉兴地区有着较为广泛的使用情况。但有一部分青年人使用“发风”，说明不同年龄段人群成长环境和语言接触不同，老一辈可能受方言影响更深。60 岁以上人群相较 19-25 岁人群，对传统方言词“起风”认同度更高，说明方言保留度随年龄递增。

2.2 变异的特点

综合整理问卷调查数据可以看出，不同社会因素对嘉兴方言动词变异的影响各不相同，年龄因素是影响词汇变异的最大变量，性别的影响较小。

60 岁以上群体对传统方言词汇的保持率较高，20-30 岁群体较低且变异情况明显，显示出了明显的代际差异。教育程度也呈现出一定的影响，高学历群体虽然在日常使用中更多采用普通话表达，但对方言文化价值的认知度更高，说明了文化传承的重要性得到了社会的认同。同时，居住环境导致的差异显著，农村地区方言词汇使用频率比城市地区高。职业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从事教育、文化工作的群体对方言传承的重视程度明显高于其他行业。

从以上调查研究数据可以看出，嘉兴方言词汇的演变呈现出几种特点：首先是取代型，就拿“亮月”来说，普通话的词序以及词形大体上把方言里特有的倒序词给取代了，这类倒序词只在少数情形下才会出现，正逐渐走向消亡。其次是并存竞争型，以“霍闪”与“闪电”为例，方言特色词汇与普通话词汇在口语当中同时存在，使用者会依据语境或者个人习惯来做出选择，这恰好证实了问卷里“二者相互渗透，长期共存”的看法。再次是传承型，以“明朝”、“日脚”为例，虽然这些词汇在普通话里有相对应的词语，然而因为其使用频率较高、文化根基深厚，在方言里依旧保持着很强的稳定性，成为嘉兴方言的核心词汇。最后是内部差异型，以“毒日头”和“大太阳”为例，方言内部同样存在着不一样的表达方式，这或许跟城乡或者代际差异有关。

三、嘉兴方言词汇变异的原因分析

嘉兴方言的词汇系统朝着与普通话深度交融的方向发展,其独特的传统词汇将进一步萎缩,保留在特定语境和老年人口中,整体上将呈现出一种“普通话框架下的吴语地方变体”特征。本文将从语言地位、语言功能、语言情感对嘉兴方言变异原因进行进一步分析。

3.1 嘉兴方言的语言地位

方言的社会地位并非语言本身固有属性,而是由社会、经济、政治等因素共同建构的。虽在功能上不可或缺,却常被视为“低势”的“低”变体。为了解嘉兴方言语言地位,笔者在问卷中分别设计了“您认为嘉兴方言的地位如何?”、“您认为嘉兴方言有用吗?”和“您认为嘉兴方言在传承地方文化中的重要性如何?”这三个问题。

如表3.1所示,虽然绝大部分受访者认为嘉兴方言是重要、有用的,但仍有7.1%的受访者持消极态度。部分人可能受社会、经济等外部因素影响,认为在当下的交流环境中,嘉兴方言的作用有所弱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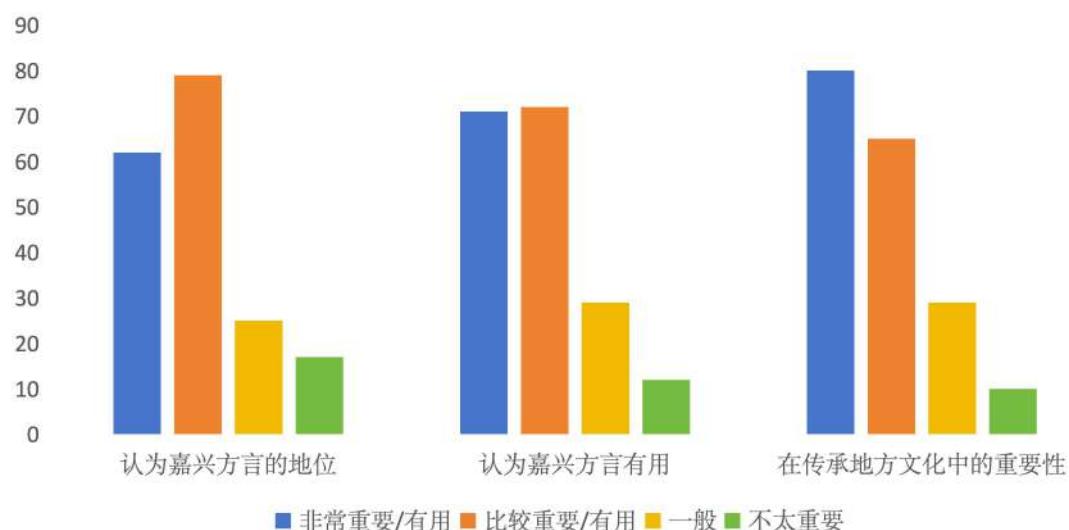


图 3.1 对嘉兴方言的语言地位的评价

3.2 嘉兴方言的语言功能

为了解受访者对嘉兴方言语言功能的评价,笔者设计了“您认为嘉兴方言有哪些功能?”的问题。如图3.2所示,整体上来看,受访者普遍认为嘉兴方言的语言功能以交际功能为主,有最多人认可“老一辈使用的交流方式”观点,说明嘉兴方言在老一辈群体的日常交流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承载着嘉兴人的交流习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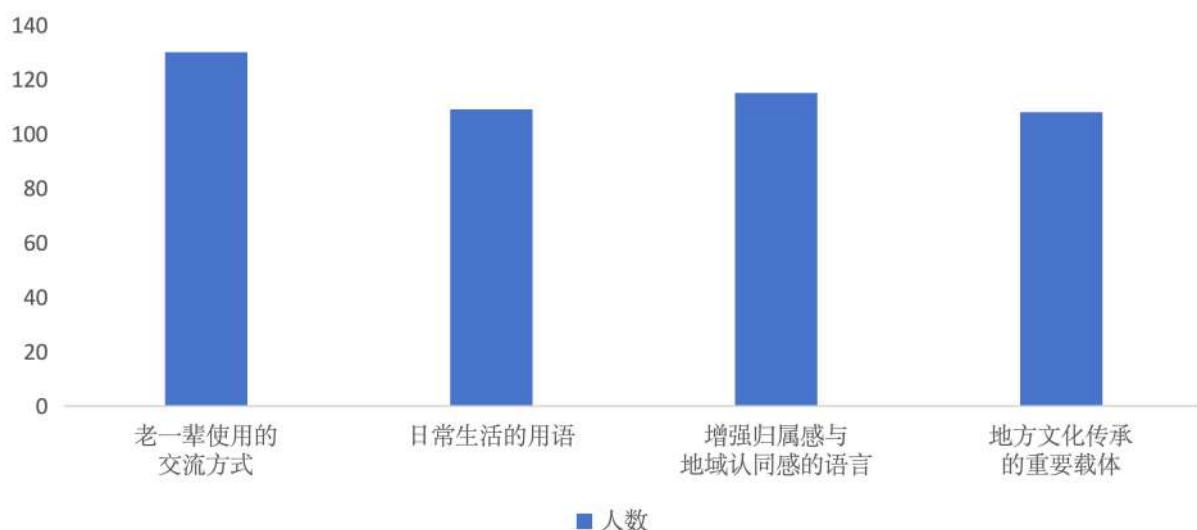


图 3.2 对嘉兴方言的语言功能的评价

3.3 嘉兴方言的语言情感

根据调查显示,有25.0%的受访者表示,对于嘉兴方言“一般喜欢但不太了解,不能掌握”、“没有太多情感,与方言使用者间存在沟通障碍”。这反映出部分人可能因为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城镇与农村的社会环境与常驻人口差异不断扩大,方言使用环境与接触较少等原因,对嘉兴方言的熟悉度和运用能力不足,甚至产生交流隔阂,体现出嘉兴方言在情感认同和实际掌握运用上存在一定的群体差异,而方言也在交流与传播的过程中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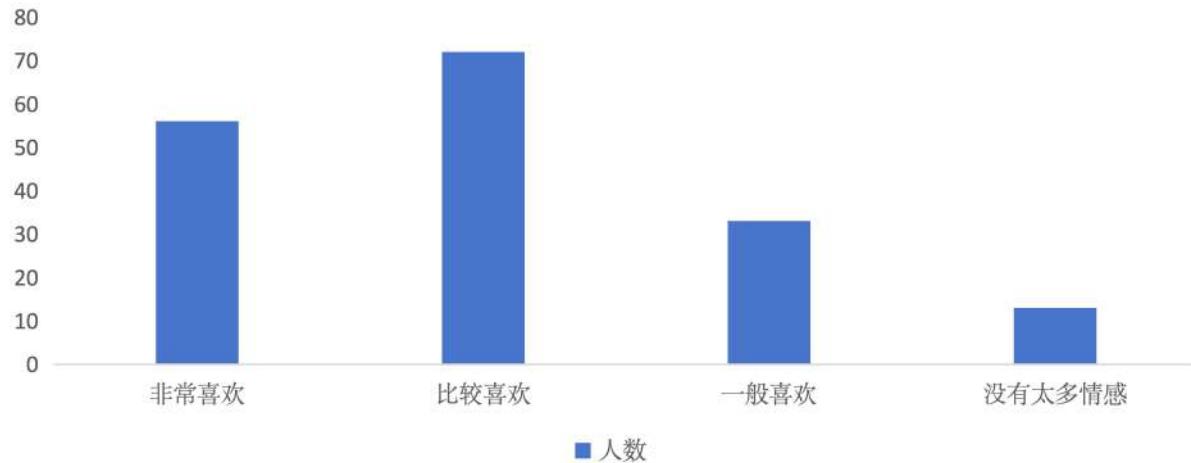


图 3.3 对嘉兴方言的语言情感的评价

总结“嘉兴方言使用情况调查问卷”的统计结果,当代嘉兴居民对方言的态度呈现多元态势,问卷数据显示,主要使用人群仍以“老嘉兴人”(父辈或祖辈即为嘉兴人)为主,他们在日常交流中会更频繁地使用方言。但在方言的未来发展上,观点出现了显著分化,接近47.2%的受访者认为未来将是“一部分嘉兴方言消失,一部分嘉兴方言与普通话长期共存”的局面,而约16.6%的受访者认为“嘉兴方言会逐渐消亡,被普通话取代”,这种认知分歧的背后,是词汇变异的客观现实。影响词汇变异的最大因素首先就是普通话的普及与社会流动的加剧,其次是年龄代际、城乡差异等社会语言学变量,如以年轻一代和城市居民为代表的新派就会更倾向于使用普通话词汇,而老一辈和乡镇居民则更多保留传统方言词。另外,通过问卷数据可以发现学历水平与对方言传承重要性的认同度呈现正相关,在问卷中,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受访者普遍认为方言传承“非常重要”,这与以往部分调查中高学历人群对方言情感较为疏离的结论不同,反映出随着文化自信的提升,方言作为文化遗产的价值正得到更广泛的社会认同。

四、结论

词汇的变异与演替现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城镇化进程以及普通话的全面推广,这些因素打破了传统方言传播范围的封闭性,使得语言接触更为频繁,从而加速了方言词汇系统的演变。面对嘉兴方言词汇的流变现状,单纯的记录已显不足,亟待实施一些保护与传承措施:在政策层面,可以通过地方政策或制度手段,推进普通话与方言“双语共生”的和谐发展;在社会文化层面,可以借鉴其他地区的成功经验,出版方言教材,开设具有地方特色的语言广播电视节目,并将方言与民间歌谣、地方戏曲等文化形式相结合,提升其社会地位与文化内涵;在教育层面,学校尤其是幼儿园和小学,应承担起方言传承的责任,通过营造良好的语言环境或开设方言兴趣课程,让年轻一代能够听懂并会说嘉兴方言,为方言的传承注入新动力。

综上,本文为民国嘉兴方言研究提供了资料以及系统性分析,弥补了相关领域的研究空白,同时借助古今对比,直观呈现了方言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演变规律,这对重新认识方言文化价值以及科学制定语言保护政策有着关键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但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像语料来源主要局限于书面文学作品,或许无法完全囊括口语全貌,问卷调查样本量也有限。期望未来的研究能基于此,拓展语料范围,结合语音、语法等层面,开展更宏观的历时与共时比较研究,从而可以更全面地重现吴语地区百年语言面貌。

参考文献：

- [1] 游汝杰.吴语方言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8.
- [2] 游汝杰.汉语方言学教程(第二版)[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6.
- [3] 徐越.嘉兴方言[M].北京:方志出版社, 2016.
- [4] 王福堂.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M].北京:语文出版社, 2005.
- [5] 张南庄.何典[M].北京:学林出版社, 2005.
- [6] 袁家骅.汉语方言概要 (第二版) [M].北京:语文出版社, 2003.
- [7] 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 1956.
- [8] 王翼之.吴歌乙集[M].广州: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 1928.
- [9] 葛世瑶, 伍长春, 张怡超, 等. 嘉兴方言的使用现状与保护传承[J].嘉兴学院学报, 2017, 29(02):93-97.
- [10] 唐惠华. 嘉兴方言与普通话接触现象及特点研究[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下旬刊), 2013, (08):169-171.
- [11] 沈飞燕, 刘晓蕊. 嘉兴方言形容词复杂形式及形容词与程度副词的搭配问题——兼论其与普通话的相关比较[J]. 商业文化(下半月), 2011, (11):249-250.
- [12] 徐越. 地理语言学视角下的浙北杭嘉湖方言[J].江西社会科学, 2007, (11):178-181.
- [13] 徐越. 杭嘉湖方言语音研究[D].北京语言大学, 2005.
- [14] 徐大明.语言变异与变化[M].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6.

A Study of Jiaxing Dialect Vocabulary in the Republican era in China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

Si Qilin¹, Deng Yan¹, Sun Jingyi¹

(*1.Jiaxing University, Jiaxing Zhejiang,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selects the literary works of Jiaxing-born writers from the Republican era in China as the primary corpus. Using a combination of documentary collection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s—integrating both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pproaches—we treat Jiaxing dialect vocabulary of the Republican period as the linguistic variable under investigation. The survey examines the distribution of linguistic variants across different age groups. Results indicate that, compared with contemporary Jiaxing dialect, several characteristic lexical items have either disappeared or been assimilated into Standard Mandarin, while a considerable portion remains prevalent in everyday spoken language. Moreover, by analyzing respondents' attitudes toward the Jiaxing dialect, the study explores the factors driving lexical variation. These findings provide empirical material for the historical study of Jiaxing dialect vocabulary, and offer references for the preserva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dialect resources as well as for the formulation of language policies.

Keywords: Jiaxing dialect; Language variation; Lexical research; the Republican era in China

思想政治教育课程议题式教学实践研究思考

王艺璇

(锦州医科大学, 辽宁 锦州 121001)

摘要: 议题式教学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改革的重要实践范式, 其核心在于通过具有探究性的议题设置, 引导学生实现从知识接受者到思维建构者的角色转变。研究指出, 有效的议题设计应锚定理论难点与社会热点交汇处, 构建“问题链-情境链-活动链”三位一体的教学逻辑, 通过结构化辩论、多源文本分析、反思性写作等路径, 驱动学生在认知冲突中实现概念重构与价值内化。议题式教学在实践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 部分教师未能摆脱“灌输式”的教学模式, 学生的主体意识淡薄。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和培养学生参与教学的意识和能力等途径来解决, 进而增强议题式教学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 思想政治教育, 议题式教学, 实践研究

DOI: doi.org/10.70693/jyxb.v1i3.83

一、思想政治课程议题式教学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议题式教学已成为我国新一轮课程改革所提倡的一种新的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目前, 很多学校都开始尝试运用议题式教学进行课堂教学, 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但在实际的教学实践中, 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我们需要对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

(一) 高中思想政治课程议题式教学的问题分析

1. 教师未能摆脱“灌输式”的教学模式

“理念引领行为”, 教育观念对教学活动的组织与执行有着深远的影响。新课改的推进, 大量新的理念被引进到了课堂上, 推动了教育的变革。议题式教学就是顺应这种趋势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教学方式。然而, 在高中思想政治教学中, 存在着一些问题。由于受到传统教学理念、高考指挥棒等因素的制约, 使得议题式教学并未得到充分的运用。其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 一些教师过于重视“灌输式”的教育, 习惯了“我说, 你听”、“听指挥”等传统教学模式, 使学生陷入了学习的消极局面, 失去了学习的主动性、独立性和建构性。

第二, 一些教师受到“灌输式”的教育理念的影响, 将议题式教学看成是一种可以选择的活动, 只是一种“摆设”而不愿用于课堂。

第三, 一些教师仍有一些错误的教育理念, 如“一言堂”、“满堂灌”。在高中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施议题式教学过程中, 常常忽略了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角色。整节课下来, 同学们都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 而教师长期采用的这种方式并不能很好地促进学生的整体素养的提升, 无法反映出议题式教学在高中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价值。

第四, 议题的重复率较高, 缺乏具体的教学目标。议题式教学以议题为核心, 更好地达到了教学目的, 提升了教育的有效性, 而具有探索性和实用性的议题则可以引领着整堂课的教学。然而, 当前许多教师在议题的选择上存在着一定的偏差, 导致议题的创新性不足。议题的重复率主要体现在: 议题太具有理论性, 议题的内容超过了学生的认识水平, 使得他们很难用目前的思考能力进行高效的探讨, 使得议题丧失了“议”的可能性。因此, 议题要与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适应。许多教师在选择议题的过程中, 没有考虑到学生的具体情况, 挑选了许多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的过时话题, 这就造成了他们对议题的参与程度和热情都不高, 使得议题的探讨变得只是一种形式。

2. 学生的主体意识淡薄

作者简介: 王艺璇 (2002-),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通讯作者: 王艺璇

长期以来，学生都是采用了“教师讲、学生听”的传统教学模式，而在思想政治课的议题式教学中，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被激发出来，使学生能够更好地参与到课堂中来。而在具体的教学中，“学生”这一主体出现了一些问题。

第一，学生对于教师布置的课前任务，有的同学是不愿意参加的，认为很麻烦，即使不准备上课时候教师也会讲，干脆等教师给答案。有的学生即使准备了，也是敷衍教师，准备得并不充分，当教师提出问题后，学生不理解教师所提出的问题，也就无法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从而影响到议题式教学所期望的效果。

第二，在不同的话题下，同学们的学习热情也会有所不同。只有遇到他们感兴趣的议题，他们才会积极配合。所以教师在准备新课的时候，可以选用与学生生活相关的议题，调动他们参与课堂的积极性。

第三，在传统的课堂上，教师只会讲知识，学生只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知识的倾听者，只会作简单的记录，在课堂上进行一些习题的训练。因此，在学生看来，学习仅仅是把自己的笔记记下来，把知识背下来，在上课时过于依靠教师的讲解，很少有自己的思想。在课堂教学中，即便是教师让他们进行独立的思考，也难以让他们快速地融入到问题情境中。

第四，学生缺乏课堂表达能力。以学生为主体的议题式教学要求同学们仔细搜集相关的信息，积极发表自己的看法，积极参与课堂讨论，积极思考，勇于发表意见，变消极接受为积极探索。所以，教师平时就要注重对学生表达能力的训练。

（二）高中思想政治课程议题式教学问题的原因分析

1.教师专业素养不足

在高中思想政治教学实践中，如何有效地开展议题式教学，是当前教学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第一，部分高中思想政治教师对议题式教学的认识上出现了误区。例如，有的高中教师把议题式教学看成是一种普通的教法；有的高中教师把议题式教学看成是一种简单的教育方式。这些都会使对议题式教学的理解陷入误区。

第二，部分高中思想政治教师在实施议题式教学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在教学工作中，一些教师普遍对“议题”这一观念存在误解，有的甚至把“议题”当作“案例”来看待。在进行议题式教学的过程中，通过讨论分析能够有效地改善课堂效率，进而使高中思想政治教师的授课水平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第三，在高中思想政治课议题式教学的应用中，议题式教学对于教师的要求较高。议题式教学的议题准备阶段长、议题信息丰富、情境创设灵活、课堂把控能力强和组织能力强等，这些都要求教师具备一定的教学能力和基本素质。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语言艺术与评价技能；缺乏专业素养，让许多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师放弃议题式教学。

2.学生参与积极性不高

学生参与积极性不高主要有如下两点原因造成：

第一，在应试教育的作用下，很多学生都想要取得一个理想分数，考上一个好大学。因此，他们在日常学习中，只是学习与考试相关的内容，在课堂上听讲，然后等着教师给出正确的答案。久而久之，就会养成不愿意动脑的毛病，也不会有强烈的参与意识。

第二，学生自学能力差，合作精神差。虽然在议题式教学中，教师会给他们安排一定的讨论工作，但他们并没有进行相应的交流沟通，每个人都只认同自己的观点，忽略了小组成员，没有聆听其他学生提出的合理建议，难以取得一致的意见。

二、高中思想政治课程议题式教学的优化策略

在高中思想政治课堂中，面对上述问题，高中思想政治课议题式教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何使思想政治课议题式教学发挥其最大效用，还需师生的共同努力。

（一）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

1.改变传统理念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高中思想政治教师的教育理念会影响教师的教学行为，会直接体现在高中思想政治课堂教学之中。

第一，高中思想政治教师必须转变传统的教学观念和教学方法，树立以学生为本的教育观，注重对学生的思考和创造力的发展。与此同时，教师也必须改变自身的角色，成为课堂引导者和组织者。只有这样，才能使课堂教学更加有效。教师不仅要传道、授业、解惑，还要对学生加以引导和帮助、与学生良性互动、处理好知与能的关系。教师不仅教给学生知识，还要教会他们怎样学，是既能“鱼”也能“渔”。同时还要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做到因材施教。结合高中思想政治课标准要求、教学内容、学生的实际情况，创设学生喜闻乐见的教学情景等，从而提升学生的自学水平，最大限度地发展了每一个学生的性格特点，增强了他们的学习热情和主动性。

第二，高中思想政治教师对议题的选取，将会对课堂的整体质量产生重要的作用。在进行议题式教学前，要根据课程标准和教学目的等因素，选取与教学内容相适应的议题。教师在进行议题式教学时，应该引导学生结合议题以及所学知识对本节的教学内容进行理解与掌握，让学生从被动地听转换为主动地学。

为此，高中思想政治教师要突破以往“一言堂”的授课模式，转变“灌输式”的观念，对自身的教育观念进行了更新，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教师则以引导者的身份参与课堂。

2.学习相关的理论知识

“没有掌握先进的教学理论，难以在课堂教学中用好先进的教学方法。”议题式教学的特点符合新时代课程改革的基本要求，也符合学生的认知水平。因此，议题式教学历来受到很多人的推崇。对于高中生而言，他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所以，在高中思想政治教学中应用议题式教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要使高中思想政治课取得好的教育效果，就必须加强对议题式教学的研究。

第一，要利用各种方式进行议题式的教学。例如，要通过阅读有关的书本、参考最新的研究结果、主动参与议题式教学的学术报告会、教研等，并且要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对其进行归纳和思考。同时，高中的思想政治教师除了要掌握议题式教学的有关理论之外，也应该和其它教师开展沟通和讨论，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别人的教学经历进行共享，这样才能让我们更好地认识议题式教学，使它在高中思想政治课堂上更好地应用。

第二，在研究议题式教学的过程中，要加强自己的认识，提高自己的认知水平。因为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是一门学科内容的综合，因此，在课堂上，教师一定要从不同的领域选择最合适的议题来开展教学，比如政治、经济、文化等。因此，高中思想政治教师既要具有深厚的专业素养，又要具有广阔的知识面。在日常生活中，教师要多读书，多听有关专业的专业知识，多看一些有关专业的文献，多看一些有关政治的新闻。这样，教师们就可以更好地把议题和教科书上的知识联系起来，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有效性。

3.善于反思和总结

常虎温（2016）指出：“教学反思是指在正、反两个层面上，对自身的教育教学情景、事件和价值等进行多种不同的思考，来认识和了解自身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其重要性，持续地对自身的教育教学活动进行主动地介入，寻找提高教学质量的途径，以此来推动教师的专业化发展”。^②在此基础上，教师进行了“内视”、“自省”和“交流”。

第一，教师应以己为镜，反省自己。王陆、张敏霞（2012）认为：“自省是一种以内心对话为基础进行的反省行为”。^③在进行教学反思时，要做好相关的工作。课堂结束后立即回顾本课教学过程，思考整个课堂的优点和缺点。通过对学生的学习状况进行调研与归纳，发现了自己在课堂上存在的不足之处，从而在自我反省中获得进步。

第二，教师应以人为镜，进行集体反思。在进行教学反思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将自己和身边的教师进行比较，分析他们的优点，以及学习如何提高自己教学水平的方法。同时，还可以和其他学科老师的教学活动相比较，找出自己的不足并加以改进，从而提高自己应用议题式教学的能力。

（二）培养学生参与教学的意识和能力

1.转变学生学习习惯

刘慧玲指出（2019）：“长期以来，在应试教育的熏陶下，很多同学已经养成了只知道和高考有关的知识，养成了教师直接授课的学习理念。”^④这就导致了学生不喜欢动脑思考，习惯了等着教师给答案，完全接受教师的讲解。在高中思想政治课堂上，要取得良好的课堂教学效果，就必须引导学生改变自己的学习方式，培养学生的自主思维和自主学习能力。

在此基础上，学生除了要在教学过程中掌握教材里的内容外，还要掌握与课程紧密相关的相关知识。在学习方式上，教师要引导学生形成良好的自学能力。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明确学生是课堂的主体，引导学生树立主人翁的意识。

2.调动学生积极性

教学是一种师生互动的行为，不能只是教师的单向输入，而要让学生完全投入其中。

“爱好胜过一切”。在此基础上，教师要充分利用议题式教学的优势，了解学生在思想政治课学习中的真实感受，从而有针对性地选取他们所关心的议题进行课堂教学。一方面，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如：分角色扮演再现真实的生活情景，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教学的有效性。另外，在学习过程中要注重对学生进行恰当的引导，例如：引导学生积极回答问题；对议题的分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同时要注意联系实际，让

^② 常虎温.教学反思刍议[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6,36(11):58-59.

^③ 王陆,张敏霞.教学反思方法与技术[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69.

^④ 刘慧玲.案例教学法在高中思想政治课运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 2019:28.

学生敢于说真话，勇于表达自己的见解。另一方面，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要幽默，可以通过“笑点”来调节课堂的氛围，避免因为上课氛围太过严肃而让学生产生紧张的情绪，从而激发出学生对参与议题式教学的热情。为了使学生更加积极地参加到课堂上来，教师可以采用鼓励的方式，在表扬成绩好的同学的同时，也不能忽略成绩平平的同学，要增强他们的自信，使他们也能够完全融入到课堂之中。

3. 提升学生能力

在议题式教学中，学生能准确地掌握并分析总议题对议题教学效果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一，培养学生的自主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议题式教学是一种开放式、互动型教学。在教学过程中，可以让同学们对高中思想政治课中所包含的知识有一个更加深刻的了解，从而提高他们独立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首先，要改变传统的教育方式，理论联系实际，加强学生对应用所学理论的认识，提高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其次，要增强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交流。最后，要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

第二，培养学生的小组协作精神和能力。在教学课堂上，培养小组协作的意识和能力对提高课堂的效率有着重要影响。首先，在小组讨论中，学生要主动表达自己的观点。学生在与他人发生分歧时，要懂得尊敬、倾听、分析他人的观点，吸取他人观点中的有益成分。其次，在分配任务的时候，还要注重小组成员之间的分工，让每个成员都能做出自己的贡献。此外，在课堂上，教师要重视提问，使每一个学生都能参加到课堂中，并且可以根据问题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对策，以提升教学的有效性。最后，学生要不断学习新的知识，拓宽自己的思路，为小组合作学习做好充足的准备，这样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达到最大程度地达到预期效果。

三、结论

在新课改不断深入的背景下，高中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方法进行了相应的改革。议题式教学有利于强化学生主体地位，培养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以及提升学生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所以在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中，议题式教学成为有效的教学方法。

高中阶段对学生而言是个重要的时期，这个时候他们需要更多的知识来充实自己。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能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议题式教学这种新的教学方式不仅能够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而且还能拉近师生之间距离，使课堂变得更加生动形象，这对于提升高中思想政治课的育人价值具有重要意义。由于自身知识能力水平与教学实践经验有待提升，因此本文存在诸多不足，所分析总结出的策略也不甚完善，许多内容仍需在以后的学习与研究过程中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 (2017年版 2020年修订) [S].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
- [2] 沈雪春,梁英姿,柳翠.设计与优化:思想政治课议题式教学叙事 (〈政治与法治〉) 分册[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21.
- [3] 常虎温.教学反思刍议[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6,36(11):58-59.
- [4] 刘慧玲.案例教学法在高中思想政治课运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D].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 2019:28.
- [5] 王陆,张敏霞.教学反思方法与技术[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 [6] 钱美娜.素养视角下议题式教学的实践路径[J].文理导航(上旬),2023(05).

Thoughts on the Practice Research of Topic-based Teaching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urses

Yixuan Wang

(College of Marxism, Ji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Jinzhou Liaoning)

Abstract: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ractical model in the re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urses, issue-based teaching focuses on guiding students to transform from knowledge recipients to thinkers through the setting of exploratory issues.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effective issue design should be anchored at the intersection of theoretical difficulties and social hotspots, and construct a three-in-one teaching logic of "problem chain - context chain - activity chain". Through structured debates, multi-source text analysis, and reflective writing, it drives students to achieve concept reconstruction and value internalization in cognitive conflict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practice of issue-based teaching. Some teachers have not yet escaped the "indoctrination" teaching model, and students' subject consciousness is weak. These problems can be solved by enhancing teachers' professional qualities and cultivating students' awareness and ability to participate in teaching, thereby enhancing the teaching effect of issue-based teaching.

Key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sue-based teaching; Practical research

数智赋能高校足球个性化教学模式的实践路径研究

乔伟¹ 项和平¹ 王逸¹

(1.安庆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 安徽 安庆 246133)

摘要:随着我国科技的快速发展,数智技术已广泛渗透至教育的各个方面,高校体育教学的数智化转型已在不断发展,数智化技术为高校足球个性化教学带来了新的机遇和解决方案,数智化赋能高校足球个性化教学模式的研究,对于提高高校足球教学质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立足于当前高校足球教学的现状,详细阐述数智化赋能高校足球个性化教学模式的实践路径,并探讨利用数智化技术优化足球教学的个性化教学,为高校足球教学的实践者提供参考与启示。

关键词:数智; 高校; 足球; 个性化教学

基金项目:安徽省规划办项目(安徽省中小学校园足球发展模式的实证比较与创新研究,AHSKY2022D186);安庆师范学校重点课题(SK202407ZD)

DOI: doi.org/10.70693/jyxb.v1i3.82

一、引言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的飞速发展,数智化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日益深入,推动着教育模式的变革与创新。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推进教育数字化”战略部署,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融通发展^[1]。信息技术在推动教育现代化起着重要作用,为高校体育教学的数智化转型提供了政策支持与方向指引。足球在高校体育活动中是深受学生喜爱的运动项目,然而,当前高校足球教学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教学方法较为传统,大多采用“一刀切”的模式,难以满足不同学生在足球基础、身体素质、兴趣爱好和学习目标等方面的个性化需求,导致部分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教学效果不尽如人意^[2]。在场地与师资方面,也存在着资源紧张的状况。许多高校的足球场地有限,限制了教学活动的开展和学生的训练时间;同时,专业足球教师数量不足,教师的教学负担较重,影响了教学质量的提升。此外,教学评价方式单一^[3],往往侧重于技能考核,忽视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努力程度、进步幅度以及态度等方面的评价,无法全面、客观地反映学生的学习情况和发展潜力。

数智化技术为高校足球个性化教学带来了新的机遇和解决方案,数智化赋能高校足球个性化教学模式的研究,对于提高高校足球教学质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数智化与高校足球个性化教学概述

(一) 数智化技术的内涵与应用领域

数智化技术是数字化与智能化的深度融合,是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等先进技术的加持下,实现对数据的智能分析与应用^[4]。在体育领域,数智化技术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运动员训练方面^[5],借助运动传感器、可穿戴设备等技术,能够实时采集运动员的运动数据,如心率、速度、加速度、运动轨迹等,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教练可以全面了解运动员的体能状况、技术动作特点和训练效果,为运动员制定个性化的训练计划,提高训练的科学性和效率。

(二) 高校足球个性化教学的概念与目标

高校足球个性化教学是指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异^[6],包括足球基础、身体素质、兴趣爱好、学习风格和发展目标等,量身定制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评价,以满足不同学生在足球学习过程中的多样化需求,促进每个学

作者简介: 乔伟(1988-),男,硕士,讲师,足球教学与训练。

项和平(1978-),男,硕士,副教授,足球教学与训练;

王逸(1998-),男,硕士,助教,体育教学;

通讯作者: 乔伟

生在足球技能、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和社会适应能力等方面全面发展。这种教学模式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关注学生的个性特点和发展需求，摒弃传统“一刀切”教学模式的弊端，致力于为每个学生提供最适合的足球教育。

（三）数智化赋能高校足球个性化教学的理论基础

学习分析理论为数智化赋能高校足球个性化教学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持和分析方法^[7]。该理论通过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数据，如学习行为数据、学习成绩数据、社交互动数据等进行收集、分析和挖掘，能够深入了解学生的学习过程和学习特点，发现学生的学习需求和潜在问题。在高校足球教学中，利用学习分析技术，可以收集学生在足球训练、比赛中的技术动作完成数据、体能消耗数据、战术执行数据等，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精准评估学生的足球技能水平、体能状况和战术理解能力，为制定个性化的教学计划和训练方案提供科学依据。例如，通过分析学生的射门数据，发现某些学生在射门时存在发力不足、射门角度选择不当等问题，教师可以针对这些问题为学生提供有针对性的训练指导，帮助学生改进射门技术。

个性化学习理论强调以学生为中心，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异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支持和指导，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8]。数智化技术为个性化学习理论在高校足球教学中的应用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能够构建个性化学习模型，根据学生的学习目标、学习进度、知识掌握情况和兴趣爱好等因素，为学生推荐个性化的学习内容和学习路径。例如，对于足球基础较好、有较高竞技目标的学生，可以推荐一些高级的战术训练课程和高水平的比赛视频，帮助他们提升战术素养和比赛经验；对于足球兴趣浓厚但基础较薄弱的学生，则可以推荐一些基础技能训练课程和趣味性较强的足球教学资源，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逐步提高他们的足球技能。

三、高校足球教学现状及数智化应用困境

（一）高校足球教学的现存问题

在教学方法上，许多高校仍采用传统的集体授课方式^[9]，教师在课堂上统一讲解动作要领、示范技术动作，然后组织学生进行集体练习。这种教学方法忽视了学生个体之间的差异，无法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例如，对于足球基础较好、接受能力较强的学生来说，这种统一的教学进度和内容可能过于简单，无法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潜力；而对于足球基础薄弱、身体素质较差的学生，则可能难以跟上教学节奏，导致学习困难，逐渐失去对足球学习的信心。传统教学方法缺乏互动性和趣味性，主要以教师为中心，学生被动接受知识和技能，难以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思维。

（二）数智化在高校足球教学中的应用现状

当前，数智化技术在高校足球教学中的应用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已经在一些方面得到了初步的探索和实践。部分高校开始引入智能穿戴设备，如运动手环、智能足球鞋等，用于监测学生的运动数据。这些设备可以实时采集学生的心率、运动轨迹、跑动距离、速度、加速度等数据，并通过蓝牙传输到配套的手机应用程序或电脑软件中。教师可以通过这些数据了解学生在训练和比赛中的体能消耗情况、运动强度是否合理，以及技术动作的运用是否规范等，从而为学生提供更科学的训练建议。例如，当发现某个学生在训练中心率过高，持续时间过长时，教师可以及时调整训练强度，避免学生过度疲劳，预防运动损伤的发生。

一些高校还利用视频分析软件辅助足球教学。通过在足球场上安装高清摄像头，录制学生的训练和比赛视频，然后使用视频分析软件对视频进行分析。软件可以自动识别球员的动作，分析传球、射门、防守等技术动作的成功率、失误原因，以及球员之间的配合情况等。教师可以根据分析结果，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技术指导，帮助学生改进技术动作，提高比赛中的战术执行能力。例如，通过视频分析发现某个学生在射门时总是习惯性地将球踢高，教师可以针对这一问题，为学生制定专门的射门训练计划，重点纠正学生的射门姿势和发力方式。

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也开始在高校足球教学中崭露头角^[10]。一些高校利用VR技术创建虚拟足球训练场景^[11]，学生佩戴VR设备后，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不同的比赛场地和环境，进行各种技术动作的训练和战术演练。这种沉浸式的教学方式极大地增强了学习的趣味性和体验感，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例如，学生可以在虚拟场景中模拟参加世界杯决赛，面对数万观众的呐喊助威，感受紧张激烈的比赛氛围，从而提高自己在高压环境下的比赛能力。AR技术则可以将虚拟信息与现实场景相结合，为学生提供更加直观的教学指导。比如，在足球训练中，通过AR技术在足球场上叠加虚拟的标线、球员位置提示等信息，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战术跑位和传球路线。

（三）数智化赋能高校足球个性化教学的阻碍因素

数智化技术的应用需要一定的硬件设备和软件系统支持，这无疑会增加高校的教学成本。智能穿戴设备、高清摄像头、运动分析软件、VR/AR设备等的购置费用较高，对于一些经费紧张的高校来说，难以大规模投入。此外，这些设备和软件的后期维护、更新也需要持续的资金支持。例如，智能足球鞋的电池寿命有限，需要定期

更换；运动分析软件需要不断升级以适应新的技术和教学需求，这些都增加了教学成本。数智化技术的应用还需要专业的技术人员进行设备的安装、调试和维护，以及数据的管理和分析，这也进一步加大了高校的人力和财力投入。

教师作为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其对数智化技术的掌握和应用能力直接影响着数智化赋能高校足球个性化教学的效果^[12]。然而，目前部分高校足球教师的数智化素养相对较低，缺乏对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的深入了解和掌握。在教学过程中，他们难以将数智化技术与足球教学有机结合，无法充分发挥数智化技术的优势。例如，一些教师虽然购置了智能穿戴设备，但不知道如何利用设备采集的数据进行教学分析和指导；有些教师对视频分析软件的功能了解有限，只能进行简单的视频回放，而无法运用软件进行深入的技术动作分析和战术评估。

在数智化教学过程中，学生的个人信息和运动数据涉及到隐私问题^[13]。如果这些数据被泄露或滥用，将对学生的权益造成损害。目前，我国在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高校在数据管理和保护方面也缺乏有效的措施和技术手段。

四、数智化赋能高校足球个性化教学的模式构建

(一) 数据采集与分析系统的搭建

在数智化赋能高校足球个性化教学中，数据采集与分析系统的搭建是关键环节^[14]。通过多种先进技术手段收集学生在足球学习过程中的多维度数据，并运用科学的分析方法深入挖掘数据价值，为后续的个性化教学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

视频分析技术在数据采集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足球场上安装高清摄像头，对学生的训练和比赛进行全程录制。利用先进的视频分析软件，能够自动识别球员的动作，分析传球、射门、防守等技术动作的成功率、失误原因，以及球员之间的配合情况等。通过对视频数据的逐帧分析，可以发现学生在技术动作上的细微问题，如射门时的发力点不准确、传球时的时机把握不当等，为针对性的教学指导提供有力参考。

此外，还可以通过问卷调查、在线学习平台记录等方式，收集学生的兴趣爱好、学习态度、学习目标等非运动数据，全面了解学生的足球学习情况和个性化需求。

(二) 个性化教学方案的制定与实施

个性化教学方案的制定与实施是数智化赋能高校足球个性化教学的核心内容，它基于对学生数据的深入分析，为每个学生量身定制适合其发展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内容，以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提高教学效果。

根据学生的足球基础、身体素质、学习能力等因素，将学生划分为不同的学习层次。对于足球基础较好、身体素质较强、学习能力较高的学生，可以将他们划分到高级层次，为他们提供更具挑战性的教学内容和训练任务，如高级战术分析、高水平比赛模拟等；对于足球基础一般、身体素质中等、学习能力尚可的学生，将其划分到中级层次，教学内容和训练强度则适中，注重技术的巩固和提升；对于足球基础薄弱、身体素质较差、学习能力较弱的学生，归为初级层次，教学重点放在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传授上，训练强度相对较低，以帮助他们逐步建立信心，提高足球水平。

(三) 智能化教学资源的整合与利用

智能化教学资源的整合与利用是数智化赋能高校足球个性化教学的重要支撑，在线课程是智能化教学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15]。整合国内外优质的足球在线课程，涵盖足球基础理论、技术教学、战术分析、体能训练等多个方面。这些课程可以由知名足球教练、体育教育专家授课，内容丰富、讲解详细。通过与专业的在线教育平台合作，或者自主开发在线教学平台，将这些课程整合到统一的平台上，方便学生随时随地学习。在平台上设置课程分类、搜索功能和个性化推荐系统，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学习需求，快速找到适合自己的课程。例如，对于想要提升射门技术的学生，平台可以根据其搜索记录和学习历史，推荐相关的射门技术教学课程；对于对足球战术感兴趣的学生，则推荐战术分析课程。

教学视频资源也是智能化教学资源的重要内容。收集和整理大量的足球教学视频，包括足球技术动作示范视频、比赛精彩瞬间回放、战术讲解视频等。对这些视频进行分类、标注和剪辑，制作成不同主题和难度级别的教学视频库。教师可以根据教学需要，从视频库中选取合适的视频片段，在课堂教学中进行播放和讲解，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足球知识和技能。学生也可以在课后自主观看教学视频，进行复习和巩固。利用视频分析技术，对教学视频进行深度挖掘，提取关键信息和知识点，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视频推荐和学习路径规划。例如，当学生在学习传球技术时，系统可以根据其学习进度和掌握情况，推荐相关的传球技术教学视频，并为其规划学习步骤，如先观看基础传球动作示范视频，再观看传球技巧提升视频，最后观看实战中的传球应用视频。

五、结语

数智化赋能高校足球个性化教学仍是一个动态发展的领域。随着5G、物联网、大模型等技术的迭代，体育

教学数据的采集将更实时、分析更智能、方案更精准。此外，跨学科融合将成为重要趋势，需加强师资数智化能力建设尤其在体育学、教育学、计算机科学、数据科学的协同创新，改造与提升教学硬件设施，让数智化真正服务于每一位学生的足球成长，为培养兼具运动技能与创新思维的高素质人才提供有力支撑。

参考文献：

- [1] 唐烨伟,赵长银,赵华,等.信息化教学应用实践共同体:学理探析、逻辑透析与发展评析——以教育部“教育信息化应用实践共同体项目”为例[J].中国电化教育,2025,(09):9-18.
- [2] 王涛.启发式教学在高校足球教学中的运用[J].集宁师范学院学报,2024,46(03):105-109.
- [3] 张辉.高校足球体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当代体育科技,2020,10(17):174+176.
- [4] 代宁.数智赋能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为何、何为与可为[J].继续教育研究,2025,(11):12-17.
- [5] 张一桥,吉玉良,吴雅辛.新质生产力赋能大学体育数智化改革研究[J].湖北文理学院学报,2025,46(06):79-85.
- [6] 宋军.数字信息背景下体育个性化教学策略研究[J].文体用品与科技,2024,(16):118-120.
- [7] 刘俊娟,闫培玲,肖俊生,等.基于复杂网络聚类算法的用户学习行为动态演化模型[J].吉林大学学报(理学版),2025,63(05):1411-1417.
- [8] 张峰.计算机技术与人工智能结合在教育领域的应用[J].信息与电脑,2025,37(16):215-217.
- [9] 李文波.我国高校校园足球开展的现实困境与发展路径研究[J].当代体育科技,2019,9(25):148+150.
- [10] 徐敏咪.虚拟现实(VR)与增强现实(AR)技术在体育教学中的应用效果评估[J].文体用品与科技,2025,(19):108-111.
- [11] 耿耿.VR技术在青少年足球运动员战术训练中的应用研究[J].文体用品与科技,2025,(17):105-107.
- [12] 宋梅.高校体育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现状、困境与推进路径[J].百色学院学报,2025,38(01):124-135.
- [13] 吴双,靳海霞.我国学校体育优质均衡发展的数智治理[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24,43(05):29-35.
- [14] 刘杨,王光军.数智化背景下信息技术与体育教学的深度融合研究[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24,38(02):38-42.
- [15] 郭丽,袁红,张晶.数智化背景下体育教师专业发展的机遇、挑战与路径研究[J].当代体育科技,2023,13(35):160-163.

Study on the Practical Path of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Empowerment in the Personalized Teaching Model of College Football

Wei Qiao, Heping Xiang, Yi Wang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qing Normal University, Anqing city,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have been widely applied in various aspects of education. The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s been continuously advancing. These technologies have brought new opportunities and solutions to the personalized teaching of college football. The research on the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empowerment of the personalized teaching model for college football holds signific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college football teaching and promoting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Based on the current status of college football teaching, this paper elaborates on the practical paths of the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empowerment in the personalized teaching model of college football, and explores the optimization of personalized football teaching through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s and inspirations for practitioners in college football teaching.

Keywords: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Universities; football; Personalized Teaching

唐山故事融入“大思政课”的一体化机制研究

张健¹ 周颖芳¹ 王璐璐¹ 王海红¹

(1.唐山师范学院, 河北 唐山 063000)

摘要: 本文以“大思政课”建设为背景, 以唐山地区为研究对象, 探讨区域文化资源赋能思政教育的一体化机制构建路径。唐山地区所蕴含的“五种精神”等地域文化是思政教育的价值富矿, 其在地性与情境性优势为破解思政教育抽象化、空洞化问题提供了鲜活载体。基于此, 本文构建了“资源活化-主体协同-实践运行”三位一体的机制模型, 旨在系统整合文化资源、贯通学校与社会场域、创新思政教育实践路径。该机制通过将“唐山故事”有机融入“大思政课”建设, 为深化区域文化与思政教育融合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样本。

关键词: 大思政课; 区域文化; 思政教育一体化; 家校社协同; 唐山故事

基金项目: 2025年唐山师范学院校级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课题“家校社协同育人视域下唐山故事”文化资源活化与思政教育一体化机制研究(XSZ2025130)

DOI: doi.org/10.70693/jyxb.v1i3.84

一、引言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进程中, 立德树人始终是教育的根本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 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教育教学全过程,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大学考察调研时进一步指出, “要把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有机结合起来”, 要求推动思政教育与现实生活、社会实践紧密结合, 真正实现入脑入心、以文化人。这一重要论述, 为新时代“大思政课”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区域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一个地区历史、社会与精神文明的综合体现。相较于宏大的国家叙事, 区域文化更具有地性与情境性, 能够以贴近生活的方式增强学生的认同感与体验感。近年来, 国内学者逐渐意识到, 区域文化不仅是地方教育的文化支撑, 也是思政教育的重要资源。通过挖掘区域文化的精神内核与时代价值, 可以有效提升思政教育的情境化水平, 使抽象的价值理念转化为具体可感的生活经验, 从而增强教育实效^[1]。唐山作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源地之一, 既有“北方煤都”的工业文明积淀, 也有“抗震精神”的集体记忆与“凤凰涅槃”的发展奇迹。1976年唐山大地震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但唐山人民顽强拼搏、守望相助, 重建家园, 孕育出“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团结互助、无私奉献”的抗震精神。这种精神已超越地方经验, 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2]。与此同时, 唐山在新时代绿色转型与生态修复中形成的生态文化, 也彰显了地方在可持续发展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方面的探索与成效。因此, “唐山故事”不仅是一段区域历史, 更是一个价值富矿, 承载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因此, 本文选取“唐山故事”作为典型样本, 在“大思政课”建设背景下, 探讨区域文化资源挖掘与活化赋能思政教育一体化机制的构建路径。

二、区域文化融入“大思政课”的研究进展与启示

(一) 国内“大思政课”建设的研究取向

近年来, “大思政课”作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改革的核心议题, 其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引发了学界的广泛探讨。2022年教育部印发的《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明确提出, 要推动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相结合, 发挥社会各界、各领域的育人合力^[3]。其理念强调打破传统课堂边界, 旨在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的新格局。为系统把握该领域的研究现状, 本文对国内相关文献进行梳理, 发现有研究主要呈现以下取

作者简介: 张健(1985—), 女, 博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基础教育;

周颖芳(1996—), 女, 硕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基础教育;

王璐璐(1997—), 女, 硕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儿童心理发展与教育

王海红(2003—), 女, 本科生(学生), 研究方向为小学教育。

通讯作者: 张健

向。

首先，理论建构不断深化。“大思政课”不仅是一种课程形态，更是一种教育理念和育人模式的创新。相关研究者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系统论和教育生态学等角度，探讨了“大思政课”的理论基础与运行机制。例如，禹红樱（2019）在研究中提出“大思政课”应实现“三进”，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构建“教材—教学—价值”一体化转化路径^[4]。张利涛（2017）则进一步指出，“大思政课”需依托地域文化资源，实现思政教育从“知”到“行”的转化，增强教育的实效性和感染力^[5]。

其次，实践探索日益多元。众多学者基于地域文化资源，开展了丰富的大思政课实践模式探索。例如，部分学者以“唐山精神”中的大钊精神、抗震精神为载体，将其嵌入思政课教学，通过案例教学、实践体验等方式增强学生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6]。部分学者则强调区域红色文化资源的育人功能，提出依托地方革命历史遗存、红色基因库等开展现场教学，使思政教育“接地气、冒热气、添生气”^[7]。此外，一些研究还关注数字化技术在“大思政课”中的应用，如通过虚拟仿真、线上资源库等手段拓展教学时空^[8]。

梳理现有研究，在区域文化融入“大思政课”的探索中仍存在三点显著不足。其一，研究的系统性不足，多集中于个案分析，缺乏对区域文化资源进行系统整合与转化的普适性模型。其二，机制的协同性不足，学校、社会、政府等主体间存在壁垒，未能形成有效的资源联动与长效合作机制^[9]。其三，实践的纵深性不足，区域文化资源易陷入“静态化”“陈列化”困境，且相关实践多局限于高等院校，未能有效向基础教育阶段延伸。

（二）区域文化的教育价值与赋能潜力

区域文化是特定地域内历史传统、社会习俗、价值观念和精神风貌的集中体现，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其教育价值与赋能潜力主要体现为：第一，区域文化是思政教育的重要资源库。地域文化中蕴含的红色基因、奋斗精神、道德规范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契合。例如，唐山的工业文化、抗震文化和红色文化，不仅反映了地方历史脉络，也彰显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将丰富的区域文化资源融入思政教育，能够使抽象的理论具体化、情境化，增强教育的亲和力和感染力^[10]。第二，区域文化为“大思政课”提供实践载体。地域文化的物质形态如遗址、博物馆，以及和非物质形态如民俗、艺术，为思政教育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场景。通过组织学生参观工业遗址、抗震纪念馆，开展地方文化研学活动，能够使学生在实践中感悟文化魅力，提升社会责任感和家国情怀^[11]。第三，区域文化赋能思政教育机制创新。地域文化的融入推动了思政教育从“单向灌输”向“多元互动”转变^[12]，即地域文化带动了校地合作、资源共享，形成了“学校—社会—政府”协同育人的新格局^[13]。

然而，区域文化的教育潜能尚未完全释放。例如，课程化程度不足现象普遍存在。许多区域文化仅作为零散案例引入课堂，未能系统融入教材体系；实践教学往往流于形式，缺乏深度体验和价值升华^[14]。因此，在区域文化赋能“大思政课”建设方面，须拓展对区域文化中所蕴含的思想价值、历史价值及实践价值的认知，突破原有以红色文化为主的单一叙事，融入民俗、工业、生态等多元主题，形成更为立体的资源供给体系。此外，应着力构建“资源—课程—实践”一体化的赋能模式，推动区域文化从零散案例走向系统化课程开发、从浅表实践走向深度化体验设计，从而真正实现其教育功能的全面释放。

（三）国际镜鉴

国际上，地方性教育（Place-Based Education）的理念与实践与我国的区域文化融入“大思政课”如出一辙。该教育理念主张将学习过程根植于具体的地方环境与文化语境，强调通过实践参与和社区互动促进学生的知识建构与价值认同。例如，美国部分州将地方历史、地理和生态资源纳入课程体系，学生通过实地考察、社区服务等方式增强对本土文化的认知。与此同时，现代教育技术的运用进一步拓展了教学手段，如美国部分学校运用虚拟现实技术重现地方历史场景，使学生获得沉浸式学习体验^[15]。此外，澳大利亚通过推行“社区—学校”合作模式，通过学校与博物馆、文化机构的协同合作，实现了教育资源的有效整合与学生社会责任感的提升^[16]。

通过梳理其他国家经验可见，区域文化赋能思想教育的有效路径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首先，需要推动区域文化从零散资源向系统化课程转化，实现文化资源的教学化开发；其次，应当突破传统课堂的时空限制，构建学校与社区、文化机构等多方协同的育人场域；最后，要善于运用数字化技术创新文化呈现形式，增强教学过程的互动性与实效性。以上经验表明，区域文化只有转化为可感知、可体验的教育内容，才能有效实现育人目标。

三、唐山文化资源的思政教育价值要素提炼

（一）唐山文化资源的多元构成与精神内核

唐山作为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区，其独特的文化资源凝聚为具有地域特色的“五种精神”，构成了一个层次分明、内涵丰富的价值体系。这五种精神不仅是唐山人民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更为“大思政课”建设提供了鲜活而深刻的地方性知识载体。

1. 大钊精神：革命理想与忠诚担当的信仰基石

大钊精神以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提出的“铁肩担道义”为核心要义展现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

仰和忠诚担当的政治品格。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在其著作《青春》中发出“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的呐喊，这种追求真理、献身理想的精神境界，为当代青年树立了光辉榜样。在思政教育中，通过研读李大钊《青春》《庶民的胜利》等著作，参观李大钊纪念馆等形式，能够引导学生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筑牢信仰之基。这种精神为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滋养。

2. “特别能战斗”精神：工人阶级的力量彰显

“特别能战斗”精神源于开滦煤矿工人的革命传统和奋斗实践。这一精神最早可追溯至1922年开滦五矿工人同盟大罢工，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工人运动，展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觉醒和力量。开滦工人以“顾全大局、百折不挠”的品格，创造了多个煤炭生产纪录，涌现出大批劳动模范。将这一精神融入思政教育，可以通过组织学生下井体验、参观矿山博物馆等形式，让学生亲身感受矿工的工作环境，体会劳动的光荣和工人的伟大，培养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3. “穷棒子”精神：自力更生的创业典范

“穷棒子”精神以“三条驴腿闹革命”的典故为象征，生动展现了唐山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这一精神源于上世纪50年代遵化西铺村王国藩合作社的创业历程，当时23户贫农凭借顽强的意志，通过互助合作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毛泽东同志曾赞誉“穷棒子社”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在思政教育中，通过讲述这段历史，可以引导学生认识到艰苦奋斗是成就事业的必由之路，培养勤俭节约、自强不息的品格。

4. “当代愚公”精神：改造自然的顽强毅力

“当代愚公”精神以沙石峪村“万里千担一亩田，青石板上创高产”的奇迹为标志，彰显了唐山人民不畏艰难、改造自然的顽强毅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沙石峪村党支部书记张贵顺带领村民发扬愚公移山精神，在青石板上造田，创造了“土如珍珠水如油，满山遍野大石头”的农业生产奇迹。将这一精神融入思政教育，可以通过组织学生参观沙石峪纪念馆、开展生态修复实践等方式，培养学生脚踏实地、坚持不懈的品格，增强建设美丽中国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5. 抗震精神：多难兴邦的民族气节

抗震精神以“公而忘私、患难与共、百折不挠、勇往直前”为内涵，凝聚了唐山人民在1976年大地震中展现出的顽强品格。这一精神不仅体现在灾区人民的自强不息，更彰显了全国人民“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大爱情怀。抗震精神的四个思想核心融入思政教育，通过参观地震遗址公园、聆听亲历者讲述、开展防灾演练等形式，能够让学生深刻理解生命的价值、集体的力量和民族的精神，增强应对挑战的勇气和能力。

以上五种精神既各有侧重，又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了唐山文化的精神谱系，即大钊精神确立了信仰坐标，“特别能战斗”精神展现了力量源泉，“穷棒子”精神提供了自力更生的创业智慧，“当代愚公”精神彰显了奋斗毅力，抗震精神升华了价值追求。五种精神共同构筑了唐山人民的精神家园，为“大思政课”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教育资源。

（二）从文化资源到教育要素的价值转化逻辑

将区域文化资源有效转化为思政教育要素，需要遵循特定的转化逻辑。唐山文化的教育价值实现，关键在于完成从资源形态到教育形态的创造性转化，这一过程需要通过叙事转化、价值附着和情感联结三个环节来实现。

1. 叙事转化：从宏大历史到鲜活故事的具象化表达

传统思政教育往往侧重于宏大叙事，容易产生距离感。而区域文化的优势在于能够通过具体、微观的叙事方式，使历史变得可感可知。例如，在讲述工业文明时，可以通过“一条铁路的故事”（唐胥铁路）、“一座煤矿的变迁”（开滦煤矿）等具体载体，将宏观历史转化为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交织的生命史。在抗震精神教育中，通过普通民众的灾后重生经历、救援人员的亲身回忆等个体叙事，使抗震精神不再是抽象概念，而是具有生命温度的情感记忆。这种转化打破了传统思政教育中“见事不见人”的局限，通过具体人物、具体事件的情感共鸣，实现了价值观的有效传递。

2. 价值附着：将抽象价值观融入具体人物、事件与场景

区域文化本身是价值中立的，其教育价值需要通过自觉的挖掘和附着才能实现。这一过程要求教育者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族精神等抽象价值理念，巧妙地融入具体的文化载体中。以唐山工业遗产为例，“艰苦奋斗”这一抽象价值可以通过第一代产业工人手工铺就铁轨的故事来具象化；“改革创新”精神可以通过唐山作为中国工业文明起步地的历史地位来彰显。这种价值附着不是简单的标签化处理，而是通过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使价值

观自然呈现于文化叙事之中。

3.情感联结: 通过在地性与亲近感增强认同与共鸣

思政教育的有效性最终取决于受教育者的内心认同, 而认同的产生离不开情感共鸣。唐山文化的地域性特征恰恰为情感联结提供了天然纽带。对于唐山籍学生而言, 家乡文化本身就具有亲切感和认同感; 对于外地学生, 则可以通过地方文化的独特性引发好奇心和探索欲。例如, 在组织学生参观地震遗址公园时, 通过现场讲述、亲历者口述等方式, 能够唤起对生命的敬畏、对互助精神的认同。在工业遗址参观中, 通过体验式教学让学生感受早期工业生产的艰辛, 能够增强对劳动价值的认同。这种基于地方认同的情感体验, 能够有效打破思政教育中常见的心理距离, 实现从“知”到“情”再到“信”的转化。

四、区域文化赋能思政教育的一体化模型

(一) 资源活化机制: 从静态文化到动态教育的三级转化

区域文化资源需经历系统化的活化过程, 才能转化为有效的教育要素。唐山文化资源的活化可遵循“原始资源—教育素材—实践工具”的三级转化路径。第一级是原始资源系统化梳理。通过对唐山工业遗产、抗震遗址、文化场馆等实体资源, 以及文献档案、口述历史等文本资源进行数字化归档与分类整合, 建立“唐山文化资源数据库”。如开滦国家矿山公园将矿史文献、实物档案、影像资料进行数字化处理, 形成可检索、可使用的资源库。第二级是教育素材标准化开发。组织高校教师、文史专家、教研人员共同编写《唐山文化资源教育转化指南》, 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标准化教学素材。例如, 将“特别能战斗”精神转化为包含历史背景、典型案例、讨论问题的模块化教学单元, 并配套开发图文故事卡、微视频等教学资源。第三级是实践工具多样化生成。将教学素材进一步转化为可直接使用的实践工具, 如开发“重走唐胥铁路”研学路线、“地震遗址沉浸式体验”实践方案、“工业遗产VR体验”数字化产品等, 使文化资源成为可参与、可体验的教育载体。通过三级转化可以实现文化资源从静态保存到动态利用的转变, 使区域文化成为可迭代、可更新的活态教育资源。

(二) 主体协同机制: 多元教育共同体的联动赋能路径

区域文化赋能思政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 其有效性依赖于一个协同有序的实施机制。以唐山地区为例, 在实践区域文化赋能大思政课的过程中可以构建一个以“贯通育人品牌、联通各类资源、融通实施载体”为核心的一体化联动机制(如图1所示), 从而系统性地将区域文化资源转化为思政教育动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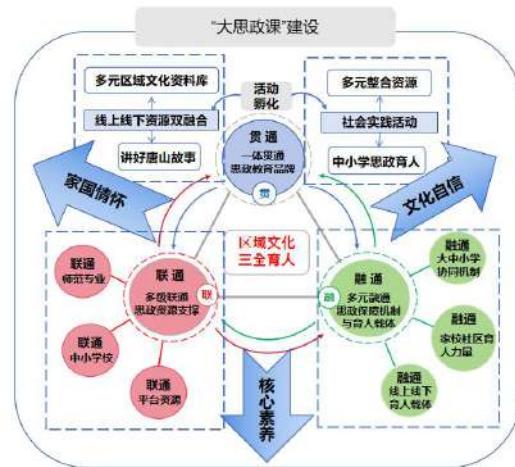


图1 “贯通育人品牌、联通各类资源、融通实施载体”为核心的一体化联动机制

首先, 在“联通”层面, 构建坚实的思政资源支撑体系。该体系旨在打通壁垒, 实现资源要素的跨领域整合。其核心是联通专业力量与基础教育, 发挥高校的“引领”和“中枢”作用, 特别是依托师范专业的学术与人才优势, 对唐山“五种精神”等区域文化进行理论研究与课程化开发, 并通过组建学生宣讲团、开展社团活动等方式, 将研究成果转化为系列化、规范化的宣讲资源。同时, 联通中小学校这一关键“实践终端”, 推动文化资源的校本化实施, 通过合作开展研学实践、思政宣讲等活动, 确保教育内容落地。最终, 通过数字化平台收集相关资源, 建设“多元区域文化资料库”, 实现优质资源的共建共享, 为“讲好唐山故事”奠定坚实基础。

其次, 在“融通”层面, 创新思政保障机制与育人载体, 着力解决教育资源与教育实践的有效衔接问题。一

方面,是融通保障机制,建立社会机构(如图书馆、博物馆)的“支持”机制,通过开放实践场地、提供专业指导,形成“高校-中小学-社会”三方协同的常态化运行模式。另一方面,是融通育人载体,将整合后的文化资源,通过“线上线下双融合”的方式,转化为多样化的社会实践活动和校园文化项目,如组织“行走的思政课”等,实现从课堂教学到社会实践的场域拓展,使思政教育无处不在、生动可感。

最终,在“贯通”层面,塑造一体化的思政教育品牌。作为“联通”与“融通”的最终目标,“贯通”是通过系统化的“活动孵化”,将多元整合的资源与实践贯通于立德树人的全过程,塑造出“区域文化三全育人”的鲜明特色和品牌项目。这一过程将文化资源中蕴含的价值要素,内化为学生的家国情怀与文化自信,并最终指向学生核心素养的全面提升,实现“润物细无声”的育人效果。

参考文献:

- [1]王玉坤,吴莹.地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的路径研究[J].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2023(04):87-95.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 [EB/OL].(2022-08-10)[2025-08-04].<http://www.moe.gov.cn>.
- [3]王士立,程雪.唐山历史文化概说[J].唐山学院学报,2009(2),1-6.
- [4]禹红樱.开放式教学模式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进”的思考[J].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8(3):108-112.
- [5]张利涛.关于地方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思考——以青海省为例[J].广西教育学院学报, 2017(6):153-156.
- [6]赵雪,曹甜甜.唐山精神嵌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探析[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8,40(3):105-108.
- [7]武兴华,江舟.文化资源融入学校“大思政课”建设的区域实践[J].江苏教育,2024(44),12-14.
- [8]王玉坤,吴莹.地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的路径研究[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4):87-90.
- [9]刘世彩.西安地方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研究[D].西安科技大学,2019.
- [10]李楠,许楠楠.地方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创新研究[J].世纪桥, 2024(16):99-101
- [11]李楠,高宇.基于唐山文化的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创新研究.工业技术与职业教育,2019,17(3):69-71.
- [12]郭志一.以校地合作提升“大思政课”育人实效[J].教育进展, 2025, 15(7):313-316.
- [13]刘伟,卢羨婷,朱丽莉.高校思政课创新的广西探索[J].瞭望, 2018(46):56-57.
- [14]冯利伟.地域文化融入地方高校思政课路径研究-以唐山本科院校为例[D].华北理工大,2021.
- [15]Epstein, J. L. (2011). School, family, and community partnerships: Preparing educators and improving schools (2nd ed.)[M]. Routledge.
- [16]Gruenewald, D. A. (2003). The best of both worlds: A critical pedagogy of place [J]. Educational Researcher, 32(4), 3-12.

A Study on the Integrated Mechanism of Integrating Tangshan Stories into the “Grea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Framework

Zhang Jian, Zhou Yingfang, Wang Lulu, Wang Haihong

(Tangshan Normal University, Tangshan, Hebei 063000)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promoting the “Grea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initiativ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tegrated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regional cultural resources empowe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aking Tangshan as a case study. The regional culture of Tangshan, embodied in its “Five Spirits,” serves as a rich repository of values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ts local and contextual characteristics provide a vivid and practical vehicle for addressing the issues of abstraction and emptiness often found in traditional ideological education. Based on this foundation, the study constructs a tripartite mechanism model encompassing resource activation, subject collaboration, and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aiming to systematically integrate cultural resources, bridge the gap between academic and social environments, and innovate practical approaches 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y organically incorporating “Tangshan Stories” into the “Grea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framework, this mechanism offers both theoretical insights and practical examples for deepening the integration of regional culture and ideological education.

Keywords: Grea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Regional Cultur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Home-School-Community Collaboration; Tangshan Stories

“影视画面造型”课程教学设计与实践探析 ——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

邢 璐

(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 大湾区影视学院, 广东 广州 510900)

摘要:在“新文科”建设和高等教育转型的大背景下,艺术类专业课程的教学改革正面临“能力导向”与“价值引导”的双重挑战。《影视画面造型》作为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的基础课程,其教学设计不仅关系到学生的影像表达能力培养,也承载着美育与课程思政的重要功能。本文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导向,系统分析当前课程在教学目标、内容结构、教学方式与评价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强化“视觉表达力”、构建模块化课程体系、实施“项目式+任务驱动”教学模式、优化“过程+成果”多元评价机制等策略。研究表明,课程改革可有效促进学生从技术执行者向创意表达者转变,推动影视教育在实践性、艺术性与育人功能上的协同发展。本文亦为同类课程的教学改革与专业建设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参考。

关键词:影视画面造型; 应用型人才培养; 项目式教学; 视觉表达; 教学评价; 课程改革

基金项目: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2024年度校级一流本科课程——线下课程《影视画面造型》(华农珠江教字(2025)7号)阶段性成果。

DOI: doi.org/10.70693/jyxb.v1i3.86

引言

在“新文科”建设与教育现代化背景下,高等院校正逐步从传统知识传授型教育向能力导向型、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转变。影视专业作为兼具艺术创作与技术实践属性的交叉学科,其核心课程体系必须围绕“综合能力提升”与“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进行改革与优化。在此背景下,《影视画面造型》课程作为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的重要基础课程,其教学设计与实践路径的更新不仅关系到学生专业能力的构建,更承载着高校美育教育、课程思政融入、技术素养提升等多重育人功能。

“画面造型”作为影视创作的视觉基石,其涵盖内容远不止构图技巧和光影布置,更延伸至影像叙事逻辑、情感表达、空间建构与文化意涵的多维统一。随着数字媒介的发展与影视工业的深化,学生仅具备基础美术知识与摄影技术已难以胜任未来职业场景。因此,亟需通过课程改革,将影视语言的核心要素转化为系统性教学内容,并引入项目式教学、任务驱动、跨媒介实践等手段,提升学生的造型综合能力与创作表达意识。

当前,许多高校在《影视画面造型》课程的教学中仍存在理论与实践脱节、课程内容碎片化、教学方法单一等问题,无法有效回应“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本质需求。同时,随着“课程思政”理念在全国高校全面推进,艺术类课程也逐渐被赋予思想价值引领与文化自信培育的时代责任。因此,如何在“造型训练”中融入审美素养与价值引导,探索美育与德育的有机结合,也成为该课程教学设计中必须正视的关键议题。

基于以上背景,本文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导向,围绕《影视画面造型》课程的教学设计与实践路径进行系统探析。通过梳理课程定位与结构,分析教学内容的模块化重构,探讨项目式教学的具体应用,并结合课程思政的有效融入与学生创作作品的教学成果展示,提出可操作性较强的教学优化策略。期望为影视类课程的教学改革提供经验借鉴,同时推动高等艺术教育在能力培养与价值塑造上的融合发展。

一、《影视画面造型》课程的教学现状分析

(一) 课程定位与教学目标

作者简介:邢璐(1993—),女,硕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为影像与数字媒体;

通讯作者:邢 璐

《影视画面造型》是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的核心基础课程，主要面向本科阶段的二年级或三年级学生开设。该课程立足于视觉艺术与影视表达的融合，从镜头语言、构图逻辑、色彩与光影控制、空间表现等多个维度引导学生建立“影像造型意识”，并通过实践操作提升其视觉表达能力与影像叙事能力。

根据教学大纲，该课程旨在“培养学生成为艺术理论基础扎实、对形式美有敏感知、能灵活运用色彩情感，并具备一定软件操作与创作表达能力的复合型影视人才”。其目标不仅限于技能训练，更重在学生审美素养、思维方式、创意意识的全面塑造。

一位授课教师在访谈中提到：“这是学生第一次系统接触‘视觉语言’，但很多学生一开始只关注技术细节，比如‘拍得清不清楚’，而忽略了构图和镜头的情绪。我们希望他们逐渐意识到，‘画面’不仅是工具，更是表达态度与美学的方式。”

（二）教学内容与组织结构分析

目前，大多数高校在《影视画面造型》课程中普遍采用“理论讲授+案例分析+实践拍摄”的混合教学模式。教学内容涵盖画面构图、光影关系、景别与镜头语言、空间感营造、色彩运用、运动调度等多个模块，课程整体呈现出由静态构图逐步过渡到动态影像造型实践的螺旋式上升结构。从课程安排来看，通常总学时为48学时，其中实践操作部分占比超过40%，充分体现出“动手导向”“项目导向”的教学理念。这种高比例的实践设计，有利于学生在真实操作中提升技术敏感度与视觉表达力，有效强化理论与创作的联动。

然而，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也暴露出一系列亟待改进的问题。首先，理论与实践存在一定程度的割裂。不少学生反映课程理论讲授“抽象、不直观”，难以与实际拍摄经验建立联结。一位学生在课程反馈中提到：“老师讲透视规律的时候，我们理解了‘一二三点透视’，但一拿起相机就还是拍成了‘平面图’。”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课程教学过程中“纸上谈兵”现象的存在。

其次，教学内容呈现出碎片化倾向。虽然课程内容覆盖广，但缺乏完整的视觉表达逻辑链条支撑，学生往往在知识之间难以建立内在关联。“学了构图，不会结合色彩；学了灯光，不会结合情绪”，成为许多学生在创作过程中共同遇到的问题。正如一位学生所言：“画面造型涉及太多东西，有时会觉得是‘东学一点西学一点’，但拍片时找不到系统思路。”

最后，学生参与度存在明显不均现象。在小组实践项目中，常出现“部分学生承担主要任务，部分学生处于边缘化”的状况。这种不均衡不仅影响了教学公平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学生的团队协作意识和集体创作能力，进而影响最终的教学成效与作品质量。

综上可见，《影视画面造型》课程在内容设置与实践导向方面虽具备积极意义，但在教学联动性、逻辑结构性与学生参与机制方面仍有优化空间。如何通过教学设计的再构建，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成为课程进一步发展的关键。

（三）教师教学困境与反馈

教师在教学中也面临诸多现实挑战。首先，课程需统筹兼顾美学指导、技术操作、理论传授等多个方面，对教师综合能力要求高。而不少高校尚未实现专职教师与行业导师的协同配备，导致“讲得精但做得少”或“懂操作但缺理论深度”的教学偏向。

一位课程主讲教师坦言：“我们也在摸索中前行。如何在有限课时内既讲清楚视觉美学，又让学生掌握拍摄技巧？这其实对我们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此外，部分教学设备陈旧、实践场地受限、课外指导时间不足等问题也影响了课程成效。有教师反映：“有时要带十几组学生同时拍摄，教室、器材、人力都紧张，只能靠学生自己摸索。教学质量和学生作品质量也受到影响。”

尽管如此，多数教师对于该课程的教学意义仍持积极态度。一位资深教师表示：“影视画面造型是一门真正让学生‘看见美、表达美’的课程。它不仅塑造了他们的专业眼光，也锻炼了他们的表达力与判断力。”

二、《影视画面造型》课程教学设计优化策略

（一）强化表达导向：课程目标从“技能训练”转向“视觉表达力”

长期以来，《影视画面造型》课程在教学实践中多以“掌握摄影构图、用光技巧、景别变化”为主要目标，这种以技术性为核心的“技能训练导向”在提升学生基础操作能力方面确实具有积极作用。然而，随着影视媒介的创作门槛降低和技术的普及化，仅仅停留在技术训练层面的教学已无法满足当代影视教育对人才综合表达能力的更高要求。尤其在应用型高校中，课程更应注重培养学生“用镜头说话”的能力，即如何通过画面构建、视觉叙事和情绪设计，传达创作者对现实的观察、对社会的态度与对美的理解。

“表达导向”强调学生在影视创作中不只是“复现现实”，更是“建构意义”。镜头、光影、色彩、构图不再是孤立使用的技法，而是有意图的造型语言。这种转变要求教师从课程伊始就引导学生将技术手段置于叙事与审美的语境之中，例如在讲授景别的使用时，不止于介绍“远景、中景、特写”的划分与用途，更应深入探讨不同景别所

承载的情绪含义与视觉引导效果。

在课程实施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视觉表达任务”的设计,引导学生以主题为核心进行构图训练,如“孤独感的画面设计”、“城市节奏的光影捕捉”等;也可以要求学生在拍摄前撰写“视觉阐述报告”,明确画面的情感基调、叙述视角和风格方向。这种方式促使学生在创作前就建立“表达意识”,进而在拍摄实践中自觉运用造型手段服务于主题传达。

简而言之,课程目标从“技能训练”转向“视觉表达力”的升级,是影视艺术教育从“教做”向“教思”转变的重要体现,也是真正实现应用型、复合型、创意型影视人才培养的关键路径。

(二) 构建模块化课程结构: 建立“视觉语言生态链”

在传统教学模式中,《影视画面造型》课程往往采用线性推进的方式,即按照“理论讲授—案例分析—实践训练”的顺序逐步展开。这种方式虽有其系统性,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容易形成知识割裂、能力发展断层的局面。学生往往在前期积累了一定理论知识,却在实际创作中难以综合运用,导致“学得多、用得少”“操作熟、表达弱”的尴尬现象。因此,构建模块化课程结构,形成“由浅入深、由点到面、由技至意”的教学逻辑链条,是提升教学成效的重要突破口。

本课程可根据教学内容与能力指向,重构为三大教学模块:基础模块、进阶模块与融合模块,三者层层递进,互为支撑,共同构建学生的“视觉语言生态链”。具体内容见下表1。

表1 课程模块结构与能力培养关系图

教学模块	内容核心	教学重点	能力指向
基础模块	构图、色彩、光影	理解视觉元素	视觉感知与基础造型能力
进阶模块	景别、空间、运动	运用镜头语言	镜头组织与叙事能力
融合模块	项目实践、综合创作	融会贯通	综合表达与创作能力

基础模块主要帮助学生建立基本的视觉认知能力,重点内容包括构图规律、色彩搭配、光线质感与情绪氛围的控制。此阶段以图像分析与静态画面拍摄为主,训练学生对“形式美”与“画面秩序”的敏感度。教学中可以结合典型镜头截图分析,如希区柯克影片中的对称构图,或韦斯·安德森的色彩配比,培养学生观察与模仿的能力。

进阶模块则聚焦于动态造型与镜头语言的训练,强调景别选择、空间运用、运动节奏与镜头逻辑的掌握。此阶段需引导学生将静态视觉语言迁移至动态表达,通过练习如“景别转化练习”“空间重构任务”等,提升其影像组织能力。例如,可以要求学生拍摄一个主题连续镜头,运用不同景别、方位与镜头运动手段,完成人物心理变化的可视化表达。

融合模块是对前两个模块学习成果的整合提升,以项目式创作为主线,引导学生独立完成一部短片作品,从主题策划、视觉风格确立、拍摄执行到后期剪辑,全面考察其综合创作能力与审美表达水平。教师在此阶段应更强调“作品背后的意图”,鼓励学生通过影像表达个体经验、社会观察或文化认同,从而实现从“技术执行”到“创意表达”的质变。

模块化课程结构的优势在于,它为学生提供了清晰的学习路径,也为教师提供了更具针对性的教学切入点。通过“视觉语言生态链”的构建,学生不再是分散技能的堆砌者,而是拥有视觉表达系统思维的构建者。最终,实现学生由“造型模仿者”向“影像讲述者”的转变,正是《影视画面造型》课程作为艺术基础课的核心价值所在。

(三) 教学方法革新: 引入“项目式+任务驱动”混合模式

为了有效提升《影视画面造型》课程的实践性和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建议在教学中系统引入“项目式教学”与“任务驱动”相结合的混合教学模式。相比传统以讲授和作业为主的教学方式,项目式教学更注重以真实创作情境为引导,以阶段性任务为依托,让学生在“做中学”“用中思”“创中悟”,从而形成更具实战性与表达力的学习体验。

在具体实施上,可将课程分为六个阶段:主题确定与分组、视觉风格设定、构图与色彩方案设计、拍摄计划与实拍执行、后期剪辑与配音、作品展示与评议。每一阶段都有明确的任务目标与产出要求,教师则在其中承担“项目督导”与“过程反馈”的双重角色,既提供技术指导,又注重审美逻辑与叙事策略的培养。

表中反映出从概念构思到作品完成的全过程。整个教学周期贯穿“表达力”与“协作力”的双向培养,不仅锻炼学生的个体创作能力,也增强了团队合作、角色分工与沟通协调等软技能。

例如,在“构图与色彩方案”阶段,学生需要提交一份视觉风格板(Moodboard)与构图手稿,并就自己的造型意图进行课堂简述。这一过程促使学生将造型训练置于主题表达的框架中,避免了“为拍而拍”的低效实践。再如在“作品展示与评议”阶段,要求学生撰写作品阐述报告,说明其拍摄逻辑与镜头选择依据,并接受同伴与教师的批评反馈。这种全流程的反馈机制强化了学生的表达自觉性与创作反思能力。

实践表明,采用项目式与任务驱动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后,学生对课程的参与度明显提升,作品的完成质量与

思想深度也有明显改进。教学不再是“布置+完成”的单向流程，而是形成了“设计—实现—反思—优化”的闭环结构，从而有效地服务于应用型影视人才的培养目标。

表 2 课程学习六阶段表

教学阶段	核心任务内容	时间分配建议 (周数)	教学目标与能力导向
1. 主题确定与分组	明确创作主题；组建小组；分配任务角色	1 周	提升选题能力、团队协作与创作目标感知能力
2. 视觉风格设定	制作 Moodboard、参考片分析、确定影像风格方向	2 周	建立个人视觉表达意识与风格构建能力
3. 构图与色彩方案设计	绘制构图草图、确定色彩搭配策略、撰写风格说明文档	2 周	掌握造型要素的组合使用，强化视觉预判能力
4. 拍摄计划与实拍	拍摄脚本、分镜绘制、实地拍摄、镜头组织与素材采集	3 周	实战操作与镜头语言综合运用能力
5. 后期剪辑与配音	素材初剪、音画同步、风格统一、完成最终输出	2 周	建立镜头节奏、情绪控制与完整视听合成能力
6. 作品展示与评议	学生展示短片、撰写作品阐述、师生互动评议	1 周	强化表达能力、批判性思维与审美反馈能力

(四) 评价机制优化：构建“过程 + 成果”多元评估体系

在传统《影视画面造型》课程中，学生成绩往往以期末作品为唯一评价标准，忽视了学习过程中的探索、思考与表达实践，导致部分学生出现“重结果轻过程”、“重完成轻创意”的学习态度。要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课程目标，就必须打破单一评价模式的局限，建立起涵盖“学习过程”与“作品成果”双维度的多元评估体系，以激发学生的持续投入与自我驱动能力。

首先，过程性评价应贯穿教学全过程，注重学生在各阶段中的表现、参与度、反思能力和小组协作情况。例如，在项目式教学中，教师可设置“阶段性提交任务”，如构图草图、色彩风格板、拍摄计划、剪辑初版等，并给予定性与定量结合的反馈。同时，可鼓励学生进行阶段性“学习日志”撰写，记录自己在每个环节的学习体会与问题反思，作为课堂参与的组成部分。

其次，成果性评价应以学生完成的短片作品为核心，但不应仅以“好看”与否、“技术熟练”与否为标准，而应从“主题呈现”、“视觉语言运用”、“镜头组织逻辑”、“风格一致性”等维度综合考量。此外，还需加入学生对作品的阐述与答辩环节，考察其对造型策略、创作理念及技术选择的理解与表达能力。为了清晰量化评价标准，建议构建如下评估权重体系。

表 3 评估权重体系

评价维度	权重	内容说明
课堂参与	20%	出勤、讨论、即时反馈
阶段作业	30%	构图草图、拍摄计划、视觉风格板等
项目成片	40%	完整短片质量与主题表达
作品阐述	10%	对拍摄创意、造型策略的分析与表达

此外，教师还可引入学生互评与自评机制，尤其在作品展示环节中，让学生参与到彼此的评价中，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其批判性思维能力，还能激发自我反思意识，促使其从观众与创作者两个角度去理解影像造型的复杂性。综上所述，构建“过程 + 成果”双维评估体系，有助于更加全面、立体地评价学生在《影视画面造型》课程中的学习成效，真正实现教学目标与能力导向的一致性，也更契合当前高等教育倡导的“以评促学、以评促改”的教学理念。

三、结束语

《影视画面造型》作为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的重要基础课程，不仅承载着视觉造型语言训练的职能，更承担着引导学生形成艺术表达能力与审美判断力的教育使命。在“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引领下，本课程的教学改革必须从传统的技能训练思维中跳脱出来，转向以“视觉表达”为核心导向的综合能力塑造。这不仅要求课程内

容结构的系统化重构，更需要教学方法、评价机制与育人理念的整体协同。

本文通过对当前课程教学现状的分析，指出存在理论与实践脱节、内容碎片化、学生参与度不均等问题，进一步提出了以“表达导向”为目标的教学策略，包括模块化课程结构构建、“项目式+任务驱动”的教学方法引入，以及过程与成果并重的多元评价机制。教学实践证明，这些策略不仅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影像造型能力与创作积极性，更能在潜移默化中加强其团队协作意识、批判性思维与社会观察力。

与此同时，课程在实施过程中也面临一些现实挑战，如师资队伍的复合能力建设、教学资源的配备更新、与行业实践的深度联动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学校管理层、教师团队和外部资源的协同参与，真正实现“课堂—社会—产业”三位一体的教学生态建设。

未来，《影视画面造型》课程应在保留专业性与艺术性的基础上，继续加强课程思政、美育引导与跨学科融合的探索，推动形成更加贴近时代、贴近学生、贴近现实的教学体系。唯有如此，课程才能真正承担起育人使命，为影视艺术领域培养具备创意思维、实践能力与人文关怀的新时代应用型复合人才。

参考文献：

- [1] 刘生成.基于案例分析的专业课程思政元素融入——评《新闻传播学课程思政案例》[J].科技与出版,2024,(10):152.
- [2] 于舸,王爽.“TDP”教学模式下口语传播课程教改与创新实践——以浙江传媒学院“媒体口语表达基础”课程为例[J].中国广播电视台学刊,2024,(10):104-108.
- [3] 王玢.课程思政理念融入传媒类专业教学的价值与路径[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23,(40):106-108.
- [4] 杨名宜.新媒体课程线上线下融合教学新样态[J].传媒,2023,(02):83-85.
- [5] 王春美.基于 OBE 理念的新闻实践课程教学设计与改革——以音视频节目制作为例[J].传媒,2020,(03):81-84.
- [6] 郭健鸣,申雪凤.数字媒体技术类课程慕课教学研究初探——以广西艺术学院为例[J].传媒,2018,(19):84-86.

Teaching Design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Film and Television Screen Modeling: A Study Based on Application-Oriented Talent Development

Xing Lu

(Greater Bay Area Film and Television School, Zhujiang College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900, China)

Abstract: Amid the broader trend of “New Liberal Arts” construc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professional art courses are facing dual challenges of capability development and value cultivation. As a fundamental course for Film and Television Photography and Production majors, Film and Television Screen Modeling plays a key role not only in building students' visual expression skills but also in integrating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ideological-political elements into teaching. This paper, guided by the goal of training application-oriented talents, examines the current issues in the course's objectives, content structure, teaching methods, and assessment strategies. It proposes a series of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including shifting from technical training to visual expression, constructing a modular curriculum system, implementing project-based and task-driven teaching models, and developing a dual-dimensional assessment framework focusing on both process and outcome.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se reforms significantly promote students' transformation from technical executors to creative visual narrators, advancing the synergy between practicality, artistry, and holistic education in film and television instruction. The study provides practical insights for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similar courses in applied art education.

Keywords: Film and Television Screen Modeling; Application-Oriented Talent; Project-Based Teaching; Visual Expression; Assessment System; Curriculum Reform

虚拟世界中的自我认同：时空模糊性的教育哲学探讨

侯睿辰

(福建师范大学, 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虚拟世界的时空特性对基于现实经验的自我同一性理论构成了根本性挑战。本文从教育哲学视角出发，系统批判了将虚拟身份视为纯粹虚构的“朴素虚构主义”观点。通过整合笛卡尔、休谟以及克拉克与查默斯等人的哲学理论，本文论证了虚拟环境中的自我呈现出时间上的流变性与空间上的延展性，从而具有内在的模糊性。这种时空模糊性导致个体在情感道德、自我认知与社会互动等方面面临新的发展态势。教育实践应超越简单的“虚拟/现实”二元论，引导学生在虚实交织的体验中整合多重身份，致力于构建一种具有动态韧性的自我同一性。

关键词：虚拟世界；自我同一性；时空模糊性；教育哲学；延展自我

DOI: doi.org/10.70693/jyxb.v1i3.87

引言

随着元宇宙、沉浸式游戏等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虚拟世界已逐渐成为个体进行自我探索与身份建构的重要社会文化场域。这一背景下，我国教育数字化战略亦明确推进：2022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将“推进教育数字化”纳入“数字中国”建设的整体布局。与政策引导并行的是青少年网络实践的普遍化与现实化，据《第6次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2024）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已突破1.96亿，互联网普及率高达97.3%，昭示着虚拟空间已成为当代青少年成长的基本环境^[1]。

这一结构性变迁不仅拓展了人类互动的物理边界，更对源自现实经验传统的自我同一性理论提出了深刻的哲学性质疑。在虚拟环境中，个体通过化身（Avatar）进行的多重角色扮演、跨时空互动与身份实践，使得自我同一性的边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已有实证研究揭示了其中的发展困境：网络社交媒体的使用虽可能通过强化“成就型自我同一性”间接提升青少年生活满意度，但也可能通过加剧“弥散型自我同一性”对其心理适应产生负面影响^[2]。更有研究指出，部分大学生在社交媒体中呈现出“虚拟自我”“现实隔离”等依赖现象，不仅改变自我认同的载体，也弱化了现实社会支持系统，甚至引发自我认同危机^[3]。

从埃里克森（Erik·H·Erikson）的发展阶段论到玛西亚（Marcia）的状态模型，传统的自我同一性理论均植根于相对稳定的现实社会结构与时空经验。然而，虚拟世界的“时空模糊性”——即时间维度的流动压缩与空间维度的弹性延展——动摇了这些理论的解释根基。在此背景下，一种将虚拟身份简单视为“虚构”的“朴素虚构主义”观点在教育实践与哲学讨论中颇具影响，但其理论简化倾向无疑遮蔽了问题的深度，亦难以回应当代青少年在虚实交织环境中的认同发展现实。

基于此，本文旨在从教育哲学视角完成三重任务：其一，系统梳理并批判关于虚拟自我认同的“朴素虚构主义”立场；其二，引入休谟（David Hume）的怀疑主义自我观与克拉克（Clark Andy）的延展心灵理论，构建理解虚拟自我“时空模糊性”的哲学框架；其三，探讨该框架对教育实践的启示，论证教育应如何引导学生在虚实交织的语境中，实现自我同一性的整合与建构，以回应数字时代人的发展的现实挑战。

一、理论背景：自我同一性的经典框架与虚拟世界的新挑战

自我同一性（personal identity）作为人格发展的核心概念，其理论演进本身即为一个不断挣脱单一框架、拥抱复杂性的过程。埃里克森将其界定为个体在生命周期中对自我价值观与社会角色的探索与确认^[4]。具体而言，自我同一性不仅包括个体对自身过去经历和人格特征的认同（如遗传禀赋、早期经验等），还涉及个体对未来的

作者简介：侯睿辰(2002—)，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比较教育学；

通讯作者：侯睿辰

规划与定位（如职业发展、社会角色认知等）^[5]。玛西亚通过“危机”与“承诺”两个维度，进一步将自我同一性细化为获得、延缓、早闭和扩散四种状态，为实证研究提供了可操作化的理论工具^[6]。克罗格（Kroger,2007）则强调，这一建构过程是贯穿生命全程的、动态的，而非仅限于青少年阶段的静态结果^[7]。

然而，上述理论均预设了一个相对稳定、连续的现实社会环境作为自我建构的环境，虚拟世界的兴起彻底改变了这一情况。有学者从知觉现象学出发，指出用户是依靠“信息技术身体”介入游戏世界的，这一概念描述了一种通过技术界面（从手柄到VR设备）延伸了自身的知觉与行动能力，从而与虚拟环境互动的身体状态^[8]。在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MMORPG）或元宇宙平台中，个体正是通过这样的“信息技术身体”自由创设、切换多个虚拟化身，体验在现实世界中难以企及的社会角色与生命历程。这种“身份实验”具有低风险、高自由度的特征，一方面为自我探索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安全空间，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自我感的弥散与同一性承诺的弱化。

教育系统作为个体社会化与自我形塑的关键制度，长期以来依赖于现实世界的互动结构。虚拟世界的渗透，使得传统的教育干预（如生涯规划、价值观教育和社会技能培养），面临失效风险。若教育哲学与实践不能及时回应这种时空结构的变迁，则可能加剧青少年在虚实身份之间的认知割裂与认同困惑^[9]。因此，厘清虚拟自我认同的哲学本质，成为设计适应性教育方案的理论前提。

二、虚拟自我认同的哲学谱系：从朴素虚构主义到时空模糊性

（一）朴素虚构主义及其理论局限

在关于虚拟自我的本体论讨论中，“朴素虚构主义”提供了一种最为直接且极简的解决方案。该立场内含两个紧密关联的核心论断：其一为语义学论断，即主张诸如“谋杀是错误的”或“2是质数”等句子的字面意义为假；其二为本体论论断，认为上述句子所承诺的实体（如“道德错误”、“数字”）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据此，“错误”与“不存在”构成了其理论基石。推及虚拟世界，该观点认为用户的一切第一人称陈述（如“我正在城堡中寻找宝箱”）在性质上等同于小说中的语句，均属完全错误的虚构表达。

然而，这一立场面临两个根本性质疑。首先，它违背了理性的语言实践。在具体的游戏情境中，参与者均将这些陈述默认为在游戏语境下“为真”的交流内容。若严格按照朴素虚构主义的逻辑，任何基于虚拟角色的互动与合作都将无法进行。其次，它无法处理虚实交织的认知产品。例如，玩家在游玩《塞尔达传说：旷野之息》（The Legend of Zelda: Breath of the Wild）时说“我注意到巨石难以翻倒”，这一陈述虽发生于虚拟世界，但其反映的物理学原理在现实世界中同样为真。朴素虚构主义因其过于粗暴的“一刀切”判准，无法应对虚拟体验中复杂的语义与认知问题。

更为关键的是，大量实证研究证实，虚拟自我的体验会对个体的现实自我概念、情感模式与社会行为产生实质性的“遗留效应”（carryover effect）。例如，心理学研究发现，玩家通过虚拟化身进行的行为和身份模拟，会内化其特质，改变自我认知^[10]。这有力地证明了虚拟自我并非一个与现实隔绝的、无害的“虚构”，而是构成了一个具有现实影响力的“延展自我”。此外，对大学生玩家的扎根理论研究进一步揭示了该立场的浅薄：研究发现，玩家在虚拟世界中的身份实践是一种高度理性化的意义寻求过程，其虚拟行为与现实认知和情感紧密交织，远非“虚构”所能界定^[11]。

（二）从拟剧论到扮假作真理论：虚实二元论的困境

作为对“朴素虚构主义”的修正，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拟剧论将社会互动视为一场戏剧表演，个体通过“前台”的角色扮演来管理他人印象。此理论框架下的虚拟身份，可被理解为一种基于特定“情境定义”的想象性建构，是独立于后台“现实自我”的“虚拟自我”^[12]。

分析美学家肯达尔·沃尔顿（Kendall Lewis Walton）提出的“扮假作真（make-believe）”理论，则为此类虚构实践提供了一个更为系统的哲学框架。沃尔顿认为，虚构的本质在于它能在一种“扮假作真”的游戏中充当道具，与特定的规则和参与者的想象共同构建一个“似真世界”^[13]。在此世界中，被激发的想象内容（如“玩家是一名骑士”）构成了“虚构的真理”。据此，虚拟世界中的行为可被界定为一种在游戏规则授权下的“虚构的断言”，它根植于叙事逻辑与工具理性，在原则上与现实身份及其实践相隔离^[14]。

戈夫曼的拟剧论与沃尔顿的“扮假作真”理论，均深刻地揭示了虚拟自我作为社会建构或游戏道具的心理实在性。然而，这两种理论在本质上仍维护了一种虚实二元对立的隔绝状态。它们倾向于将虚拟体验框定在一个自洽的“魔力圈”内，强调其内在的规则与逻辑，却普遍忽略了虚拟体验对个体认知结构、情感模式与行为倾向所产生的、超越游戏边界的实质性反哺效应。例如，一个在虚拟世界中反复实践并习惯于领导团队的玩家，其在现实情境中的自信心与组织协调能力很可能因此得到培育与增强。

这种从虚拟向现实双向渗透与影响的现象，揭示了虚拟自我不再是沃尔顿理论中那个纯粹、自洽的“虚构真

理”的载体，也不再是戈夫曼笔下那个可以随时卸下的“前台”面具。它通过持续的行为反馈与情感投入，与现实自我交织互动，共同构成了一个连续的、动态的自我认同谱系。因此，任何将虚拟自我截然孤立于现实自我之外的理论，都难以充分回应数字时代自我认同的复杂性与整合性需求。

(三) 时空模糊性：一个整合性的哲学框架

为超越上述理论的局限，本文主张回归经典哲学中的怀疑论与延展认知理论，以“时空模糊性”为核心，重新概念化虚拟自我。

1. 时间上的流变性：从休谟的怀疑论到角色的动态建构

在自我同一性的哲学谱系中，笛卡尔 (Descartes) 通过怀疑一切不确定的存在，最终确立了“我思故我在”的命题，将自我界定为恒定不变的认知基点^[15]。在他看来，物体的“广延性”是其不变的核心特质，无论物质经历怎样的变化，他依然保持着空间占据的特性。进一步的，笛卡尔将自我视为思想的延续，他认为，尽管人类思想内容的变化巨大，但只要思想的持续存在不被中断，自我就可以被视为统一^[16]。然而，笛卡尔未曾考虑到心灵在虚拟空间中如何与物质世界分离、重构，并保持同一性。休谟在《人性论》中对此进行了彻底的解构，他质疑了笛卡尔对自我持久性的假设，认为自我并不是一个恒定存在的实体，而是由不断变化的感知与印象构成的^[17]。其指出，所谓的“自我”并非如笛卡尔所预设的那样是一个同一的、持续的实体，而不过是“一束知觉的集合”，是“以不能想象的速度互相连续着、并处于永远流动和运动中的知觉的集合体”^[18]。休谟对恒定自我的解构，在虚拟世界中找到了其经验性的印证场域——虚拟身份的本质，正是一种依赖于持续交互与叙事建构而存在的“知觉之流”。

角色体验“认知建构观”为这一哲学洞见提供了生动的经验注脚，该观点指出，玩家的角色体验并非静态的心理模式，而是一个在时间中展开的、动态的认知建构过程，具体包括“角色预想”、“角色塑造”与“角色消隐”三个阶段^[19]。例如，在游戏《旺达与巨像》中，玩家对角色“旺达”的认知，从最初“英雄救美”的理想化想象，随着游戏叙事的推进，逐步被重塑为对“渺小个体对抗宿命的悲剧性”的深刻认识。这一过程不仅揭示了自我认同在虚拟时间维度上的叙事流变性与可塑性，更呼应了休谟对自我作为“知觉束”的哲学诊断——自我不再是先验的给定实体，而是在叙事的连续性与交互的选择性中不断被建构的产物。

这种时间上的流变性在玩家的身份实践中亦清晰可辨。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归纳出，玩家在虚拟环境中会形成诸如“最强大佬”、“社交中枢”、“万年咸鱼”等多样化的身份类型，而这些身份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玩家内在需求的演变、现实压力的介入以及游戏内部境遇的转换而动态转化^[20]。这一现象进一步印证了虚拟自我在本质上正是休谟所描述的“一束知觉”在数字时代的流动集合，是自我在时间维度上不断生成与消解的动态过程。

2. 空间上的延展性：从克拉克的“延展心灵”到“信息技术身体”

安迪·克拉克与大卫·查默斯 (David Chalmers) 提出了“延展心灵假说”主张：人类的心灵并非局限于个体的生物大脑，而是可以通过技术、工具等外部媒介得以“延展”^[21]，将这一假说应用于虚拟世界，我们可以合理地推论：自我同样是可以延展的。在虚拟世界中，个体的自我认同不仅仅依赖于物理身体的存在，还与虚拟角色、在线互动和数字化工具密切相关，这一观点为理解虚拟游戏玩家的身份构建提供了理论支持。游戏中的“我”不仅仅是玩家的物理自我，更是通过与虚拟世界中的角色、任务和情节的互动来塑造和表现的延展自我。吴一迪提出的“信息技术身体”概念，正是“延展自我”在虚拟空间中的具体化呈现。他指出，在电脑游戏中，“玩家利用信息技术身体远程遥控器如同木偶一般的虚拟化身”，而随着技术发展，尤其是在 VR 游戏中，“玩家将身体其境地视自身源于游戏世界中”。玩家的虚拟化身、操控设备乃至整个游戏世界的规则，共同构成了其进行认知与身份实践的外部组件。自我因此模糊了其生物身体的边界，与虚拟环境深度融合，呈现出空间上的延展性。当玩家熟练运用“信息技术身体”后，设备会如梅洛-庞蒂 (Maurice Merleau-Ponty) 所说的盲人手杖一样变得“透明”，成为身体图示的一部分，从而实现了主体知觉向虚拟空间的成功投射^[22]。

这种延展性因移动媒介的发展而愈发显著。研究表明，手机的普及使游戏从固定的“魔力圈”中解放出来，渗透进“起床、吃饭、候车”等日常生活的所有间隙^[23]。玩家的身份也随之从一种刻意为之的角色扮演，延展为一种在虚实交织的时空中流动的、伴随性的状态。自我不再是禁锢于生物身体的存在，而是通过信息技术身体与移动媒介深度融合，弹性地分布于虚实交织的空间之中。

综合而言，虚拟世界中的自我在时间上是休谟式的流动集合与汪博所描述的动态建构过程，在空间上是克拉克式的延展系统与吴一迪所界定的信息技术身体。这种“时空模糊性”并非一种需要被克服的缺陷，而是数字时代自我认同的新常态。

三、教育哲学的回应：在时空模糊性中培育韧性的自我同一性

虚拟自我认同的时空模糊性对教育目标、内容与方法提出了全新要求。教育不应试图消除这种模糊性，将学生拉回一个纯粹的“现实”，而应引导学生学习如何在模糊性中智慧地生存与建构。

（一）推动批判性的身份整合教育

教育者应注意到，玩家在虚拟角色选择上存在“自我一致性”与“自我差异性”的复杂心理^[24]。因此，教育者应设计结构化的反思活动，主动介入并引导汪博所描述的角色体验的“认知建构”过程。例如，在学生接触新游戏前，可引导其进行“角色预想”分析；游戏中，通过“数字身份自传”等形式，鼓励学生持续反思其虚拟行为与角色认知的变化（即“角色塑造”阶段）；在游戏后，则引导学生思考虚拟经历对现实自我的影响。其目的不是达成单一凝固的自我定义，而是培养学生管理多重身份、整合虚实自我的元认知能力，最终引导其身份认知从二元对立的“脱离与抵抗”走向与现实的“有机统一”^[25]。

（二）构建虚实交融的道德教育场景

鉴于虚拟世界的匿名性可能诱发行为失范^[26]，利用其作为道德学习的“安全模拟器”显得尤为重要。教育者可借助角色扮演游戏中的道德困境任务，利用信息技术身体所带来的沉浸感（Immersion）与临场感（Presence）^[27]，让学生在承担后果风险较低的环境中，进行深度的道德判断与抉择。之后通过苏格拉底式的诘问，引导学生将虚拟情境中的道德推理迁移至现实生活的类似场景中，从而打通虚实场域的伦理思考，促进其道德认知与情感的统一发展。

（三）培养跨介质的社交与文化素养

面对游戏社交可能依赖甚至挤压现实社交时间的风险^[28]，教育必须明确地将跨介质的社交素养纳入课程目标，其核心是教会学生有效地管理其延展出去的社会自我，稳健地驾驭虚实交织的关系网络。这包括理解不同虚拟社群的行为规范、发展跨文化沟通的敏感性、以及对线上身份与线下身份进行有意识的整合与管理，从而帮助学生稳健地驾驭其跨越虚实边界的延展自我。

四、结论与展望

虚拟世界的出现并非创造了一个与现实对立的“虚幻王国”，而是深刻地重塑了人类自我认同的时空结构。本文通过批判“朴素虚构主义”的浅薄，并整合休谟与克拉克的理论，论证了虚拟自我在时间与空间维度上的内在模糊性。这一哲学诊断启示我们，教育在数字时代的基本使命之一便是帮助学生直面并驾驭这种模糊性。

未来的研究可在两个方向继续推进：其一，开展深入的实证研究，追踪不同教育干预策略在促进青少年虚实身份整合方面的长期效果；其二，与神经科学、认知科学进行跨学科合作，探究虚拟体验对大脑发育与自我表征的生理性影响。唯有通过理论与实践的持续对话，教育哲学才能为在虚实交织的时空中成长的一代，提供真正富有洞察力的精神指引。

参考文献：

- [1] 中国青年网. 报告：未成年人网络普及率达 97.3% 建议引导“小网民”用好互联网[EB/OL]. (2024-11-24). https://news.youth.cn/gn/202411/t20241124_15670305.htm.
- [2] 曲苒, 倪晓莉. 网络社交媒体使用对青少年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自我同一性状态的中介作用[J]. 心理与行为研究, 2020, 18(02): 214-219.
- [3] 龚劲丹, 龚吴蔚. 大学生“社交媒体依赖”的心理干预[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23, 43(27): 46-50.
- [4] WELCHMAN K. Erik Erikson: His Life, Work and Significance[M]. 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0: 127-128.
- [5] 郭金山. 西方心理学自我同一性概念的解析[J]. 心理科学进展, 2003, (02): 227-234.
- [6] MARCIA J E, WATERMAN A S, MATTESON D R, et al. Ego-identity: The Handbook of Psychosocial Research[M]. New York: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3: 1-21.
- [7] KROGER J. Discussions on Ego Identity[M]. London: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93: 5-14.
- [8] 吴一迪. 从知觉现象学看玩家对游戏世界的介入[J].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2018, 35(06): 123-128.
- [9] 张馨月, 邓林园. 青少年感知的父母冲突、自我同一性对其网络成瘾的影响[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 志, 2015, 23(05): 906-910.
- [10] 衡书鹏, 赵换方, 范翠英, 等. 视频游戏虚拟化身对自我概念的影响[J]. 心理科学进展, 2020, 28(05): 810-823.
- [11] NG Y C J, 高丁佳, 谭清美. 基于经典扎根理论的游戏身份构建研究[J]. 西部学刊, 2019, (23): 134-140.
- [12] 王晴锋. 戈夫曼拟剧论的内涵、误释与道德性[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04): 182-188.
- [13] WALTON K L. Fiction, Fiction-Making, and Styles of Fictionality[J].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1983, 7(1): 78-88.
- [14] 龚玺. 扮假作真的模仿—肯达尔·沃尔顿的虚构理论[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20.
- [15] 笛卡尔. 谈谈方法[M]. 王太庆,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26-27.
- [16] 笛卡尔. 第一哲学沉思集[M]. 庞景仁,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 26.
- [17] 休谟. 人性论[M]. 关文运,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290.
- [18] 高秉江. 西方哲学史上人格同一性的三种形态[J]. 江苏社会科学, 2005, (04): 32-37.
- [19] 汪博. 电子游戏中玩家的角色体验研究[J]. 装饰, 2017, (08): 115-117.
- [20] NG Y C J, 高丁佳, 谭清美. 基于经典扎根理论的游戏身份构建研究[J]. 西部学刊, 2019, (23): 134-140.
- [21] CLARK A, CHALMERS D. The extended mind[J]. Analysis, 1998, 58(1): 7-19.
- [23] 周帅. 脱离、抵抗与回归: 基于媒介移动性的玩家身份流动研究[J]. 东南传播, 2021, (03): 19-23.
- [24] 刘懿璇, 何建平, 高原. 具身、镜像与认同: 基于扎根理论的移动游戏玩家身份构建研究[J]. 北京青年研究, 2021, 30(01): 28-36.
- [25] 赵红勋, 陈霞. 角色认知与关系建构: 青年游戏实践的社会交往研究——基于《王者荣耀》游戏玩家的学术考察[J]. 未来传播, 2021, 28(06): 50-57+122.

The Construction of Self in the Digital Realm: Spatiotemporal Liquidity and 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Hou Ruichen

(College of Education,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China)

Abstract: The unique spatiotemporal nature of virtual worlds fundamentally challenges traditional theories of ego-identity grounded in real-life experiences. Employing an educational philosophy framework, this paper offers a systematic critique of "Naïve Fictionalism"—the perspective that dismisses virtual identities as mere fiction. Drawing on the philosophical work of Descartes, Hume, and Clark & Chalmers, it is contended that the self in digital environments is characterized by temporal fluidity and spatial extension, resulting in inherent ambiguity. This spatiotemporal ambiguity creates novel developmental conditions for individuals, impacting their moral emotions, self-perception, and social interactions. Consequently, education must move beyond the rigid virtual/reality dichotomy and foster students' ability to integrate multiple identities within a hybrid reality, ultimately cultivating a dynamically resilient sense of self.

Keywords: Virtual Worlds; Ego-Identity; Spatiotemporal Ambiguity;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Extended Self

中小学课间延长的网络舆情分析

胡卓妮

(中南民族大学教育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0)

摘要: 课间是两节课之间必要的间隔时间, 是中小学生调节学习状态、缓解疲劳和相互交流的重要时段。将中小学课间延长是新学期一些学校采取的新举措, 及时把握相关的网络舆情, 有助于了解家长、学生以及社会各界对这一改革措施的反馈和意见, 进而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相应调整和优化, 确保课间延长政策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文章提出了严监控课间延长, 确保政策落实、改学校办学评价, 健全事故认定机制、增特色校园活动, 丰富学生体验、重身心健康发展, 减轻学生负担四个方面的建议。

关键词: 中小学; 课间活动; 网络舆情

DOI: doi.org/10.70693/jyxb.v1i3.89

一、问题的提出

从新学期开始, “课间一刻钟”成为不少省市中小学校的“标配”。北京市、福建泉州市、江苏无锡市新吴区等多地将课间从10分钟延长至15分钟, 引导师生走出教室、走向户外、走进阳光。这个举措的出发点是想改善中小学课间管理的现状, 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因为当前许多中小学在课间管理上采取了较为严格和保守的策略。出于对学生安全的考虑, 一些学校对课间活动进行了严格的限制, 甚至出现了“禁止奔跑”、“禁止大声喧哗”等规定, 使得原本应该充满活力和欢声笑语的课间变得沉闷而压抑。人们的教育理念也在逐步转变, 开始意识到教育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 更是学生身心全面发展的过程。课间作为学生学习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质量和效果会直接影响到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学习效率。在此背景下, “中小学课间延长至一刻钟”的举措应运而生。

然而, 这一举措的提出引发了广泛的网络舆情讨论。有人认为延长课间时间有助于改善学生的身心健康状况, 提高学习效率; 有人则担心延长课间时间会影响学生的学习进度和课堂纪律; 还有人对此提出质疑, 课间延时是否真正执行到位等等。面对这些不同的声音, 我们需要进行深入的舆情分析, 了解公众的真实需求和期望以及该举措的实际效果, 从而为教育发展提供合理的建议, 构建更加人性化、健康化的教育环境。

二、研究设计与统计分析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抖音和bilibili作为原始文本数据的来源平台, 因为它们分别代表了短视频和弹幕视频领域的两大领军者, 平台的用户基数庞大, 活跃度高, 并且内容涵盖娱乐、教育、科技、生活等多个领域, 可以为文本数据的采集提供丰富的样本。Python作为一种面向对象的解释型计算机程序设计语言, 拥有高效的高级数据结构, 是一款强大的数据挖掘、数据分析与可视化工具。本研究在数据采集中以Python编程接入抖音和bilibili平台, 获取样本数据。

通过对抖音平台中国新闻网用户发表的“小课间从10分钟延长至15分钟”视频(2024年9月26日发布)相关评论和bilibili平台人民网用户发表的“北京中小学课间休息调整为15分钟”视频(2024年8月30日)两周以内的评论的抓取, 共获得5232条原始文本数据。同一个网民、同一个ip所发的多条评论只算作一条, 所以在剔除无关文本和重复文本后, 剩余4581条文本数据。

(二) 数据统计

我们将所有的评论归为三大类: 第一类是网民对于这个事件的态度: 赞同还是不赞同; 第二类是网民赞同该

作者简介: 胡卓妮(2001—),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

通讯作者: 胡卓妮

事件的原因；第三类是网民不赞同该事件的原因。各类评论的计量与所占比率见表1。

表1 “中小学课间延长”的网络舆情统计

类别	计量(个)	所占比例(%)
赞同还是不赞同	2836	61.9
赞同的原因	589	12.9
不赞同的原因	1842	40.2
百分比超过100%，因为有重复		

关于“中小学课间延长”的网络舆情统计，调查结果显示，有2836人表达了对这一政策的看法，占总调查人数的61.9%。这一比例表明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群对“中小学课间延长”这一政策持有明确的看法，无论是赞同还是不赞同，都反映出该政策在社会中具有较高的关注度。此外，有589人给出了赞同的具体原因，占总人数的12.9%。虽然这个比例相对较低，但它仍然表明有一部分人对课间延长政策持有积极态度，并愿意为此提供理由。还有1842人给出了不赞同的具体原因，占总人数的40.2%。如此高的比例表明该政策在公众中具有一定的争议性，至少存在一部分人对政策的具体内容或实施方式有所担忧。

(三) 讨论分析

1. 网民对该政策的态度分析

根据表2的数据，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到不赞同该政策的人数占据了明显多数，共有1999人，这一数字占据了总人数的70.5%。这一结果表明，大部分网民对这一政策持有反对或保留意见，他们对该政策的内容、实施方式或预期效果存在疑虑或担忧。相比之下，赞同该政策的人数则显得较少，仅有837人，占总人数的29.5%。虽然这一比例低于不赞同者，但也反映出有一部分网民对该政策持支持态度，他们认为该政策有助于解决实际问题、符合他们的期望和需求。

综上所述，这揭示了网民对这一政策的态度呈现出明显的分布不均，不赞同者占据了绝大多数，而赞同者则相对较少。这种态度分布不均可能反映了政策本身存在的问题，或者公众对政策的误解和疑虑。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这些数据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有助于他们更好地了解公众对政策的看法和态度，从而进一步完善和优化政策内容，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表2 网民对该政策的态度

态度类别	计量(个)	所占比例(%)
赞同	837	29.5
不赞同	1999	70.5
总计	2836	100

2. 赞同的原因分析

我们依据网民言论的支持率高低将赞同“中小学课间延长”的各类代表性言论有选择性地呈现，如表3所示(在复述这些评论时并未进行修改)。

表3 赞同“中小学课间延长”的代表性言论

代表性言论	二级编码	一级编码
1. “挺好的，上厕所不用跑了” 2. “有时间上厕所了” 3. “给孩子一个自由社交的时间”	日常活动满足	
1. “支持给学生一个很美好的童年！” 2. “无比赞同！要让孩子有童年” 3. “给孩子一个愉快的童年，去户外去接触大自然！感受生命的自由与美好！”	珍视美好童年	儿童福祉关怀
1. “都是祖国的栋梁，不能累着” 2. “卷也没用，还不如健健康康的[赞]‘身心健康’” 3. “太好了，一定要让孩子们多见阳光，多在阳光下活动，这样的话，抑郁的人，心理有问题的人都会减少，很多病都会避免，体育课不被其他课占就更好了。愿我们的政策越来越成熟，孩子们越来越健康！”	关注孩子健康	

如表3所示,可以将网民赞同“中小学课间延长”的原因归纳为儿童福祉关怀维度,再细分为日常活动满足、珍视美好童年和关注孩子健康3个方面。

(1) 课间延长有助于提升学生的日常活动满足度

课间时间的延长为学生们提供了更加充裕的休息时间。在以往短暂的课间里,学生们往往只能匆忙解决生理需求,如上厕所等,而无法充分放松身心。然而,当课间时间延长至一刻钟时,学生们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去处理这些日常活动,不再因为时间紧迫而感到焦虑或不安。此外,课间时间的延长还为学生们提供了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机会。他们可以在课间与同学们聊天、分享趣事,或者在操场上进行简单的体育活动,这些都有助于缓解学习压力,提升学生们的日常活动满足度。

(2) 课间延长有助于珍视和保护学生的美好童年

童年是每个人生命中最重要的时期之一,它充满了快乐、探索和成长。然而,在现代社会,学生们往往面临着巨大的学习压力,导致他们的童年时光被大量的学习任务所占据。课间时间的延长为学生们提供了一个逃离学习压力、享受童年乐趣的机会。在课间,学生们可以自由地玩耍、聊天,或者参与各种有趣的活动。这些活动不仅有助于学生们释放压力、调节情绪,还能让他们更加珍惜和享受童年时光。通过课间时间的延长,我们可以更好地珍视和保护学生的美好童年,让他们在未来的生活中拥有更多美好的回忆。

(3) 课间延长有助于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长时间的课堂学习容易让学生们感到疲惫和压抑,而课间时间的延长则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放松身心、恢复精力的机会。在课间,学生们可以进行简单的体育活动,如跑步、跳绳等,这些都有助于提高他们的身体素质和免疫力。此外,课间时间的延长还有助于缓解学生们的心理压力。在课间,他们可以与同学们交流互动,分享彼此的感受和困惑,从而得到情感上的支持和安慰。这种情感支持对于学生们的心理健康至关重要,有助于他们更好地应对学习和生活中的挑战。^[1]

3. 不赞同的原因分析

我们依据网民言论的支持率高低将不赞同“中小学课间延长”的各类代表性言论有选择性地呈现,如表4所示(在复述这些评论时并未进行修改)。

表4 不赞同“中小学课间延长”的代表性言论

代表性言论	二级编码	一级编码
1. “讲了很好,但很难执行”		
2. “不要假大空,去学校看看吧,几个学校能做到,做不到怎么办?”		
3. “上面是上面,下面是下面”	政策执行问题	
4. “唯分数的评价机制不变,恐怕难落实”		
5. “检查的来了就有课间、检查组一走全部拖堂”		执行效果
1. “能否全国各地都一样”		
2. “山河四省表示:什么是课间”	地方差异问题	
3. “这能比么,北京的学生穿着昂贵的礼服开晚会时,河北的学生在没有空调的教室里上着自习,重复机械的刷着题”		
1. “没用,一样拖课,10分钟下课,下课铃响晚一分钟,预备铃响早两分钟”	时间管理问题	
2. “通过将十分钟课间改为十五分钟,上课时间从四十五分钟变成了五十分钟”		实施现状
1. “延到15分有什么用?老师学校要求课间不能离开教室,更不能到操场去,延多少都没有用!”	活动限制问题	

代表性言论	二级编码	一级编码
2. “我们课间大概保持在 2-5 分钟内，还不准出教学楼”		
3. “老师们为了自保不让孩子动弹，最后就是越来越畸形”		

如表 4 所示，可以将网民不赞同“中小学课间延长”的原因归纳为执行效果和实施现状维度，执行效果维度可再细分为政策执行问题和地方差异问题 2 个方面，实施现状维度可再细分为时间管理问题和活动限制问题 2 个方面。

(1) 政策的有效执行是确保成功的关键

政策的初衷是希望通过延长课间时间，为学生提供更多的休息与放松机会，从而缓解学习压力，提升身心健康。虽然课间延长政策的初衷良好，但实际操作中可能面临执行不力的问题，从网民的评论中也可以看出，很多人对政策是否真正执行持怀疑态度，认为在实际操作中，政策往往只是被挂在墙上，而不会真正得到贯彻执行。因此，为确保政策效果，需要建立健全的监督机制，确保学校、教师能够严格按照政策要求执行。同时，通过定期评估与反馈，及时调整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问题，确保政策能够真正惠及每一位学生。

(2) 地方差异是影响政策执行效果的重要因素

由于不同地区在教育资源分配、文化背景积淀以及教育理念秉持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同一项政策在不同地区的执行效果会呈现出明显的区别。一些地区，得益于较为丰富的教育资源、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以及先进的教育理念，能够迅速理解并有效适应“课间延长至一刻钟”这一政策。然而，另一些地区则可能因为资源匮乏、文化惯性较强或是教育理念相对滞后，而在执行这一政策时面临诸多挑战。因此，面对这样的现实差异，我们不能采取“一刀切”的策略，而是需要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实际情况，量身定制灵活多样的政策执行方案。在政策设计时，就需要充分调研，了解各地需求，确保政策既有统一性，又富有弹性，能够兼容并蓄，适应多样化的地方环境。同时，加强地区间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推动政策的落地与实施。

(3) 优化课程安排与时间管理，确保课间有效利用

在实施现状中，时间管理问题无疑是一个需要被高度重视的焦点。课间时间的延长，虽然旨在为学生提供更多的休息与放松机会，但同时也对原有的紧凑课程安排产生了一定的冲击，这就要求学校必须对课程进行重新调整和优化，以确保教学质量与学生学习效率不受影响。学校管理层需要细致规划，既要保证课程的连贯性和完整性，又要兼顾学生的休息需求。与此同时，教师作为课间时间管理的直接执行者，其角色至关重要。他们需加强对课间时间的管理，确保学生能够真正利用这段时间进行身心的放松与恢复；引导学生理解课间休息的重要性，避免将宝贵的休息时间用于额外的学习任务或其他非休息活动。为了保障课间时间的正常进行，学校还可以采取一系列措施，如设置明确的课间铃声，提醒师生按时休息；安排课间巡逻，确保课间秩序井然，同时及时发现并解决可能存在的问题。

(4) 放宽课间活动限制，提供多样化的课间体验

活动限制问题也是影响课间延长政策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些学校出于安全或管理的考虑，可能会对学生的课间活动设置过多的限制，导致学生的课间时间被局限在教室或教学楼内，无法充分享受户外活动的乐趣，也无法真正体验到课间延长带来的身心放松。因此，我们需要积极鼓励学校放宽对课间活动的限制，为学生提供更多样化的课间活动选择，如组织户外游戏、开展体育锻炼等，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度过课间时光。当然，在放宽活动限制的同时，加强安全教育也是必不可少的。学校应定期开展安全教育课程，提升学生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确保他们在课间活动中的安全。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我们可以更好地发挥课间延长政策的积极作用，为学生的健康成长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四、讨论与建议

“课间延长”政策实施的初衷是为了让孩子们能有更多的休息与活动时间，以减轻学习压力、提升身心健康，并且这一政策在理论上是有一定益处的。然而，根据网民的评论可以看出，该政策的实施力度以及实际效果并未完全达到预期，引发了诸多不满。因此，为了使得“课间延长”政策能够更好地执行下去并有效发挥作用，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 严监控课间延长，确保政策落实

1. 建立监管机制

为确保课间延长至 15 分钟的政策得到有效且持久的执行，我们亟需构建一个全面而高效的监管体系。这一体系应吸纳教育部门、学校管理层、家长委员会及学生代表等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到政策的监督与评估中来。教育部门可负责宏观政策的制定与指导，学校管理层则具体负责政策的落地与日常监管，家长委员会和学生代表则提供来自家庭与学生视角的监督与反馈。通过定期召开会议、开展联合检查等方式，我们可以对政策的执行情况进行全面而深入的评估，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

2. 设立反馈渠道

为了更加精准地掌握课间延长政策的执行情况，我们还应积极设立多样化的反馈渠道。鼓励学生、家长和教师以匿名或公开的方式，通过学校意见箱、在线调查平台、热线电话等多种途径，对课间时长的执行情况进行实时反馈。这样的反馈机制不仅可以及时发现政策执行中的偏差与不足，还能让相关部门迅速获取第一手信息，从而采取更加有效的纠正措施。同时，我们也应保护反馈者的隐私与权益，确保他们不会因提供反馈而遭受任何不利影响。

3. 利用技术手段

在数字化时代，技术手段已成为提高监管效率与精准度的有力工具。因此，我们可以考虑介入学校的监控设备或利用现有的教学管理系统，对课间的实际时长定期进行抽查，并对师生的活动轨迹、行为模式等进行全面监测。通过数据分析与挖掘，发现政策执行中的潜在问题与规律，为政策调整与优化提供科学依据。

（二）改学校办学评价，健全事故认定机制

为何学校学科老师要挤占学生课间加班加点上课？就是因为一些地方教育部门只用升学率来评价学校办学与教师教育教学的效果，对学校违规挤占学生课间、体育课视而不见。如果不破除唯分数、唯升学评价，课间时长延长到 15 分钟后，还是可能被挤占。事实上，以前的大课间 30 分钟，给了学生充足的活动时间，但是，“大课间静悄悄”、被用于上课的比比皆是。学校、老师要求学生在课间不要离开教室外出活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了“推责”，避免把过多时间、精力用于纷争中，取消有安全隐患的课间活动、户外活动，对学生进行“圈养”。^[2]

因此，延长课间时长，只是把课间交给学生的第一步。要让学生充分享有课间时间，维护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就必须切实推进教育评价改革，不能再片面地用升学率评价学校，而要重视学校的教育过程，对学校办学与教师教学进行过程性评价。另外，要依法界定学校、老师的教育职责，不能再把学校视为“无限责任主体”。对于学生在校园里发生意外伤害事故，要依法界定学校、老师的责任，如果学校、老师已经尽到安全教育、安全管理责任，学生在课间活动中出现磕碰等意外伤害，是由于偶然因素或自身原因，则明确学校、老师不承担责任，而是通过鼓励学生（家长）购买学生意外伤害险由保险理赔。如此，才能把学校、老师从安全管理压力中解放出来，不再对学生进行课间“圈养”而是和学生一起走出教室，让学生快乐跳起来、动起来。^[3]

（三）增特色校园活动，丰富学生体验

过去，中小学校课间往往显得过于“安静”，学生们在课间也未能充分释放活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小胖墩、小眼镜等“四小”现象的增多。为了改变这一现状，除了延长课间时间外，还要大力增加特色校园活动，让学生愿意活动，在课间也能享受到运动的乐趣，从而增强体质、培养兴趣。各个学校应该行动起来，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和特色，设计一系列丰富多彩的课间活动。

目前已经有的学校开始实施了。例如，北京市朝阳实验小学密云学校根据不同年级学生特点设计了丰富多彩的课间活动，组织学生走出教室，开展传统游戏。校长徐国文介绍，老师和同学们一起跳皮筋、丢沙包、滚铁环、跳格子，华容道、九连环、神龙摆尾等传统游戏也“回归”了，希望传统游戏成为孩子课间快乐的选择；在北京朝阳区，大课间和劳动教育结合了起来，开放校园种植区、动物养殖区，划分班级责任田、安排动物管理员，丰富学生课间生活；湖北襄阳市，根据办学特色和区域特点将学校划分成武术、轮滑、舞龙舞狮、竹竿舞等 10 个体育特色片区，各校按照“1+X”模式推进阳光大课间，“1”为片区特色，“X”为学校特色，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阳光体育大课间活动。抖空竹、节奏跳绳、折扇操竹竿舞等“创新版”特色大课间运动项目“百花齐放”。^[4]

我们应该继续探索和实践更多具有创意和实效的特色校园活动，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创造更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在这个过程中，要注重活动的实效性与可持续性。特色校园活动不仅要能够立即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他们的参与热情，更要能够长期持续，成为学生校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我们需要建立科学的活动评估机制，定期收集师生反馈，及时调整优化活动内容与形式，确保活动始终贴近学生需求，保持新鲜感和吸引力。

（四）重身心健康发展，减轻学生负担

在当今社会，随着教育竞争的日益激烈，学生的身心健康问题日益凸显，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为了促

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学生的身心健康，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减轻学生的负担。

首先，重身心健康发展，意味着我们要从源头上优化教育环境，营造一个更加宽松、和谐的学习氛围。学校应鼓励学生参与多样化的课外活动，如体育运动、艺术创作、社会实践等，锻炼学生的身体、培养他们的兴趣爱好、提升综合素质。同时，学校应加强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定期开展心理健康讲座和辅导，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自我认知，学会情绪管理，增强抗压能力。

其次，减轻学生负担，需要我们从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上进行改革。一方面，学校应合理调整课程结构，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内容和应试训练，增加与学生兴趣和未来职业发展相关的课程内容，使学习更加贴近实际，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另一方面，教师应采用更加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如项目式学习、探究式学习等，鼓励学生主动思考、动手实践，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掌握知识，减轻学习负担。

此外，家庭和社会也应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共同为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减负努力。家长应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不要过分追求孩子的学业成绩，而应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给予他们足够的关爱和支持。社会应加强对教育的监督和引导，推动形成正确的教育评价体系，减少对学校和学生的过度压力，为教育创造一个更加健康、公平的环境。^[5]

参考文献：

- [1] 辛君清.中小学落实“课间 15 分钟”的实践方略与保障机制[J].人民教育,2025,(05):66-68.
- [2] 薛晨. 拥抱“15 分钟课间”新生态[J].教育家, 2024(42):31.
- [3] 熊丙奇.课间延长小微调,能否起到大作用[J].北京观察,2024(09):43.
- [4] 姚晓丹, 董城.让孩子们身上有汗, 眼里有光[N].光明日报,2024-10-15(014).
- [5] 李嘉源, 宋立华.教育生态学视角下“课间圈养”的现象剖析及其应对策略[J].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学报,2025,44(09):121-125.

Network public opinion analysis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recess extension

Zhuo-ni Hu

(South-Central Minzu University, Wuhan 430070, China)

Abstract: The break is a necessary interval between two classes. It is an important period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to adjust their learning status, relieve fatigue and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Extending the break betwee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s a new measure taken by some schools in the new semester. Grasping the relevant online public opinion in a timely manner helps to understand the feedback and opinions of parents, students and all sectors of society on this reform measure, and then make corresponding adjustments and optimizations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Ensure that the extension policy can better serve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and overall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four suggestions : strictly monitoring the extension of class break, ens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policies ; improving the evaluation of school running, improving the accident identification mechanism; increas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ampus activities, enriching students ' experience;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and reducing students ' burden.

Keywords: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ter-class activities; network public opinion

幼儿自我调节的干预研究—以深圳市X幼儿园为例

黄绮婷¹ 李丽婷¹

(1.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中心幼儿园(集团)华海金湾幼儿园,广东 江门 529200)

摘要:随着社会进步和教育理念的革新,心理健康得到广泛的关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强调关注幼儿情绪变化、满足心理需求及家园共育的背景下,幼儿的心理健康备受重视。在日常教学实践中,我们观察到部分幼儿存在情绪识别困难、社交退缩及抗压能力薄弱等心理发展障碍。为有效应对这些问题,本研究聚焦大班有情绪控制障碍的幼儿果果,采用绘本教学作为干预手段,通过精选绘本、互动阅读等方式,助力幼儿改善情绪管理能力,提升其自我调节能力,为幼儿园心理健康教育的实践提供了新策略。

关键词:绘本教学;自我调节;情绪管理

DOI: doi.org/10.70693/jyxb.v1i3.88

一、个案现状

(一) 个案基本情况

果果是一名大班的幼儿,平日里喜欢沉浸在自我构建的小世界里,性格比较浮躁,容易因为一些小事情而产生情绪波动。在与同伴交往中,果果不善运用语言与同伴协商沟通,遇到问题或不满时习惯直接采取动手的方式解决。例如,当与同伴同时看上一个玩具时,他会直接抢夺;如果其他小朋友触碰了属于他的物品,他会非常愤怒,甚至会动手推打别人。这种情绪失控且行为冲动的表现,使得他在与同伴的交往中频繁出现矛盾,给他的社交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二) 具体事例

1.案例一:积木争夺大作战“小火山的喷发”

在一次区域活动中,果果和几个小朋友在建构区用积木搭建小学。一开始,大家各自在柜子里寻找合适的材料进行搭建。然而,果果在搭建楼房时发现缺少了一个屋顶,他看到乐乐搭建的房子那有可当屋顶的积木,直接走过去,拿走了乐乐的屋顶,乐乐看到了,伸手想拿回积木,说:“这是我先拿到的,我还在用呢!”

随后两人争抢起来,果果情绪激动,一把将乐乐推倒在地上,夺过积木,嘴里喊着:“我要用这个,给我,你不给我,我就打你!”。看到乐乐哭了,其他小朋友们不知所措地看着。

老师听到哭声,立刻上前介入,安抚了乐乐的情绪。老师轻轻拉住果果的手,温和地问道:“果果,你为什么要打乐乐呢?可以告诉我你的想法吗?”“你是想用这个积木搭房子,对吗?”果果一脸不满地说:“他不给我积木,我就打他,我要把他打飞。”老师接着耐心引导:“果果,乐乐没把积木给你,你很生气,对吗?生气是正常的情绪,没有好坏之分,但是打人是不对的。而且这个积木是乐乐先拿到的,你想用那块积木,可以问问乐乐什么时候可以用完,或者你们可以一起想办法,比如轮流使用。”

2.案例二:被抢占的座位

户外活动结束后,老师组织小朋友们回教室坐在座位上听故事。果果换完衣服回到教室,发现自己原先的座位被豆豆坐了,他瞬间生气了,冲到豆豆面前,大声吼道:“这是我的座位,你不许坐!”看到豆豆没有起身让座,果果情绪更加激动,用力推搡豆豆,豆豆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吓得大哭起来。果果看到豆豆哭了,依然推拉豆豆试图想要他离开座位。老师迅速过去,制止了果果的行为,把他带到一边,引导他说:“果果,你是不是觉得豆豆坐了你的座位,你很生气呀?但是座位是大家一起用的哦。”果果依然有点不开心,觉得自己的“领地”被占了。

(三) 基于案例的行为分析

作者简介:黄绮婷(1999—),女,本科,研究方向为学前教育语言教育;

李丽婷(1999—),女,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学前教育语言教育。

通讯作者:黄绮婷

笔者通过对个案的日常观察并结合案例进行分析发现，果果在情绪管理和社会认知方面存在较为明显的问题。

1.情绪：缺乏觉察与调控

果果对自身情绪的识别比较模糊，当需求未得到满足时，无法意识到自己处于生气状态，更难以控制激烈的情绪。在积木事件中，乐乐拒绝给积木，果果瞬间情绪失控，采取推倒、抢夺等激烈行为；座位事件里，看到座位被占，立刻愤怒推搡。这表明他缺乏有效的情绪调节机制，情绪调控能力较弱，不能通过理性思考来控制自己的行为，任由情绪主导行动。

2.行为：欠缺共情与表达

与同伴发生冲突时，果果无法清晰、平和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习惯用肢体动作代替语言沟通。这种表达方式不仅无法解决问题，还容易伤害到他人，导致冲突升级。如在两个案例中，他都没有尝试用言语协商解决问题，而是直接采取暴力行为。

3.规则：弱于理解与内化

果果在社会认知方面存在一定缺陷，无法及时理解他人意图和感受，也缺乏对规则的理解和遵守意识。在积木事件中，他不理解乐乐对积木的使用权；座位事件里，忽视了座位共用规则。这反映出他在社会交往中，缺乏换位思考的能力，不能站在他人角度看待问题，也不清楚在社会环境中应遵循的基本规则。

二、实施方案

基于对果果在园生活的观察，发现果果的负面情绪爆发频次较高，且频发在与幼儿同伴互动较多的游戏活动和生活活动中。结合自我调节欠缺的现状，笔者有针对性的选择相应主题绘本，开展系列教学活动，旨在借助绘本的价值，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式，帮助果果直观的感受绘本中人物情绪、行为等方面的变化，从而提升其自我调节能力。本次以《我变成一只喷火龙了》为例子，对绘本教学干预过程进行详细分析。

绘本教学活动：《我变成一只喷火龙了》

(1) 教学目标：

- ①通过细致观察和理解画面内容，感受画中人物的表情，并体会他们的情绪变化。
- ②认识到“生气”情绪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并初步了解一些管理情绪的方法，培养情绪控制的意识。
- ③学习通过与他人分享感受和自我调节，增强情绪表达和沟通的能力。

(针对果果在情绪管理方面的问题，及4-6岁幼儿认知特点，笔者进行“感知—理解—应用”的递进设计，兼顾认知发展与行为改变。依据果果的情况与目标进行对照，判断其情绪调控改善情况，确保目标达成助力自我调节能力的建立。)

(2) 活动过程：

- ①教师出示绘本封面和扉页，并展示放大图片细节。
- ②采用小组讨论方式，每组内先讨论，再请组代表分享

师：封面上这只小动物是谁呢？他长什么样？

师：不着急，让我们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通过教师引导观察画面中人物的情绪和小组讨论，果果能更准确地识别情绪的外在表现，从不同的角度理解生气情绪。)

③共读环节：故事梳理与情绪体验

(通过具体场景（烧毁朋友家、树木），果果能直观地感知阿古力的情绪变化及“情绪失控”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而联想自己生气时的行为对他人造成的伤害。有利于其建立“情绪与行为关联”的意识，弥补其情绪识别模糊的缺陷。)

④讨论环节：情绪危害与自我调节策略

引导幼儿明白“生气”的危害，形成情绪管理的意识，初步了解一些自我调节情绪的方法：

师：阿古力生气变成喷火龙了，他造成了什么破坏？

师：那阿古丽生气干的事情，是不是和我们生气一样，一生气就会伤害到别人？

师：当你和阿古力一样生气的时候，你会用什么方法去灭火，让自己不生气？

(通过提问引导,教师总结调节情绪的方法,让果果能了解多种情绪管理的策略,逐步改变不良的情绪表达方法,学会用“说”代替“做”。)

⑤复述故事,带领幼儿深入理解“生气”的破坏性,形成情绪管理的意识

⑥角色体验:教师组织幼儿进行绘本角色表演

(通过回顾内容,果果能进一步巩固关于生气和情绪管理方法的知识,并通过角色扮演的形式,让幼儿能够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加深记忆,以便将所学运用到日常生活中。)

(3) 活动延伸:游戏《情绪过山车》

规则:听口令做动作。师:开心(幼儿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开心)伤心(幼儿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伤心)

通过游戏指令,将抽象情绪转化为具体动作,果果在体验游戏过程中其情绪识别与表达能力得到强化。

活动分析与反思

在本次活动中果果对生气这种情绪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可能对其他复杂情绪的分辨不足。在小组讨论时,果果较少表达自己的想法,与教师、同伴互动较少,对情绪管理方法的理解还不够深入,但活动结束后与同伴有冲突时会说出自己的想法,已经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情绪,果果仍需更多的练习和引导。

三、研究结论

针对果果的情况,笔者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绘本教学干预,并在日常生活中给予及时引导。短期干预结果显示,绘本教学对果果自我调节能力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从果果在面对同一情境时前后测的不同反应可以看出。下面展示果果在干预后的访谈对话,侧面反映自我调节的变化。

果果后测访谈:

师:你在扮演菲菲被抢玩具时,心情是怎样的?感觉怎么样?

果:有点生气,还想大叫。

师:如果也有小朋友没有问你就拿你的玩具,你会怎么办?

果:我会说“这是我先拿,我们可以轮流着玩。”

师:那如果他不同意呢?

果:那我跟他说:“等我玩一会儿再给他,或者一起玩。”

通过谈话发现,果果在同一问题的处理上,对比前期有了很大的进步。在日常的观察中笔者也发现他在遇到问题时,情绪爆发的频次明显降低,能够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和幼儿的相处过程中,动手的情况也在逐渐减少,规则意识慢慢加强。例如,学会用商量的语气表达自己对玩具的需求;在教师组织户外活动中,能够遵守规则;面对其他幼儿的不良行为,能够找老师帮助而不是直接动手等。由此可以看出绘本教学作为一种有效的干预手段,能对幼儿的自我调节能力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四、研究建议

通过对果果的短期个案干预及所取得的积极成效,笔者进一步总结出绘本教学在促进幼儿自我调节能力发展方面的一些实践建议,具体如下:

(一) 目标设定:基于学情,递进设计

邢琼琼(2023)提出有效的绘本教学应注重内容的丰富性与可读性,结合幼儿现状,符合幼儿的兴趣爱好,并重视图文结合与审美教育,以提升幼儿的心理发展和教师的教学水平。在设定绘本教学目标前,教师对幼儿的情绪认知水平、表达能力及已有知识经验等进行全面评估,确保目标既符合幼儿实际发展需求,又具有一定挑战性。目标按照认知、技能、情感不同维度进一步细化,设定应体现递进性,并根据幼儿的学习进展和实际能力情况适时调整目标,对于能力较弱的幼儿,适当降低目标难度,注重基础情绪认知的培养;对于能力较强的幼儿,可以增加目标的挑战性,鼓励他们探索更深入的情绪管理方法。

(二) 过程实施:循序渐进,层层深入

绘本教学过程的每个环节应紧密围绕预设目标展开,确保每个任务都有清晰的指向性。教师在绘本教学中,要借助提问、讨论等手段,逐步引导幼儿从对绘本内容的浅表理解走向深度思考,引导其关注故事细节、体会角色感受,领悟故事传达的深层含义。正如刘婷在《情绪主题绘本促进幼儿情绪能力发展的行动研究》中所提,教学环节遵循由浅入深顺序:先建立“情绪—行为”关联以弥补幼儿情绪识别不足;接着通过师幼共读深化其对情绪的理解;最后引导幼儿洞察情绪产生的后果,推动其内在转变。

(三) 方法策略：多元互动，寓教于乐

在绘本教学活动中，积极融入多媒体资源，运用动画、音频、互动小游戏等多种媒体形式，将抽象的情绪概念转化为直观、生动的视听内容，让幼儿更直观地感受情绪的影响。教师要结合绘本内容采用讲述、讨论、角色扮演、绘画、手工制作等多种教学方法，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杨洋（2017）的研究表明，多元化的绘本教学方式对提升幼儿情绪调节能力具有显著效果。因此，教师应充分利用绘本这一载体，开展多样化的教学活动，如绘本阅读活动、绘画创作、戏剧表演等。运用多元教学手段和方式，可以为幼儿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学习体验。

(四) 活动反思：及时评估，持续优化

绘本教学活动结束后，教师应及时进行反思与评估，总结教学过程中的成功经验与不足。通过收集幼儿反馈、观察幼儿表现以数据分析等方式，全面了解教学效果。针对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教师应积极寻找改进措施，及时调整教学策略和方法，优化活动设计。同时，教师应保持持续学习的态度，关注绘本教学领域的最新动态与研究成果，不断更新自己的教学理念与技能，为幼儿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绘本教学服务。

六、结语

本研究基于《学前教育法》背景下，针对幼儿自我调节问题展开绘本教学干预实践，以果果为个案的研究结果清晰地表明，绘本教学在改善幼儿自我调节方面具有显著作用。在绘本教学中通过对目标设定、过程实施、以及活动反思，能够比较详细的针对幼儿的情况给予针对性的干预，从而科学有效的提高幼儿的自我调节能力。然而，幼儿自我调节能力的培养是一个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后续研究可进一步扩大样本范围，深入探究不同类型绘本、不同教学方法组合对幼儿自我调节能力的影响，以不断完善干预策略，为幼儿园心理健康教育提供更为科学、全面的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导。

参考文献：

- [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草案）[EB/OL].(2023-08-28) [2024-05-20].
- [2]于肖楠,张建新.韧性在压力下复原和成长的心理机制[J].心理科学进展,2005,13(5):658-665.
- [3]姚雪姣.儿童绘本教学现状研究[D].杭州师范大学,2011.
- [4]杨洋.以情绪主题绘本为载体促进大班幼儿情绪调节能力发展的行动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7
- [5]刘婷.情绪主题绘本促进幼儿情绪能力发展的行动研究[D].西南大学,2010.
- [6]邢琼琼.支架式教学应用于幼儿园绘本教学的行动研究[D].塔里木大学,2023.
- [7]田怡楠.提升学前流动儿童心理弹性的阅读游戏干预课程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19.

An Intervention Study on Young Children's Self-regulation: A Case Study of X Kindergarten in Shenzhen

Huang Qiting, Li Liting

(Shenzhen Bao'an District Xixiang Subdistrict Central Kindergarten (Group) Huahai Jinwan Kindergarten, Jiangmen, Guangdong 529200, China)

Abstract: With social progress and the innovation of educational concepts, mental health has garnered extensive attention.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Preschool Education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of monitoring children's emotional changes, meeting their psychological needs, and promoting home-kindergarten collaboration, young children's mental health has become a key focus. In daily teaching practice, we have observed that some children exhibit difficulties in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such as trouble identifying emotions, social withdrawal, and low stress resilience. To effectively address these issues, this study focuses on a child in the senior kindergarten class, pseudonymed Guoguo, who has emotional regulation difficulties. Using picture book teaching as an intervention method, and through activities such as selecting appropriate picture books and conducting interactive reading sessions, the study aims to help the child improve emotional management skills and enhance self-regulation abilities. This approach provides new practical strategies for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kindergartens.

Keywords: picture book teaching; self-regulation; emotional management

“双轮驱动”背景下现代产业学院专业建设质量提升路径研究 ——以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与产业需求协同为视角

邹鸣民¹胥懋云²

(1江西科技学院, 江西南昌 330098; 2南昌大学, 江西南昌 330031)

摘要:在“双轮驱动”政策语境下,本文把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与现代产业学院视为“规范轮”与“实践轮”,构建一套“目标共建—课程共创—过程共管—达成共评—质量共保”的协同操作系统。通过“产教协同建模、资源共建共享、三元治理保障、数据闭环改进”四类机制,将认证指标与企业岗位能力映射到同一套时间轴和成绩单,使毕业要求随产业需求同步刷新,课程项目随生产节点同步推进,达成度评价随现场考核同步完成。实践表明,该模式把传统的“认证后改进”转变为“实时调校”,既满足国际认证规范,又显著缩短人才到岗适应周期,为高校提供了一条可复制、可迁移的“卓越质量”升级路径。

关键词:双轮驱动;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 现代产业学院; OBE; 产教协同; 实时质量闭环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3.90

1 引言

过去十年,中国高等教育经历了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的整体转型。教育部在2021年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实施方案(2021—2025年)》^[1],将“以学生为中心、成果导向、持续改进”作为评估要素,并要求高校以专业建设为抓手,构建可持续认证的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2]以及《国务院关于“十四五”教育发展规划》^[3]也都提出了:高校专业需与产业链条对接,建立多方参与的质量保障机制。

现代产业学院正是在这些政策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一种新型实体办学机构。2020年教育部和工业和信息化部两部委联合下发了《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指南(试行)》^[4],明确指出,现代产业学院是高校会同地方政府、行业龙头企业等各方主体共建,以产业和技术发展的最新需求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平台。但从首批50所国家级现代产业学院验收结果看,主要有3个方面存在问题:一是专业目标与行业岗位需求缺少数量化的对接映射,课程建设随意性强;二是企业的参与教学只停留在讲座、参观的形式,缺少可持续的制度化安排;三是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与现代产业学院建设的“双轨制”运行,认证结论无法直接用于改善合作课程。

自2006年起,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展开。2016年,中国正式成为《华盛顿协议》的成员,其认证标准和程序已经在实质上与国际实现等效。认证的核心是把毕业生能力分解成可测指标,通过课程矩阵、教学过程监控和达成度评价,形成人才培养的闭环改进机制^{[5][6]}。但在实践中,认证所用行业数据多为问卷和访谈,缺少持续更新的岗位能力模型和真实项目成果,导致“最后一公里”难以落地。

基于上述现实,本文提出“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现代产业学院”双轮驱动模式。第一轮以认证标准为“规范轮”,保证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体系、评价方式符合国际工程教育共识;第二轮以产业学院为“实践轮”,把企业最新岗位标准、真实项目案例和企业导师嵌入教学全过程。为了让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与现代产业学院真正咬合而不是“两张皮”,我们将两套体系浓缩成一份“运行时刻表”:毕业要求和企业岗位能力先在同一张清单里对齐;接着把认证矩阵和项目化课程排进同一张地图;教学周历与企业项目节点共用一根时间轴;最后,达成度测评与企业现场考核写进同一页成绩单,任何偏离都能被实时捕捉并立即回环修正。

作者简介:邹鸣民(1990-),男,博士,研究方向为产教融合、高等教育国际化。

2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2.1 国内外研究现状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起源于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工程与技术认证委员会 (ABET) 的美国初创实践, 其中《工程教育认证标准 2000》(EC2000) 第一次将“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凝练为可操作的评价框架^[7], 后被《华盛顿协议》吸收成为世界通行的认证语言^[8]。2006 年中国启动试点, 2016 年正式加入协议, 同步建立起以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体系、师资队伍、支撑条件和持续改进为中心的整体规范, 围绕该规范, 学界先后展开了标准比较、达成度量化模型、闭环改进机制的探讨^[9]。王孙禹等系统论述了《华盛顿协议》的程序逻辑^[10], 李志义则告诫高校“通过”是起点, 持续改进是认证的落脚点^[11]。但这些研究更多仍停在校内教学质量保障方面, 对如何把产业的真实需求转化为毕业要求仍语焉不详。

现代产业学院出现则为对接空白提供制度通道。2017 年国务院提出深化产教融合。2020 年, 教育部与工信部联合发布《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指南(试行)》, 将其界定为高校、企业、政府三方面主体一起建设与运行的实体化育人单元^[4]。林健提出了现代产业学院建设的主要共性问题分析及对策建议^[12]; 彭小玉则告诫地方高校要把区域产业链写入到毕业要求中, 否则平台则难以为继^[13]。虽案例纷呈, 但是现有研究多为经验总结, 未在认证标准的技术层面给出可迁移的对接方案。两条改革路径在时间轴上同步推进, 却在概念体系、数据链条和改进回路上始终“平行运行”。认证话语里的“毕业要求指标点”与产业学院常用的“岗位能力单元”缺乏统一编码; 认证举证依赖课程考核和毕业生问卷, 产业学院掌握的真实项目数据难以进入认证证据链; 认证结论反馈给院系, 产业学院评价结果流向企业人事部门, 双方没有共享数据库。如何使认证标准借助产业资源有效落地, 又如何让产业场景反哺认证能力体系, 便成为当前研究亟待填补的空白。

2.2 理论基础

本研究并非简单套用既有概念, 而是回到“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如何证明培养有效”这一原问题, 把三条成熟理论重新编织为可操作的解释框架。

2.2.1. 成果导向教育 (OBE) ^[14]: 把“终点”搬到“起点”

OBE 的核心不是“结果”二字, 而是“逆序设计”——先界定毕业生五年后应能做什么, 再反向选择课程内容、教学策略和评价方式^[15]。在专业认证端, ABET、华盛顿协议等已把“能做什么”细化为可观测的毕业要求; 在产业学院端, 这些要求被翻译为企业岗位胜任力, 由真实项目、真实交付物驱动学生提前“达标”。两条链路共用一套能力语言, 解决了“靶子”与“打靶”断裂的问题。

2.2.2. 系统协同理论^[16]: 让两条轨道并成一条高铁

系统协同理论把专业认证与产业学院比作两条原本各跑各的钢轨: 一条按图施工, 讲究毫米级规范; 一条随市应变, 追求场景级灵活。要让列车稳、准、快地驶向同一站台, 关键是先把“道床”铺成同一条——目标、数据、标准共用一套坐标系。于是出现了“四个同步”: 毕业要求与岗位胜任力像榫卯一样咬合, 认证指标与企业用人标准共用一把量尺, 教学节奏与项目节点踩着同一张课表, 学业评价与绩效考核共享同一摞证据。当这四件事同时发生, 规范不再是束缚灵活的绳索, 灵活也不再是稀释规范的漏洞; 它们互为筋骨, 车厢与轨道从此由“并行”变“并轨”。

2.2.3. 教育过程控制论^[17]: 把“质量黑箱”变成“透明车间”

不是仅靠末端抽测, 而是基于对“目标设定—资源配置—教学实施—成效反馈”全链条的管控。专业认证提供的是“工艺卡”(关键控制点、阈值、反馈周期), 产业学院提供的是“原材料”和“订单”(真实案例、实时数据、真实客户)。两者叠加, 课堂教学被切分为可观测、可度量、可改进的微环节, 实现“教—学—做—评”闭环。

已有研究常把认证与产业学院分开讨论: 前者重“合标”, 后者重“合用”。本文以上述三条理论为经纬, 把“合标”与“合用”编入同一套话语体系、同一组数据流、同一条价值链, 从而在“认证科学性”与“产业适应性”之间搭建桥梁, 为“双轮驱动”的质量提升路径奠定可迁移的理论底座, 填补二者联动研究的理论空白与制度创新探索。

3 双轮驱动模式内涵解析

在高等教育进入深化改革的时代、国家进入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时代, 传统的“以高校内部视角”为主的

专业建设模式遭遇困境，如何实现“培养目标科学合理”与“达成路径真实可行”并进是新时期专业建设的迫切需求，本文以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与现代产业学院机制为“双轮”，实现专业建设由“目标逻辑”向“实施逻辑”的融合演化，探索以现代产业学院与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协同“双轮驱动”的高质量专业建设模式。

3.1 专业认证：明确“培养什么人”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以OBE理念为基础，围绕“学生应具备的核心能力”设定毕业要求、课程目标与评价体系，其根本任务是回答“培养什么人”的问题。从多个角度，如目标实现程度、需求契合度、运作效率、条件保障水平和质量满意度等，确保人才培养关键环节的科学合理性^[18]。

表 1 专业认证典型特征

维度	要点	具体做法	目的与作用
培养目标设定	科学设定目标	基于社会需求、行业标准与学校定位，制定面向未来岗位的能力框架	明确“培养什么人”，回答人才培养的根本问题
课程体系设计	构建支撑矩阵	明确各课程对毕业要求达成的指标点贡献关系，推动课程“对标达能”	系统支撑毕业要求，确保课程与培养目标对应
达成度评价	多元闭环评价	直接评价（作品、测试）+间接评价（问卷、自评）	全面衡量学生能力达成度，形成质量监控与反馈
持续改进	正向迭代机制	通过反馈持续优化课程结构、教学方式与资源配置	实现培养质量的持续提升，形成动态改进系统

认证机制保障了专业建设的“科学性”“规范性”“可评价性”，但其实践路径往往受限于高校资源与课堂边界，缺乏真实场景与岗位需求的深度嵌入。

3.2 产业学院：解决“如何培养人”

表 2 产业学院培养人的典型路径

维度	要点	具体做法	目的与作用
教学体系	项目化教学	围绕真实企业项目设计教学任务，融合产业工具与行业标准	以真实项目为驱动，提升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资源配置	双导师机制	企业工程师+高校教师共同指导，协同完成产学研任务	实现校企协同育人，弥补高校师资在产业实践上的不足
能力培养	岗位胜任力模型	以岗位职责为引领，将职业素养、技能操作、协作能力融入教学过程	精准对接岗位需求，培养即战型人才
质量评价	企业评价机制	实训、实习、答辩等环节引入企业考核标准	提升能力评价的针对性与实用性，确保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同步

现代产业学院利用企业资源和岗位实践，通过合作开发课程、项目驱动和实际岗位培训等方式，了解产业需求、技术标准、方法规范、环境平台和人才标准等要素，以支持人才培养关键环节的实现，系统解决“如何培养人”的实践问题^[19]。

产业学院机制在提升教学适应性与学生实践能力方面成效显著，但其系统性、评估性与标准规范性仍需借力专业认证的成熟机制。

3.3 “双轮驱动”模型逻辑构建^{[20][21]}

从教育逻辑上看,专业认证解决的是“系统设计+质量评估”的问题,而产业学院解决的是“内容实践+过程保障”的问题。两者结合,正构成“理论—实践—评估”完整链条。在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与现代产业学院“双轮联动”的框架下,人才培养质量可抽象为一个“五度五环节”的闭环模型(见图1)。这个模型以一种持续改进的思路为核心,遵循“提升—强化—改进—优化—提高”的逻辑,并将专业认证所强调的五大核心要求——即“目标适应度、方案匹配度、过程有效度、条件保障度和质量满意度”——映射到人才培养的五个关键环节:即“培养目标、培养方案、培养过程、培养条件和培养成效”。五大环节以“制定—编制—实施—建设—评价”的动态闭环运行,既依托现代产业学院提供的产业愿景、技术标准、方法规范、环境平台与用人反馈,又以专业认证的关键环节科学性与达成度为衡量基准,最终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高度耦合与持续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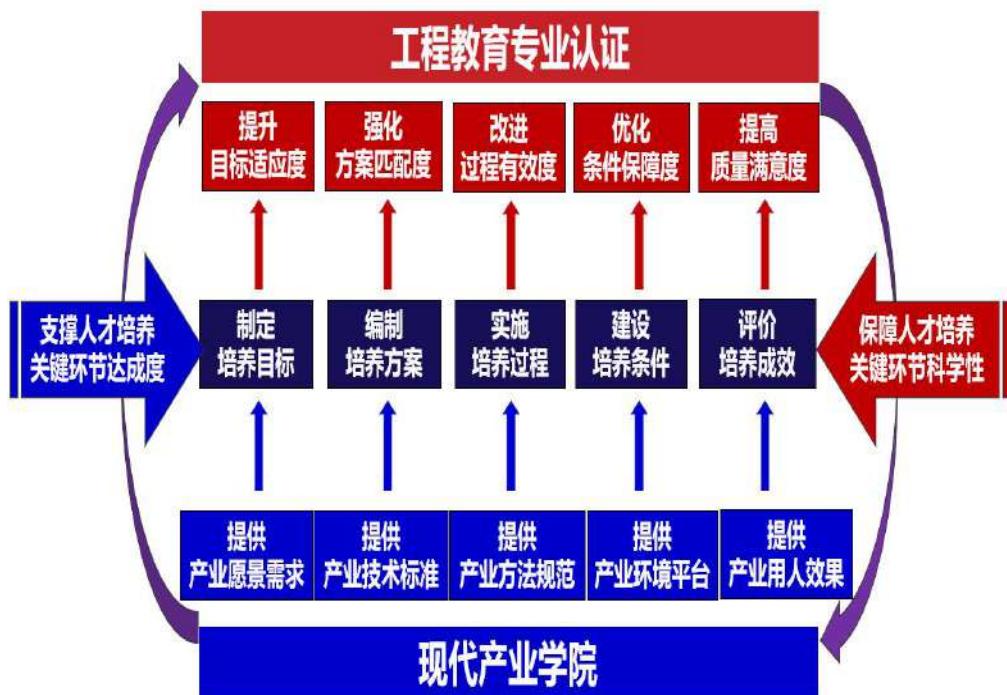


图1：“双轮驱动”模型^[22]

表3显示:专业认证体系以“毕业要求→课程矩阵→教学实施→达成度测评→质量改进”闭环保证人才质量,现代产业学院体系以“岗位需求→项目课程→项目教学→企业评价→需求再调研”闭环对接产业,两闭环并行的“双轮驱动”模型实现教育质量与产业需求同步提升。

表3 “双轮驱动”模型逻辑关系^[23]

驱动维度	专业认证体系	现代产业学院体系
逻辑起点	确定培养目标、毕业要求	明确岗位需求、职业能力标准
课程设置	指标点-课程矩阵设计	项目群-课程群协同开发
实施过程	教学活动组织、教学资料管理	项目驱动教学、企业导师嵌入
能力评价	达成度测评(直接+间接)	企业实训评价、岗位胜任反馈
持续改进	教学质量监测与结果反馈	用人单位反馈与需求调研闭环

3.4 双轮协同的价值与优势

通过“双轮驱动”协同模式，不仅可以增强专业建设的科学性与规范性，更能提升育人过程的真实性与产业关联度，实现以下目标：由产业数据与岗位需求校验目标合理性，解决培养目标虚化问题；通过项目制方式实现指标达成的可视化与可测量，打通认证指标与产业实践的断裂；以企业评价结果作为认证达成度补充依据，提升学生就业适配度与能力信心；实现专业建设从“静态评估”向“动态协同”升级。“双轮驱动”模式以专业认证的目标体系为“骨架”，以产业学院的协同实践为“血肉”，二者互为支撑、互补短板，为当前高等教育改革背景下的专业内涵式建设提供了切实路径。

4.典型机制构建路径分析

基于“双轮驱动”专业建设模式的内在逻辑，本章围绕“专业认证主轴”与“产业学院支撑轴”两个维度，系统构建涵盖目标制定、课程开发、教学实施、达成评价、持续改进五个核心环节的协同运行机制。通过机制细化与流程建构，推动“双轮”协同从理论走向实践。

4.1 专业认证主轴：构建科学性与评估性的标准保障机制

表 4 培养目标构建与动态调整机制^[24]

维度	关键要素	具体做法	实施主体	周期	案例示例
培养目标构建	三层架构	校级目标→ 专业目标→ 毕业要求	学校、学院、专业	持续	—
		学校定位+ 行业标准+ 区域产业发展需求			
逻辑来源	三重依据	用人单位、 校友、行业专家 、教师共同参与	校院两级管理团队	持续	—
动态调整机制	四元反馈	将“绿色制造能 力”新增为 毕业能力指标	校企合作委员会、 专业建设委员会	每 2-3 年	—
案例支持	指标修订	某工科专业	最近一次 修订	依据新能源 企业反馈	

表 4 以“校—院—专”三层目标对接学校定位、行业标准与区域需求，并通过用人单位、校友、行业专家、教师四元反馈每 2-3 年动态修订毕业要求（如新增“绿色制造能力”），形成可持续迭代的专业认证培养目标保障机制。

表 5 课程体系与支撑矩阵机制^[25]

维度	关键要素	标准/方法	实施细节	关键制度	目的作用
标准 来源	毕业要求→ 课程支撑	依据 12 项毕业要求	构建“指标点-课程群-课 程模块”三维矩阵	—	确保课程与毕业要 求准对应
实施 方法	课程大纲细 化	每门课程明确：①对应指标点② 能力贡献点③达成策略	教学团队在大纲中具体 描述	专业课程 负责人制	实现课程与毕业要 求 “闭环匹配”
关键 制度	专业课程负 责人制	每门课设 1 名负责人	统筹教学内容、考核方 式与指标点达成	学院聘 任、 年度考核	保障教学内容持续 对标毕业要求

表 5 以“毕业要求—指标点—课程群”三维矩阵为核心，通过专业课程负责人制将每门课程的能力贡献点、达成策略与考核方式精准锚定毕业要求，实现课程体系对培养目标的全闭环支撑。

表 6 教学组织与过程管理机制^[26]

维度	制度/机制	核心内容	具体做法	技术/工具	目的与作用
过程控制	《课程教学设计书》制度	四统一：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资源—评价方式	开课前任课教师必须提交并审核通过	教务系统模板	确保课程实施与毕业要求精准对齐
教研机制	“认证-教学-教改”三融合研讨制度	定期召开教学协同改进会议	每学期至少 2 次，校企专家共同参与	会议纪要、共享平台	实现教学设计、实施、改革的持续优化
质量管理	达成过程监控	实时记录教学活动与学情轨迹	课堂数据、作业成绩、在线互动等自动采集	教务系统大数据模块	提供可视化证据链，支撑持续改进与认证举证

表 6 通过《课程教学设计书》制度统一教学四要素、校企协同“认证-教学-教改”研讨及教务系统实时数据监控，实现教学过程与毕业要求精准对齐、持续优化并形成可追溯的证据链。

表 7 能力达成度测评与多元评价机制^[27]

维度	关键要素	具体做法	工具/模型	触发条件	后续行动
评价方式	直接+间接	直接：项目报告、测试、作品；间接：问卷、访谈、跟踪	—	每学期/每课程周期	汇总形成原始数据包
分析工具	OBE 达成度分析模型	Bloom 分层法、雷达图、指标点达成度计算	达成诊断报告模板	数据收集完成后	自动生成诊断报告
问题整改	改进闭环	指标点达成度 < 设定值	课程负责人提交《改进报告》并更新教学方案	达成度低于阈值	纳入下一轮教学实施与监控

表 7 以“直接+间接”多元评价收集证据，经 OBE 达成度模型诊断，一旦某指标点未达标即触发课程负责人提交改进报告并更新教学方案，形成数据驱动的持续改进闭环。

表 8：持续改进与闭环管理机制^[28]

维度	关键要素	数据来源	反馈路径	制度保障	文化塑造
数据来源	多元质量证据	课程达成数据、就业反馈、竞赛表现、毕业论文质量等		教务系统自动采集+人工补充	为改进提供客观依据
反馈路径	统筹与决策		专业建设委员会：质量分析→整改方案→目标修订	每学年至少 1 次全体会议，会议纪要存档	实现闭环管理
持续改进文化	正反馈机制		将改进成效纳入教师考核与奖励	职称评聘、绩效奖金挂钩	形成认证驱动持续改进的“正反馈”文化

表 8 通过教务系统自动汇聚课程达成、就业、竞赛等多元证据，由专业建设委员会每年至少一次统筹分析并制定整改方案，同时将改进成效与教师职称、绩效挂钩，营造数据驱动、持续改进的正反馈文化。

4.2 产业学院支撑轴：构建实践性与适配性的协同育人机制

表 9 岗位导向课程群开发机制^[29]

核心要素	具体做法	输出成果	目标价值
对接模型	以企业岗位能力模型为基准，建立“课程群—能力模块—岗位标准”映射表	岗位-课程映射表	精准对接岗位需求，明确课程定位
开发机制	采用“项目驱动+校企共建”模式，联合设计课程内容、实训环节与考核方式	项目化课程方案、校企共制考核标准	提升课程实践性与产业适配度
教材建设	开发“校企双标”课程资源包：含案例库、任务包、工具包等	校企双标资源包	为教学实施提供贴合企业场景的资源支撑

表 9 以企业岗位能力模型为锚，校企共建项目化课程群与“双标”资源包，实现课程内容与企业场景精准对接并提升实践适配度。

表 10 企业导师嵌入式教学机制^[30]

维度	关键要素	具体做法	组织保障	预期成效
选聘机制	准入标准与入库管理	企业导师须具备≥3年行业经验；产业学院统一培训并纳入教师库	产业学院人事管理办法	保证导师质量与稳定性
角色分工	双导师职责划分	企业导师：主导实践课、实训环节；高校教师：主导理论讲解、能力拓展	课程教学大纲明确职责	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
协作机制	教学共研小组	每门课设“企业+高校”双导师，定期交流课改进度与成效	每月至少1次共研会、纪要存档	实现课程持续迭代与效果提升

表 10 通过“统一选聘+双导师分工+月度共研”机制，让企业导师深度嵌入实践教学，与高校教师协同迭代课程，实现理论与产业场景无缝融合。

表 11 校企共评共考机制^[31]

维度	内容	具体做法	目的与作用
评价标准	联合制定实践课程评价量表	聚焦“问题解决、项目执行、团队合作”三个维度	统一校企评价尺度，突出产业核心能力
实施机制	企业代表参与评审	考试、答辩、项目展示等环节均引入企业代表共同评审	确保评价贴合产业实际，提升评价有效性
数据互通	结果实时入库	评价结果同步反馈至认证指标点数据库	为达成度提供补充证据，支撑持续改进与认证举证

表 11 通过校企联合制定三维评价量表、企业代表全程参与评审并实时回传结果，实现评价标准与产业需求同频，同时为认证达成度补充证据链。

表 12 实训平台与工程实践基地机制^[32]

协同维度	高校角色	企业角色	运行方式	学生任务	评价输出	作用与价值
资源共建	提供课程设计与指导团队	提供真实项目环境与平台设备	共建共享	—	联合资源清单	打通校企场景, 夯实实践基础
联合运行	导师现场评分	派发真实工单	“任务进驻式实训”	按工单完成企业实际任务	现场评分记录	实时反馈, 提升岗位胜任力
项目化实习	纳入毕业评定	提供企业课题与指导	学生驻企完成课题	提交“项目总结+能力成长报告”	毕业评定组成部分	以成果为导向, 对接毕业要求与产业标准

表 12 制定了实训平台与工程实践基地机制。高校与企业共建真实项目平台并实施“任务进驻式实训”，学生按企业工单完成课题并获现场评分，成果直接纳入毕业评定，实现毕业要求与产业标准对接。

“双轮驱动”下的典型机制构建，不再是传统高校内部教学组织的简单延伸，而是涵盖教学目标、课程开发、实施过程、能力评价、改进反馈全过程的“双轴联动”机制系统。认证体系提供结构性支撑，产业学院提供实践性赋能，二者相辅相成，最终推动高校专业建设走向内涵发展、高质量发展。

5. 协同联动机制设计

“双轮驱动”专业建设模式的有效运行，关键在于建立一套贯通标准制定—课程开发—教学实施—能力评价—反馈改进全过程的协同联动机制。该机制不仅要在纵向上实现“专业认证主轴”与“产业学院支撑轴”的内在耦合，也要在横向上打通高校内部各教学管理环节与企业外部资源之间的边界，实现多主体共建共享、共同育人、共评共改的协同系统。

5.1 构建“产教协同建模”机制，实现标准与需求同步更新

传统的专业认证标准大多由高校单方设定，难以精准反映企业对岗位胜任力的最新要求。为此，需构建“认证标准—行业标准—岗位能力标准”三位一体的协同建模机制。

表 13 产教协同建模机制（三位一体·四步闭环）^[33]

阶段	高校	企业	行业协会/第三方	关键输出
① 需求扫描	梳理毕业要求→课程指标点矩阵	提炼最新岗位能力、评价维度	发布年度《产业人才白皮书》	岗位-能力-课程映射表
② 标准共建	牵头起草认证标准草案	提供技术规范、场景案例	组织专家评审并编号发布	《认证-行业-岗位》三维标准
③ 课程落地	设计“双标准导向课程群”教学大纲	植入真实项目、兼职教师	监督课程实施质量	学期运行工单、学生能力成长档案
④ 反馈迭代	收集学习成果数据	反馈用人成效、技术迭代	召开“标准联合发布会”	新版标准修订清单

实施载体：校企专业标准共建联盟（常设秘书处，校企轮值）；标准联合发布会（每季度一次，线上直播+线

下签约)；双标准导向课程群(每门课同时标注认证指标点与岗位胜任力编码)。

5.2 推动“双轮联动”的资源协同机制，实现平台、师资与内容共建

资源是实现双轮联动的物质基础。需要统筹平台、课程资源、师资团队三大核心要素，搭建校企资源共建共享系统。

表 14 “双轮联动”资源协同机制一览表(平台共建—师资协同—内容共创，三维贯通、数据闭环)^[34]

维度	校内载体	校外载体	关键制度	共享/协同要点	典型产出
平台	产业项目实验室	企业工程实践中心	①“双门”开放管理规范②资源预约—任务派发—评分上传数据闭环	生产级设备、真实订单、在线孪生数据实时回传	年度共享清单、项目工单、孪生数据集
师资	“双师型”教师挂职	企业导师进课堂	①双向流动协议(学时互认、成果互享)②联合教改/教材专项基金	企业工程师≥20%课时；高校教师≥3个月工程实践	混编教学团队、联合教材、共享案例库
内容	“行业微课”+“任务包”+“能力包”三合一资源平台	企业项目驱动式教材	①双周内容迭代例会②校企联合版权与收益分配办法	真实项目→教学任务→能力图谱一键映射	每学期更新≥15%在线资源，新编教材≥2部

配套制度：校企轮值共管实验与工程“双中心”，教师进企业、工程师进课堂均须打卡计时，共创的教材案例版权共享，三合一资源平台周更新并直通报成绩，把协同写进章程、落到钱包。

5.3 构建“三元协同”组织保障机制，实现协同常态化运行

组织结构是协同机制高效运行的保障，应设立覆盖高校、企业、行业三方的协同治理平台。

表 15 “三元协同”组织保障机制一览表(高校—企业—行业三方共治，常态运行)^[35]

层级	机构/会议	成员构成	职责要点	运行节奏	核心产出
决策层	专业认证—产业学院双轮联动办公室	校长/董事长(双主任)+教务处+企业副总裁+行业协会秘书长	统筹资源、审批预算、发布年度工作令	每月一次办公会	《双轮联动年度路线图》
咨询层	专业建设委员会	院系负责人+企业首席工程师+行业技术专家(比例4:3:3)	审定培养方案、认证自评报告、岗位能力模型	每学期一次全体会议	《人才培养白皮书》
执行层	课程共建小组	课程负责人+企业项目经理+行业协会培训总监	设计课程大纲、案例、考核标准	每月一次例会	课程包、微课视频
执行层	项目评审小组	校内督导+企业质量经理+行业认证官	审核项目工单、评分标准、风险预案	每项目一次评审	项目通过清单
改进层	反馈改进小组	学工+HRBP+第三方评估机构	对比达成度与岗位胜任度，提出改进清单	每学期一次诊断会	《专业认证与产业匹配度报告》

配套制度：每学期召开一次“三方联合专业建设研讨会”；每年进行一次“达成度vs岗位胜任度”对比分析；

每两年发布一次《专业认证与产业匹配度报告》

5.4 构建“反馈—迭代—更新”闭环改进机制，实现持续优化

协同机制的生命力在于其“自我修复”能力，需构建全过程的数据回流与改进机制。

表 16：“反馈—迭代—更新”闭环改进机制一览表（数据回流→多维诊断→精准迭代→效果验证）^[36]

环节	关键动作	数据来源	触发条件	责任主体	量化输出
数据回流	实时采集四类数据：教学达成度、课程测评、企业反馈、学生成长	教务系统、企业 HR 系统、毕业生跟踪平台	每日自动抓取，周度汇总	数据平台管理员	专业建设大数据看板（含预警灯）
多维诊断	召开“双师反馈联席会”对照岗位胜任度与课程目标达成度	企业导师、任课教师、第三方评估	达成度<85% 或企业满意度<80%	专业建设委员会	《诊断报告》（差距列表+优先级）
精准迭代	启动“课程重构—教材修订—教学方案再设计”微周期	课程共建小组	诊断报告下发后两周内	课程负责人+企业项目经理	新版课程包、修订教材、更新任务单
效果验证	A/B 教学实验：新旧方案并行，对比关键指标	学生测评、企业实习评价	学期末/项目结束	项目评审小组	改进前后指标对比表、年度总结报告

配套制度：每学期发布《专业建设与产业匹配度报告》；每两年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并上报教学质量年报。

协同发展机理是“双轮驱动”专业建设的驱动核装置，打通了“标准—资源—教什么—怎样教—教得怎样”的一体化建设流程，同时使不同主体的校内和校外协同完成组织动员和工作联动，以组织、平台、数据保障高质量认证下的现代高校，实现与产业需求的双向流动，使专业建设由“准动态（事后评估）”向“动态（持续发展）”迈进。

6.质量保障体系与优化建议

在“双轮驱动”框架下的专业认证与现代产业学院的协同推进就是持续努力打造集闭环反馈机制、多元化评价机制、治理结构改革与信息技术的利用与服务机制于一体的教育质量控制的有机生态系统，以期通过这一质量控制模式的打造而实现对人才培养过程的内部管理和质量持续改进。

6.1 构建全过程质量闭环：从评估到改进

建立“目标—实施—评价—反馈—优化”五段式闭环控制机制，是实现协同专业建设有效运转的关键。前端控制以认证标准与岗位模型为依据制定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中段过程依托课程达成监控平台、教学日志系统、学生学习分析等实现实施监测；末端反馈通过毕业设计质量分析、岗位胜任力跟踪、学生发展报告，生成达成度反馈；数据驱动改进形成课程优化建议、教学方式调整、资源投入优化等可执行的改进路径。闭环体系需与高校质量保障体系全面对接，推动专业建设标准化、制度化、持续化。

6.2 搭建多元协同评价体系：强化成效导向与产业参与

质量评估不能单一“唯考试论”、“唯毕业率论”，应多方交叉构建复合指标：对学生评估，不再单一以考试成绩论英雄，注重学生的创新成果、职业素质、职业能力、职业素养、就业竞争力等；对学生所学专业、专业教师

的教学效果、实践生产与实践能力、育人的努力程度、参与产教融合的程度等给予评估；对引入的“企业导师”、岗位实习中的用人单位给予评价；行业专家的评价、专业认证的反馈、学科评估的反馈等社会评估意见，确保真实公正。通过指标、数据的搭建对接，真正实现评估的“教了什么”“学了什么”“能做什么”的过程性评估。

6.3 优化治理结构：推动协同机制组织化、制度化

要让“双轮”真正转起来，先得把方向盘、油门和刹车装进同一辆车里。学校层面成立“双轮驱动领导小组”，主管教学的副校长亲自挂帅，教务处、质量办、产业学院、认证联络人同坐一张圆桌，决策链条缩短到一句话的距离；制度层面，把认证指标、产业需求一条一条写进《专业课程指标点设定指导办法》《企业导师参与教学管理条例》，让标准和反馈不再游离于制度之外；运行层面，每学期固定一次“校-企-师”三方对话会，问题当场摆到桌面，目标当场对表，任务当场分账，久而久之便沉淀出一种“有事一起扛、有活一起干”的专业建设文化。

6.4 引入数字化手段赋能：实现质量管理智能化、动态化

传统的质量报告往往滞后一个学期，等发现问题时学生已经毕业。要想让质量管理“长牙齿”，必须把数据搬上云端、把课堂装进屏幕。具体做法是：先把教务系统、课程平台、企业反馈系统打通，统一接口、统一颗粒度，形成一条不会断流的数据河；再用可视化仪表盘把课程指标达成图、学生能力成长曲线、企业满意度波动一屏打尽，红黄绿灯一闪就知道哪里掉链子；接着让算法值班——哪门课的哪项指标跌过阈值，系统即时推送改进建议给任课教师，甚至直接给出可套用的教学策略模板；最后借助学习行为数据——在线停留时长、课堂互动频次、项目贡献度——勾勒出每个学生的“成长轨迹”，让“因材施教”从口号变成公式。由此，质量保障体系便完成从“事后评估”到“实时监控”再到“智能改进”的三级跳。“双轮驱动”下的质量保障体系，不仅关注“认证通过”与“合作开展”的形式性结果，更关注“能力达成”“岗位适配”“师生成长”“产业价值”等内在质量指标。通过制度支撑、技术赋能和多方联动，逐步形成一个以“数据为依据、过程为核心、改进为导向”的现代专业质量治理体系，是推动高校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体现。

7. 结论与研究展望

7.1 研究结论

面对“加快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深化工程教育改革”的现实语境，如何既有效完成“培养目标科学设置”，又切实贯彻执行“培养路径有效实施”，是专业建设实现转型升级的实质问题。本文从“工程教育认证”和“现代产业学院”两个子系统出发，以“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保障质量、现代产业学院提升能力”为主线，构建了具有规范性、适合性、有效性专业建设质量提升路径。

研究表明：专业认证提供了系统化、结构化、可评价的专业内涵建设标准；现代产业学院通过企业深度参与，解决了能力达成路径与实践适配问题；两者融合所形成的“目标共建—课程共创—过程共管—达成共评—质量共保”机制，能显著增强专业建设的针对性、实效性与可持续性；构建“协同建模机制”“资源共享机制”“治理融合机制”与“智能化保障体系”，是实现双轮协同效能最大化的关键路径。

本文的实践逻辑与制度设计，对于当前高校推进“产教融合”“教育评价改革”“OBE教学体系”等重点任务，具有理论启发与现实指导意义。

7.2 研究展望

本研究虽以工科院校为切口、以“双轮驱动”为框架，初步打通了专业认证与产业学院协同的理论逻辑与操作路径，但仍有四道“缺口”待补。其一，案例尚显单薄：工科经验能否在经济管理、艺术设计、教育学等“软专业”落地生根，尚未验证；其二，证据尚欠火候：目前结论多基于访谈与文本，如能引入认证达标率、毕业生五年跟踪、企业用人反馈三类长周期数据，建立多变量回归模型，才能让“协同效应”从故事变成可度量的增量；其三，时间维度尚短：机制一旦启动，校企权力如何再平衡、课程如何再进化、标准如何再升级，都需要五年乃至十年的纵向跟踪；其四，空间维度尚窄：东部产业高地与中西部资源洼地的高校，若直接套用同一套模板，恐水土不服，跨区

域比较才能提炼出“因地制宜”的微调方案。面向未来，高校唯有把“双轮协同”写进章程、嵌入日常、接入智能平台，在制度化、常态化、智能化三条赛道上持续迭代，方能真正完成从“合格建设”到“卓越质量”的跃升。

参考文献

- [1] 教育部.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实施方案 (2021—2025 年) [Z]. 2021-02-03.
- [2]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Z]. 2021-10-12.
- [3] 国务院. “十四五”教育发展规划[Z]. 2022-01-10.
- [4] 教育部办公厅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指南 (试行) [Z]. 2020-08-28.
- [5] 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协会. 工程教育认证标准 (2022 版) [S]. 2022-03-15.
- [6] 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协会. 中国工程教育认证年度报告 (2023) [R]. 2024-03.
- [7] 《美国高校工程教育持续质量改进机制研究》, 2023-04-25, 重庆大学期刊社.
- [8] 《华盛顿协议与工程教育专业认证》, njtc.edu.cn.
- [9] 《我国高等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发展现状分析及其展望》, 2024-08-29, 豆丁网.
- [10] 王孙禹, 孔钢城, 雷环. 《华盛顿协议》及其对我国工程教育的借鉴意义[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07(1): 10-15.
- [11] 李志义. 解析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持续改进理念[J]. 中国高等教育, 2015(Z3): 33-35.
- [12] 林健. 现代产业学院建设: 主要共性问题分析及对策建议[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24(1): 1-9.
- [13] 彭小玉. 地方本科高校现代产业学院专业建设路径研究[J]. 教育进展, 2022, 12(8): 2905-2911. [14] Harden R M. AMEE Guide No.14: Outcome-based education: Part 1—An introduction to outcome-based education[J]. Medical Teacher, 2009, 21(1): 7-14.
- [15] 李志义. 成果导向的教学设计[J]. 中国大学教学, 2015(3): 34-41.
- [16] 陆旭东, 王琴. 系统协同理论下“中本贯通”一体化育人的框架与实践路径[J]. 职业技术教育, 2025(8): 25-30.
- [17] 钟启泉. 苏联学者的“教育控制论”研究 (上) [J]. 全球教育展望, 1991(4): 13-23.
- [18] 佚名.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背景下课程目标达成度研究[J]. 职业技术教育研究, 2019(1): 174-175.
- [19] 王孙禹, 张文雪, 赵婷婷. 高等工程教育质量保障研究: 以河南省为例[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5: 45-67.
- [20] 胡体创, 李洪波, 李耀. 工程教育认证背景下“五度”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研究[J]. 江苏高教, 2022(12): 91-96.
- [21] 张文敏, 王斌. 基于“产出—过程—支撑—评价”四循环的专业持续改进机制[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23(2): 75-81.
- [22] 江作军. 现代产业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新路径的探索与实践[Z]. PPT, 2023-10-12.
- [23] 李志义. 适应认证要求推进工程教育教学改革[R]. 大连理工大学, 2015-10-25.
- [24] 教育部. 关于职业院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与实施工作的指导意见[A]. 2019-12-25.
- [25] 陈艳, 施泽进, 邓晓宇, 等. 新时代协同视角下专业型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研究[J]. 2024-01-15.
- [26] 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教育教学研究中心. 新课标视域下区域“学为中心”课堂建构的有效实践[R]. 2024-07-08.
- [27]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基于 OBE 的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与持续改进报告[R]. 2015.
- [28] 屠曼, 董燕. 基于产教融合的现代学徒制课程群建设——以商务助理专业为例[J]. 江苏教育研究, 2023(5): 13-16.
- [29] 吕迎, 李俊刚, 张达, 庄明辉, 廖平. 面向工程认证的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持续改进机制探索与实践[J]. 教育进展, 2024, 14(10): 250-255.
- [30]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深化技师学院学制技师培养改革试点工作方案[Z]. 2025-08-27.
- [31] 河南林业职业学院电子商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2025 版) [R]. 2025-05-23.
- [32] 衢州市教育局. 衢州学院《产教融合示范专业建设实施方案》[R], 2025-05.
- [33] 郭佳, 钟俊萍, 王玉奎, 龙昊. 土木水利专硕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机制创新与教学实践[J]. 教育进展, 2025, 15(5): 1540-1544.
- [34]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两化融合型”管理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R], 2024-05-08.
- [35] 田学斌, 刘志迟. 基于三元协同治理的跨区域生态治理新模式——以京津冀为例[J].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21(3): 88-95.
- [36] 陈艳, 施泽进, 邓晓宇, 等. 新时代协同视角下专业型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研究[J]. 2024-01-15.

Research on the Path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rofessional Construction in Modern Industry Colleg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ual - Wheel Drive"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ynergy between Engineering Education P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 and Industry Needs

Zou Mingmin¹ Yuan Xiaoping²

(¹*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China*, ²*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dual - wheel drive" policy, this paper regards engineering education p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 and modern Industry colleges as the "regulation wheel" and the "practice wheel" respectively, and constructs a set of collaborative operating systems of "joint goal - setting, joint curriculum creation, joint process management, joint achievement evaluation, and joint quality assurance". Through four types of mechanisms, namely "industry - education collaborative modeling, resource co - 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ternary governance guarantee, and data closed - loop improvement", the certification indicators and enterprise job capabilities are mapped to the same time axis and report card, so that the graduation requirements are refreshed synchronously with Industry needs, the curriculum projects are advanced synchronously with production nodes, and the achievement evaluation is completed synchronously with on - site assessment. Practice shows that this model transforms the traditional "post - certification improvement" into "real - time adjustment", which not only meets international certification specifications but also significantly shortens the adaptation period for talents to take up their posts, providing a replicable and transferable "excellent quality" upgrading path for universities.

Keywords: Dual - Wheel Drive; Engineering Education P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 Modern Industry Colleges; OBE; Industry - Education Collaboration; Real - Time Quality Closed - Loop

中国特色政治话语翻译中的人机协作模式研究 ——基于《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白皮书官方译本与 DeepSeek 译本的对比分析

陈巧云

(喀什大学, 新疆 喀什 844000)

摘要:随着国际传播对翻译效率与质量要求的不断提升,人工智能技术如何有效融入中国特色政治话语的翻译流程已成为重要课题。本研究以《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白皮书为语料,对其官方人工译本与 DeepSeek 机器翻译译本进行系统性对比分析。通过构建包含“概念精准度”、“文化适应性”与“交际有效性”的三维评估框架,研究发现: DeepSeek 在术语一致性及标准化表述翻译上表现可靠,但在处理蕴含特定意识形态的文化隐喻及修辞结构时,仍存在系统性局限,主要表现为概念内涵的误读、情感色彩的偏差与修辞效果的弱化。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一个“分级人机协作”实践框架:对于标准化表述,可采用“机译主翻-人工校对”模式;对于核心政治概念与文化负载项则应采用“人工主译-技术辅助”模式。这一框架为优化中国特色政治话语的对外翻译流程提供了兼具效率与质量的建设性方案。

关键词:中国特色政治话语;《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人工翻译;DeepSeek;人机协作;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3.93

一、引言

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的新时代背景下,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构建融通中外的中国叙事体系,已成为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紧迫任务。政治文献外译作为国际传播的重要载体,承担着向世界说明中国道路、阐释中国理念、展现中国形象的关键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而精准传译正是打通国际传播“最后一公里”的核心环节。

中国特色政治话语体系,如“中国梦”、“新发展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核心概念,植根于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土壤、政治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发展,是凝聚了特定意识形态内涵、价值取向与文化密码的思想结晶。其翻译的过程不单单是语言的转化,更是思想与文化的交流。^[1]

近年来,以 DeepSeek、ChatGPT 等为代表的新一代大型语言模型及神经机器翻译系统在通用文本翻译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其出色的流畅度和上下文理解能力引发了广泛关注。人工智能翻译技术的发展,为各国开展公共外交、塑造良好国际形象提供新的可能。^[2]同时也催生了一个亟待深入探究的重要命题:在面对政治敏感性极高、文化负载极重的中国特色话语翻译这一特殊领域时,先进机器翻译技术的效能边界究竟何在?其能否承担起与经过严格专业训练的人工翻译相当的重要角色?

本研究选取《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白皮书这一兼具政治权威性、时代特征性和话语丰富性的典型文本,系统对比其官方权威译本与 DeepSeek 机器译本。力求实现以下研究目标:

其一,深入剖析人机翻译差异产生的深层机理,从认知科学与跨文化交际学的理论视角,解读二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本质区别;

其二,基于详实的实证发现,尝试构建一个面向翻译实践的“分级人机协作框架”,为不同情境下人与机器的角色定位提供明确指引。

作者简介:陈巧云(2000—),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英语笔译。

通讯作者:陈巧云

本研究致力于为提升我国对外翻译工作效能、优化资源配置提供学理支撑与实践路径，助力中国故事更精准、有效地实现跨文化传播。

二、理论背景与分析框架：政治话语翻译的三维评估模型

为确保分析的系统性与客观性，本研究建构了一个包含三个核心维度的评估模型：

1.概念精准度：源于术语学理论，强调概念体系的对应性。考察译文对源文核心政治概念的本质内涵、外延范围及在特定话语体系中的位置是否实现了精准把握与传递。政治文本的翻译首先要考量的是准确性，这一点在政治传播中具有决定性意义。^[3]

2.文化适应性：源自跨文化交际学，关注译文对文化专有项（如历史典故、成语谚语）的转化策略。在翻译那些蕴含丰富文化内涵词汇时，不应该被其表面的表达形式所束缚。^[4]成功的翻译需要克服文化隔阂，避免因文化意象的错位或缺失导致目标读者的误解或排斥，实现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3.交际有效性：将翻译视为一种有目的的交际行为。除了词汇和概念层面，在句法篇章层面，可以评判译文的可读性、可接受度、文体得当性以及其在目标语境中激发预期情感共鸣与行为回应的能力。

该三位一体的框架，将翻译批评从单纯的语言文本层面，提升至跨文化政治交际行为的层面，为后续精细化的案例对比提供了严谨的分析工具。

三、DeepSeek 译本与人工翻译的对比分析

基于构建的三维评估框架，本研究对《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白皮书进行了系统的文本对比，选取以下典型案例深入剖析人机翻译的本质差异。

3.1 概念精准度：

案例 1：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原译：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held in 2012 marks the beginning of a new era i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5]

Deepseek 译：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in 2012,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entered a new era.

官方译文采用了“marks the beginning of a new era in the development of...”的表述，这是一种经过精心设计的阐释性翻译。它强调了“新时代”是一个在“发展进程”中开启的“新阶段”，内涵上更为严谨，符合国际社会对历史阶段演进的理解习惯。

DeepSeek 的译文“has entered a new era”虽然字面上与“进入新时代”高度对应，且语法无误，但将这一重大政治表述简化为普通的状态变化，未能体现“党的十八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这种差异揭示了机器翻译在把握政治话语历史建构功能方面的系统性局限。政治概念的翻译不仅要求语义准确，更需要构建符合政治逻辑的意义框架，而当前机器翻译在此方面仍存在认知盲区。

案例 2：青年“急难愁盼”突出问题

原译：the pressing difficulties and problems that are of the greatest concern to young people.^[5]

DeepSeek 译：the prominent problems facing young people – their most pressing difficulties and urgent needs.

该案例集中体现了人机翻译在处理复合政治概念时的不同路径。官方译文采用情感整合策略，通过“of the greatest concern”将“急难愁盼”的复杂情感维度统一为政策语境中的“关切”表述。这种处理体现了政治文献翻译中的情感管理智慧——在保持概念完整性的同时，确保情感表达符合政策文本的庄重性要求。

DeepSeek 译文则展现出独特的概念解构能力，通过破折号将复合概念拆解为“difficulties”（急难）和“needs”（愁盼）两个明确的政策操作范畴。这种解析重构不仅准确传达了语义，更实现了从情感表达至政策议题的功能转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urgent needs”的表述将“盼”的期盼转化为明确的需求导向，体现了机器翻译在特定语境下超越字面意义的概念操作优势。这一案例表明，机器翻译并非简单的“不理解”，而是在某些语境下形成了独特的概念处理逻辑，这为优化人机协作提供了重要启示。

3.2 文化适应性：以用典与修辞为例

案例 3：中国青年逐渐由单向的“孔雀东南飞”转变为多向的“自由随心飞”。

原译：young people in China, who used to flock to economically developed southern and eastern regions of the

country, have gradually diversified...^[5]

DeepSeek 译: Chinese youth have gradually shifted from the one-way “peacocks flying to the southeast” to ...

“孔雀东南飞”是中国古典文学名篇，在此喻指人才向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单向流动。官方译文完全舍弃了原典故的意象，采用意译策略，直接解释其社会现象内涵——“flock to economically developed southern and eastern regions”。这种处理避免了目标读者因文化背景缺失而产生的困惑，实现了跨文化交际的有效性。

DeepSeek 则采取了异化策略，直译为“peacocks flying to the southeast”。虽然保留了原文的文学色彩，但对于不熟悉该典故的英语读者而言，这个意象会显得非常突兀、费解，甚至可能产生“青年像孔雀一样（炫耀地）飞向东南”的怪异联想，造成了文化隔阂。这表明机器在面临深厚文化负载项时，缺乏判断何时需要牺牲形式以保全意义的跨文化交际意识。

案例 4:新时代中国青年把基层作为最好的课堂，把实践作为最好的老师

原译: The local community is the best place to temper young people in the new era, where they can learn through practice.^[5]

DeepSeek 译: In the new era, Chinese youth view the grassroots level as their finest classroom and practice as their greatest teacher.

此句包含“课堂”和“老师”两个核心隐喻。官方译文对隐喻进行了创造性转化。“把基层作为最好的课堂”没有直译，而是转化为“the best place to temper young people”，其中“temper”一词（意为“锻炼、磨砺”）极具表现力，精准传达了下基层磨练意志的内涵。“把实践作为最好的老师”则被意译为“learn through practice”，清晰直白。

DeepSeek 的译文则保留了隐喻的形式 (classroom, teacher)，这种直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但“finest classroom”和“greatest teacher”的表述在英语中略显平淡和陈旧，未能完全传递出中文原文中“实践出真知”的深刻哲理和号召力。官方译文的处理更显地道和老练，内涵意义表达的更为清晰。

3.3 交际有效性的落差：句式结构与整体可读性

案例 5: 新时代中国青年刚健自信、胸怀天下、担当有为，衷心拥护党的领导，奋力走在时代前列，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昂扬风貌。

原译: Young Chinese people in the new era are confident, aspirant and responsible. They wholeheartedly support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With a global vision, they stand at the forefront of the times bursting with commitment.^[5]

DeepSeek 译: The youth of China in the new era, robust and self-confident, caring for the world and assuming their responsibilities, sincerely uphold the Party’s leadership and strive to be at the forefront of the times, demonstrating an uplifting spirit never seen before.

此案例集中体现了句式结构对交际有效性的深刻影响。面对一连串的四字格排比，官方译文果断进行了分句和句式重构。它将长句拆分为三个语义完整的短句，并调整了语序，将“担当有为”转化为“responsible”，并将其与“拥护党的领导”的逻辑联系起来，将“胸怀天下”与“奋力走在时代前列”联系起来，语义逻辑连贯。使用“bursting with commitment”这样富有感染力的短语结尾，使整个译文节奏明快、铿锵有力，符合英语宣传文本的写作风格。

DeepSeek 译文则基本遵循了源文的句法结构，使用多个现在分词短语 (robust and self-confident, caring... assuming...) 作状语，导致句子主干冗长、结构松散。虽然信息点齐全，但行文拖沓，缺乏官方译文那种一气呵成的气势和感染力。这清晰地表明，机器在篇章层面的修辞优化和文体把握上存在局限。

案例 6: 新时代中国青年应该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努力把共同的地球家园建成一个命运与共的大家庭。

原译: We should stand together and help each other in the face of adversity, and endeavor to build this planet of ours into a single family of shared future.^[5]

DeepSeek 译: They believe it is imperative to stand together in times of difficulty and uphold the spirit of mutual assistance, striving to build our shared planetary home into one large family with a shared future.

两个译文质量都很高，但细微之处见真章。对于“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官方译文将其合并简化为“stand together and help each other in the face of adversity”，流畅自然。DeepSeek 则译为“stand together in times of difficulty and uphold the spirit of mutual assistance”，其中“uphold the spirit of...”的表述略显抽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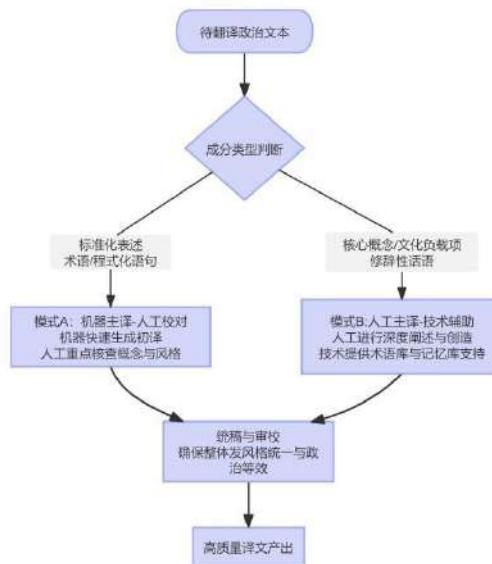
最关键的区别在于主语和视角的选择。官方译文使用了“We should...”，这是一种包容性的全球视角，将中国青年置于世界青年之中，共同呼吁行动，极大地增强了认同感和交际有效性。DeepSeek 则全程使用“They”的第三人称视角，始终将中国青年作为被描述的“他者”，这种客观描述在拉近心理距离、引发共鸣方面，效果弱于官方译文。这体现了人工翻译在把握外交辞令和传播策略上的高超智慧。

通过以上案例的多维度深度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机器翻译在概念传递层面表现不错、文化适应和交际效

果两个层面都与专业人工翻译存在系统性差距。这些差距不仅反映了技术层面的局限，更深刻地揭示了政治文献翻译这一特殊领域中，机器在政治认知、文化智慧和修辞判断等方面的本质缺失。这些发现为构建更加科学有效的人机协作模式提供了坚实的实证基础。

四、迈向分级人机协作：一个优化路径的构想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分级人机协作”模式，其核心在于以专业译员为决策中心，根据文本特性灵活调用技术资源。具体工作流程如下：



模式 A：机译主翻-人工校对

适用对象：标准化、程式化表述，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已有定译的术语。

工作流程：机器生成初译，人工转为“审核者”，重点核查概念与风格。

模式 B：人工主译-技术辅助

适用对象：核心政治概念、文化典故、修辞性话语。

工作流程：人工主导深度阐释与创造，技术提供术语库等支持。

最终统稿与审校：无论采用哪种模式产出的译文片段，都必须由资深译员进行整体统稿，确保全文风格统一、术语一致、政治立场无误，从而保证最终的交际有效性。

该框架的实践价值在于，通过合理的人机分工，将人类专家从重复性、机械性的基础工作中解放出来，使其能将宝贵的的认知资源集中于最具价值的核心概念阐释、文化障碍化解与修辞效果营造等创造性任务，最终实现翻译质量与效率的有机统一。

五、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通过构建三维评估模型，并对《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白皮书进行深入的案例对比，实证了当前阶段的DeepSeek等先进机器翻译系统在处理中国特色政治话语时，其能力存在明显的“能力鸿沟”。它的优势体现在处理标准化信息的一致性与速度上，能够成为译员的高效助手。然而，其瓶颈在于缺乏对政治话语深层逻辑、历史文化语境与意识形态内涵的深度认知与创造性阐释能力。因此，中国特色政治话语的高质量外译工作，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其核心驱动力依然是人，是那些具备高度政治素养、深刻文化洞察力与娴熟跨语言能力的人工专家。机器翻译可以作为重要的“生产力加速器”，但绝不能成为“翻译质量的决策者”。

展望未来，我们应在以下方面持续努力：

1. 对人机协作模式的持续探索与细化：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分级人机协作”流程，开发更适合该模式的计算器辅助翻译（CAT）工具与工作平台。

2. 对翻译技术发展的方向引导: 未来的机器翻译研发不应止步于语言的流畅, 应致力于向更具“文化意识”与“政治智能”的方向演进, 例如通过引入大规模高质量的政治文献平行语料库、构建政治话语知识图谱等方式, 提升系统对特定概念的理解深度。

3. 对翻译人才培养模式的革新: 未来政治文献译员不仅需要传统的双语能力, 还需培养“技术驾驭力”与“人机协作管理能力”, 学会如何高效地指挥、评估与修正机器的产出。

唯有如此, 我们才能构建起一个既能跟上技术发展步伐, 又能坚守政治与质量底线的现代化对外翻译体系, 从而更好地在促进国际理解与合作、构建人类命运体的宏伟蓝图中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 [1] 陈京钰, 黄友义. 构建国家对外话语体系中的对外翻译及国际传播——黄友义先生访谈录[J]. 中国翻译, 2024, 45(02): 117-122.
- [2] 黄忠. 新兴数字科技的发展与国际政治的变革[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24, (01): 149-158.
- [3] 杨霞. 机器翻译与人工翻译在中国特色话语翻译中的对比分析——以二十大报告为例[J]. 现代英语, 2024, (05): 121-123.
- [4] 胡晓华. 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及方法[J]. 汉字文化, 2022, (22): 144-146.
- [5] 中国日报网. 英语点津: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双语全文) . 2022.04.21. <https://language.chinadaily.com.cn/a/202204/21/WS62611ee0a310fd2b29e58788.html>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v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Political Discours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Official and DeepSeek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Youth in the New Era* White Paper

Chen Qiaoyun

(Kashi University, Kashi, China)

Abstract: As global communication demands increasingly require both efficiency and quality in translation, integrating AI technologies into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for Chinese political discourse has become critically important. This study conducts a systematic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official human translation and DeepSeek's machine translation of China's white paper *Chinese Youth in the New Era*. Through a three-dimensional assessment framework evaluating “conceptual precision,” “cultural appropriateness,” and “communicative efficacy,” the research reveals that while DeepSeek demonstrates reliability in handling terminology and standardized expressions, it shows systematic limitations in processing culture-specific metaphors and rhetorical structures embedded with ideological connotations. These limitations primarily manifest as conceptual misunderstandings, emotional tone deviations, and diminished rhetorical impact. Accordingly, this study proposes a tiered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framework: employing machine-translation with human revision for standardized content, while adopting human-led translation with technical support for core political concepts and culture-loaded terms. This approach offers a balanced solution optimizing both efficiency and quality in translating Chinese political discourse for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Keywords: Chinese political discourse; *Chinese Youth in the New Era*; human translation; DeepSeek;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基于 GIS 的 3D 建模与分析技术在房地产质量评价中的应用

林詹滨¹ 张蒙莉¹ 虢小燕¹ 李昆松¹

(1.广州华商职业学院, 广东 广州 511300)

摘要: 伴随房地产行业的蓬勃发展, 针对房产质量评估的需求也日益增长。传统的人工评估方式存在着低效、差异性大、信息共享难度大、仅能实现二维展示效果等缺点。为克服传统评估方式的弊端, 本文针对不同房地产项目, 提供了一种更加高效准确、客观的房产评估方法。首先, 利用开发商数据以及卫星图像等数据源, 通过 SketchUp 软件对不同房地产项目进行三维建模; 其次, 使用 ArcGIS 软件对房产项目三维模型进行编辑分析, 为了更好的展示效果对数据进行简化; 最后利用熵权法-灰色关联度分析对不同项目质量进行分析, 考虑了全面客观的质量评价体系, 具备很高的参考价值。本文应用的 SketchUp 建模+ArcGIS 数据处理+熵权法-灰色关联度分析的房产质量评价体系, 克服了传统人工评估的缺陷, 提供了更高效全面的质量评价方法, 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 GIS, 熵权法, 房地产质量评价

DOI: doi.org/10.70693/jyxb.v1i3.94

1.引言

随着房地产行业的发展, 其在国民经济领域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房地产质量评价是通过对房屋建筑、结构、装修材料、设备等进行全面检测, 建立和完善房屋质量档案, 评价房屋质量的过程^[1,2], 不仅在房地产的前期开发、中期销售、后期交付等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基于房地产质量评价的价值评估也在产权过户、税收缴纳、房产保险、权益纠纷中提供客观参考价值^[3-5]。传统的房地产质量评估体系以人工评估的方式为主, 这种方式受评估人员的主观影响较大, 评价结果缺乏客观性和公正性; 其次, 人工评估还存在着效率低、成本高的问题, 对房产质量的定性分析缺乏统一的标准, 定量分析缺乏精确的测算数据; 最后, 人工评价在信息资源共享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 展示方式缺乏动态可视化效果, 难以让人产生直观体验。总而言之, 人工评估方式存在着效率低、成本高、主观性强、信息共享难度大、展示效果差等缺点^[6]。

随着地理科学、计算机技术、遥感技术和信息科学的发展, 地理信息系统(以下称 GI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得到了长足的发展^[7,8]。该技术是上世纪六十年代首先由加拿大学者提出,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 GIS 技术完成了与一些具有专业领域的结合^[9-12], 已经能够对任一形式的地理信息进行高效获取、存储、更新、操作、分析及显示的集成, 目前已在资源环境的开发保护、土地规划及城市管理建设、交通及地图测绘、房地产开发、农业研究、自然灾害的监测与评估等领域有了大量的应用^[13]。Jin, YL^[14]利用 GIS 技术分析评估了北京市儿童乐园土壤和粉尘中的重金属来源; Chowdary, VM^[15]使用遥感技术配合 GIS 技术 GIS 技术能够整合和分析从遥感和其他常规来源获得的各种格式获得的空间、空间和多层信息, 对印度马尤拉克什流域进行可持续管理的水资源综合开发计划; Aklibasinda, M^[16]使用 GIS 软件对开塞利 Kayseri 的自然文化资源数据进行分析整合, 并确定了潜在的旅游和娱乐地形; Milevski, I^[17]介绍了地理信息系统(GIS)结合遥感(RS)技术评估潜在自然灾害(过度侵蚀、山体滑坡、暴洪和森林火灾)的方法。上述列举的研究均充分说明了 GIS 技术在各个专业领域应用的可行性。此外, 伴随着房地产行业的蓬勃发展, GIS 技术也开始在房地产领域展现出极大的需求和应用前景。在房地产研究领域, 涉及 GIS 应用的文献呈现出持续增长的态势, 这直接体现了该系统在这一领域应用的可行性。Chong, XL^[18]使用 GIS 系统用于捕获、描述和追踪城市中每栋房屋的地理属性, 构建了一种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三维城市地产建模与仿真系统, 可用于数字城市建模、城市规划、住房评估、住房监控、住房交易可视化等; Rau, JY^[19]

作者简介: 林詹滨(1994—), 男, 硕士, 研究方向土地资源管理、房地产经营与管理;

张蒙莉(1989—), 女, 本科, 讲师, 研究方向为 3D 建模、思想政治教育;

虢小燕(1996—), 女, 硕士, 研究方向为工程项目管理

通讯作者: 李昆松

提出一种基于具有丰富属性的二维 GIS 建筑覆盖体的高性价比多尺度建筑建模策略, 并通过基于 Web 的三维 GIS 平台实现其在房地产市场中的应用; Liu, XS^[20]建立了基于 GIS 和 BP 神经网络的房地产评估体系, 系统结构设计包括评估模型、贸易案例、GIS 数据库和查询分析模块。结果表明, 该评估系统实现了空间数据和属性数据的查询、添加和编辑功能, 提高了房地产的效率和准确性, 从而为系统提供了新的房地产方法。总结的说, GIS 系统作为一种基于计算机技术和遥感技术的特定的空间地理信息系统, 经过不断的发展完善, 目前已在资源环境、城市规划管理、自然灾害评估、农业科学等等领域实现了大量的应用。在房地产领域, GIS 系统也被用于捕获、描述房产地理属性和空间属性, 可实现住房评估、住房交易可视化、住房监控等功能, 极大的促进了房地产领域的发展。

为了克服人工评估方式的缺陷, 本文采用基于 GIS 的 3D 建模与分析技术对房地产进行质量评价, 采用 Sketchup 对房产进行三维建模, 将三维建模模型集成于 GIS 系统, 使用 ArcGlobe 进行三维显示与分析, 为房产质量分析提供直观、深刻的房子三维交互浏览体验。在此基础上, 基于熵权法构建房地产质量评价体系, 确立房产质量的各项评价指标权重, 对房地产项目质量进行论述。

2. 建模与分析

2.1 技术实施路径

目前市场上已有的主流 3D 建模平台有 Sketchup、XSI、3DS MAX、MAYA 等。其中, Sketchup 软件建模周期相对较短, 并且简单易于操作, 能够达到模型数据量与精细度之间较好的平衡^[21,22], 因此在本文中选择 Sketchup 软件进行 3D 建模。此外, 为了实现三维分析功能, 还需要应用 GIS 技术进行房地产项目质量分析^[23-26], 利用 ArcGIS 中提供的 ArcGlobe 模块, 直接编辑三维要素并进行三维矢量分析。

选取位于深圳市四个不同房地产项目进行对比研究。使用 Sketchup 软件进行 3D 建模, 获取多方面数据源, 主要由数字程高模型、航空影响及其它数据构成, 其中包括 (1) 基础地形数据, (2) 卫星影响资料, (3) 由数码摄像机拍摄的建筑表面材料及其它材料纹理图像, (4) 由开发商提供的项目参数, 包括房产结构、材质等。利用 Sketchup 软件进行 3D 建模时, 分为几何建模、纹理贴图和三维优化三个步骤^[27]。几何建模是针对不同房地产项目楼梯结构、墙体厚度、门窗位置等结构信息进行输入, 纹理贴图则能够体现不同表面材料, 逼真还原房产外观, 三维优化是在几何建模和纹理贴图的基础上进行外观优化、数据简化等操作, 减小计算量的同时最大程度还原房产外观、结构特点。对于一些大量使用的建筑形状或者部件, 为提高建模效率, 将其选择并录人为组件, 重复使用时在数据库中进行调用即可, 例如楼梯、门窗等大量出现的组件。而对于真实世界中出现的大量的细小面, 如窗面、楼梯台阶面等, 可在不影响可视化影响的前提下使用细小面进行替代, 使可视化效果更加简洁, 又降低了工作量, 同时能够减少计算机的运行负荷, 大量节约处理时间, 优化模型。对多余的线、面、几何体进行擦除, 尤其是一些位于内部的看不见的结构, 对这些冗余结构进行消除有利于计算机运行速度, 提高工作效率。此外, 还要控制好材质的大小和质量, 部分细节并不需要很高的分辨率去显示, 因此将其显示清晰度调低能够提高显示速度, 但也要确保能够保留建筑的最基本参数结构和视觉效果。

完成 Sketchup 三维模型建立后, 需将不同房地产项目进行 GIS 系统规模化集成, 通过两种途径实现。一是将三维模型进行三维符号显示, 这种方法效率高, 但是不能进行分析操作, 因此不能单纯使用这种方法; 二是直接转化成 ArcGIS 支持的三维数据格式 -Multipatch, 则可以交互编辑 Sketchup 生成的三维模型, 实现 Sketchup-ArcGIS 的交联应用, 直观显示房地产项目外形结构的同时, 可直接编辑分析房体结构、材质、布局等与房产质量相关参数, 为后续房产质量分析做好铺垫工作。

2.2 数据组织与管理

尽管三维建模配合 GIS 系统的方法能够更加直观、深刻的反馈房产信息, 相对于人工测绘能够展示出一个三维的、动态的效果, 但势必也会造成其数据文件的庞大和复杂。因此, 在不影响展示效果和播放速度的基础上, 对三维数据文件进行切片化管理和简化是非常有必要的, 能够减小整体数据包文件的大小, 并且提高展示速度。在本文中, 三维数据是以 Multipatch 的多片数据格式进行储存的。Multipatch 是一种专门用于描述 3D 场景的数据格式, 不仅能像 3D 符号数据一样展示丰富的空间效果, 表达建筑的空间属性, 还能够进行三维数据的录入编辑与属性管理, 这种数据格式为数据精简创造了条件。Multipatch 的多片数据是以数据集的形式储存在 File Geodatabase 数据模型中, 每个数据集为一个文件夹, 实现了数据模块化的管理。因此对于大数据量的三维案例, File Geodatabase 能够仅对所展示区域的切片数据进行读取, 这将大大节约计算机内存, 提高运行速度, 提高了后期不同房地产项目结构、材质属性的显示、浏览、查询速度, 提高质量分析效率。除此之外, File Geodatabase

数据模型具有跨系统操作能力，在数据集成和空间分析方面提供较好的兼容性和操作性^[26,27]。有了以上数据系统的支撑，对项目数据管理将变得更加简便。在实际简化过程中，利用了 ArcCatalog 模块对 ArcGIS 地理数据进行管理，无需打开三维视图，只需要在 ArcCatalog 模块文件的目录树中进行操作即可。在数据建模的过程中，利用快捷命令对切片数据进行拖放、复制粘贴等操作提高效率，在数据精简过程中对不必要的或者隐藏的线、面、三维结构进行删除，实现简便的操作。

此外，在大规模建筑的三维数据展示中，需要配备高级缓存，并合理分配给展示对象^[28,29]。对于三维结构的物体、材质属性需要分配更多的缓存空间，其它数据类型例如点、线、文本、高程可以分配较少的内存。如此在后期数据浏览和展示时，得当的缓存分配将使显著提高场景显示速度，提高展示效果^[30]。

3. 房地产质量分析

房地产的质量问题关系到工程项目的进度、成本以及生产安全等重大问题。而对于已开发的房产项目，质量问题的出现不仅影响房产的销售和交易，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还严重影响居住者的人身安全问题。因此，对房产进行质量分析至关重要。本文在这一部分提供了一种高效的比对方法，即基于 3D 建模数据的基础上，使用熵权法对不同房产项目进行质量分析对比，以高效准确的评价房产项目的安全性，为房产质量评估提供客观依据。

3.1 熵权法基本原理

熵最早提出是在热力学这门学科当中，申农是首位将它应用在信息系统中的人。在信息传递中，信号源的不确定性被定义为信息熵，信息的平均值和熵具有相同的属性，因此通过熵的信息论，可以将它应用在超出目前自然科学的一些领域，在工程技术的应用上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最直接的比较方法是给这些指标赋予权系数，也就是权重。基于熵的思想，信息量的多少直接影响到决策的精度和可靠性，而熵是在决策过程中进行评价的一个重要参数。熵权法是根据各项指标的变异程度，利用信息熵计算出各个指标之间的熵权，通过熵权进一步修正各个指标的权重，从而得出更为客观的结果。信息熵比较小，其指标变异程度就比较大，提供的信息量就越多，权重就越大。而信息熵较大时，提供的信息量就越少，权重越小。因此在实际过程中，可以根据指标的变异程度，利用熵来计算指标的熵权，将计算的熵权进行加权计算，从而达到对项目质量进行客观评价的目的。本文将熵权法应用在建筑领域中，基于熵权法对房产项目进行质量评价。

3.2 利用熵权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

使用熵权法对房产项目进行评估时，首先要确定评价标准。房地产建设工程质量评价体系具有很多评判标准，本文主要从安全性、协调性和适用性三个方面构建质量评价体系，安全性分为结构强度、防火性、抗震强度三个方面考虑，适用性分为通风、采光、隔音、隔热四个方面考虑，协调性分为社会环境、生态环境、基础设施三个方面考虑。

各个方面的指标高低都将由前文 3D 建模所提供的结构、材质数据，以及专家评分等决定，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公正性，能够高效的比较出不同房产项目的质量指标，具体指标得分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不同房产项目质量评价得分细则

Project	Evaluating indicator									
	Strength	Fireproof	Anti-seismic	Air circulation	Lighting	Sound insulation	Heat insulation	Society	Ecology	Infrastructure
1	86	91	87	88	69	78	88	85	90	83
2	78	76	79	81	83	80	89	87	88	68
3	89	86	83	87	88	79	86	85	81	87
4	87	86	78	87	89	91	93	87	83	84

3.3 熵权法-灰色关联度模型分析

在这里，本文将熵权法与灰色关联度方法结合起来应用，综合两者模型的优点，在熵权法赋权的基础上，结合灰色应用模型，实现静态评估和动态预测两种目的，同时使得分析结果更加准确可靠。

根据表1中各个细化指标的评分细则表现,将所有指标进行标准化计算,在运用理想解法进行综合评价时,首先要构造加权规范化矩阵V,即将权重 w_j 和目标矩阵R中相对应的指标进行相乘,得到规范化矩阵V,其次,根据“大中取最大,小中取最小”的原则,确定理想解 V^+ 和负理想解 V^- 。

根据在规范化矩阵的计算结果中,项目1的理想解 V^+ 对应的指标为防火一项,表明在项目1中,防火性能对整体质量的贡献程度最大,而负理想解 V^- 对应的指标为照明,表明项目1的照明条件明显拖累了整体质量指标,有可能因为照明条件较弱而产生的安全事故,例如老年人在楼道里的行路安全问题,因此若后续要改进项目1的安全问题,优先从照明方向去改进将收获更大的房产质量收益。项目2、3、4对应的理想解指标分别为隔热、楼体强度、隔音,负理想解分别为基础设施、隔音、抗震,这也为质量改进工作提供了优先级的参考。接着计算对象到理想解和负理想解的距离,经过加权规范化矩阵运算,得到理想解和负理想解值。

在本文中,计算对象到理想解的距离越小,表明该细化指标越接近于高质量水准。项目1中的防火、通风、生态环境指标均距离理想解的距离小,而照明、隔音距离理想解的距离较大,表明了该项目的质量问题优化优先级方向,并且可以看出,与人为主观认识的印象一致,为年限较久的地产项目所可能出现的通病。计算各模块与正负理想解的灰色关联系数矩阵 R^+ 和 R^- ,后将R指标标准化后的指标进行计算,可以得到各项指标的熵值和熵权值,具体结果如下:

表2 各评价指标熵值和熵权值计算

Indicator	Strength	Fireproof of	Anti-seismic	Air circulation	Lighting	Sound insulation	Heat insulation	Society	Ecology	Infrastructure
Entropy	0.9997	0.9996	0.9993	0.9998	0.9994	0.9995	0.9991	0.9997	0.9992	0.9993
Entropy weight	0.1316	0.0993	0.0653	0.0963	0.1297	0.1456	0.0653	0.1389	0.0699	0.01123

从熵值与熵权值的计算结果中可以看出,所有细化指标对房产项目整体质量的贡献度排序为:楼梯强度>社会环境>隔音>照明>防火>通风>抗震>隔热>生态环境>基础设施。这体现了各细化指标对整体项目质量指标的权重,熵权值越大,表明细化指标的影响显著性越大,在考虑房产项目设计开发或者旧城改造项目中的质量改进问题时,可以优先对熵权值大的指标进行改进,能够收获较大的收益。

计算各模块与正负理想解的灰色关联系数 r_i^+ 和 r_i^- 结果如下表3所示:

表3 欧几里得距离和灰色关联系数

Project	d_i^+	d_i^-	r_i^+	r_i^-
1	0.251.1	0.201.6	0.632.5	0.807.4
2	0.155.6	0.248.3	0.781.3	0.602.3
3	0.236.8	0.183.1	0.734.2	0.653.4
4	0.240.3	0.206.6	0.775.4	0.671.5

分别对欧几里得距离和灰色关联系数进行无量纲处理,其中, D_i^+ 和 D_i^- 的数值越大,研究对象和正理想解更加贴近; D_i^+ 和 D_i^- 的数值越小,研究对象和正理想解差距则比较大。这些数据将用于计算贴近度,反映项目的整体质量。

表4 无量纲化处理和相对接近度

Project	D_i^+	D_i^-	R_i^+	R_i^-	Q_i^+	Q_i^-
1	1.0001	0.8234	0.7983	1.0000	0.8065	1.0002
2	0.6274	0.9984	0.781.3	0.602.3	1.0001	0.6842
3	0.9545	0.7355	0.734.2	0.653.4	0.8351	0.8739

4	0.9633	0.206.6	0.775.4	0.671.5	0.9224	0.8953
---	--------	---------	---------	---------	--------	--------

将以上的结合起来, 计算相对贴近度, 结果如表 5 所示。

表 5 各房地产项目质量贴近度

Project	1	2	3	4
S^+	0.0058	0.0034	0.0078	0.0062
S^-	0.0048	0.0072	0.0030	0.0058
Closeness	0.5665	0.3342	0.7138	0.5379

根据评价准则可知, 在本文中贴近度大小能够直接反应房地产项目质量, 房地产项目 3 的贴近度最高, 为 0.7138, 可知其整体建筑质量最佳, 其次为项目 1 (0.5665), 项目 4 (0.5379), 项目 2 贴近度为 4 个参评项目中质量最差, 仅 0.3342。在熵权法的计算过程中, 通过计算指标理想解与负理想解的距离可以对具体的某一项目的细化指标对整体指标的显著性进行分析, 以项目 1 为例, 防火指标权重到理想解的距离最小, 照明指标权重到负理想解的距离最小, 意味着对项目 1 本身而言, 防火性能相对于其它性能较优异, 对整体质量指标贡献度最大, 而照明性能对整体质量指标处于“拖后腿”状态, 需要优先改进。在房地产项目 2、3、4 中, 对整体质量指标贡献度最大的细化指标分别是隔热、楼体强度、隔音, 最差的分别为基础设施、隔音、抗震。而通过熵权值的计算结果, 可以看出在本文所比较的房产项目中, 所有的指标显著性排序为: 楼梯强度 > 社会环境 > 隔音 > 照明 > 防火 > 通风 > 抗震 > 隔热 > 生态环境 > 基础设施。这些信息可以为房产设计开发以及旧城改造项目中的质量问题提供具体的改进方向, 收获最大的质量提升收益。

4. 结论

本文针对房地产质量分析领域, 提供了一种高效准确的分析方法。利用开发商及卫星图像数据, 使用三维软件 SketchUp 对不同房地产项目进行建模, 导入 ArcGIS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过程基于熵权法进行, 确立了不同的指标进行质量分析。得到了如下结论:

相比起人工评估房地产质量的方法, 本文提供的 SketchUp 建模+ArcGIS 分析+熵权法评估的质量评价体系具有高效、准确的特点, 能够大大节约人力成本和提高评估效率, 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通过专家评价与实际调研, 确定了安全性、协调性和适用性三大评价指标, 其中又对三大指标进行细分。该评价指标体系考虑了关乎房地产项目质量的许多因素, 具有覆盖性强的优点, 相对于目前的人工评估房产质量方法, 能够在基于计算机算力优势的条件下, 进行更加全面客观的质量评估。

在不同房地产项目的质量评估中, 通过熵权法计算其项目贴近度来反应项目质量差别。结果表明: 项目 3 的贴近度最高, 为 0.7138, 因此其整体质量最佳。项目 1、2、3、4 的细化指标权重到理想解距离最小的分别为防火、隔热、楼体强度、隔音, 细化指标权重到理想解距离最大的分别为照明、基础设施、隔音、抗震, 分别表明了各个项目最需改进和最不需改进的方向。而在所有项目中, 指标的显著性排序为楼梯强度 > 社会环境 > 隔音 > 照明 > 防火 > 通风 > 抗震 > 隔热 > 生态环境 > 基础设施。这些信息可以为房地产项目的设计开发、旧城改造项目的质量问题提供优先改进方向, 使得工程收获最大的安全质量收益。

参考文献:

- [1] C. Wei, M. Fu, L. Wang, H. Yang, F. Tang, Y. Xiong, The research development of hedonic price Model-Based real estate appraisal in the era of big data, LAND 11 (3) (2022).
- [2] P.A. Dabholkar, J.W. Overby, An investigation of real estate agent service to home sellers: Relevant factors and attributions, SERVICE INDUSTRIES JOURNAL 26 (5) (2006) 557-579.
- [3] J.S. Lee, D. Oh, Housing quality evaluation and housing choice using PIF: A case of the Bundang New Town housing market in Kore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Sciences 16 (1) (2012) 63-83.
- [4] C. Leishman, C. Watkins, Assessing the spatial impact of policy interventions on real-estate values: An exemplar of the use of the hybrid hedonic/repeat-sales method, REGIONAL STUDIES REGIONAL SCIENCE 4 (1) (2017) 202-217.
- [5] M. Cardin, G.L. Kolschoten, D.D. Frey, R. de Neufville, O.L. de Weck, D.M. Geltner, Empirical evaluation of procedures to generate flexibility in engineering systems and improve lifecycle performance, Res. Eng. Des. 24 (3) (2013) 277-295.

- [6] S. Yilmazer, S. Kocaman, A mass appraisal assessment study using machine learning based on multiple regression and random forest, *LAND USE POLICY* 99 (2020).
- [7] R.S.A. Usmani, I.A.T. Hashem, T.R. Pillai, A. Saeed, A.M. Abdullahi,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and big spatial data: A review and challeng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TERPRISE INFORMATION SYSTEMS* 16 (4) (2020) 101-145.
- [8] R. Unrau, C. Kray, Usability evaluation for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Int. J. Geogr. Inf. Sci.* 33 (4) (2019) 645-665.
- [9] N. Arcuri, M. De Ruggiero, F. Salvo, R. Zinno, Automated valuation methods through the cost approach in a BIM and GIS integration framework for smart city appraisals, *Sustainability-Basel* 12 (18) (2020).
- [10] J. Zhu, X. Wang, P. Wang, Z. Wu, M.J. Kim, Integration of BIM and GIS: Geometry from IFC to shapefile using open-source technology, *Automat. Constr.* 102 (2019) 105-119.
- [11] J. Zhu, X. Wang, M. Chen, P. Wu, M.J. Kim, Integration of BIM and GIS: IFC geometry transformation to shapefile using enhanced open-source approach, *Automat. Constr.* 106 (2019).
- [12] Y. Sun, Y. Hua, L. Mou, X.X. Zhu, CG-Net: Conditional GIS-Aware network for individual building segmentation in VHR SAR images, *IEEE T. Geosci. Remote* 60 (2022).
- [13] G. Lu, M. Batty, J. Strobl, H. Lin, A. Zhu, M. Chen, Reflections and speculations on the progress in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GIS): A geographic perspective, *Int. J. Geogr. Inf. Sci.* 33 (2) (2019) 346-367.
- [14] Y. Jin, D. O'Connor, Y.S. Ok, D.C.W. Tsang, A. Liu, D. Hou, Assessment of sources of heavy metals in soil and dust at children's playgrounds in Beijing using GIS and multivariate statistical analysis, *Environ. Int.* 124 (2019) 320-328.
- [15] V.M. Chowdary, D. Ramakrishnan, Y.K. Srivastava, V. Chandran, A. Jeyaram, Integrated water resource development plan for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mayurakshi watershed, india using remote sensing and GIS, *Water Resour. Manag.* 23 (8) (2009) 1581-1602.
- [16] M. Aklibasinda, Y. Bulut, Analysis of terrains suitable for tourism and recreation by using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 *Environ. Monit. Assess.* 186 (9) (2014) 5711-5719.
- [17] I. Milevski, S. Dragicevic, I. Radevski, GIS and Remote Sensing based natural hazard modelling of Kriva River catchment, Republic of Macedonia, *Z. Geomorphol.* 61 (2017) 213-228.
- [18] X. Chong, S. Li, A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based 3D city estate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system. 9794 (2015). <https://10.1117/12.2203445>.
- [19] J. Rau, C. Cheng, A cost-effective strategy for multi-scale photo-realistic building modeling and web-based 3-D GIS applications in real estate, *COMPUTERS ENVIRONMENT AND URBAN SYSTEMS* 38 (2013) 35-44.
- [20] X. Liu, Z. Deng, T. Wang, Real estate appraisal system based on GIS and BP neural network, *T. Nonferr. Metal. Soc.* 21 (2011) S626-S630.
- [21] B. Wei, H. Liang, T. Wang, 3D modeling and visualization of city drain-pipes network based on ArcGIS and SketchUp. 726-731 (2013) 3030-3034. <https://10.4028/www.scientific.net/AMR.726-731.3030>.
- [22] Y. Gao, B. Hu, Y. Jia, 3D GIS Model Building Based on SketchUp. 353-356 (2013) 3507. <https://10.4028/www.scientific.net/AMM.353-356.3507>.
- [23] P. Wu, Y. Li, X. Wen, Extended application of GIS for temporal simulation of sunlight on buildings in 3D environment. 14 (2013) 511-517.
- [24] T. Wang, Z. Gao, J. Ning, Research on construction of Web 3D-GIS based on Skyline. 9221 (2014). <https://10.1117/12.2058581>.
- [25] B. Wu, S. Duan, L. Liu, ANew3DGIS Development Technology Research Based on theSketchup and SuperMapPlatform. 433-435 (2013) 1379-1382. <https://10.4028/www.scientific.net/AMM.433-435.1379>.
- [26] Y. Ma, S. Zhu, Architectural design using AutoCad and Sketchup. 556-562 (2014) 6379-6382. <https://10.4028/www.scientific.net/AMM.556-562.6379>.
- [27] F. Olivera, M. Valenzuela, R. Srinivasan, J. Choi, H. Cho, S. Koha, A. Agrawal, ArcGIS-SWAT: A geodata model and GIS interface for SWAT (vol 2, pg 295, 2006), *J. Am. Water Resour. As.* 42 (3) (2006) 807.
- [28] Q. Xie, B. Wei, K. Zhang, Z. Wang, Format conversion between CAD data and GIS data based on ArcGIS. 9808 (2015). <https://10.1117/12.2207479>.

- [29] B. Wei, H. Liang, T. Wang, 3D modeling and visualization of city drain-pipes network based on ArcGIS and SketchUp. 726-731 (2013) 3030-3034. <https://10.4028/www.scientific.net/AMR.726-731.3030>.
- [30] Y. Lee, W.P. Graf, Jr. C.C. Thiel, Z. Hu, M. Ellis, Seismic risk assessments for real estate portfolios: Impact of engineering investigation on quality of seismic risk studies, *Earthq. Spectra* 38 (1) (2022) 726-755.

Application of GIS-based 3D Modeling and Analysis Technology in Real Estate Quality Evaluation

Lin Zhanbin, Zhang Mengli, Guo Xiaoyan, Li Kunsong

(Guangzhou Huashang Vocational College)

Abstract: With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the real estate industry, the demand for real estate quality evaluation is increasing. The traditional manual evaluation method has shortcomings such as low efficiency, large differences, difficulty in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only being able to achieve 2D display effects. To overcome the drawbacks of traditional evaluation methods, this paper proposes a more efficient, accurate and objective real estate evaluation method for different real estate projects. Firstly, using data sources such as developer data and satellite images, 3D modeling of different real estate projects is carried out through SketchUp software. Secondly, ArcGIS software is used to edit and analyze the 3D models of real estate projects, and the data is simplified for better display effects. Finally, the entropy weight method - grey correlation analysis is used to analyze the quality of different projects. A comprehensive and objective quality evaluation system is considered, which has high reference value. The real estate quality evaluation system applied in this paper, which combines SketchUp modeling, ArcGIS data processing and entropy weight method - grey correlation analysis, overcomes the defects of traditional manual evaluation, provides a more efficient and comprehensive quality evaluation method, and has a good application prospect.

Keywords: GIS; Entropy Weight Method; Real Estate Quality Evaluation

从解构到重现：清宫宝座造形风格的形态建构

蔡志军¹

(1.台湾师范大学, 中国台湾省 台北 106)

摘要：宝座作为清代文化的缩影，凝聚了丰富的历史信息与美学特征。然而，现有清式家具研究多聚焦于日用家具，对于宝座这一类别的系统解析仍较为稀缺。基于此，本文引入形态分析法，通过素材建库、形态解构、流程法则、回溯验证及风格再现五个步骤，系统构建清宫宝座的造形法则，并实现其形态重构。清宫宝座以方形基础形态为核心，同时融入适度的曲线元素，展现庄重与典雅并存的视觉特征，成为现代家具形式语言的重要灵感源泉。其造形整体遵循左右对称的结构特征，广泛运用明清家具的经典构件，彰显中国传统家具对形式美感的深刻追求。这一研究不仅深化了对清宫宝座造形语言的理解，也为传统家具在当代设计中的延续与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路。

关键词：形态分析；形式语言；中式；传承；美学

DOI: doi.org/10.70693/jyxb.v1i2.98

一、前言

清宫宝座作为清代宫廷文化的典型物化形态，被赋予着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威与尊贵身份，其形态不仅是皇权制度的具象化呈现，更集中表达清代宫廷艺术与工艺的登峰造极之境。清宫宝座的结构形式、装饰风格、材质选择与工艺技法等诸多方面，深刻映射出清代政治体制中井然有序的历史文化与工艺美学。

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当代家具设计愈加呈现出跨文化交融的趋势，以回应多元市场的需求，传统工艺在此背景中不仅未被湮没，反而焕发出新的活力。清宫宝座以卓越的雕刻技艺、精致的镶嵌工艺及独具匠心的装饰纹样而著称，不仅凝聚深厚的文化符号，且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象征元素，为当代家具设计提供多样的灵感源泉。清宫宝座在造形上的塑造更是值得深究，其简洁中蕴藉庄重，繁复中不失典雅，可见东方文化的设计智慧。本研究拟引入形态分析法，系统构建清宫宝座的造形法则，期望借由这一探索，深化对传统家具设计语言的挖掘，进而推动传统文化在当代家具设计领域的创造性传承与转化。

二、陈设与象征：清宫宝座

宝座，远非寻常家居器物可比，其存在不仅承担空间的功能分配，更隐喻着权力与礼制的深刻内涵，多见于宫廷、府邸及寺院场域。清宫宝座其形态与功能显著区别于佛座，具有特殊的文化指涉^[1]。作为皇家专属之物，清宫宝座多以单件独立陈设，少有成对出现^[2]，其周围环绕雕饰华美的屏风，并辅以供桌、香几及宫灯等陈设，共同营造庄严肃穆的仪式氛围。通常置于大殿正中，高踞于居中之位，以彰显“上下有序”的权力秩序与等级尊严^[3]。藉由空间布局，清宫宝座不仅以鲜明的视觉符号昭示皇权的至高无上，更于无声中传递礼制文化的核心精神。

清宫宝座的造形以大型座具为基底，辅以精美且艺术化的装饰，其恢弘的外观无声地宣示着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威^[4]。座面以下的结构承袭传统床榻的经典形式，内翻马蹄与鼓腿膨牙成为其标志性特征，赋予宝座雄浑大气的整体形态^[3]。其用材之讲究堪称匠心独具，紫檀与黄花梨等珍稀木材因其坚韧而广泛应用，彰显皇家器物的尊贵格调。更有甚者，天然木宝座以树根的自然形态为美，隐含对自然力量的崇敬^[5]，而鹿角宝座则以质朴粗犷的审美呈现满族文化的原生气息。雕饰方面，清宫宝座为集工艺之大成，广泛运用浮雕与透雕技法，其装饰纹样以

作者简介：蔡志军(1993—)，男，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家具与室内设计

通讯作者：蔡志军

龙纹、祥云及花卉为主，寓意吉祥富贵，增添威仪之余更彰显皇家气度与奢华^[2]。部分宝座表面饰以鎏金或雕刻五爪龙纹，进一步明确“天子之座”的至尊象征。

清式家具研究历来以日用家具为主，而对宝座这一珍稀类别的系统解析则鲜有深入探讨。现有研究大多着眼于社会学与历史学的视野，例如通过对宫廷家具陈设的社会学分析，阐明宝座作为皇权象征与权力符号的文化意涵^[6]。与此同时，也有学者将目光转向宝座的修复实践，例如借助现代科技手段，深入探讨清代黑漆描金大宝座的修复案例^[7]。诚然，上述研究为宝座的保护与复原提供重要方法论与经验的支持，但多以个案为中心，未能构建起系统性的理论框架，难以全面呈现宝座整体形态的特质与规律。

《故宫博物院藏明清家具全集》为明清家具研究提供重要的实物依据，所载近两千件家具的影像资料^[8]，涵盖多件清宫宝座，固然该书详尽记录清宫宝座的年代、名称与尺寸等基本信息，却未能深入探讨宝座的形态特质与设计美学。可由此窥见，清宫宝座研究在形态学层面的深入探讨仍具较大拓展空间，亟需突破符号学阐释与修复实践的局限，进一步转向形态特征与设计逻辑的系统性分析。

三、形态分析法

形态分析法（Morphological Analysis）由美国学者 F. Zwicky 首创，其旨在通过系统化的剖析与综合，探寻对象的构成要素及其组合可能性。这一方法的独到之处，在于它能够超越传统分析模式，以一种高度逻辑化且开放的方式，生成多维度的创新构想^[9]。作为一项具有高度适应性的工具，形态分析法广泛应用于设计、工程及跨领域研究之中，展现出其在理论与实践延展上的巨大潜力^[10]。

借助形态分析法对清宫宝座形式构成与设计逻辑进行剖析，将清宫宝座的形态建构细分为五个阶段（见图 1）：

- (1) 素材建库：依据明确的筛选标准构建素材资料库，通过系统整理与归纳，以期全面把握清宫宝座的形式脉络。
- (2) 形态解构：将宝座的形式特征拆解为构成其设计语汇的基本单元，辨析这些构件的“基本形态”及其“变化形态”，力求通过解构过程还原其基础形态。
- (3) 流程法则：通过对宝座设计的形态演化与建构逻辑的梳理，总结其设计法则，并将其系统化为形态建构流程图，剖析清宫宝座在形式语言上的内在逻辑。
- (4) 回溯验证：基于现存宝座样式，通过形态回溯分析验证理论模型的可行性，确保形态建构流程具有科学性与实践性。
- (5) 风格再现：以形态建构流程与设计法则为指导，开展具象化的创作实践，以此重构清宫宝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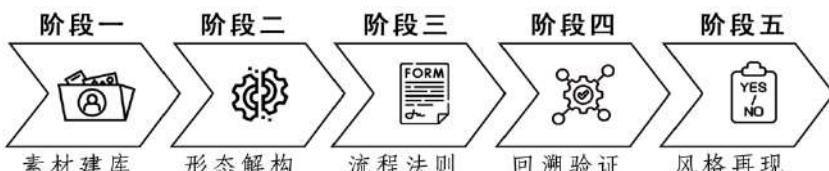


图 1 清宫宝座风格形态建构研究五大阶段（资料来源：本研究制作）

四、清宫宝座的形态建构流程

(一) 素材建库

清宫所藏宝座虽形态纷繁，却表现出高度的统一性，遵循着特定的设计规律。故以清宫所藏宝座为研究对象，主要样本取自《故宫博物院藏明清家具全集》。清宫宝座在材质选用上极尽考究，不同材质展现出各自的美学与工艺特征。例如，天然木与鹿角因材质的稀有与特殊性，其造形异于常见木材制品；而交椅式宝座则因其别具一格的结构形态，与传统宝座风格迥然不同，且存世数量极为稀少。

鉴于上述的限制，为确保研究的科学性与代表性，采用立意抽样法，通过制定明确的筛选标准后精准选取研究样本。筛选标准如下：(1) 主体结构以常见木质材料为主；(2) 排除交椅式宝座；(3) 不包括用于供奉先祖的宝座。依据上述标准，最终选定 42 件具有代表性的清宫宝座作为研究样本，并由此建立清宫宝座素材库（见图 2）。

年代分布上，宝座主要集中于清代中期，具有明显的历史阶段性特征。材质选择上，堪称多样，集中展现清宫宫廷家具在工艺表现与审美意趣上的非凡成就。木材方面，常见的品种包括红木、紫檀、楠木、鵝鵠木、黄杨木、花梨木及黄花梨等珍稀材质；漆艺则涵盖金漆、黑漆、红漆、黄漆、漆画与彩绘等形式，传达鲜明的美学效果。此外，还有玉石、松花石等石材，丝竹、象牙、螺钿、珐琅、玻璃、瓷片等多种材料的融入，进一步丰富宝

座的材质表达，可见宫廷家具制作华丽的极致追求。尺寸确定上，亦存在一定的区间分布：长度在 73 至 196 厘米之间，宽度在 56 至 131 厘米之间，高度则介于 71 至 132 厘米之间（见表 1）。清宫宝座尺寸范围的统计，不仅反映其形制的多样性，更为进一步探讨其功能属性与空间布局的内在逻辑提供重要参考。



图2 清宫宝座素材库 (资料来源: 本研究整理)

表1 清宫宝座基本资料 (资料来源: 本研究整理)

序	清代	宝座名称	尺寸(cm)	序	清代	宝座名称	尺寸(cm)
1.	中	黑漆描金镶嵌松花石夔龙纹	144x106x111	22.	早	剔红夔龙寿字纹	102x67x100
2.	中早	紫檀框黑漆描金竹纹	73x56x89	23.	不详	紫檀螺钿云龙纹	139x83x105
3.	中	紫檀嵌玉云龙纹	122x85x100	24.	中	剔红云龙纹	103x81x113
4.	中	紫檀框漆百宝嵌葡萄纹	128x79x104	25.	中早	紫檀嵌玉三多纹	122x86x106
5.	中早	黄花梨框漆嵌象牙鵝鵠木山水图	96x69x97	26.	中	紫檀嵌珐琅螭龙纹	129x104x138
6.	中	紫檀云龙纹	103x78x88	27.	中	紫檀镶玻璃百宝嵌松竹梅纹	116x84x118
7.	中	紫檀云龙纹	96x74x115	28.	中早	紫檀夔龙纹	103x80x104
8.	中	紫檀缠枝莲八宝纹	70x131x116	29.	中早	紫檀框黄漆百宝嵌花卉纹	103x76x108
9.	中早	紫檀框漆嵌牙菊花纹	116x79x98	30.	中早	紫檀框黄漆百宝嵌菊花纹	103x76x117
10.	早	红漆彩绘百鸟朝凤图	82x57x98	31.	中	紫檀嵌瓷蝠寿暗八仙纹	91x69x105
11.	晚	黑漆描金螺钿云龙纹	95x64x114	32.	中早	黄花梨螭龙蝠寿纹	77x57x71
12.	中	紫檀嵌玉云龙纹	109x83x103	33.	中	紫檀镶珐琅山水图	128x90x106
13.	中	紫檀嵌黄杨木夔龙蝠磬纹	109x80x113	34.	中	黑漆描金山水图	138x103x122
14.	中	紫檀嵌黄杨木西番莲纹	196x79x111	35.	中早	黑漆描金山水图	138x104x106
15.	中晚	红木云龙纹	126x75x132	36.	中早	红漆描金云龙纹	129x91x123
16.	中	紫檀镶楠木群鹿图	127x80x110	37.	中早	紫檀框黑漆描金云龙纹	121x90x119
17.	中	紫檀框剔红云龙纹	130x90x106	38.	不详	紫檀云蝠纹腰圆形	118x70x107
18.	中	紫檀镶楠木山水图	129x80x115	39.	中早	紫檀西番莲纹腰圆形	90x68x117
19.	中	紫檀框剔红云龙纹	103x75x102	40.	中早	紫檀镶楠木鹤蝠纹腰圆形	85x64x115
20.	中	竹丝框黑漆百宝嵌花卉纹	118x84x98	41.	中早	紫檀荷花纹	99x98x111
21.	中	紫檀框剔红桃树纹	128x78x90	42.	早	剔红云龙纹腰圆形	131x80x96

(二) 形态解构

清宫宝座的整体造形均呈现出左右对称，而构成普遍包含几大核心构件：其一，为支撑整体结构的腿足；其二，用以连接腿足与座面并实现稳固功能的横档、牙子及托泥；其三，嵌置于腿足之上、直接服务于使用者乘坐需求的座面；其四，由座面向上延展的正围子与侧围子。概而言之，清宫宝座的构件可归纳为腿足、横档、牙子、托泥、座面、正围子与侧围子七大类别（见图3），上述构件形式的多样及其巧妙组合，共同成就清宫宝座的设计形态。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清宫宝座的建构并不严格涵盖全部构件，例如横档在某些情形中被有意省略，以营造更加简洁的设计语汇。



图3 清宫宝座构件分析（资料来源：本研究制作）

表2 清宫宝座形态解析表（资料来源：本研究制作）

序号	构件	基础形态	变化形态			
1	腿足	S形				
		C形				
		长方形				
2	托泥	长方形				
3	横撑	长方形				
4	牙子	长方形				
5	座面	长方形				
6	正围子	长方形				
7	侧围子	长方形				

经过对七类构件形态的系统梳理与归纳，尽管其变化形式纷繁多样，但细致的观察与分析，仍可挖掘其中蕴藏的内在规律与共性特征。经提炼“变化形态”后，进一步归纳出“基础形态”，即以常见几何体为核心的形态元素。清宫宝座基础形态以长方形为主，既为整体结构提供高度的稳定性，又充分展现其作为皇权象征的庄严与威仪；但是，基础形态中亦不乏曲线元素的巧妙运用，例如腿足的“S形”与“C形”，或膨出的牙子等具有装

饰意味的细节。基础形态中流畅的曲线，不仅打破直线构造的单调感，更为宝座增添柔美的审美特质，在庄重与典雅之间达成了精妙的平衡。

基础形态作为构件变化的核心要素，既在逻辑上理清纷繁复杂的形态变化类型，也使宝座形态的设计规律得以更加明晰地呈现。据此整合各类构件的“基础形态”与“变化形态”，编制成清宫宝座形态解析表（见表2），可更为深入地探讨清宫宝座形态演化规律。

（三）流程法则

根据清宫宝座形态解析表的系统归纳，其形态构成展现出严谨的组合逻辑，各构件通过精确的排列与契合完成整体建构，展现宝座形态设计的内在法则与规律，同时为清代家具形态构建提供富于启发性的理论框架。为更直观地展现研究成果，绘制清宫宝座形态建构流程图，用以清晰呈现其形态构建的完整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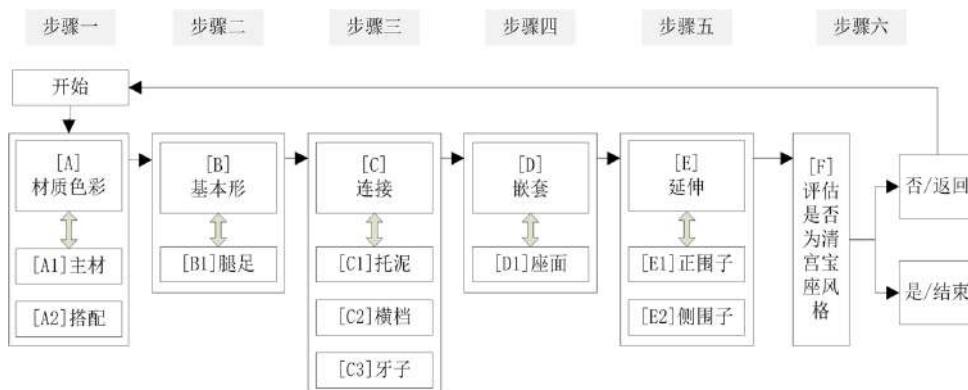


图4 清宫宝座形态建构流程图（资料来源：本研究制作）

Nicolai De 提出，座具的构成可从形态、材质和技术三个维度加以划分^[11]。形态分析以此框架中作为核心，对技术层面的探讨暂不涉及。然而，鉴于清宫宝座多以实木为主要材质，其材质特性不可忽视，因此将材质因素纳入研究范围，以更全面地呈现清宫宝座的形态特征。清宫宝座的形态构建以材质色彩为开始，依次经历基本形、连接、嵌套、延伸等环节，逐步展现出清宫宝座的形式语言（见图4）。为进一步明晰清宫宝座形态的构建过程，结合形态构建法则进行系统说明，并通过清宫宝座形态建构法则对相关规律进行详尽归纳（见表3）。

步骤一：形态构建的初始阶段需对宝座的材质色彩[A]进行预设，包括主材[A1]和搭配[A2]的选择。其中，主材的选定为每件宝座的必选选项，搭配则具有较大的灵活性，既可选择，亦可不选。若选择多种搭配，则更能进一步彰显清宫宝座在材质运用上的繁复。步骤二：完成材质预设后，进入基本形[B]的定义阶段，具体包括腿足[B1]的选型。在清宫宝座中，腿足的设计通常保持四足造形的一致性，以确保结构的稳定性。步骤三：腿足完成选型后，通过托泥[C1]、横档[C2]与牙子[C3]三种构件将其连接[C]，构建起座具的基础支撑结构，共同分担座具的重量和压力，优化受力分布，延长宝座的使用寿命。步骤四：在腿足之上嵌套[D]座面，座面[D1]形态分为平面与内凹两种形式，其中平面座面能够直接坐用，内凹的座面专为放置软垫而设计，避免坐垫滑动且提高舒适性。步骤五：在座面的基础上，向上延伸[E]形成三面围护部件，分别为正围子[E1]与两侧的侧围子[E2]。尤当关注的是，两个围子构件在每件清宫宝座中均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突出形态设计的规范性。步骤六：最后，通过形态评估[F]确认座具是否符合清宫宝座的形态特征。若评估结果为“是”，则形态建构完成；若评估结果为“否”，则返回步骤一，对材质、形态等环节进行调整与优化，直至达成最终设计目标。

表3 清宫宝座形态建构法则（资料来源：本研究制作）

序	造形手法	部位	造形法则选项
1 [A] 材质色彩	[A1] 主材	[A1-1] 木	[A1-1-1] 红木、[A1-1-2] 紫檀、[A1-1-3] 黄花梨、[A1-1-4] 花梨木
		[A1-2] 漆	[A1-2-1] 红漆、[A1-2-2] 黑漆
		[A1-3] 竹	
	[A2] 搭配	[A2-1] 木	[A2-1-1] 楠木、[A2-1-2] 鸡翅木、[A2-1-3] 黄杨木
		[A2-2] 漆	[A2-2-1] 金漆、[A2-2-2] 红漆、[A2-2-3] 黄漆、[A2-2-4] 漆、[A2-2-5] 彩绘
		[A2-3] 石	[A2-3-1] 玉石、[A2-3-2] 松花石
		[A2-4] 其他	[A2-4-1] 象牙、[A2-4-2] 螺钿、[A2-4-3] 玛瑙 [A2-4-4] 玻璃、[A2-4-5] 瓷片、[A2-4-6] 缎丝

			[A2-5]无	
2	[B]基本形	[B1]腿足	[B1-1]S形	[B1-1-1]粗短S形、[B1-1-2]瘦长S形
			[B1-2]C形	[B1-2-1]粗短C形、[B1-2-2]瘦长C形
			[B1-3]方柱	[B1-3-1]粗短方柱、[B1-3-2]瘦长方柱
3	[C]连接		[C1]方框	[C1-1-1]方框落地、[C1-1-2]方框不落地
		[C1]托泥	[C1-2]方板	
			[C1-3]无	
4	[D]嵌套	[C2]横档	[C2-1]罗锅枨	
			[C2-2]无	
		[C3]牙子	[C3-1]膨出	[C3-1-1]左右高中间低、[C3-1-2]左右等宽
5	[E]延伸		[C3-2]非膨出	[C3-2-1]左右高中间低、[C3-2-2]左右等宽
		[D1]座面	[D1-1]方板平面	
			[D1-2]方板内凹	
[E1]正围子	[E]延伸	[E1-1]单片板	[E1-1-1]有框、[E1-1-2]无框、[E1-1-3]镂雕	
		[E1-2]三片板	[E1-2-1]有框、[E1-2-2]无框、[E1-2-3]镂雕	
		[E2]侧围子	[E2-1]单片板	[E2-1-1]有框、[E2-1-2]无框、[E2-1-3]镂雕
			[E2-2]双片板	[E2-2-1]有框

(四) 回溯验证

为评估清宫宝座形态构建流程及其规则的可行性,从清宫宝座素材库中挑选两件具有代表性的座具样本,进行形态回溯分析(见表4),分别为黑漆描金镶松花石夔龙纹宝座(样本1)与紫檀镶珐琅山水图宝座(样本34)。依据各构件的造形特征逐一对照座具形态建构法则,结果表明构件的造形特征均与形态法则选项高度契合。在形态建构法则的约束下,无论是黑漆描金镶松花石夔龙纹宝座,或是紫檀镶珐琅山水图宝座,其构件均完整符合形态建构法则选项及形态建构流程图的要求。综上可推,所提出的清宫宝座形态建构流程与法则具有良好的可行性。

表4 清宫宝座形态回溯——研究样本1、研究样本34为例(资料来源:本研究制作)

序	回溯作品	步骤	造形手法	构件	形态建构法则选项
一	研究样本1(黑漆描金镶松花石夔龙纹宝座)	1	[A]材质色彩	[A1]主材	[A1-2-2]黑漆
				[A2]搭配	[A2-2-3]黄漆 [A2-3-2]松花石
		2	[B]基本形	[B1]腿足	[B1-2-1]粗短C形
				[C1]托泥	[C1-1-2]方框不落地
		3	[C]连接	[C2]横档	[C2-2]无
二	研究样本34(紫檀镶珐琅山水图宝座)			[C3]牙子	[C3-1-1]左右高中间低
		4	[D]嵌套	[D1]座面	[D1-1]方板平面
				[E1]正围子	[E1-1-1]有框
		5	[E]延伸	[E1]侧围子	[E2-1-1]有框
		1	[A]材质色彩	[A1]主材	[A1-1-2]紫檀
				[A2]搭配	[A2-4-3]珐琅
		2	[B]基本形	[B1]腿足	[B1-3-1]粗短方柱
				[C1]托泥	[C1-1-2]方框不落地
		3	[C]连接	[C2]横档	[C2-2]无
				[C3]牙子	[C3-2-1]左右高中间低
		4	[D]嵌套	[D1]座面	[D1-1]方板平面
				[E1]正围子	[E1-2-1]有框
		5	[E]延伸	[E1]侧围子	[E2-2-1]有框

(五) 风格再现

完成形态建构流程与法则的验证之后,进一步展开风格再现的实践探索。通过3D Max软件进行虚拟创作,完成三个风格再现案例(见表5)。

在风格再现案一中,选用坚硬细密、彰显尊贵的紫檀木。腿足呈瘦长C形,搭配膨出且左右高中间低的牙子,构成典型的鼓腿膨牙造型。内凹方板座面,便于固定坐垫来提升舒适度。正、侧围子采用单片板镂雕,为视觉上增添艺术美感。在风格再现案二中,采用红木搭配彩绘工艺,尽显华丽质感。腿足为瘦长方柱形,下有托泥方框,但不直接接触地面。腿足间巧妙设置罗锅枨,既强化力学结构,又赋予宝座优雅形态。牙子左右等宽,展现宝座的四平八稳之感。座面为平整方板,正围子由三块有框板构成,侧围子则由两块有框板组成。在风格再现案三中,宝座通体选用黄花梨材质,其独特纹理与温润质感尽显自然之美。腿足呈粗短S形态,与左右高中间低的膨出牙子相互呼应,构建出极具威严感的视觉效果。腿足间未设横档连接,使得腿部线条更为简洁流畅。宝座上部的座面为平整方板,正围子与侧围子均采用单片板有框结构,简约中不失精致,既保证了结构稳固,又展现出独特美学价值。

表5 清宫宝座风格再现 (资料来源: 本研究制作)

风格再现案一			风格再现案二			风格再现案三		
[A] 材质	[A1]主材	[A1-1-2]紫檀	[A] 材质	[A1]主材	[A1-1-1]红木	[A] 材质	[A1]主材	[A1-1-3]黄花梨
色彩	[A2]搭配	[A2-5]无	色彩	[A2]搭配	[A2-2-5]彩绘	色彩	[A2]搭配	[A2-5]无
[B] 基本形	[B1]腿足	[B1-2-2]瘦长C形	[B] 基本形	[B1]腿足	[B1-3-2]瘦长方柱	[B] 基本形	[B1]腿足	[B1-1-1]粗短S形
[C] 连接	[C1]托泥	[C1-3]无	[C] 连接	[C1]托泥	[C1-1-2]方框不落地	[C] 连接	[C1]托泥	[C1-3]无
	[C2]横档	[C2-2]无		[C2]横档	[C2-1]罗锅枨		[C2]横档	[C2-2]无
	[C3]牙子	[C3-1-1]左右高中间低		[C3]牙子	[C3-2-2]左右等宽		[C3]牙子	[C3-1-1]左右高中间低
[D] 嵌套	[D1]座面	[D1-2]方板内凹	[D] 嵌套	[D1]座面	[D1-1]方板平面	[D] 嵌套	[D1]座面	[D1-1]方板平面
[E] 延伸	[E1]正围子	[E1-1-3]镂雕	[E] 延伸	[E1]正围子	[E1-2-1]有框	[E] 延伸	[E1]正围子	[E1-1-1]有框
	[E2]侧围子	[E2-1-3]镂雕		[E2]侧围子	[E2-2-1]有框		[E2]侧围子	[E2-1-1]有框

三件风格再现作品的形态特征与艺术风格,在设计语言上与清宫宝座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契合(见表5),可见其创作成果在制作过程中较为忠实地还原清宫宝座典型的形态语汇。

五、与当代家具设计语法的跨时空对话

(一) 形式语言的启发

清宫宝座不仅以皇权象征而备受瞩目,其蕴含的文化符号更彰显出造形语言的独到之处。清宫宝座常以方形基础形态为核心进行延展,既赋予其稳重的视觉意象,又彰显出庄重与权威感。同时,适度融入曲线基础形态,不仅平衡方形结构的刚硬特质,更为宝座的意象增添柔美与典雅。从腿足流畅的线条到围子高低有序的布局,处处折射出造形上的精准与匠心,清宫宝座所呈现的形式语言,是当代家具设计重要的灵感源泉,为当代家具设计提供了丰富的形态参照。

(二) 中式美学的传承

宝座的艺术价值已超越其作为实用器物的功能性,集中体现于其中式传统的美学风格与深厚的文化意涵之中。例如,S形的三弯腿、C形结合膨牙构成的鼓腿膨牙,不仅是明清家具的经典构件,更展现中国传统家具对形式美感的执着追求。清宫宝座的造形整体呈现左右对称的结构特征,在形式美学上反应出平衡与和谐的高度统一。由此可见,物质创造的价值不应仅局限于功能性的满足,更在于融入深厚的文化内涵,使其得以传承后世。

(三) 后续研究的建议

本研究从设计学视角切入,以清宫宝座的形态构成为研究重点,而清宫宝座在工艺、材料及雕刻纹样等方面所承载的设计价值,同样值得深入探讨。除此之外,建议未来的研究者应进一步拓宽视野,着眼于中国历代宝座形态的演进脉络,尝试构建完整的宝座形态发展体系。通过考察宝座在不同政治、文化及审美语境下的设计逻辑与象征意义,深入探讨其形态如何与历代统治理念和文化价值形成互动,从而深化传统家具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参考文献:

- [1] 王世襄.明式家具研究[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
- [2] 杨海涛.荣宝斋教鉴赏:明清家具[M].龙图腾文化出版社,2014.
- [3] 吴振韩.中国传统设计思维方式与家具风格演变研究[D].南京林业大学,2011.
- [4] 王世襄.明式家具珍赏[M].文物出版社,2003.
- [5] 屈峰.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之天然木家具研究[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0(8):87-101.
- [6] 宫浩钦,周岚,黄盛斌.宝座与象征——关于家具摆设的宫廷社会学解读[J].装饰,2009(11):86-87.
- [7] 王娜,闵俊蝶,康葆强,等.故宫博物院旧藏漆器文物中漆灰材质的科学研究[J].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23,35(1):101-110.
- [8] 故宫博物院编.故宫博物院藏明清家具全集[M].故宫出版社,2015.
- [9] 王海山.科学方法百科词典[M].恩楷出版社,1998.
- [10] 蔡志军,伊彬.汉斯·韦格纳中国椅系列座具造形风格之形态建构[J].设计学研究,2024(1):25-43.
- [11] Nicolai De.椅子的构造[M].朱婕,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9.

From Deconstruction to Reconstruction:

Morph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Design Style of Qing Court Thrones

Zhi-Jun Cai

Department of Design,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Region

Abstract: The throne, as a microcosm of Qing Dynasty culture, embodies rich historical information and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However, existing research on Qing-style furniture primarily focuses on everyday furniture, with systematic analyses of thrones remaining relatively scarce. To address this gap, this study introduces a morphological analysis method, employing five steps: material database creation, morphological deconstruction, process rule formulation, reverse verification, and style reconstruction. This framework systematically establishes the design principles of Qing court thrones and achieves their morphological reconstruction. The Qing court throne is centered on a square-based form while incorporating moderate curves, thereby achieving a visual balance of solemnity and elegance. It serves as a significant source of inspiration for modern furniture design language. Adhering to a symmetrical structural configuration, the throne extensively utilizes classic elements of Ming and Qing furniture, thereby highlighting the profound pursuit of formal aesthetic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raftsmanship. This research not only deepen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throne's design language but also offers new perspectives for the continuation and innovation of traditional furniture in contemporary design.

Keywords: Morphological analysis; Formal language; Chinese style; Inheritance; Aesthetics

问题、现象、超越：质性研究视域下的书法理论寻绎

余阔洋¹ 张祎铭¹

(1.汉阳大学, 韩国 首尔 04762)

摘要：书法学科在当代高等教育中发展迅速，但又面临着自身多维复杂性、理论局限和国际学术交流不足等诸多挑战。随着书法学科在学术体系中的不断“升级”，解决这些问题不仅是当务之急，更是推动书法学科在当代语境中创新与发展的必然责任。本文拟择取质性研究范畴中的现象学、民族志和扎根理论三种研究取向，剖析其于书法理论构建中的拓展空间与潜在适用性，进而探索书法研究发展的多元路径。

关键词：质性研究；书法学科；理论建设；方法论

DOI: doi.org/10.70693/jyxb.v1i3.95

一、书法学科“升级”交困

当代书法学科虽然在高等教育领域建立较晚，但发展迅猛，实为20世纪后期传统书学在当代语境中的“转型”与“重生”。自1963年浙江美术学院首设书法本科，1979年招收书法硕士，再至1995年首都师范大学招收书法博士，书法专业逐渐走向系统化发展。2012年教育部在本科招生目录中特设“书法学”专业（代码130405T），隶属美术学类^[1]。截至2024年3月，全国已有156所大学开设书法学本科专业，逾百所大学、科研机构在相关学科下招收和培养书法硕博研究生。2022年9月，书法学与美术学并列为“美术与书法”（代码1356），隶属“艺术学”学科门类，为专业学位类别^[2]。同时，隶属于同一门类的“艺术学”一级学科（代码1301）也包含书法研究方向，为学术学位类别^[3]。尽管有学者认为，此次目录调整仅使书法专业获得了与一级学科并列的专业学位地位，并未真正赋予其独立的一级学科身份，然而不可否认，书法专业的学术地位已显著攀升，其发展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仍可视为一种“升级”。这不仅彰显了书法在高等教育体系中攀升至更高的学术地位，并获得了重要的制度性承认，同时也为其未来发展拓展了更为广袤的前景。然则，书法学科在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亦面临诸多隐忧，并承载着因其日益受到重视而赋予的更为重大的学术责任。

（一）书法的多维复杂性

书法作为一种独特的表达形式，其内涵与外延呈现出显著的多维复杂性。这主要体现在书法既可被视作追求书写技巧与文字表现的艺术活动，又可以被视为蕴含丰富文化意涵的“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4]。书法不仅仅是艺术创作的载体，它还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历史、社会、哲学等意蕴。故此研究不局限于单一维度，同时也能够跨越多个学科领域，通过整合不同学科的理论、方法和观点，以解决复杂问题或开展综合性研究，突显“跨学科研究”^[5]的潜力和重要性。因此，书法的复杂性不仅在于本身的艺术表现，还在于其作为一个跨学科研究对象的深厚价值潜力和广泛影响力。

正是由于书法本身的多维复杂性，其相关研究的范畴远远超越了对艺术形式的简单界定。这些多样化的研究视角不仅为书法研究注入了丰富的学术内涵，拓宽了探索书法的边界。然而，这也使得书法在学术体系中面临难以被完整理解与精确归类的挑战。

（二）理论研究的局限

当前书法理论研究按照学位类别可分为两大取向：一为沿袭传统书学路径的学术学位论文研究，侧重文献考据、书论辨析等；二为强调理论与实践技能结合的专业学位论文研究，多聚焦于作品分析与创作心得。二者在实

作者简介：余阔洋(1996—)，男，博士，研究方向为书法史、质性研究方法论、艺术本位研究(ABR)；

张祎铭(1998—)，女，硕士，研究方向为质性研究方法论、美术理论与创作。

通讯作者：余阔洋

际培养过程中固有交叉，亦各有局限。古典书学和当代书法专业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书法在当代环境中的研究进程遭遇了延缓与断裂^[6]。诚然，传统书学研究路径虽夯实了书法学科的历史理论基础，然其方法高度依赖史料考据与文献整理，略显单一陈旧，缺乏多元化的研究方法，难以应对当代书法的需求。参见金宗学《书法论文研究内容体系构建》^[7]一文，其所整理的20年博士论文310篇，基本集中在古代、近代书法相关研究，这也带来了书法学界不同角度的反思与批评。姜寿田即指出，当下书法研究中过度依赖史料考据的方法，导致理论、美学、艺术史研究边缘化，进而影响书法学科建设的完整性。崔树强则指出目前书法学科的史学研究和文献考证吸引了过多的研究力量，并认为这对整个书法学科的发展是不利的。^[8]

在现代学科发展历程中，“学科”作为制度化知识框架，本为西方现代人文与社会科学所塑造的产物。自康德的批判哲学，以及尼采、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传统的反思以来，经由伽达默尔、福柯、德里达等人对“再现危机”的揭示，知识生产逐步呈现出去中心化与跨学科交融的趋势。进入21世纪，AI生成式媒介的迅猛发展进一步重塑了作者性与意义生成机制，推动知识结构向非线性与多元演化。在这一理论与媒介语境下，德勒兹的思想对知识体系的构建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以“差异与重复”挑战传统学科的中心化范式，强调知识生成的非线性、流动性与异质性，并通过“根茎论”揭示学科发展开放性、互渗性与去等级化的可能路径。然就目前而言，书法专业的理论研究议题仍显集中，对当代语境与实际应用问题的回应明显不足，难以为书法发展提供充足的理论支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时代性与前瞻性。

尽管当前书法理论研究，无论是学术还是实践性研究，已尝试借鉴并融合其他学科的方法，带来多学科交叉的优势。但此类尝试尚未臻完善，方法体系较为单一，难以与相关学科形成深度的学术对话与协同。这在一定程度上桎梏了书法研究的学术深化与专业发展，使其在学术体系的完善性和学科影响力方面，相较于其他成熟学科仍显薄弱。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迟滞了书法的跨学科研究进程，也增加了学科融合的难度，尤其表现在书法教育、书法社会、书法传播等目前书法学科逐渐关注并重视的研究方向领域。

（三）国际学术交流挑战

书法学科在国际学术交流中所面临的挑战，不仅涉及文化与语言的差异，更深层地根植于研究方法的适应性与知识体系的哲学取向。尽管书法在中国拥有深厚的理论传统与文化底蕴，然当代书法理论的发展相对迟缓，使其在国际学界缺乏系统阐释与有效传播的能力。与此同时，书法专业的扩招与理论研究的小众化之间形成反差，进一步凸显学科结构的失衡。

从学科建构的视角看，“科学性”曾长期被视为评估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准；然而，自20世纪后期的后现代转向以来，科学理性受到广泛反思与批判，福柯、利奥塔、德里达等均揭示了“宏大叙事”与“科学真理”背后的权力机制与排他性。知识生产由此呈现出去中心化、多元化的趋势。相较而言，设计学、教育学、美术学等学科已较早引入社会科学与解释学、现象学等多元路径，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动态共构。此种差距揭示了书法学科在方法论现代化与国际化进程中的滞后，也提示其需在“后科学”语境下重构自身的研究范式与话语体系。

总的来看，书法学科的“升级”虽然象征着其在国内学术领域的重要性得到了广泛认可，但也暴露了该学科在学科发展、理论深化构建以及国际交流方面的挑战。书法的多维复杂性和学科门类难以完全涵盖其研究范围，常使书法学科发展超越传统分类框架的限制，这实际上提供了跨越传统边界，探索新的学术路径的机会。这种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情况说明，学科的发展既是内在驱动的扩散过程，也是外在归纳的机会。在书法学科建设讨论中，陈振濂认为书法缺乏“合法身份”；祝帅、冯健强调书学研究应借鉴社会科学方法，以拓展研究范畴；刘宗超提出“大艺术观”概念，主张书法学科应与其他艺术门类及相关学科相互融通，形成一种生态观。香港刘仲严则早在2010年提出，艺术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之间的界限并非绝对，认为在当代艺术学界，仍坚持“二者无法融通”观点的学者已属少数。^[9]他们的建议实则响应了学科深化与创新的内在需求，采用更为多元化和综合性的研究方法对书法学科以及书法理论的发展至关重要。

在此背景下，质性研究实则值得书法学界所关注。相较于传统书法研究以文献考据和技法分析为主的研究范式，质性研究能够拓展分析维度，提供灵活、多层次的解读方式，尤其在应对书法所具有的多维复杂性方面。祝帅曾言：“与其说‘书法’是一门‘学科’，不如说它是一个‘问题’，从而包容各种不同的学术范式对于它的探索”，凸显以问题导向的方法尤显必要。而质性研究本质以问题为驱动，强调在特定语境中深入理解现象的复杂性和动态性。通过促进跨学科合作与方法论创新，其不仅有助于丰富书法研究的学术视角，使其在理论构建与实践应用之间形成更紧密的联系，还能为其在国际学术体系中的发展提供新的可能。伴随学科“升级”与全球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化，书法学科亟需在研究方法上寻求突破，以更开放、多元的方式融入当代学术语境，助力书法学科在全

球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二、质性研究：定义、方法与跨领域应用

关于质性研究 (Qualitative Research)，它既可以作为一组研究方法的集合，包含多种具体技术，研究者可根据具体问题灵活选择、组合不同方法；同时，质性研究亦可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强调对社会现实的哲学层面理解。在此范式下，研究者被视为数据的诠释者，通过与研究对象的自然互动，构建对社会现象的深刻理解。

由于质性研究的复杂性，许多学者在定义其内涵时表现出谨慎，担忧固定的“定义”会限制其灵活性和适应性。随着研究的发展，国内学者如陈向明和李晓凤分别从方法和方法论角度对其进行界定^[10]。丹津 (Denzin) 和林肯 (Lincoln) 在《SAGE 定性研究手册》中提出了一个动态定义，反映了质性研究从社会建构主义到解释学，再到世界社会正义理论的变化^[11]。克雷斯韦尔 (Creswell) 在丹津和林肯定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质性研究的定义，结合了更多关于研究设计和探究方法的内容。

质性研究通过强调假设以及个人或群体对社会或人类问题的意义，开始提供解决研究问题的解释性/理论性框架的信息。为了研究这个问题，质性研究者们在对研究对象和地点敏感的自然环境中收集数据，主要使用归纳和演绎的数据分析，建立模式或主题。最终的报告或展示包括参与者的声音、研究者的反思、对问题的复杂解释和分析、对文献的贡献或要求变革的声音等。^[12]

质性研究虽最初起源于社会科学领域，但其适用性早已超越这一范畴，广泛应用于多个学科，并在不同领域展现出独特的价值。例如，就历史学而言，传统史学偏向实证，而后现代史学则借助质性方法，如文本分析、口述史、档案研究等，挖掘被忽视的历史主体与多元视角，强调历史记忆与叙述的建构性。于艺术史领域，质性研究为作品解读提供了独特视角，拓展了艺术的文化语境，探索艺术创作、传播与接受等过程中的身份建构。在文学研究中，质性方法进一步突破了传统文本细读的局限。通过话语分析、自我民族志等方法，考察文本的社会影响、读者接受与跨文化诠释，同时批判性挖掘文学中的隐性意识形态与话语权力。至于哲学领域，尽管质性研究并非其传统方法，但现象学中的主观体验分析却与其密切相关。现象学通过深入剖析主观意识和人类体验，揭示个体存在的复杂性，这一方法已被社会科学借鉴，并成为质性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在现象学的影响下，质性研究以细致的描述和方法论分析，在文化、社会和艺术等跨学科领域展现出独特价值，进一步揭示个体经验的多维性与复杂性。

表 1 Saldana 艺术 (戏剧学) 领域质性研究方法

整理自 Saldana 与 Creswell 的相关文献

研究方法	英文名称	相关应用描述
民族志	Ethnography	观察特定文化群体，理解社会文化生活。
扎根理论	Grounded Theory	从数据中发展理论，揭示艺术中的动态过程。
现象学	Phenomenology	探索个人在艺术创作和欣赏过程中的体验和感知。
案例研究	Case Study	深入研究特定艺术实例，分析其文化和社会影响。
内容分析	Content Analysis	分析艺术作品和媒体报道，识别主题和模式。
混合方法研究	Mixed Methods Research	结合质性和量化研究方法，全面理解艺术现象。
叙事探究	Narrative Inquiry	通过故事分析，揭示艺术实践的文化背景。
艺术本位研究	Arts-based Research	通过艺术手段进行研究和表达。
自我民族志	Autoethnography	以自身经验为基础，探索艺术实践中的文化动态。
评估研究	Evaluation Research	评估艺术项目的效果和价值。
行动研究	Action Research	与艺术家合作，改进艺术实践。
调查性新闻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通过深入调查揭露艺术界问题。
批判性调查	Critical Inquiry	挑战和重构艺术中的社会文化规范。

在《质性研究基础》一书中，萨尔达尼娅 (Saldana) 详细探讨了艺术领域的质性研究应用，尤其是艺术本位研究 (ABR) 和自我民族志 (Autoethnography) 研究取向。^[13]他详述了如何将艺术创作过程融入质性研究，通过

记录和分析创作过程中的情感、思考和互动，解释艺术作品在特定文化和社会背景下的意义与影响。还引入了“观众影响分析”，着重分析艺术品如何与观众进行互动，以及如何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中产生影响。^[14]此外，质性研究的方法如深度访谈、参与观察、案例研究及叙事分析，在文化研究、性别研究、民族研究等多个跨学科研究领域中均有广泛应用。

质性研究方法因其通用性和灵活性，已成为理解和解释人类社会及文化复杂性的有力工具。这些方法不仅源于社会科学并在此领域得到广泛应用，还在人文科学和跨学科研究中显示出巨大的价值和潜力。特别是在探索性研究、意义诠释、发掘总体或深层社会文化结构方面，质性研究展现了其独特的适应能力。^[15]鉴于此，在书法领域，这种研究方式能够帮助研究者更全面地理解书法多维复杂性，帮助挖掘与书法相关的隐含价值、文化内涵与书法边界。

三、质性探索与书法视野

质性研究方法多样，常用的数据收集技术包括访谈、观察、焦点小组讨论和文献分析。此外，现象学、民族志、扎根理论、叙事研究、个案研究等传统研究取向，以及 ABR、行动研究等非传统研究方法，既是质性研究的重要工具，也展现了其方法论的多样性。本文择选三种质性研究取向：现象学研究、民族志、扎根理论。选择这些取向是因为它们涵盖从个体经验到社会结构的多个层面，能够为书法学科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理解途径，从而深入揭示书法在现代社会中的多元意义。

(一) 现象学

现象学 (Phenomenology) 既是一种哲学思潮，也是一种研究方法。作为哲学流派，胡塞尔于 20 世纪初奠定了其核心思想，强调对经验的还原与悬置，以揭示意识现象之本质。^[16]在质性研究中，现象学更侧重于方法论层面的实践，通过深入访谈、参与观察等方式，从第一人称视角捕捉个体体验。尽管质性研究借鉴了哲学现象学的核心概念，如现象学还原与共情理解，但其重点在于经验的描述与分析，旨在揭示社会文化情境中的主观体验，而非对意识本体的形而上探究。^[17]

当代书法研究中，虽然技法和风格分析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存在理论与创作脱轨^[18]及书法与社会现实脱节的问题，缺乏书法在社会文化语境中的影响。因此，现象学方法可以为研究提供框架，探索书法创作与观赏过程中的心理和情感状态。通过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研究者可以选取目标对象，理解书法家在创作过程中的心理流动、文化体验和情感表达，揭示其创作意图和艺术追求。此外，也可以参与观察，记录分析观赏者面对书法作品时的情感反应和美学评价，通过悬置个人的假设和偏见，以开放的态度去理解参与者的体验，关注参与者对特定现象的主观体验和感知，试图揭示这种体验的本质特征。特别是在专业学位论文中，通过探索书法作品的美学评价、展览体验以及作品的互动和参与。促进书法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为书法理论建设提供丰富的洞察力，彰显高等书法教育在培养人才方面的专业性和独特价值。面对古代书法研究，其同样可作为一种方法论指导，以开放心态直触作品本质，突破传统品评框架，关注创作体验、观赏心理、身体性及社会文化功能。通过分析书家的主观感知、观赏者的接受与诠释，以及书写行为与物质媒介的互动，深化对书法精神意涵和文化流动的理解，构建更完整的研究体系。

此外，就“书法教育”领域而言，目前学界对其关注程度亦不高。相关研究重心仍多聚焦于古代、近代传统书法教育，缺乏对当代书法教育的系统研究。^[19]正如崔树强所言：“当代关于书法教育和教学法的研究非常薄弱，被书法教育界忽略了，大多还停留在个体感性经验层面。”^[20]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自 19 世纪末从西方传入以来，为中国教育界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而“中国的教育学与中国传统教育之间却是完全断裂的…并不是两个‘等价’的概念。”^[21]尽管中国传统书法教育在理论和方法上相比其他传统教育更具优势，但其强调师徒制和感性体验，而现代教育学则重视系统的课程设置和科学的教学方法。因此，如何从传统书法教育转变到当代书法教育仍是当代书法教育面临的重大问题。现象学方法通过关注学习者的主观体验，深入探讨认知模式、情感变化与身体知觉，揭示书法学习的本质结构。它有助于分析学生的学习体验、教学内容的接受度及技法掌握过程，并剖析师生互动模式，优化教学方法，从而推动书法教育向更系统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

(二) 民族志

民族志 (Ethnography) 虽起源于人类学研究传统，但亦是一种质性研究方法。在人类学的民族志实践中，研究者通常保持外部观察者的立场，侧重记录文化群体的社会结构、历史脉络与仪式实践，强调“旁观”与“记录”。而在质性研究民族志框架下，研究者更强调方法论层面的参与，通过深度访谈、田野笔记、影像记录等方法，捕

捉个体与群体的互动模式及其文化意义，强调“体验与互动”。^[23]尽管民族志承袭了人类学的核心理念，如“深描”“文化内视”等，但其重点在于具体情境中的经验分析，旨在揭示社会文化如何被构建、再现与体验，而非对文化本体进行抽象定义。在书法研究领域，民族志方法的应用虽已有诸多探索，但主要以人类学民族志视角，关注书法社群的文化传统、仪式、承续等。然而，质性研究民族志在书法研究中的应用仍较为稀缺，但它在方法论上具备独特优势，能够为书法研究提供更细腻的个体视角和社会语境分析。

书法作为特殊的表现形式，在不同文化语境中承载多重功能。传统社会中，书写不仅限于记录与表达，还广泛渗透于宗教仪轨、民俗信仰体系、社会权力结构之中，展现出高度的象征性、神圣性与仪式化特征。民族志方法能够提供深入解析书法社会机制的路径，使其得以通过沉浸式田野调查、深度访谈、行动研究等策略，捕捉书法在祭祀、符篆、经文抄写等仪式实践中的符号逻辑、象征秩序及文化嵌入方式，揭示其在历史与社会变迁中的存续、转译与再编码。

同样，书法在不同社会生态中展现出的地缘性变体，亦是其文化适应与历史流变的体现。这些地域性书写体系不仅承载着族群记忆、宗教传统与身份认同，亦受地域性文化互动、社会结构变迁的深层影响。江永女书、藏文、维吾尔文和蒙古文等地缘性书法文化，通过民族志方法，研究者能够有效记录和分析其独特形式及其社会意义。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许多地缘性书法文化正面临遗忘与消解，彝文、壮文、满文、蒙古文，以及越南喃字、马来西亚爪夷文等书写体系的式微^[24]，昭示着书法符号体系在全球化语境下的边缘化与再塑造。民族志研究能够捕捉这些书写体系在社会互动中的微观机制，追溯其在仪式、教育、政治权力结构中的嵌入模式，并揭示其在现代社会如何被选择性地保留、复兴或改造，从而为地缘性书法的文化存续提供理论支持，也为书法在跨文化语境中的再编码提供深层解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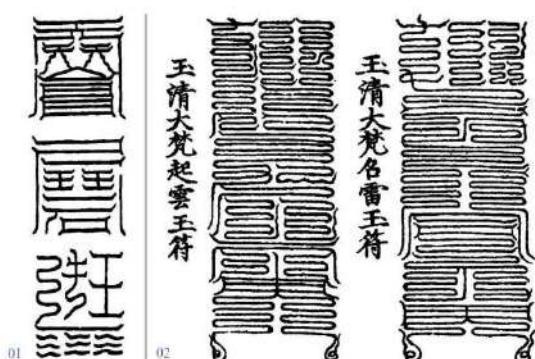


图 1 道教符篆 (木刻)

01 南北朝太上导引三光九变妙经



图 2 藏传佛教经书页



图 3 湖南江永女书手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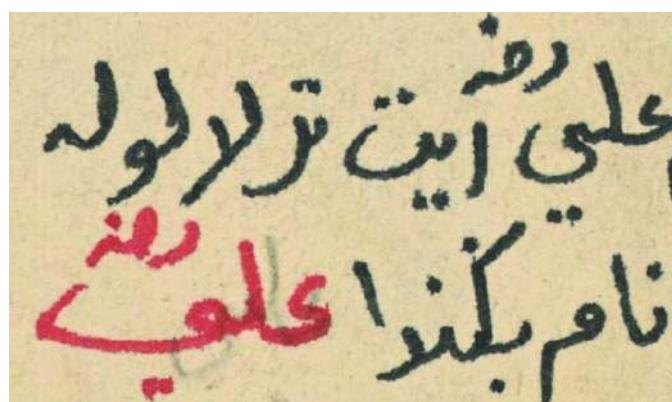


图 4 爪夷文手稿局部

民族志强调文化实践的动态性、社会嵌入性及个体经验的多样性，从而能够突破传统书法研究中对于风格的静态分类与风格归纳的局限，可适应于“民间书法”研究。长期以来，有关“民间书法”概念纷繁芜杂，王镛、沃兴华、马啸等人将其界定为下层平民之手。丛文俊率先质疑“民间书法”概念的模糊性，扩展涵盖范围。又有华人德、叶鹏飞等人的献疑，反对这种模糊的定义^[25]。民间书法”概念难以廓清，主要由于书史脉络复杂，界定标准随时与社会语境而异。民族志研究既可聚焦当代，通过田野调查解析现代社会文化对书法的影响，也可结合历史民族志方法，考察不同历史阶段书法实践的社会功能与文化变迁，弥补单一文献分析的局限，避免因史料断裂导致的认知偏差。譬如，白谦慎《与古为徒与娟娟发屋》^[26]在探讨书法经典建构与碑学观念变迁时，实际上便有意或无意的借鉴了民族志方法。其研究虽包含历史与人类学民族志的分析框架，但在考察个体经验、社会互动及文化适应过程中，亦展现出质性研究民族志的核心特征。突破了精英书法研究范式，转向当代普通人的书写实践，并关注外国人对汉字书写的理解及跨文化语境下书法的接受与误读，从而揭示经典建构的社会机制。强调书法在不同文化情境中的流变，并提供了关于个体经验、文化适应及符号再生产的研究启发。



图5 “娟娟发屋”，图片来源于白谦慎《与古为徒与娟娟发屋》一书

(三) 扎根理论

扎根理论 (Grounded Theory) 由格拉泽和斯特劳斯于 1967 年首次提出，属于质性研究方法之一，旨在从经验数据中归纳生成理论，以避免预设框架对研究过程的干扰。^[27]传统研究多采用演绎推理，从既有理论出发进行验证，而扎根理论则通过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的层层递进，使理论生发于数据本身。^[28]特别适用于理论尚未成熟或缺乏系统建构的研究领域。

艺术治疗 (Art Therapy) 作为一种利用艺术创作促进心理健康的疗法，目前已经在美、日、韩等国家得到广泛应用，并逐步发展出不同的实践路径。反观书法，尽管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长期被视为修身养性、陶冶情操的重要活动，但在当代，随着展览热的兴起，虽然带来诸多益处，但也导致书法创作的功利化倾向加剧，使其在某些情境下反而成为焦虑、竞争与社会压力的来源。相比之下，书法在心理康复、认知训练及文化疗愈方面的价值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与开发。扎根理论能够为书法治疗这一尚未成熟但富有极大潜力的研究领域提供系统化的理论建构路径。其归纳性、数据驱动的特性，使研究者能够从个体体验、治疗实践和跨学科研究中提炼核心概念，揭示书法治疗在心理调节、认知康复和文化疗愈中的机制。通过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扎根理论能够整合心理学、神经科学与艺术治疗的研究视角，推动书法治疗从经验性讨论走向理论建构与实证研究。

此外，书法在当代的发展过程中，展览体系的固化使其逐渐呈现出“同质化”倾向，书法学科的发展，则进一步推动了书法教育与创作模式的规范化。然而，书法的未来发展不应局限于单一理论与创作范式，而应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探索教学体系的标准化与艺术创作的个性化并存的可能性。扎根理论能够提供一种从实际数据出发构建理论的路径，使研究者能够在不同领域的书法实践中归纳适应性强的创作导向。例如，在中小学书法教育、书法治疗、书法传统体验、书法本科及研究生培养以及当代艺术创作等不同领域，通过数据收集、归纳分析与理论建构，探索各自适用的教学或创作标准。对于基础书法教学而言，“标准化”的训练体系有助于提高教学效率，保证书写技能的规范化；而在艺术创作领域，则需要强调个体风格、媒介拓展与实验性，以避免因过度规范化而抑制创作自由。同样，“标准”并非僵化的模式，而是一种动态导向，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提供实践指导，以抵御“同质化”趋势对艺术本质的侵蚀。扎根理论的归纳性分析，使其能够适应书法在不同语境中的发展需求，既推动教学体系的科学化，也鼓励艺术创作的多元化。书法理论与创作实践应在多元框架下不断演化，确保书法

在现代社会中持续保持其独特的生命力与文化影响力。

四、结语

学科的发展通常有赖于科学化、系统化的研究路径基础之上，以确保理论体系的完备与实践维度的恒续。书法学科的“升级”，不仅关涉书法技艺与体系的规整，更牵引着学术范式的嬗变与知识谱系的重摹，承载着重估书法文化价值与拓展学术外延的深层使命。当今学术结构正向跨学科融合与多方法共建迈进，而新兴科技携带的算法逻辑正悄然渗透传统知识领域，对非实用性学科的理论支撑与方法体系提出新的挑战。书法研究唯有踏入具备方法生长力与文化整合能力的理论场域，才能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回应现实，在思想与实践之间拓出一方可持续对话的麈谈之地。

参考文献：

- [1] 教育部.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 [Z]. 教高〔2012〕9号, 2012年9月发布。
- [2]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教育部. 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 [Z]. 学位〔2022〕15号, 2022年9月。
- [3]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教育部. 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 [Z]. 学位〔2022〕15号, 2022年9月。
- [4] 熊秉明. 书法与中国文化 [M]. 上海: 文汇出版社, 1999:252. 此外, 对于“文化”而言, 有学者认为“文化”本身就是跨学科、去学科的概念。
- [5] 跨学科研究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是指将两个或多个不同学科的理论、方法和工具结合起来, 共同解决复杂问题或探讨特定课题。我国于1985年召开“交叉科学大会”, “交叉科学(或学科)”一词在科学界广为传播。90年代以后, 有学者开始用“跨学科”一词代替“交叉科学”。参见 Nissan M. Fruits, Salads, and Smoothies: A Working Definition of Interdisciplinarity [J]. The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hought, 1995, 29(2): 121 – 128; 刘啸霆. 当代跨学科性科学的研究的“式”与“法” [N]. 光明日报, 2006, (12).
- [6] 姜寿田. 由书法升级为一级学科想到的 [J]. 荣宝斋, 2022(8): 240.
- [7] 金宗学. 书法论文研究内容体系建构 [J]. 书法, 2024(7): 79-84.
- [8] 崔树强. 推动与书法学科升级相适应的学术研究 [J]. 大学书法, 2023(1): 36、37.
- [9] 分别参见祝帅. 书法何以成为社会议题 [C]// 全国第八届书学讨论会论文集. 郑州: 河南美术出版社, 2009; 冯健. 书法研究与其他学科对话的困境和途径 [J]. 西泠艺丛, 2021(4): 17-23; 刘总超. 大艺术观与书法学科专业建设 [J]. 大学书法, 2023(1): 32-34.
- [10] 陈向明. 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 [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0: 12; 李晓凤. 质性研究方法 [M]. 湖北: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6: 6.
- [11] 参见 Denzin N. K., & Lincoln Y. S. Introduction: The Discipline and Practice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M]// The SAGE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4th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2011: 1-19.
- [12] Creswell J. W., and Cheryl N. Poth. Qualitative Inquiry and Research Design: Choosing Among Five Approaches [M]. 4th ed. 조홍식等译, Seoul: Hakjisa, 2021: 24.
- [13] 参见 Saldaña J. Fundamental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M]. Oxford,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 [14] 参见 Hare J. R. Review: Johnny Saldaña (2005). Ethnodrama: An Anthology of Reality Theatre [J]. Forum Qualitative Sozialforschung / Forum: Qualitative Social Research, 9(2), 2007.
- [15] 李晓凤. 质性研究方法 [M]. 湖北: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6: 19-21, 2-7.
- [16] 李晓凤. 质性研究方法 [M]. 湖北: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6: 19-21, 2-7.
- [17] 李晓凤. 质性研究方法 [M]. 湖北: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6: 19-21, 2-7.
- [18] 参见李南仁, 金贤浩. 现象学与质性研究 [M]. 第三版, 坡州: 韩吉社, 2015.
- [19] 参见吴鹏. 书法博士与博士书法 [J]. 书法, 2024(4): 99-100.
- [20] 参见金宗学《书法论文研究内容体系建构》一文, 可知近二十年书法博士论文中310篇中书法教育相关的论文仅占比3% (8篇), 其中中国古代民国书法教育4篇、日本近现代书法教育1篇、中国现代书法教育3篇。
- [21] 崔树强. 推动与书法学科升级相适应的学术研究 [J]. 大学书法, 2023(1): 36、37.

- [22] 瞿葆奎、金洲. 中国教育学科的百年求索 [J]. 教育学报, 2006(3): 3-11.
- [23] Krupat A. Ethnocriticism: Ethnography, History, Literature [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23.
- Glaser, Barney G., and Anselm L. Strauss.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M]. Chicago: Aldine, 1967.
- [24] 参见濒危字母表项目(Endangered Alphabets Project).
- [25] 分别参见王镛《中国古代砖文》[M]; 沃兴华《民间书法艺术》[M]; 马啸《民间书法》[M]; 丛文俊《论“民间书法”之命题在理论上的缺陷》[J]; 华人德《评帖学与碑学》[J]; 叶鹏飞《慎思之明辨之——亦从“民间书法”说起》[J]等相关内容。
- [26] 参见白谦慎. 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 [27] Glaser, Barney G., and Anselm L. Strauss.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M]. Chicago: Aldine, 1967.
- [28] 参见 Corbin, J. M., Strauss, A. L., 质性研究的基础: 形成扎根理论的程序与方法[M], 朱光明译, 第3版,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5.

Problem, Phenomenon, and Transcendence: A Qualitative Inquiry into the Theoretical Elucidation of Calligraphy

Kuoyang Yu¹, Yiming Zhang¹

¹ Hanyang University, Seoul, Korea 04762

Abstract: The discipline of calligraphy has developed rapidly within contemporary higher education, yet it continues to face enduring challenges stemming from its multidimensional complexity, theoretical limitations, and limited engagement in international academic discourse. As the field undergoes ongoing institutional “upgrading,” addressing these issues has become not only an urgent imperative but also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fostering innovation and sustaining relevance in the contemporary context. This paper draws upon three qualitative research orientations—phenomenology, ethnography, and grounded theory—to examine their potential applicability and methodological affordances in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calligraphy, thereby outlining diverse pathways for the discipline’s future development.

Keywords: qualitative research; calligraphy disciplin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methodology

敏捷治理视角下“矛盾化解在基层”数字化转型路径的实证考察——以成都市郫都区“一站式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为例

杨沛璇¹

(1.西南财经大学, 成都 610000)

摘要:本研究围绕“如何在数字化背景下实现基层矛盾化解的源头性、主动性、多元性与有效性”这一核心问题展开讨论。针对治理实践中存在的被动响应、滞后干预与形式化处置等现实困境,本研究在引入以公众利益为导向、以技术为支撑、主张通过柔性机制与动态响应提升治理适应性的敏捷治理理论的基础上,构建起“基础—起点—过程—结果”分析框架,并结合成都市郫都区实践案例展开分析。研究表明,敏捷治理与基层矛盾化解目标高度契合,其协同机制、数据感知机制、预警机制与迭代反馈机制可切实解决当前基层矛盾治理在主体、途径、干预及成效维护等方面的难题。基于上述发现,本研究进一步从协同行动、以人为本、数据赋能、结果导向四个维度,提出数字时代“矛盾化解在基层”的转型路径。

关键词:基层矛盾治理; 敏捷治理; 数字赋能; 多元共治

DOI: doi.org/10.70693/jyxb.v1i3.99

一、问题的提出

(一) 研究背景

为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努力将矛盾化解在基层”^[1],标志着“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矛盾就地化解”的“枫桥经验”从地方实践正式上升为全国性治理范式。^[2]随后,中央进一步审议通过《关于加强溯源治理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的意见》,明确以新时代“枫桥经验”为指引,系统构建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着力提升社会矛盾的早期识别与前端干预能力。^[3]在这一政策演进背景下,“矛盾化解在基层”不仅要求基层矛盾化解机制需承担缓解司法资源压力的现实任务,更在治理目标上追求“源头性、主动性、多元性、有效性”的有机统一。

(二) 研究问题

然而,当前以调解为代表的传统非诉纠纷解决机制在实现四个目标的过程中,同样也面临着三重阻碍。

其一,“不告不理”的制度逻辑导致治理存在滞后性与被动性缺陷。调解与仲裁等制度本质上仍聚焦于纠纷发生后的调处救济,属于“事后应对型”模式。这使得“矛盾化解在基层”在实践中往往被窄化为“矛盾事后解决在基层”,难以实现“矛盾事前防控在基层”的治理目标;其二,纠纷形态复杂化凸显传统解纷途径的单一性局限。随着数字时代来临,矛盾场域从实体空间延伸至网络虚拟空间,纠纷主体呈现平台化、多边化特征,争议内容也转向数据权益、网络侵权等新型案件。此类纠纷具有跨地域、高技术与强专业等特点,对传统调解机制的主体覆盖、专业能力与手段适配构成严峻考验;^[4]其三,社会结构变迁与科层制障碍加剧形式化风险。熟人社会淡出使调解制度依赖的社会基础受到削弱,而科层制的专业分工则强化了部门职能分割与数据壁垒,制约了协同合作。在此背景下,基层矛盾治理工作易在层层考核中异化为部门数据指标,偏离实质有效的治理导向。^[5]

因此,当前基层纠纷化解机制仍难以摆脱被动响应、滞后干预、单一应对与形式治理局限,难以适应高流动性、高复杂性的现代社会治理需求。在此背景下,如何超越传统“化解”模式的局限,构建具备“防于未萌、止

作者简介:杨沛璇 (2001-),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经济法学。

通讯作者:杨沛璇

于初现、多元协同、实质有效”等特征的系统性基层纠纷解决机制，已成为推进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亟待回应的现实。

二、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搭建

（一）基层矛盾纠纷化解能力提升的研究

要系统提升基层“源头预防、前端化解、综合防控”的能力的问题，就必须对“谁来化解”“何时化解”“如何化解”进行系统性回答。现有研究主要从纠纷化解的主体与方式两个层面展开分析。

一是化解主体的研究。当前我国纠纷化解力量主要包括国家机关与社会组织两大类。国家层面包括法院、仲裁机关、行政机关等，并形成行政主导、司法主导和检察主导三种模式。^[6]社会层面包括消费者协会、行业协会等社会民间调解组织和街道办事处、村委会、居委会等社区组织。^[7]然而，当前基层纠纷化解机制面临动力不足的问题，突出表现为司法调解、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之间未能形成有效合力。^[8]此外，群众参与纠纷解决的积极性不高、法律意识薄弱，^[9]律师等专业人员尚未发挥作用。^[10]对此，学界建议应统一配置司法与行政的非诉纠纷解决资源，^[11]打破各部门“各自为政”^[12]并充分发挥第三方社会调解机构独立、专业、中立的优势。^[13]

二是化解方式的研究，可概括为协商化、多元化、数据化三个方向。学者主张通过民主协商优化基层纠纷化解机制。^[14]针对纠纷类型的差异性，调解主体应避免“一刀切”，通过建立多元化解机制，并采用差异化的利益平衡标准^[15]与调解技巧^[16]^[17]来针对性化解具体纠纷；此外，“互联网+调解”被视为未来纠纷化解的重要趋势。^[18]一方面，互联网技术有助于衔接不同主体形成化解合力；^[19]另一方面，可拓展线上线下联动的纠纷解决机制，增强调解途径与场域的灵活性。^[20]^[21]

当前研究存在明显不足：一方面缺乏对“源头预防、前端化解”目标的实质性讨论，多数成果聚焦于已形成纠纷的被动应对，忽视了对潜在矛盾的主动识别与干预；另一方面缺乏矛盾治理系统性考察，规范性研究多停留于顶层设计，微观实践层面的可操作机制研究匮乏，而实证研究又往往局限于某一具体问题，难以涵盖基层矛盾治理的广泛领域。

基于此，本文以“敏捷治理理论”为分析视角，以郫都区“一站式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为案例，系统探讨基层矛盾治理的协同路径与机制创新。通过厘清各治理主体功能定位，分析科技手段如何助力资源整合与流程优化，旨在回应基层矛盾治理中存在的“滞后性、被动性、单一性、形式性”等问题，为实现“源头性、主动性、多元性、有效性”的治理目标提供理论与实践参照。

（二）敏捷治理理论下基层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框架搭建

1. 敏捷治理的理论阐述

敏捷治理理论是一种为应对高速变化和高度不确定性社会环境而兴起的现代公共治理理论，最初源于制造业的“敏捷生产”模式，该模式旨在通过柔性生产和快速响应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22]随着数字时代的深入，这一理念被引入公共管理领域，以解决传统科层制政府因层级繁多、程序固化而导致的“政策制定过程落后于技术创新”的现象，2018年世界经济论坛发布《敏捷治理：重塑政策制定的蓝图》白皮书，将敏捷治理定义为“一种具有适应性、以人为本、包容性及可持续的政策制定过程”。^[23]敏捷治理理论主张通过“四个机制”来实现“三个理念”：

“四个机制”包括：一是韧性机制，指具备治理组织与运行的灵活性、稳健性、抗压性的组织运行机制；二是协同机制，指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权责在多中心网络中合理分布的治理机制；三为数据驱动机制，指主张依托数据与科技，推进决策过程从经验判断向科学循证转变的精准性机制；四为感知机制，指主动识别用户需求与环境变化，并建立快速反馈与策略迭代的时效性机制。^[24]

“三个理念”则体现为：一是弹性理念，主张政策设计与执行方式应具备包容性与灵活性，以提升治理系统对复杂环境与多元诉求的适应与缓冲能力；二是回应性理念，强调治理主体须具备快速识别并有效响应公众利益与社会需求变化的能力；三是适应性理念，要求治理主体与机制在动态演进的环境中保持开放与创新，不断调适策略与方法，以持续保障公共服务质量与治理效能。^[25]

2. “敏捷治理”理论在“矛盾化解在基层”的适应性分析

基层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根基，其矛盾纠纷化解能力直接关系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际效能。实现“矛盾化解在基层”所追求的源头性、主动性、多元性与有效性目标是一项系统性任务，需要建立跨部门联动、动态响应、多元协作的治理机制。然而，当前基层治理实践中仍普遍存在“科层固化”“响应迟滞”“手段单一”等现实瓶颈，传统治理方式难以应对矛盾形态日益复杂化的新挑战。

在此背景下，敏捷治理理论展现出与基层矛盾化解目标的高度适配性。该理论在治理时序上强调重心前移，推动矛盾干预从事后处置转向源头防控；在治理宗旨上坚持以群众满意度为核心，注重主动识别需求并建立快速响应机制；在治理路径上主张跨部门、跨层级的信息共享和资源整合，为“多元化解”奠定基础；在治理效能上强调通过动态调适与闭环反馈提升施策精准度，从而增强治理的有效性与公信力。

因此，敏捷治理理论以公众利益为导向、以数字技术为赋能手段，通过柔性机制与动态响应提升系统适应性的核心逻辑，与“矛盾化解在基层”的目标诉求高度契合。该理论不仅为理解基层矛盾治理提供了有益视角，也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路径奠定了学理基础与方法论支持。



图1：敏捷治理驱动基层矛盾纠纷治理分析框架

3. 基于“敏捷治理”理论的分析框架构建

敏捷治理强调将韧性机制、协同机制、感知机制、数据驱动机制系统性地融入政策制定与执行及公共服务中，从而将灵活性、回应性、适应性理念贯穿公共治理全过程。本文基于“基层一起点—过程—效果”的治理逻辑，构建起一套敏捷治理引领下的基层矛盾纠纷治理分析框架，系统阐述其如何从多元协同、源头识别、主动介入、效能维持四个维度嵌入治理实践，推动“矛盾化解在基层”从理念目标转化为可持续的治理实效。（见图1）

首先，是以“弹性—协同”整合机制为治理基础，增强矛盾化解的主体多元性和途径多样化。面对基层矛盾主体多样、类型复杂的特点，敏捷治理以组织韧性与机制弹性为基础，构建多元共治的协同网络。一方面，通过建立分类施策、多路径选择的程序规则与解决方案体系，增强制度包容性；另一方面，通过跨部门、跨层级的资源整合与联动响应，打破治理壁垒，形成党政主导、社会参与、法治保障的多元共治格局。

其次，以“数据—感知”识别机制为干预起点，增强矛盾识别的“源头性”。传统识别模式往往滞后于矛盾发展，而敏捷治理主张通过构建动态感知机制，依托数据平台与社会风险扫描系统，实现对纠纷苗头的早期识别与定位，为“早介入”提供决策依据，从而将治理关口前移，提升源头防控能力。

再次，以“研判—响应”预警机制为过程指引，强化矛盾介入的“主动性”。并非所有社会矛盾均需专门机构介入，敏捷治理主张运用大数据分析与人工智能研判技术，建立快速响应的预警机制。通过研判矛盾演变的深层诱因与潜在发展，实现对重点矛盾风险的精准识别与分级响应，推动纠纷化解模式从被动处置转向主动干预。

最后是以“迭代—反馈”的持续机制为效能后盾，巩固纠纷化解成果的有效性和长期性。矛盾纠纷化解的成效最终体现在群众的实际获得感与满意度上而非“数据报表上”。敏捷治理注重建立持续优化的治理闭环，通过政策执行中的动态评估与民众反馈，不断调整策略、完善机制，促进有益成果的积累并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基层矛盾纠纷化解经验。

三、敏捷治理视角下“矛盾化解在基层”的基层实践表达

本研究选取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的实践作为具体分析案例。成都市郫都区“一站式”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以下简称“矛调中心”）是成都市深化基层社会治理改革的重要实践载体。近年来，郫都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制度。依托郫都区综治中心，做实区、镇街、村社三级“一站式”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以下简称“矛调平台”），以“聚合资源、健全机制、数字赋能”路径不断提升各类矛盾调处法

治化、专业化、智能化水平及工作效率，实现“小事不出村社、大事不出镇街、难事不出区、风险不上行”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

（一）主要创新

1. 党政共治推动多元协同

在治理主体联动方面，为破解传统治理中存在的科层壁垒与响应滞后等问题，郫都区构建起“党政主导、政府执行、社会参与”的协同化矛盾纠纷化解体系，推动形成多元共治的主体格局。

在党委统筹层面，区委政法委发挥“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政治优势，牵头整合政府、司法、信访、公安、法院、人社、住建等多部门力量，组建跨部门联合团队，明确共同责任目标，有效克服科层壁垒与条块分割问题；在政府执行层面，各职能部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围绕“矛盾不上交、风险不上行”目标，构建权责清晰、响应迅速的行政体系。各职能部门通过派驻专员进驻区级矛盾调处中心，实现群众诉求“一窗受理、内部流转、限时办结”，避免职责交叉带来的推诿拖延；在社会协同层面，郫都区积极拓展“政社联动”路径，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纠纷调处网络。一方面加快培育“法律明白人”队伍，吸纳律师、行业专家等专业人员组建调解团队，提升医疗、物业等专业纠纷化解能力；另一方面依托党委公信力，推动党政部门与保险公司、公证机构等社会组织合作，为矛盾化解增加保障途径。

2. 综治中心实现动态监控

在党委统一领导下，郫都区立足区域治理实际，成功打造了集“数据共享、动态识别、智能预警、全程留痕”功能于一体的数字化平台。该平台为推动司法、行政资源向治理前端集聚，实现矛盾纠纷的源头预防、精准干预和高效化解提供了关键支撑，显著提升了基层矛盾化解工作的智能化与协同化水平。

在数据集成方面，郫都区突破部门壁垒，实现了跨部门、跨层级、跨领域数据的深度融合与共享。平台不仅聚合了信访、司法、公安等核心政法系统的业务数据，更将触角延伸至教育、市政、生态环境及交通管理等关键公共管理领域，接入了海量的实时监控数据。这一数据基础使平台能够对辖区内的人、事、地、物、情等治理要素实现全天候、立体化的动态监控，为矛盾风险的早期识别提供信息保障。

在风险研判方面，郫都区创新构建“社情指数”风险评估模型，以增强对基层矛盾的识别能力。该模型通过对多源信息的量化分析与深度挖掘，不仅能够宏观展示各类矛盾纠纷的整体走势、地域分布和办理进度，还能通过设置事件关键词、所属街道等精细化检索条件，实现对具体个案及其背后数据的快速穿透与查询。这一功能使治理者能够精准识别基层高风险领域与趋势性苗头，为后续主动介入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

在预警处置方面，郫都区建立智能识别与全程留痕相结合的工作机制。通过为全区布设的摄像头加载先进的AI算法，平台实现了对特定违法违规情形和潜在风险点的自动识别、即时捕捉与智能预警。一旦算法捕捉到预设的异常场景，系统会自动生成预警信息，并第一时间推送至对应责任人员。这种“智能发现、自动派单”的模式，极大地延伸了基层治理的感知范围与反应速度。同时，依托完整的“发现—研判—干预—化解—评估”处置链条，平台可确保从预警发现到结果反馈的全过程留痕与动态跟踪，有效保证了矛盾化解工作的规范性与连贯性。

3. “微网实格”促进实时联动

郫都区坚持以“党建+网格”为引领，通过系统构建“微网实格”工作体系并优化网格架构，逐步建立起响应迅速、处置精准、线上线下高效联动的基层矛盾纠纷化解机制。

在网格架构方面，形成“总网格—一般网格—微网格—专属网格”四级组织体系，将管理单元精准匹配至楼栋院落，实现责任到人、溯源可查。专职网格员负责300-500户的日常巡查，借助移动终端实时上报邻里、家庭等常见纠纷苗头，推动一般性矛盾在萌芽阶段得到及时化解。针对商圈、园区等矛盾易发区域，创新设立“专属网格”，配备专业力量开展重点巡查，构建全域监测的防范体系。

在处置流程方面，建立“线上发现与线下解决”的联动机制。对平台汇聚的预警信息实行分级分类处置：简易纠纷由网格员现场调解并实时反馈；复杂问题转介至社区、街道或区级部门协同处置；需多方协调的纠纷推送至“矛盾调处中心”集中调处。这一“网格首诊、分级会诊、协同处置”的机制，既保障了小矛盾就地化解，又提升了复杂纠纷的系统应对能力。

（二）初步成效

自投入运行以来，郫都区通过“多元共治+数字赋能”的创新性尝试，在基层矛盾纠纷治理领域取得显著成效，具体体现在调解能效的系统性提升与源头治理的持续性深化两个维度。实践表明，该模式不仅有效增强了基层治理的响应速度与处置能力，也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在地化实践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区域治理样本。

1. 调解规模与成效双提升

自2024年2月正式投入运营以来，该平台在调解规模上持续拓展，累计受理各类矛盾纠纷超过1.2万件，成功调解约6800件，推动该区法院受理案件数量实现持续下降。案件类型以民生类纠纷为主，涵盖劳动纠纷、邻里纠纷、物业服务纠纷、道路交通纠纷、民间借贷纠纷以及婚姻家庭等多个方面；在调解质效方面，平台整体成功率达到了68%，91.5%的案件在7天内完成办结，群众回访满意度稳定保持在99.8%的高位水平；在调解速度方面，重点领域纠纷平均处置周期已缩短至3.5天，整体效率较传统模式提升近60%。以上数据充分印证了该区在矛盾纠纷响应速度和处置能力上的显著提升。

2. 源头预防成效逐步显现

截止2024年底，通过“平台预警+网格巡查”的双轨机制，郫都区累计预警近230万起，其中，依托大数据准确预警并成功化解的潜在矛盾年均200余起，借助网格力量、社区民警与村社干部、物业保安等群防群治力量准确发现并提前化解社会积怨类纠纷年均800起。初步实现“把矛盾纠纷70%解决在村社、20%解决在镇街、10%解决在区平台”的目标，把大多数纠纷化解在前端。

（三）成果要素

郫都区在构建基层矛盾纠纷机制的过程中，其成功要素可归结于四个根本性转变。这些转变不仅有力推动了“矛盾化解在基层”的“源头性”“主动性”“多元性”“有效性”的目标实现，更契合“敏捷治理”对现代治理体系精准识别、快速响应、协同行动和持续优化的核心要求。下文将依据“基础—起点—过程—结果”这一敏捷治理框架，对该体系的运行成效要素展开分析。

1. 治理基础：从分散处置向协同化解转变

郫都区以“联动—协同”的过程整合机制为依托，推动治理资源由分散处置向多元协同转变，破解了治理行动“散”与“隔”的困境。在主体层面，以政法委为统筹核心，郫都区构建起党委、行政、司法、社会与群众力量的多元协同主体网络，并依托平台实现行政资源、司法力量与社会组织的弹性聚合与动态调配，形成“一体化联动、按需响应”的治理格局。在手段层面，除传统单一调解手段外，郫都区矛盾中心持续拓展“调解+”多元机制，积极引入“调解+保险”“调解+公证”等新型解纷模式，并依托12个专业调解工作室，吸纳行业专家参与特定领域纠纷调处。该机制不仅实现了调解主体的多元化，更推动调解手段向专业化、精细化发展，显著增强了该区对复杂社会矛盾的适应性与处置灵活性。

2. 治理起点：从事后应对向源头防控转变

郫都区以“数据—感知”的识别机制为基础，推动治理时序从事后处置向源头防控转型，有效破解了矛盾获取时间“晚”和处理周期“长”的弊病。郫都区抓住数据归集是矛盾捕捉的关键前提，通过社会数据和执法数据共享来推动了治理时序的重构，使干预节点从矛盾爆发后前移至风险萌发阶段，显著压缩了矛盾演化周期，降低了社会治理的综合成本。

3. 治理过程：从被动救济向主动服务转变

郫都区以“研判—响应”预警机制为介入信号，推动治理态度从被动救济向主动服务转变，解决了矛盾介入响应“慢”与“钝”的问题。该区通过以“社情指数”为研判标准的智能预警机制，形成“阈值触发—指令生成—精准推送—快速处置”的闭环流程，实现了对风险态势的动态评估与前瞻预警，从而将矛盾干预从“等矛盾上门”的被动接收，转变为“送服务上门”的主动干预，显著提升了矛盾识别的敏感度与介入响应的及时性。

4. 治理结果：从程序空转向实质保障转变

郫都区以“迭代—反馈”的持续机制为后盾，实现治理效能从形式程序向实质保障转变，回应了治理结果“虚”与“浮”的质疑。为确保矛盾实质性化解与群众满意度提升的目标实现，在成果检验方面，郫都区建立起“一站式解决、全过程追踪、结果可评估、责任可追溯”的矛盾纠纷化解流程；在优化推进方面，郫都区仍在积极探索“法律明白人”专业调解队伍的建设，同时积极制定政策激励、绩效考核、专项补贴政策，使得网格员、调解员

以及积极参与社会企业、组织能够获得相应金钱与社会荣誉，推进“一站式”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人力支持与财力支持。

四、数字时代下“矛盾化解在基层”的未来面向

(一) 协同行动：党委领导推动多元共治

在敏捷治理视角下，党的政治引领与基层矛盾化解工作高度契合。党委通过将政治优势转化为统筹引领、组织动员能力，将矛盾化解深度嵌入基层治理网络，推动构建政治、法治与社会保障相结合的治理架构，实现政治势能向治理效能的持续转化。

1. 以政治统筹总揽治理全局

党组织凭借其组织网络优势，能够实现对分散性、常态化基层矛盾的有效渗透与全面覆盖。一方面，依托行政、司法系统及社区一线的党员力量，建立问题导向的调研与排查机制，系统梳理政策执行难点，早期发现邻里、物业等微观风险，实现对矛盾源头的动态感知。另一方面，党委能够将矛盾化解从常规业务提升至区域战略高度，通过政策引导与规划部署，推动形成跨部门协同处置合力，并将宏观目标分解为各部门可执行、可考核的具体任务，建立起权责清晰的工作体系。此外，党委通过定期通报、绩效考核等方式，对工作推进与履职实效进行监督指导，实现从部署到见效的全流程精细化管理。

2. 以政治组织整合部门职能

党委依托其政治权威与全局协调能力，着力破解因职能分割造成的协同壁垒。在体制内部，党委根据部门职能与资源优势，科学配置任务，形成流程衔接的工作体系；在跨组织层面，可由党委牵头搭建“府院联动”、“府检协同”等机制，促进行政执法与司法程序在关键环节的有效配合，提升涉诉涉访纠纷的一体化处理能力。同时，行政与司法系统也应着力推动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上进行专业化与体系化建设：信访部门可转型打造集接访、调解、督办于一体的综合平台，实现从“转交办”向“实质解”的转变；教育、卫健、住建等行业主管部门则凭借其专业监管能力与政策熟悉度，在消费维权、校园纠纷、医患矛盾、物业服务等特定类型争议中提供更具公信力的解决方案，实现“行业纠纷在行业内化解”的精准治理目标。

3. 以政治号召拓展社会参与

在党的群众路线指引下，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成为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路径。党组织一方面通过党建活动、普法宣传、社区走访等渠道，积极动员具备法律知识或群众工作经验的党员投身调解一线，设立“党员调解室”、“社区法律站”等实体载体，在常见纠纷中发挥示范调处作用，形成“党委引领—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良性调解生态。另一方面，党组织将其政治公信力转化为整合社会资源的信用纽带，借助党员在社会组织、企业、乡贤群体中的桥梁作用，引导各类主体提供专业辅助、场地或资金支持，共同参与复杂矛盾的协同化解，有效拓宽矛盾化解渠道。

(二) 以人为本：被动介入演变主动服务

“矛盾化解在基层”作为应对社会转型期复杂治理挑战的重要战略，其目标设定与实践推进不仅体现国家治理体系对时代需求的积极回应，更彰显对民众诉求的主动响应和包容满足。^[26]

敏捷治理所倡导的主动回应与动态调适理念，与基层矛盾所具有的累积性、流动性和易扩散性高度契合。在此方法论的引导下，基层矛盾化解应超越传统个案处置逻辑，实现从“被动响应”到“主动服务”的整体转型。

1. 强化治理的主动意识

基层矛盾化解主体需实现从被动受理到主动干预的根本转变。具体而言：工作队伍应深入社区一线，通过数据分析与实地走访相结合，对征地拆迁、物业服务等重点领域开展常态化风险摸排，推动履责方式由“坐等受理”向“主动发现”转型；同时要深入剖析矛盾背后的利益结构与核心诉求，通过利益平衡与多方协商予以针对性回应，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防止矛盾积累升级。此外，还需建立持续、良性的群众互动机制，不仅关注已发生争议的化解，更应通过群体交流与社区关系修复，从源头上消除矛盾滋生土壤，构建“发现—响应—干预—预防”的可持续工作闭环。

2. 强化治理的主动意识

服务意识要求将“以人民为中心”理念转化为具体行动。在矛盾化解过程中，工作人员要注重沟通方式，以充分耐心和理解尊重当事人的情绪表达；善用“情、理、法”融合的调和策略，在遵循法律框架基础上，兼顾个案中的人情事理，通过心理疏导、关系修复等柔性化方式提升纠纷化解的可接受度。同时，建立常态化回访与反馈机制，持续跟踪已化解矛盾的后续发展，及时响应新诉求，通过每个个案的妥善处理累积基层社会的公信力与凝聚力，形成良性互动的工作生态。

（三）数字赋能：滞后处置演变精准响应

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正推动社会治理模式的数字化转型，促使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实现从滞后处置向快速响应的演进。在敏捷治理理念的指导下，通过数据驱动和人机协同相结合的方式，数字赋能可实现对矛盾风险的早期识别、精准研判与快速干预，为“矛盾化解在基层”目标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技术路径与制度支撑。

1.搭建快速响应机制

为实现基层矛盾高效协同化解目标，各地遵循“一个中心、多方入驻、快速响应、流程优化”的运行逻辑，系统构建快速响应体系。通过建立“分层过滤、繁简分流”的纠纷化解机制，使有限治理资源得以优化配置，重点聚焦重大矛盾攻坚。

遵循统一指挥、多元协同、高效响应的原则，该机制具体包含四个核心环节：

“一个中心”指建立统一的矛盾纠纷调度中心，承担信息汇聚与指挥调度职能，负责矛盾线索的统一采集、智能分类与风险评估，并依据类型、紧急程度及属地原则实现任务的精准分派；“多方入驻”要求行政、司法与调解等多元力量进驻中心，通过设置常驻与轮值岗位，形成“专门问题专人解决、综合问题联合会诊”的工作模式，增强对复杂纠纷的综合应对能力；“快速响应”通过建立预警信息与处置行动的无缝衔接机制，明确各类矛盾的响应时限与处置标准，配合全程留痕与实时监督，确保平台分派任务得到及时落实；“流程简化”重在优化非必要环节，对一般性纠纷由调度中心组建专项调解小组推动就地化解；仅对重大复杂或无法通过非诉途径解决的争议，才依法导入诉讼程序，从而实现效率与规范的统一。^[27]

2.提升纠纷化解质量

在推进矛盾纠纷治理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治理主体亦需警惕陷入“数据主义”误区，避免过度追求数量规模和处理速度而忽视矛盾化解的质量。因此，各地应探索推动数字技术与治理智慧深度融合的治理道路，实现从追求“有解”向追求“优解”的跃升，达成速度与公平、数量与质量、专业与温度的有机统一。^[28]

在运行机制方面，各地应注重强化人机协同，构建数据驱动与人工干预相结合的决策模式。既要依靠数据训练模型，也要建立人工审核与纠偏机制，防止数据偏见或经验局限导致处置失误，确保解纷结果的公正合理；在能力建设方面，各地需弥合地区间数字鸿沟，推动服务均等化。针对数字基础薄弱地区，通过搭建轻量化应用平台、开展专项技能培训等方式，提升基层工作人员的数字工具运用能力，避免因技术不对称加剧区域间治理差距；在服务创新方面，各地积极探索数字化转型下的解纷新模式，如线上调解打破时空限制、预约调解体现人文关怀、异步协商优化沟通效率、电子督促强化协议执行等，以多元化服务形态提升基层矛盾化解的便捷度与实效性。

（四）结果导向：持续优化激活效能提升

在基层矛盾治理初步实现源头防控、主动介入与多元协同的基础上，其工作重心需转向长效机制的建设，以保障治理效能持续提升。敏捷治理理论强调治理体系应具备自我演进能力，这就要求建立以结果为导向的持续优化机制，推动基层矛盾化解工作从阶段性成果迈向长效发展，形成基层善治的良性循环。

1.推动政策制度化与激励精准化

基层矛盾治理的持续推进需要坚实的制度保障和有效的激励机制。在制度建设方面，地方立法机关应系统梳理和提炼实践中行之有效的矛盾化解机制、协作模式与职责分工，将其转化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规或实施细则，通过明确各部门在预警、调解、执行等环节的权责边界，为基层矛盾治理提供稳定、规范的制度依据。

在行为激励方面，各地应构建差异化、精准化的考核标准与激励机制。对党政机关及职能部门人员，以“矛盾预防与化解成效”作为体制内工作人员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对社会组织、企业等社会力量，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补贴、政策优惠等方式提升其参与积极性；对网格员、调解员等一线工作人员，推行“以案定补”“优质案件奖励”等绩效机制，依据调解数量、难度及群众反馈落实差异化补贴。通过制度设计的精准引导，实现“干

有方向、评有标准、优有激励”，持续激发多元主体参与基层矛盾治理工作的内生动力。

2.建立动态反馈与流程优化机制

为维持防范化解工作的适应性与长效性，基层矛盾化解机制还需增加贯穿全过程的动态反馈与持续优化机制。在反馈机制方面，平台应完善“个案追踪”“领域分析”“系统建言”等功能：对已办结纠纷设定效果追踪期，定期评估化解成效的持续性；聚焦物业、劳资等重点领域开展专项研判，及时发现系统性隐患；依托数字平台设立“建言通道”，广泛收集群众、调解员、社区工作者等主体的意见建议，形成民意驱动的改进源泉。

在政策完善方面，各地应形成政策与机制动态调整的常态路径。党委与立法机关建立常态化的政策评估与修订机制，定期对规范实施效果开展系统评估，及时响应基层实践中的新问题与新需求，推动制度持续迭代；对局部流程不畅或职责不清的问题，通过跨部门协同实现快速响应与程序疏通；对涉及多方权责或制度约束的重大流程变更，则严格履行公众听证、专家论证与合法性审查等法定程序，确保政策调整兼具民主性与规范性。同时，各地可建立“试点评估”的创新机制，所有流程优化均需经过小范围试行与成效验证，再逐步推广，以降低改革风险，提升制度优化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

在资源保障方面，稳定的资源保障是基层矛盾治理持续运行的基础。对公，各地可设立专项资金并纳入财政预算，明确使用范围与绩效标准，重点投向调解员培训、智慧平台运维、典型案例激励等关键环节。同时，对私探索政府购买服务、社会资本合作等多元投入方式，拓展资源增加渠道；对群众，通过建立持续、透明的资源保障机制，确保基层矛盾治理工作具备长期运行的物质基础，推动“化解在基层”从理念落实为稳定、可视的治理实践。

五、结论

本研究采用法社会学研究方法，通过引入敏捷治理理论构建“基础一起点—过程—结果”四维分析框架，并以郫都区“一站式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为实证对象，系统回应了“数字化背景下如何实现基层矛盾治理的源头性、主动性、多元性与有效性”这一核心命题。

研究形成以下创新性结论：第一，敏捷治理理论与基层矛盾治理目标高度契合。在其“四个机制”与“三个理念”的指引下，以数据为支撑，通过构建矛盾感知、纠纷预警、多元协同与迭代反馈机制，可推动基层矛盾治理模式从“事后应对”转向“源头防控”，从“被动救济”升级为“主动服务”，有效破解传统治理中响应滞后、手段单一与成效不固等现实困境。第二，将敏捷治理理论与中国基层治理实践相结合，提出“协同行动—以人为本—数字赋能—结果导向”四位一体的治理路径，明确了以党建引领推动多元共治、以态度转型激活服务意识、以技术嵌入提升响应速度、以持续优化保障长效发展的中国式基层矛盾治理方案。

“矛盾化解在基层”有赖于技术赋能，更系于治理理念与过程的重构。在数字时代背景下，唯有坚持以协同为基础、以人民为中心、以数据为驱动、以实效为导向，才能构建具备韧性、响应力与适应性的敏捷治理体系，推动基层矛盾治理从理论到实践、从局部到整体、从“有为”迈向“善治”的深刻转型。

参考文献：

- [1]《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
- [2]左文君,张竞匀.构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新时代“枫桥经验”解析[J].长江论坛,2019,(05):83-89.
- [3]《关于加强诉源治理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的意见》.
- [4] 刘建明.当前我国社会矛盾的基本特征和发展态势[J].理论探讨,2019,(06):57-61.
- [5] 胡佳,李珍刚.基层社会矛盾协同调处机制的构建——基于民族地区实证考察的分析[J].广西社会科学,2017,(05):144-149.
- [6] 杨林,赵秋雁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研究——基于三种实践模式的分析[J].中国行政管理,2022,(06):137-143.
- [7] 彭勃,陶丹萍.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本土化问题初探[J].政治与法律,2007,(04):71-75.
- [8] 左文君,张竞匀.构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新时代“枫桥经验”解析[J].长江论坛,2019,(05):83-89.
- [9]李永庆,吴猛.协同治理视角下乡村治理的困境与突破路径[J].成都行政学院学报,2021(05):78-84.
- [10] 孔凡义.农民上访与送法下乡：律师参与基层纠纷化解研究[J].湖北社会科学报, 2020(11):39-46.
- [11] 张西恒.走出碎片化：多元纠纷化解一体化平台的构建[J].甘肃社会科学, 2021(06): 163-170.

- [12] 廖永安,吕宗澄.我国“互联网+调解”发展困境及其路径选择[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1(03): 88-94.
- [13] 汪习根, 武小川.社会治理的法治实践模式构建——以武汉为样本的实证分析[J].法学论坛,2014,29(03): 146-153.
- [14] 卢芳霞.协商民主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的功能与实现路径——基于浙江基层协商民主经验的研究[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7,33(04):46-52.
- [15] 龙飞.论国家治理视角下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J].法律适用, 2015(07): 2-12.
- [16] 赫然,张荣艳.中国社会纠纷多元调解机制的新探索[J].当代法学,2014,28(02): 115-12
- [17] 侯学勇.司法调解中的法官修辞及其对司法公信力的影响[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4,32(01): 14-20.
- [18] 龙飞.论国家治理视角下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J].法律适用, 2015(07): 2-12.
- [19] 李瑞昌.联体与联动: 作为社会治理制度的在线调解创新[J].行政论坛, 2020,27(04): 83-89.
- [20] 雷望红.动员型调解: 乡村纠纷调解体系的适应与重构[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7(02): 59-69+151-152.
- [21] 任建通.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矛盾纠纷转型及化解机制研究[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47(03): 99-108.
- [22] 薛澜,赵静.走向敏捷治理: 新兴产业发展与监管模式探究[J].中国行政管理, 2019 (8): 28-34.
- [23] World Economic Forum. Agile Governance Re-imagining Policy-making in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White Paper, 2018, [EB/OL]. [2023-3-9].
- [24] 曹海军,候甜甜.敏捷赋能视角下的数字政府建设: 实践缘起与理论建构[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1,61 (06): 170-178 + 235;
- [25] 李汉卿,孟子龙.数字政府建设何以实现敏捷治理:多维度展开及其不确定性克服[J].求实, 2022(5):26-3.
- [26] 张力伟.基层矛盾在地化解.历史传统、现实指向与治理价值[J].政治学研究, 2025, (01):135-147+190-191.
- [27] 卫跃宁,刘文斌.诉调对接模式的决策依据与相对选择——基于本土司法数据及实务经验的原理总结与趋势前瞻[J].河北法学, 2020,38(12): 35-55.
- [28] 王松磊.迈向敏捷治理: 人工智能时代的现实要求、推进动力与路径策略[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25,50(05):125-136.

Empirical Study o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ath of "Resolving Contradictions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gile Governance: A Case Study of "One stop Diversified Resolution of Contradictions and Disputes" in Pidu District, Chengdu City

Yang Peixuan¹

(¹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0000)

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core issue of "how to achieve the source, initiative, divers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grassroots conflict resolution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ization". In response to th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of passive response, lagging intervention, and formal disposal in governance practice, this study introduces the agile governance theory guided by public interest, supported by technology, and advocating the improvement of governance adaptability through flexible mechanisms and dynamic response. Based on this, a "foundation starting point process result" analysis framework is constructed, and combined with the practical case of Pidu District, Chengdu City for analysis.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agile governance is highly aligned with the goal of resolving grassroots conflicts. Its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data perception mechanism, warning mechanism, and iterative feedback mechanism can effectively address the limitations of current grassroots conflict governance in terms of subject, approach, intervention, and effectiveness maintenance. Based on the above findings, this study further proposes a transformation path of "resolving conflicts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in the digital age from four dimensions: collaborative action, people-oriented, data empowerment, and results oriented.

Keywords: grassroots conflict governance, agile governance, digital empowerment, diverse governance

“螺旋递进、多元协同”：现代产业学院产教融合课程体系的构建路径研究

邹鸣民

(江西科技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98)

摘要：面向“回归工程”，现代产业学院成为应用型高校推进产教融合的主战场。本文以常熟理工学院医药生物技术学院为案例，运用文献调研法、案例分析法、调研访谈与实证法验证，建立并证实了现代产业学院模式下的“多元协同、螺旋递进”课程体系模型：目标上“知识—技能—综合能力—岗位胜任力”四阶螺旋为主线索，内容上“通识课程—专业基础—专业方向—行业应用”四个层级呈递进式结构，企业协同项目持续贯穿四年，达到目标定位、内容重构、教学实施、评价反馈的螺旋循环。结论显示，该模型的提出可以有效提高学生工程能力和就业匹配；“双导师+真实项目”机制较好解决师资结构性失衡和企业参与动力不足问题；依托数字孪生平台与“红黄绿”预警系统，可实现课程动态更新与治理可视化。结论指出现状共性瓶颈：课程内容落后、评价标准混乱、制度供给不到位；并提出了双导师协同、企业收益—荣誉双线激励、多维岗位胜任力、内容动态更新等解决方案，为各高校如何将产业学院从经验借鉴走向标准治理提供可借鉴、可推广、可落地的操作指南。

关键词：现代产业学院；产教融合；课程体系；螺旋递进；多元协同；能力本位

DOI: doi.org/10.70693/jyxb.v1i3.91

1 引言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度推进，要求高等教育如何从“知识传授”转向“能力导向”，这成为目前中国高等教育整体处于普及化阶段后的另一种现实。即对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要求，要求中国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方式实现更高水准。当前，产教融合的发展推进，要求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耦合方面，实现中国高等教育的内涵发展。

近年来，国家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为现代产业学院建设及产教融合课程体系改革提供政策依据、制度保障。2017年国务院《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首次指出“产教融合、校企协同育人”是推进科技成果转化与人才协同培养的新路径^[1]。2019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指出“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建设一批产教融合型高校、建设若干个产业学院^[2]。在此背景下，各行各业尤其是以应用型人才为培养目标的各高等院校纷纷尝试构建面向工程实践、服务区域经济的课程模式，产业学院应运而生。

但是，当前众多高等学校在产业学院建设方面，仍然存在课程体系建设与行业企业需求不匹配、课程体系针对性不强，企业融入力度不足，实践教学体系不清晰、不科学等问题。长期以来，高校课程体系重学科建设、轻行业企业需求等问题普遍存在，造成本科学生职业能力与专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培养质量不高，因而需要以课程体系和专业建设为出发点进行深入改革，需在顶层规划上立足“工程教育”，以“能力本位”为宗旨，以“融合业界”为特色，以“螺旋递进”为路径推动产教融合的建设。

因此，如何践行“回归工程”课程体系构建，将“回归工程”思维落实到教学实践中，进一步回答如何构建“重学术与应用”的课程体系结构；如何利用“多元协同”机制，构建院校和企业共同参与开发和设计课程、实现教学过程、明确考核评价的统一机制；如何依托“螺旋递进”式课程推进路径，科学构建学生基础能力培养、专业能力形成、综合能力和工程能力成长的路径，是本研究的旨所在，这也为提高应用型高校产教深度融合水平以进一步促进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提供有益的探索。

2 理论与文献综述

作者简介：邹鸣民(1990-)，男，博士，研究方向为产教融合、高等教育国际化。

2.1 理论基础: 产教融合与工程教育的融合理念

“产教融合”是我国战略性教育方向, 2010年教育部提出“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相关政策主张, 通过变革高校“学科本位”的封闭式培养体系, 促使人才由“学术导向”向“职业导向”转变, 使得学校与企业的人才标准、内容、平台及就业路径实行整合的系统联动^[3]。“产教融合”思想于2017年在国务院办公厅的《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中提出, 要实现“校企结合, 建设现代职业教育”, 推动课程体系的进一步改革^[4]。

与此同时, 工程教育的“OBE (Outcome-Based Education) 理念”和“CDIO (Conceive-Design-Implement-Operate) 教学框架”成为高校构建能力导向课程体系的重要理论依据^{[5][6]}。OBE 强调“以学生为中心”“以成果为导向”, 倡导围绕职业能力、综合素养设计课程内容与教学目标^[7]; 而 CDIO 更加强调从真实工程背景中获取项目载体, 驱动学生知识迁移与综合应用能力的发展^[8]。两者为高校“回归工程”的课程改革提供了明确的路径模型。

2.2 学术研究综述: 国内外产教融合课程体系的研究进展

对于国际应用型院校与企业合作培养人才, 已有一定成熟的分析模式。例如德国“双元制”教育重视企业进行实践培训, 学校进行知识学习基础构建, 学生在具体工作岗位上进行学习完成培养^{[9][10]}; 美国的合作教育也注重劳逸结合, 通过“有偿实习”来做好课程与职场对接。

国内研究则主要聚焦于以下几个方面:

课程体系的构建逻辑: 多数学者如王凯、郑林楠等认为, 应以“行业导向+学科逻辑”为基础重构课程体系, 实现“基础-进阶-拓展-实践”的螺旋式课程安排模式^[11]。部分研究提出建立“模块化课程包”, 以增强课程的可调整性和企业参与度^[12]。

高校与企业协同机制: 研究者普遍认为, 仅有课程共建还不够, 需建立包括“岗位嵌入式教学”“企业导师参与”“联合评价机制”在内的多维协同机制^[13]。同时, 政府、行业协会也应作为“第三方治理力量”进入人才培养体系, 保障公平性与标准化。

能力导向评价模式: 部分高校试点将学生能力指标体系分解为“基础认知能力、实践操作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创新与解决问题能力”等四类维度, 依据 OBE 理念开展课程评价设计^{[14][15]}。如西南交通大学、深圳技术大学等院校已初步探索基于岗位胜任力的课程评价改革。

AI、区块链、工业互联网等新产教技术, 促动产教课程改革和课程体系更新。近年来, 随着 AI、区块链、工业互联网等产教前沿技术的应用, 探索的课程内涵技术融合也增加, 如清华大学“智能制造产业学院”建设方案明确强调课程内容应与重点研发计划(国家)、企业的重点岗位(企业)需求匹配, 须反映新技术、新模式和新业态特征^{[16][17]}。

2.3 研究不足与本研究的突破点

尽管已有大量关于产教融合课程体系的研究成果, 但仍存在以下不足: 课程体系与工程教育核心理念结合不够深入; 实践教学路径设计零散, 缺乏体系化“螺旋递进”逻辑; 校企共建课程的标准化与评估机制尚未形成统一范式; 行业参与在课程构建初期阶段的实际作用仍较薄弱。

因此, 本文试图在已有研究基础上, 从“融合业界、能力本位”的视角出发, 设计一套基于“学术性与应用性并重”的课程路径模型, 具体提出多元协同下的课程模块构建机制、企业深度参与机制与工程能力递进式培养路径, 形成具有可复制性和可评价性的课程融合框架。

2.4 研究的预期贡献

本研究希望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理论与实践上的贡献: 理论层面, 丰富产教融合课程体系的结构化研究, 提出以“工程能力成长”为导向的课程递进模型; 实践层面, 为应用型高校产业学院提供可操作的课程设计蓝图, 推动校企在教学过程中的深度协同; 政策层面, 为地方教育主管部门优化课程改革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与产业对接效能。

3 研究方法与研究设计

3.1 研究思路与总体框架

文章本着“回归工程”的思想，针对高校产业学院课程体系改革中的现实问题与结构重构，从目标定位、结构设计、内容规划和实施机制四个层面出发，设计出产教融合课程体系路径模型，以期达到既注重课程内容和教学过程的学术性、又兼顾产业发展要求的应用性目标^[18]。

具体研究思路如下：以国家政策与工程教育理念为宏观导向，明确产教融合课程体系的功能定位；通过典型案例剖析，提炼可复制的课程结构与实施逻辑；运用比较分析法与路径建模方法，提出“多元协同、螺旋递进”的课程体系构建模型；最后结合实际院校改革实践，验证模型的可行性和适配性。

3.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多种教育研究方法交叉验证，确保研究的科学性与实践性，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文献综述法：整理近5年中相关国家的教育部、行业协会、地方政府政策文件，理顺产业学院、课程融合、能力导向教育方面的相关研究文献，提出理论依据。

案例研究法：聚焦一批应用型高校和应用型产业学院的办学形式与路径，梳理其课程体系构建路径与路径机制，提炼具有通约性的共同特征和关键路径。如图示的“匠心学堂—专业大类课程—行业应用课程”路径就是一个应用型产业学院的实践路径。

比较分析法：分析各类型院校实施产教融合课程体系构建的案例，对比其在课程单元划分、校企合作方法、考核方式等方面的特色，总结各自的经验做法及其适用范围。

路径建模法：基于典型案例分析结果，构建“多元协同—螺旋递进”课程体系模型，从课程层级、能力成长路径、项目实践周期等方面量化梳理，实现图示模型与理论路径的融合建构。

3.3 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

本文采取以“课程体系”为单位的研究方法，选取常熟理工学院医药生物技术学院作为分析样本，确保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和外部适用性。

研究对象：本研究以常熟理工学院医药生物技术学院为研究对象。该学院于2021年入选江苏省第二批重点产业学院，由常熟理工学院与药明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智享生物（苏州）有限公司、昭衍（苏州）新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等生物医药头部企业共建，是江苏省面向生物医药产业现代需求、深化产教融合的重要平台。

该学院面向生物制药专业集群，涵盖生物制药、生物技术、制药工程等多个本科专业，实行跨专业、跨学院遴选学生，采用“双向选择、动态进出”管理机制，构建起以“三对接、六融通”为核心的协同育人模式，强调培养目标对接产业需求、教学内容对接行业技术、学习过程对接企业生产，实现从知识传授到岗位胜任的全过程贯通^[19]。

数据来源：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确保研究的真实性、系统性与可验证性：

官方政策与规划文件：包括《常熟理工学院医药生物技术学院建设方案》《江苏省重点产业学院遴选通知》《2021—2023级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教学大纲》《课程质量年度报告》等，用于明确课程设置、改革路径与政策依据。

校企协同过程性资料：收集2022—2024年间的校企联合教研会议纪要、企业导师评价表、学生能力成长档案、项目任务书、课程共建协议等，还原课程实施细节与协同机制。

毕业生就业质量数据：引用常熟理工学院2021—2023年度《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重点分析医药生物技术学院毕业生的岗位匹配率、薪资水平、用人单位满意度、晋升路径等关键指标。

企业反馈与调研访谈：通过对药明生物、智享生物、昭衍新药等企业HR、技术主管、企业导师的半结构式访谈，获取毕业生岗位表现、能力结构、职业素养等方面的第一手资料。

公开数据库与文献资料：包括江苏省教育厅公示资料、CNKI相关教改论文与专利成果，用于横向比较与政策对照。

4 案例分析：医药生物技术学院的“多元协同、螺旋递进”实践路径

4.1 课程体系结构：四阶螺旋、四层递进

医药生物技术学院围绕“知识—技能—综合能力—岗位胜任力”四阶能力成长路径，构建起“通识课程—专业基础—专业方向—行业应用”四级递进式课程体系，形成“螺旋上升、逐层深化”的教学结构。例如，学院与药明生物联合开发《蛋白质工程制药》《基因工程制药》《生物药物分析新技术》等18门行业课程（共39.5学分），覆盖新药研发、生产工艺、质量控制、生产放大四大模块，所有课程均以真实项目任务为载体，实践学时占比超过40%^[20]。

4.2 “双导师+真实项目”机制：破解师资与企业参与难题

学院建立“高校教师+企业工程师”双导师制，企业导师全程参与课程设计、教学实施、项目指导与能力评价。例如：在《生物分离工程》课程中，企业导师带领学生围绕真实疫苗纯化工艺展开项目式教学；学生在大三暑假进入企业完成1:1岗位任务，大四完成企业选题毕业设计，80%以上课题来源于企业技术需求；企业导师参与学生能力评估，建立“红黄绿”预警系统，实现学生成长轨迹的可视化与动态干预。

4.3 育人成效：就业质量与产业适配度显著提升

根据学院对2023届毕业生的跟踪调查数据，医药生物技术学院毕业生的就业质量、产业适配度及职业发展潜力均显著优于校均水平，体现出“多元协同、螺旋递进”课程体系在提升学生岗位胜任力方面的显著成效。毕业生平均起薪达7200元/月，明显高于学校平均水平，且薪资增长幅度稳定；92%以上毕业生入职员工规模超1000人的大型生物医药企业，如药明生物、昭衍新药、智享生物等，岗位对接度高；80%以上毕业生在2年内实现岗位晋升，担任项目技术专员、研发助理、工程师等关键岗位；企业普遍反馈毕业生“学习能力强、解决问题能力突出、职业稳定性高”，在岗位适应、团队协作与技术执行方面表现优异。药明生物和智享生物都给予了学生高度评价：“学生具备独立操作能力，与企业融合度高，各部门普遍欢迎该学院毕业生加入。”“相比其他高校学生，该学院毕业生在学习能力、执行能力与职业稳定性方面表现更为优异。”^[20]

此外，学院通过引入企业真实项目、岗位任务式教学及“双导师”指导机制，显著提升了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职业素养与产业理解力，为其高质量就业与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用人单位普遍认为，学院毕业生“上岗快、留得住、成长快”，充分体现了产业学院人才培养模式与行业需求的高度契合。

4.4 案例的典型性与推广价值

常熟理工学院医药生物技术学院通过构建“多元协同、螺旋递进”的产教融合课程体系，实现了从课程共建—能力培养—岗位对接—质量评价的闭环治理，具有以下典型特征：

- 课程体系标准化：四阶能力、四层课程，路径清晰、可复制；
- 企业参与制度化：双导师、项目驱动、联合考核，企业深度嵌入；
- 能力成长可视化：依托数字平台与预警系统，动态追踪学生成长；
- 就业质量可量化：高薪资、高匹配、高晋升，产业认可度高。

该模式为其他地方高校、尤其是应用型本科院校建设现代产业学院、推进“回归工程”教育提供了系统化、可操作的改革范式。

5 课程体系构建的核心路径分析

在“回归工程”理念指导下，产教融合课程体系的重构不应仅停留在形式创新，更应在体系逻辑、能力递进与校企协同层面实现深度整合^[21]。以图示展示的典型路径为基础，本文从四个维度构建“多元协同、螺旋递进”的课程体系逻辑，以实现学术性与应用性并重、基础知识与产业能力融合、教学过程与工程实践协同。

5.1 明确目标定位：学术性与应用性并重

在现代产业学院课程体系设计上，首先要明确“双导向”的目标内涵：一方面坚守基础学科的学术逻辑和专业核心知识架构，为学生可持续发展打下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强调岗位能力、工程素养与产业适配，强化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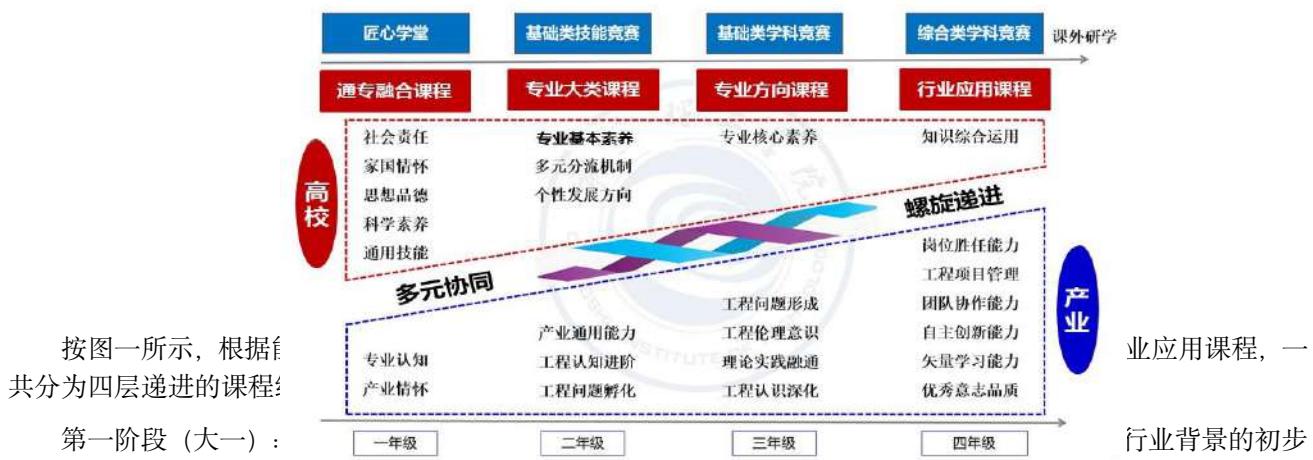
课程目标以“知识+能力+素养”三位一体为培养核心，突出以下几个关键词：

- 学术性支撑：打牢通识基础与学科通识课程；

- 职业性引导：嵌入行业标准、工程项目、岗位技能；
- 可迁移能力：贯穿批判性思维、沟通协作、项目管理等“软能力”。

5.2 回归工程，构建产教融合课程体系

现代产业学院人才培养应兼顾学术性和应用性，这就需要行业企业等利益相关方的深度参与，以满足行业企业对人才培养的期望。其目标是强化学生职业胜任力和持续发展能力，突出“融合业界、能力本位”的核心素养，课程内容与技术发展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的对接，促使课程内容在学术性与职业发展应用性之间实现有机结合。



螺旋推进的关键在于每一阶段课程设计并非割裂，而是在前一阶段学习基础上引导学生向更高层次的认知迁移与能力复合，形成“认知—理解—应用—创新”的知识链闭环。

5.3 强化实践导向：校企协同项目贯穿全过程

第三条线路就是“厂企分散培养阶段（3年）+企集中培养阶段（1年）”。将生产为导向的育人观贯穿于教学，让学生在学校的产教实训基地、企业的顶岗实践、工作过程实训、工程项目实训等实践活动中提升实际动手能力。

实践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企业工程认知训练（第1年），工程技术专题实践（第2年），企业导师指导下的工程项目开发（第3年），企业集中课程模块+综合工程实践+毕业设计（第4年）。此外，企业课程模块可根据图示划分为8周课程模块、8周生产一线综合实践、16周毕业设计，以阶段化项目驱动学生“在做中学、在用中悟”。

5.4 实现能力本位：以“岗位能力”为导向分解课程目标

为确保课程设计与人才输出标准一致,应以岗位胜任能力为标尺,构建能力导向课程评价体系。具体能力指标划分如下:

阶段	课程类型	培养目标	对应能力
大一	通识/专业认知	职业启蒙、行业感知	基础认知能力
大二	专业基础	技术基础、问题建模	学科能力 + 技术技能
大三	方向课程 + 项目	工程实践、团队协作	项目管理能力 + 工程能力
大四	企业课程 + 毕设	岗位胜任、成果转化	综合应用能力 + 岗位适配力

课程设置与评价机制围绕上述能力要素进行结构化设计,确保学生在完成学习任务的同时实现职业能力的内化与迁移。

6 典型模式的可复制性分析

前述“多元协同、螺旋递进”的课程体系模型已应用于某些高校产业学院的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并有效提升了实践质量。为促进该课程体系模型在其他院校、产业学院相关专业乃至全国其他地区复制推广,现以“清晰性”“可获取”“可治理”“可拓展”为主要分析视角,简要探讨“多元协同、螺旋递进”的可复制性。

6.1 路径结构清晰,具备通用推广价值

课程体系在目标设置、结构安排与能力递进上具备高度标准化特征,形成了“通识—基础—方向—应用”四阶段清晰逻辑,结合“企业贯穿+集中实践”的组织安排,有效避免了课程设置碎片化与实践环节孤岛化问题。

该模型有如下推广特点:通用性强,可适用于各工科专业群和应用型专业群;课程阶梯化,按专业特点能进行组合的课程单元重构等;实践路径灵活,既可采用企业联合开发模式,也可借助校内模拟平台进行过渡实践。

6.2 企业资源参与门槛可控,便于地方高校落地

部分高校常面临企业资源有限、行业支持不足等困境,本文模型强调“分散实践+集中融合”的实践策略,允许企业参与深度因地制宜、因资源定级。对于产业集中度较高的区域高校,可与本地龙头企业建立共建机制;而对于地处非核心城市的院校,则可通过以下方式突破企业参与门槛:

与多家中小企业建立模块型合作关系,形成“项目众包式实践”;建立行业协会平台,实现多企业资源共建共享;利用校内仿真实训平台进行实践模拟,部分替代生产场景;同时,企业参与环节可按“讲师参与—案例共建—项目嵌入—联合评估”四级标准分层设计,使高校能根据企业参与意愿与资源调度能力灵活推进合作深度。

6.3 治理机制规范,保障课程协同运行

模式推广的关键不只是课程设计本身,更在于制度支撑与组织保障机制的完善。本文提出如下协同治理机制作为基础保障:

- 校企联合教研机制:高校设立“企业导师库”,定期组织课程共建研讨会,统一教学内容与项目设计逻辑;
- 三方评价体系:学生学习效果由教师、企业导师与学生自评三方共同打分,构建多维度能力测评模型;
- 动态课程调整机制:每学年根据产业变化动态调整课程内容,企业导师可参与课程迭代过程;
- 任务驱动型教改激励机制:设立课程共建教师津贴、企业导师授课补贴,激励持续合作与教学创新。

治理机制的建构为课程体系的标准化与可持续实施提供组织基础,也为后续课程审核与质量评价提供依据。

6.4 具备跨专业复制潜力与纵向拓展能力

虽然该模型主要应用于工程类与应用技术类专业,但其“能力本位+项目驱动”的核心理念可适度拓展至管理、设计、教育等其他专业领域。例如:管理类专业可围绕“市场调研—数据建模—方案制定”设计递进课程;

教育类专业可围绕“课堂设计—教学演示—课后反思”构建教学能力成长路径；设计类专业可依托真实商业项目进行“需求分析—产品原型—用户测试”全过程训练；同时，该课程体系也可作为本研贯通、职教高本贯通、继续教育项目等多类型人才培养路径的基本模板，具备良好的纵向拓展性。

7 存在问题与优化建议

虽然“多元协同、螺旋递进”型课程体系已经在部分高校产业学院建设中产生了良好的发展效果，但从运转现状看，其中课程体系构建及其课程群开设在协同育人过程中存在若干问题，这些自身问题的解决不仅会影响到整体课程体系的稳定性及常态性，而且会影响到课程群开设的深度及成效性。对此，本文根据课程体系的相关问题从四个方面对课程体系中的主要问题予以整理并提出了若干针对性建议。

7.1 问题一：师资力量结构性错配，制约课程融合深度

当前很多高校在开展产教融合课程建设时依然由高校内教师全权负责，企业内的专任教师较少。一些教师在课程教学中仅对课本知识进行研究，不具备生产一线经验，不能清晰地理解一线生产单位职业岗位的关键技能，从而造成人才培养中所开课程内容不贴合现实的生产过程与环境，形式化、难以投入实际应用。建议实行“双导师双师制课程教学体系”，让高校内教师与企业内的工程师共同参与到课程开发和课程教学中来。高校应该培养“企业兼职教师名录”，鼓励企业专家参与到课程教学、教学项目指导与技能评价中；高校应该增强对“教师工程化能力培养项目”，鼓励教师到企业内挂职或到企业技术进修，增强工程化指导能力^[22]。

7.2 问题二：企业参与积极性不足，协同机制有待健全

部分高校与企业开展课程开发的合作“兴衰无常”。一方面，企业不能从高校课程建设过程中获得直接的收益；另一方面，现行高校课程开发在开发初期很难建立“共建共管共享”的制度体系，所以企业不明确自身的角色、参与度不高。建议一是构建“企业参与的回报与声望双驱动”制度，如建立校企合作专项经费对企业课酬进行补贴，在校企合作人员工作绩效考核上体现企业协作成绩等；二是共同对高校开发的课程制定标准、共同对企业人才进行能力评估模型构建，增强企业标准制定中的“话语权”；三是建立“校企教学联合委员会”（实体）来承接推进工作的“日常化”与“制度化”^[23]。

7.3 问题三：课程评价标准不统一，能力导向转化不足

尽管在课程目标定位时注重“能力本位”，但在课堂实施和质量评估过程中，依旧有“用知识考核代替能力评价”的问题，无法真正反映出学生的能力真正提升。在校企共建课上更是缺乏系统性的教学过程评价、成果产出要求、实践能力考核等评估指标的支撑，有必要建立基于“岗位胜任力模型”的评价指标，体现课程和岗位能力要素的关联，构建过程评价和结果考核结合多维评价的标准，例如“工程日记”“作品演示”“企业导师评价”等方式的引导，动态化地跟踪学生能力的成长^{[24][25]}。

7.4 问题四：课程内容更新滞后，技术适配性不足

部分课程由于技术发展迅速，更新换代比较快，课程内容跟不上产业变化，如人工智能、绿色制造、智能制造、智能物流等热门技术在课程中尚未加以考虑和融合，课程设计有“滞后于岗位需求”的问题。应组织设立“课程内容动态更新机制”，由企业专家、高校教师、行业专家组成团队，每年联合召开一次课程修订研讨会，随时将企业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等加入教学内容。设立“产业前沿论课”“企业个性化需求课”等，根据不同岗位，不同行业的岗位成长需求机动安排教学计划^[26]。

综上所述，进一步实施优化路线的设计路径将有助于强化课程设置的内部驱动效应、外部匹配水平和动态创新能力，为促进发展产业学院的优质教学服务。

8 结论

进入“质量时代”的中国高等教育仍处在“从规模教育转向质量问题”这一挑战之下，作为产教深度融合平台载体的产业学院有着重新配置人才培养体系、增强教育服务产业功能的作用使命。基于“回归工程”的思潮理念，在实践范例基础上，笔者提出“多元共管，螺旋递进”的课程体系设计，并从任务角色的指向性、建构的系统性、实施的可操作性以及素养要求的明晰性等方面展开论述。

研究发现，该课程体系具有以下显著特征与优势：在结构设计上，课程体系遵循从通识到专业再到岗位的递进路径，形成清晰的阶段性目标，有效解决了课程层级模糊、能力脱节的问题；在协同机制上，倡导校企共同参

与课程设计、教学实施与成果评价,打通了高校与企业在育人过程中的壁垒,提升了课程体系的应用性与岗位适配度;在能力培养上,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构建“基础认知—专业技能—项目能力—综合素养”的能力成长链条,实现了从学术知识向实践能力的转化;在推广路径上,模型具备良好的专业适配性、地区适应性与治理支撑性,可为不同类型高校提供可借鉴、可复制的课程改革思路与路径参考。然而,现实工作中,课证融合课程体系的开展还存在教师队伍不合理、企业和行业参与不到位、学生能力考核不明确等问题。为此,本文从建立“教师+技师”的双导师培养体系、加强行业企业考核与奖励的政策、构建学生能力考核体系、课程内容适时完善四方面对目前课证融合课程体系的开展提出有益的建议。

总之,本文研究所涉及到的产业学院课程体系的顶层设计与构建以及实践层面的课程体系改革路径,不仅为高校深化实践层面的改革提供了可资参考的范本,同时对基于上述改革路径所形成的产业学院课程体系的发展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需要课程体系进一步兼顾灵活性与开放性,实现不同学科的兼容、国际化元素的充分介入,以及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对接,并开启以智能化、个性化、数据驱动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新模式,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助力国家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 [1]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 (国发〔2017〕35号) [EB/OL]. 中国政府网, 2017-07-08.
- [2]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国发〔2019〕4号) [EB/OL]. 中国政府网, 2019-02-13.
- [3] 国务院.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EB/OL]. 中国政府网, 2010-07-29.
- [4]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 (国办发〔2017〕95号) [EB/OL]. 中国政府网, 2017-12-19.
- [5] Zhang Y, Li X, Liu H. Exploration and Innovation of a Competition-Integrated Teaching Model for Vehicle Engineering Based on the OBE-CDIO Approach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J]. Membrane Technology, 2024, 2024(4): 321-325.
- [6] 张存生, 王高琦, 王红霞, 等. 基于 OBE-CDIO 理念的材控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J]. 职业教育, 2024, 13(4): 12907-12731.
- [7] 王艳, 王磊. 基于 OBE 理念下应用型本科高校线性代数课程体系的构建与实践研究[J]. 教育进展, 2025, 15(4): 592-598.
- [8] 陈星, 李梦, 刘思远. 基于 OBE-CDIO 理念的工程制图教学改革研究[J]. 教育进展, 2025, 15(5): 720-727.
- [9] 杨蕊竹, 孙善学. 德国双元制高等教育制度变迁特征与启示[J]. 中国高教研究, 2023(10): 94-101.
- [10] 陈杰菁. 德国双元制高等教育教学研究[J]. 环球视角, 2025(6): 1-5.
- [11] 王凯, 郑林楠. 职业本科教育课程体系构建的内在逻辑与基本原则[J]. 当代教育论坛, 2022(5): 116-124.
- [12] 谢剑虹. 职业本科教育课程体系构建的内在逻辑与基本原则[J]. 当代教育论坛, 2022(5): 116-124.
- [13] 刘亚敏, 吕大静. 学习获得感视角下产教融合型课程的供需分析——基于 H 大学光电学院研究生的访谈研究[J]. 中国大学生就业, 2025(9): 53-60.
- [14] 王京, 王旭, 张泽怡, 等. OBE 理念下混合式教学效果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提升策略研究[J]. 科技资讯, 2024(19): 1-5.
- [15] 杨宗凯. 智能时代高校学生能力评价及其实践[R/OL].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2022-04-11.
- [16] 董敏, 毛爱华, 毕盛, 等. AI 赋能+通专融合+产教融合的 C++ 编程基础课程教学探索[J]. 计算机教育, 2025(2): 60-65.
- [17] 王佑镁, 王海洁, 王旦, 等. ChatGPT 赋能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多重角色与实践路径[J]. 电化教育研究, 2024(1): 76-83.
- [18] 邹鸣民. 基于校企合作教育项目的“三位一体”人才培养机制研究——以协同发展为导向的高等教育实践路径探索[J]. 中国现代教育学报, 2025, 1(2): 65-72.
- [19] 罗兵. 科技助推现代产业学院高质量发展——以常熟理工学院医药生物技术应用学院为例[J]. 常熟理工学院学报, 2021, 5: 106-109.
- [20] 江作军. 现代产业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新路径的探索与实践[Z]. PPT, 2023-10-12.
- [21] 李思媛. 产教融合背景下高职供应链专业《财务管理》课程体系重构研究——以云安农文旅产业学院为例[J]. 亚太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 2025, 1(2): 33-40.
- [22] 金向红. 地方应用型高校产教融合型师资队伍培养机制研究[J].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1): 30-36.
- [23] 周正, 尹玲娜, 蔡兵. 我国产学研协同创新动力机制研究[J]. 软科学, 2013, 27(7): 52-56.
- [24] 陈翔, 韩响玲, 王洋, 等. 课程教学质量评价体系重构与“金课”建设[J]. 中国大学教学, 2019(5): 43-48.
- [25] 汪利, 高娜. 本科课程教学质量评价指标的构建——基于学生体验的视角[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21(2): 195-200.
- [26] 李静. “双高”建设背景下高职院校智能建造专业群建设的内容与举措——以延安职业技术学院为例[J]. 内江科技, 2022, 43(2): 56-57+53.

“Spiral Progression and Multi-Dimensional Synergy”: A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Path of Curriculum Systems in Modern Industry Colleges Integrating Industry and Education

Zou Mingmin

(Jiangx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Nanchang, China)

Abstract: Oriented toward “Returning to Engineering,” modern industry colleges have become the main battleground for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to advance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Taking the School of Pharmaceutical Biotechnology at Changsh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s a case study, this paper employs literature review, case analysis, interviews, and empirical verification to establish and validate a “multi-dimensional synergy and spiral progression” curriculum system model under the modern industry college framework. The model follows a four-stage spiral—“knowledge–skills–comprehensive ability–job competence”—as the main developmental thread. In terms of content, it presents a progressive structure across four tiers: “general education–disciplinary foundation–specialization–industry application,” with enterprise-collaborative projects embedded continuously over four academic years, achieving a cyclical spiral of goal setting, content reconstruction, teaching implementation, and feedback evaluation.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is model effectively enhances students’ engineering capabilities and employment adaptability; the “dual-mentor + real project” mechanism helps resolve structural imbalances in faculty and insufficient corporate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and by leveraging digital twin platforms and a “red–yellow–green” alert system, dynamic curriculum updates and visualized governance can be realized. The study also identifies common systemic bottlenecks, including outdated curriculum content, inconsistent evaluation standards, and inadequate institutional support. It proposes solutions such as dual-mentor collaboration, dual-track incentives combining enterprise benefits and honors, multi-dimensional job competency frameworks, and dynamic content updates. These strategies offer a practical and replicable roadmap for universities to transition modern industry colleges from experiential imitation to standardized governance.

Keywords: Modern Industry College;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Curriculum System; Spiral Progression; Multi-Dimensional Synergy; Competency-Based Education

中外对比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以广东东软学院为例

赵晓沁¹ 钟海权¹ 徐文聪¹

(1.广东东软学院 健康医疗科技学院, 广东 佛山 528200)

摘要: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医疗健康服务模式形态,健康服务人才培养现状,对比中外社会医疗健康服务模式、健康服务与管理人才培养模式、人才培养特色,相关专业设置、课程设置、培养体系及行业准入机制等,博采众长,细致梳理地域优势、产业优势及办学优势,以广东东软学院为例,在实践中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健康管理人才培养路径。

关键词:中外对比;健康服务与管理;人才培养

DOI: doi.org/10.70693/jyxb.v1i3.96

在深入贯彻《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的战略背景下,结合我国正步入快速老龄化与高龄化阶段的现实诉求,健康管理愈发受到政府部门和学术界的关注。经过 10 余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的健康管理在理论研究、产业实践和市场培育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健康服务与管理人才的培养仍然存在培养体系不完善,学科定位与产业发展不同步等问题。本文通过对比中外社会医疗健康服务模式、健康服务与管理人才培养模式、人才培养特色,旨在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健康管理人才培养路径。

1. 各国医疗健康服务体系的主要模式

在全球范围内,现代医疗健康服务体系经过了百余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英国模式(NHS)、德国模式(社会医疗保险)、美国模式(HMO)等各具特点的典型国家服务模式。他们有不同的特征,具有各自的优势并存在问题。日本模式与德国模式类似,但在老龄人口照护、改善医疗服务方面的特色更为突出。

1.1 美国模式 (HMO 模式)

美国健康保障体系(Health Management System of America)从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发展,到 70 年代逐渐发展成型。主要通过商业保险作为主要补偿形式,政府通过制定法规引导和规范社会资源力量办医,故以民营医疗机构作为服务主体。民营医疗机构建立了庞大的服务网络,有社区医院、连锁诊所、大型综合性医院和大型专科医院、医疗商场等健康管理机构,提供从日常医疗服务、小病诊疗和大病诊疗的服务体系。美国实行以商业保险为主的医保体系,其最大特点是将保险公司与医院的职能有效联合,保险组织直接参与医疗服务体系的管理。一方面会严格监督医患双方行为,防止不合理费用的产生,另一方面也会对参保人进行健康管理,减少赔付发生的可能^[1]。

1.2 英国模式 (NHS 模式)

英国国家卫生服务体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 NHS)采取政府主导下的家庭医生制度和分级诊疗制度^[2]。第一层级是以社区为主的基层医疗服务,包括家庭医生(General Practitioner, 简称 GP)、牙医、药房、眼科检查等,负责居民日常医疗健康服务。第二层级是大型医院或者专科医院,包括急诊、专科门诊及检查、手术治疗

作者简介:赵晓沁(1986—),女,硕士,主治中医师,研究方向为中医养生;

钟海权(1993—),男,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健康服务与管理;

徐文聪(1996—),男,硕士,助教,研究方向为健康服务与管理,健康政策与健康促进。

通讯作者:钟海权

和住院护理等，住院服务以政府建立和运营的公立医院为主。医疗健康服务作为一项福利覆盖全民，政府每年拿出大量资金来购买或补贴医疗卫生服务。民营医院仅为补充，面向高端医疗服务，同时也有商业医疗保险提供医疗支付^[3]。

1.3 日本模式

在世界卫生组织（WHO）每年发布的世界卫生统计报告中，日本在“高品质的医疗服务”、“医疗负担的低水平程度”以及“国民平均寿命高”等指标上长期保持领先水平。医疗社会保险覆盖全体国民。日本从1961年开始实施国民全员保险制度。大型医院和社区医疗机构建立“区域合作诊疗计划”^[4]。基层医疗机构和医院错位发展，通过绿色通道促进分级诊疗，普通疾病到社区就诊，严重疾病到医院治疗，康复回到社区。社区提供疾病预防和体检管理服务，并与大型医院之间建立服务关系，降低居民患病率。通过独立行政法人制度使公立医院成为独立社会公益事业法人，政府与公立医院管办分离。通过PFI（《利用民间资金发展公共事业法》）方式在医院改扩建和非核心业务运营上推广公私合作。

2. 各国健康服务与管理人才的培养模式

基于各国不同的医疗健康服务体系模式，人才培养模式也各有不同。

2.1 美国健康服务与管理人才培养模式

美国从事该类专业服务的人才培养一般依托公共卫生学院、公共政策学院或公共事务学院，属于公卫管理范畴，专业名称一般为：卫生政策与管理、健康管理与政策、健康教育、营养与健康等，所属方向：医学照护（非临床类）^[5]。本科毕业授予健康科学理学学士学位，可攻读临床和相关专业硕士学位。在课程设置方面，本科阶段（公共卫生专业）：生物学预备知识、数学预备知识、社会科学预备知识、公共卫生知识；硕士阶段（健康管理专业）：公共卫生、健康管理基础知识、健康管理成本、公共卫生决策、社区卫生政策、医疗质量测量与改进等^[6]。核心课程设置为4部分：管理类、公共卫生类、健康管理类、医学类课程。其严格的从业标准要求入职的健康管理师必须考取国家认证的证书^[7]。各个学校有自己的培养方向及特色，如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偏向统计分析能力以及领导能力；明尼苏达大学双子城分校侧重金融分析及政策制定能力；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侧重发展经济数据分析能力、领导能力及对法律政策了解能力等^[8]。可以看出美国高校对健康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更注重发展其领导能力、沟通能力、数据分析能力、商业相关能力以及专业发展能力、熟悉医疗环境知识和发展趋势能力等核心能力。与其商业保险的医疗健康服务体系模式匹配。

2.2 英国健康服务与管理人才培养模式

英国体系中并无专门的综合健康管理本科专业，主要以研究生学历教育为主，在不同专业背景下注重培养综合能力良好、多方面发展高素质人才。非医疗背景人员可选读健康管理辅助专业：领导与领导力专业、健康促进专业、人权与健康福祉专业、全球健康专业；医疗背景人员可选读健康管理从业专业：临床医学专业、心理治疗与精神医学专业、护理专业、听力治疗、视力治疗专业。课程设置分为3类：基础课程—流行病学、统计学、健康管理、英语等；技能培养课程—公共卫生营养、健康促进的原则和实践、传染病控制和环境健康、全球健康等；拓展课程—循证医学、文献检索研讨、医疗保健等^[8]。

2.3 日本健康服务与管理人才培养模式

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高校设置健康管理专业，有完整的健康管理专业人才学历培养体系。健康管理涵盖范围可包括卫生政策研究、医疗机构管理、运动科学与康复治疗、健康促进与管理等多个领域，涵盖博士、硕士、学士以及职业教育等各个学历层次，学制分别为6、4、2年，一般可分为研究型、应用型和技术型三种类型。研究型以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为主，应用型以培养4年制本科人才为主，技术型以培养2年制职业技术人才为主。

课程设置分为3类，公共基础课（人文社科方面基础科目）：哲学、英语、计算机应用等课程；专业基础课（医学保健类和经营管理类应用科目）：临床医学基础、健康运动学、医院管理学、社会调查理论与方法等课程；毕业设计与实践（高校与医疗服务机构或健康管理企业开展联合人才培养模式）^[9]，即通过实习基地纽带，让学生掌握实践技能，并由实习带教老师负责指导完成课题研究。普遍采用产、学、研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即高校与政府相关部门、医疗服务机构或健康管理企业开展联合人才培养。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健康管理师是由执业护士在经过1年公共卫生、人群健康和健康管理方面的培训后，参加执业资格考试，考试通过即可获得健康管理士

执业资格，获得从业资格后方可上岗^[10]。

3.我国健康服务与管理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2000年以来，以健康体检为主要形式的健康服务与管理业逐渐在中国兴起，国内医疗健康服务体系与日本模式有较多相似之处。2006年，劳动与保障部发布把健康管理师作为新职业纳入卫生行业特有职业。2015年，随着“健康中国建设”的稳步推进，全国高职院校专业目录首次增设健康管理专业。2016年，教育部正式批准设立健康服务与管理本科专业，截至2020年，全国开设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的院校共124所^[11]。多数为医学背景院校，其他学校类型多为理工类、商科类、师范类、体育类等。目前国内健康管理人才培养有一定的规模，但培养模式尚待进一步摸索与完善。

3.1 健康服务与管理人才培养现状

该专业国家定位为培养“厚基础、宽口径、强能力、高素质、广适应”的健康服务与管理应用型人才，要具备现代管理理论、技术与方法等方面的知识，以及应用这些知识的能力，毕业后能在医疗卫生、公共卫生、健康管理、健康产业、卫生行政等相关企事业单位从事管理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对应职业岗位是健康管理师，但健康管理师目前所从事服务与全科医师、公共卫生医师有重叠交叉部分，执业分工不清晰，职业岗位功能定位不明确，导致健康管理学科定位与当前健康服务产业需求的契合度不高^[12]。健康管理虽已形成专、本、硕、博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教育体系，但具备健康管理方向硕、博学位授予权的高校非常少^[11]。在本科阶段获得管理学学士学位后，专业人才大多在研究生阶段转向公共卫生管理方向继续进修。

3.2 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课程设置与专业特色

由于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还未有国家教学质量标准，各高校开设健康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课程设置体系、实践教学、职业定位等多沿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中公共管理类学科标准制订，课程设置及实践技能要求上缺乏统一标准与规范要求。共性的课程有：基础理论课程—管理学、营销学、社会医学、临床医学概论、流行病学、健康管理、中医学概论；技能性核心课—健康信息管理、健康评估技术、健康心理学、数据挖掘与分析等；实践课程—课内实验、见习、毕业实习、毕业设计、第二课堂等；特色课程—中医美容学、急救医学、音乐疗愈、民族医药等。不同院校根据所处区域产业优势及自身办学特色，人才培养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如：成都医学院着重培养学生健康数据处理的核心竞争力；贵阳中医药大学着重培养学生中医康复、营销咨询、心理咨询知识技能；上海健康医学院作为上海首个设立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的院校，围绕学校“医工结合、医养结合、医保结合”发展方向，立足上海面向全国，培养宽视野多元化的健康管理专业人才^[10]。总的来说，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作为一个“医”、“管”交叉融合的新专业，各高校总体是遵循跨学科联合培养的人才培养模式并逐步摸索自身的专业特色。

3.3 行业准入资格

2005年，健康管理师确立为卫生行业的国家职业；2017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又重新明确增加健康管理师职业资格。健康管理师是指从事个体或群体健康的监测、分析、评估以及健康咨询、指导和健康干预等工作的专业人员^[13]。根据《健康管理师国家职业标准》，健康管理师共设3个等级，分别为：助理健康管理师（国家职业资格三级）、健康管理师（国家职业资格二级）以及高级健康管理师（国家职业资格一级）。国家卫生健康委人才交流服务中心是国家职业资格唯一的认证单位。但健康管理师准入资格培训也有由人社部门委托鉴定机构组织考试鉴定，且准入门槛低，中专或非医药专业考生也可通过培训机构完成标准课时的速成培训后获取证书。业态鱼龙混杂，证书质量不达标。针对健康管理师职业资格准入门槛较低的问题，政府相关部门及行业权威应严控健康管理师的入职门槛，把好第一道关，完善健康管理师证书登记注册制度，加大健康管理师的入职审核力度，规划年限，加强对健康管理师资格证书的再审核，加强相关卫生机构对医疗机构健康管理服务的监督，形成科学合理的绩效考核体系^[11]。可参考日本的“指定校”制度^[14]，让有资质的正规办学院校主导健康管理师资格认证工作。

3.4 广东东软学院的人才培养路径探索与实践

基于地处广东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域的优势、大健康产业优势、国家高新区的区位环境优势以及依托东软集团智慧医疗板块产业优势，广东东软学院于2021年开设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立足广东，面向粤港澳大湾区，培养“医管信创”融通的高素质应用型技术技能人才。参考中外健康管理业态模式及人才培养路径，充分汲取国内外优秀培养经验，基于我国健康管理业态正处于传统医疗行业信息化转型升级及健康新生业态蓬勃发展的状态，科学规划医学、管理学、信息技术、创新创业四位一体的课程设置突出跨学科联合培养；以大健康行业信息化转

型需求为导向,特别突出与现代信息技术的有机融合的特色;基于国内行业准入机制逐步完善,专业把健康管理师职业资格证书考核标准纳入课程标准,推进“课程融通”;同时,于第三学年以专业拓展课形式,匹配区域产业发展的岗位需求分智慧康养方向、公卫管理方向及健康科技方向培养。而基于目前培养体系中,健康管理专业硕博授予点特别少的现状,开设公卫管理方向课程也为学生考取公共卫生管理方向研究生打下基础。具体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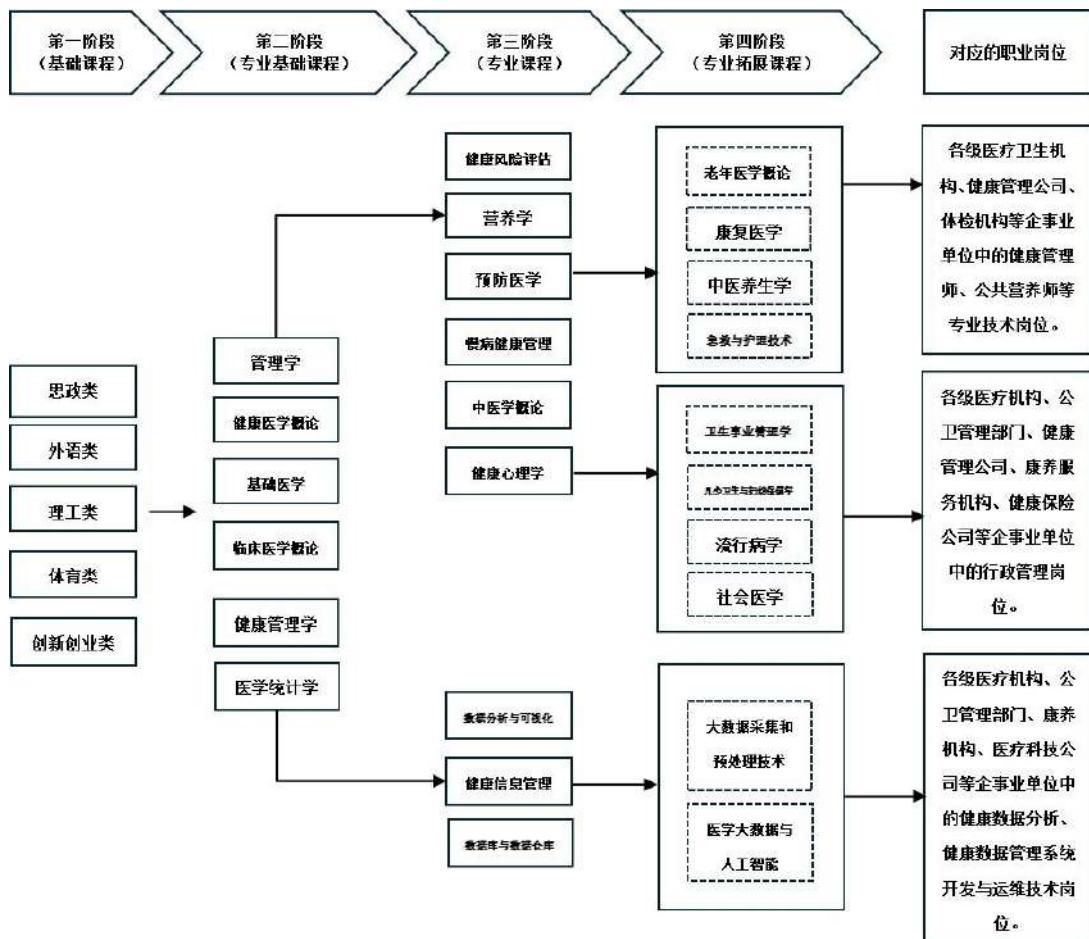


图1.课程设置与主要工作岗位对应关系链路图

针对实践能力提升方面,学校每学年开设3、6、9实践学期,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开展医院健康管理中心见习活动、健康管理企业数据分析及系统开发项目、社区公共卫生管理服务实践等实践教学项目,实现校企合作、理实一体、层层递进的实践教学体系,突出产教融合、科教融汇。

综上,国内健康服务与管理人才的培养模式仍需进一步实践及探索,须紧跟行业产业发展最新动态,持续吸收国内外优秀的培养经验,进一步完善培养体系及培养标准,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健康管理人才培养路径。

参考文献：

- [1] 刘瀚洋,穆云庆,冯泽永. 美国管理型医疗对我国社区健康管理的启示[J]. 医学与哲学(A), 2015, 36(09): 74-77.
- [2] Sonja Myhre, Mahlet Kifle Habtemariam, David L. Heymann, et al. Bridging global health actors and agendas: the role of national public health institutes[J].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Policy, 2022, 43(2): 251-265.
- [3] 谢春艳,胡善联,何江江,等. 整合保健:英国经验对我国社区卫生服务改革的启示[J]. 中国卫生政策研究, 2012, 5(09): 40-44.

- [4] Ogata Hiroya. [Health care delivery system in Japan: features, challenges and perspectives].[J]. *Fukuoka igaku zasshi*, 2012, 103(3): 49-58.
- [5] 于建琳. 美国高校健康管理专业的发展现状探析与思考[J]. *环渤海经济瞭望*, 2016, (05): 56-59.
- [6] 李英华,李长宁. 美国健康教育专业人员资格认证开发过程[J]. *中国健康教育*, 2021, 37(01): 57-62.
- [7] 李桂霞,钟建珍,王立虹. 构建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J].*职业与教育*,2005(20):4-7.
- [8] 王育珊,姚华,刘波. 新时代健康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现况及对策[J]. *新疆医学*, 2022, 52(07): 838-840, 842.
- [9] 张骞. 日本:健康管理是长寿秘诀[J].*中国卫生*,2013(6):42-43.
- [10] 李坦英,俞双燕. 健康服务与管理人才培养路径——基于国内外比较研究[J]. *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 2018, 38(10): 1278-1281.
- [11] 罗桂华,任佳瑞,李文清,等. 国外高校健康管理教育概况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 *中国医药导报*, 2022, 19(16): 75-79.
- [12] 张静,李宇阳,郭清. 我国高等院校健康管理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现状分析[J].*中华健康管理学*,2014,8 (4):275-277.
- [13] 陈君石,黄建始. 健康管理师[M].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7.
- [14] 张建. 日本高校健康管理专业建设现状及启示[J].*医学教育研究与实践*, 2018 年 12 月第 26 期:914-917.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Talent Training in Health Service and Management: A Case Study of Neusoft Institute Guangdong

Zhao, Xiaoqin¹, Zhong, Haiquan² Xu, Wencong³

School of Health and Medical Science, Neusoft Institute Guangdong, Foshan,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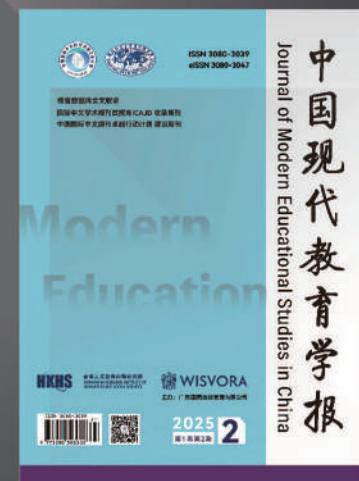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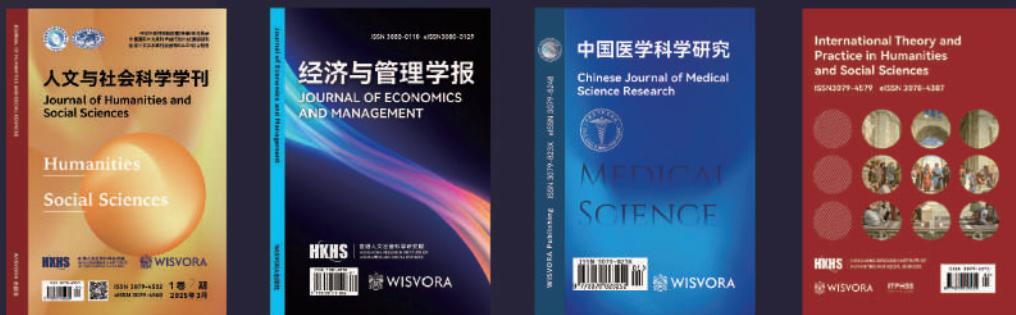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patterns and forms of medical and healthcare services at home and abroad, as well as the current status of healthcare personnel training. By comparing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healthcare service models, healthcare service and management personnel training models, training characteristics, relevant program offerings, curriculum design, training systems, and industry access mechanisms, it draws on best practices and carefully examines regional, industrial, and educational advantages. Taking Neusoft Institute Guangdong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explores a healthcare management personnel training path that suits

Keywords: Chinese-Foreign Comparison; Health Service and Management; Talent Training



WISVORA 出版社：专注于学术出版管理，WISVORA 出版社提供期刊编辑、论文出版和国际索引、期刊创办、期刊托管等服务，增强学术研究的全球传播和影响力。

www.wisvora.com



中国现代教育学报

Journal of Modern Educational Studies in China

《中国现代教育学报》是一份聚焦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服务教育强国战略的学术期刊。期刊以推动教育学理论发展与教育实践创新为核心使命，重点关注课程改革、教育政策、教学理论、教师发展教育技术等重大议题，致力于在新时代教育变革背景下，探索更加科学、高效、人本的教育路径。

印刷出版 ISSN 3080-3039

电子出版 ISSN 3080-3047



权责声明

期刊所刊载的评论、意见、观点等均出自文章作者个人立场，不代表本出版社的观点或看法。对于文章任何部分及文内引用材料给任何个人、机构、及其财产所带来的任何损失及伤害，本出版社均不承担责任。我们郑重声明，本出版社的出版业务，不构成对任何产品商业性能的保证，也不表示本社业已承认本社出版物中所述内容适用于某特定用途。如有疑问，请寻找专业人士协助。

学术赠阅